

时代映像：“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长长背影

刘 忠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工农兵英雄”形象负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讯息,时代诉求、表现对象和评价尺度的多重聚焦,让他们的精神品格进一步放大,不仅引领了接受者的身份认同风潮,也以其集体性、实践性、阶级性的优长取代知识分子个体性、理论性、批判性特点,成为一个较长时段的话语中心。探究原因,有时代与意识形态的征召因素,亦有知识分子身份改造和对象化成分。今天,我们审视“工农兵英雄”形象,在看到人物性格单一、审美表现稀薄等缺憾的同时,也应正视历史选择的合理性、阶级群体的价值导向等问题。

关键词:新中国文学;工农兵英雄;身份认同;历史选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01-07

新中国文学中,“英雄人物”一直都是文学话语的重要焦点,他们身上不仅浓缩了作家对生命理想的想象,也承载着人们超越庸常人生的期盼。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英雄”,从“五四”时期的“狂人英雄”到“左联”时期的“革命英雄”,再到“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英雄”,从新时期之初的“改革英雄”到20世纪90年代的叛逆、嬉皮士等“另类英雄”,再到新世纪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精英人士”“小时代英雄”。时代在变,文学中“英雄”的身份与面孔也在变。回望百年中国新文学史,“英雄人物”的出场犹如川剧中的变脸一样,层出不穷,给人们带来新奇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考验着批评家的思想认知与艺术识见。

一、文学史评价的恒定与摇摆

谈论新中国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工农兵英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纯文学论者”“价值优先论者”眼里,“工农兵英雄”不仅身份可疑,而且有悖人性,纯粹是思想斗争、政治运动的副产品,代表了一段扭曲变形的文学史;而在另一些研

究者看来,工农兵形象不仅诠释了国家叙事的合法性,而且是“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的具体实践,是小资产阶级退场、社会主义新人出场的标志,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起点。

究其实,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评价背后遵循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专注于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标准与价值理性,忽视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标准和工具理性,尤其是文学经典的流动性和结构性。前者先在地预设一个不变的人学标准,从普世价值立场出发,寻找文本、人性、审美等方面的不足,脱离彼时彼地的文学语境,进行价值比对,凡是符合此一标准的,就是人性的、审美的,否则就是违反人性的。后者则以普泛的“人民文学”立场,依据马克思·韦伯的“目的一工具”理性理论,认为以工农兵新人为标志的“十七年文学”是“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体现了国家叙事的合理性,表现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向往之情,是工具论文学的代表,缺少叙述主体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主题先行”“三突出”“三结合”等“左倾”理论的必要反思与警醒。

收稿日期:2019-10-19

作者简介:刘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二、投身革命与建设的果敢有效

作为历史话语之一种,文学史是流动的、交错的,文学史叙述既要遵循文学史发生的经验事实,又要体现治史者的价值立场和评判标准;文学史书写既要进入彼时彼地的历史语境,又要衡估此一语境中作家作品的审美价值,给经验事实和价值意义以双重关注,这样才可能规避文学史书写中的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文学史研究必须有历史的视角,考察文学发展现象所含有的历史文化内容。如果离开了历史而谈审美,这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但很难构成文学史研究。光用审美的视角回顾文学史,看到的也许如茫茫云海上的几座群山之巅,只是抽去了时间意义的一些零星的孤立的文学高峰,却无法寻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1]事实上,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和时代精神,只强调历史标准而忽视审美标准,或者强调审美标准而无视它的生活与思想内容,都是偏颇的,很容易陷入审美感性化、批评隔膜感的误区。例如,同是书写爱情,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迥然不同。在一个消费主义的年代,性爱的过度渲染和把玩极容易滑向人性的粗鄙面;但在一个禁欲主义年代,任何一点对性爱的触及都可能见出爱情的光辉、思想的锋芒和作家的胆识。

尽管在今人看来,“工农兵英雄”形象确实存在人为拔高和美化的成分,“假大空”“高大全”的标签也很自然、很容易地与他们绑定在一起,但谁又能否认他们身上承载的道德内涵和人格魅力,特别是在价值观念混乱的今天,英雄崇拜在化解心理焦虑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呢?从彼时彼地的文学生态出发,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考量时代与文学交互作用下“非议”不断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不仅符合“十七年文学”的经验事实,也可以规避用静态的、不变的价值标准来矮化“英雄”、解构“英雄”的偏颇做法,凸显文学史研究的在场性和鲜活性。当然,这样做也并非有意拔高“工农兵英雄”的人性高度,否认其审美表现的刻板单一,更不是为“左倾”、权威主义文学招魂;只是强调,对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十七年文学”,文学史评价应跳出恒定与摇摆的二元对立思维,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揭示作家迎合主流话语与抵抗主流话语的矛盾状态,呈现文本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人物形象的分裂性、阐释空间的多样性。透过“英雄”的长长背影,正视时代选择的有幸与无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表层主题与深层主题的置换、阶级身份的认同与疏离等因素的多元交织和复杂存在。

事实上,在一个战乱不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非常”年代,在思想启蒙收效甚微、民族国家久等不来的情形下,正是那些“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2]的工农兵英雄果敢地走到了中国革命的前台,肩负起救亡、翻身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工农兵英雄的牺牲精神、凸显他们身上阶级意识和革命动力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从解放区走来的作家和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作家身上(来自国统区的作家由于没有或者不熟悉工农兵生活,大多停笔或者延续之前的“小资产阶级”写作)。他们热情地歌颂战火中逝去的革命先烈、生活中拼搏奋进的建设者,弘扬英雄们的浩然之气,激励人们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诚如诗人们歌唱的那样,“在我们的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长几寸/苦难的背后/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3],因为英雄们的牺牲,才会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4]的自豪。

与“悲凉”之感遍披华林的现代文学相比,“十七年文学”洋溢着浓烈的喜悦之情,从主题到人物,从思想到情感,充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幸福感、自豪感,颂歌、赞歌贯穿始终,其主导话语即是“工农兵英雄”叙事。“经历了从旧到新的历史沧桑,咨嗟咏叹于民族国家之优乐,寄怀纵目于河山风景之兴替,努力以啜嚅之声同时代精神相共鸣,成了中国内地作家普遍性的使命与寻索。”^[5]在《讲话》“文艺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征召下,塑造“工农兵英雄”成为“十七年文学”的重中之重。作家们调动一切手段,塑造有着钢铁般意志、圣人般情怀的革命英雄,有意识地抽取、剥离日常生活的儿女情长和复杂心绪,赋予他们以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品格,把人物形象与时代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今人叙述这一时段文学史中的人物形象时,常常用“高大全”统称的重要原因。

不过,细读文本,我们发现,笃诚信仰、果敢行动并没有完全淹没人性的油彩,民间的英雄美女故事、青年男女花前月下的爱情嬉戏、单纯朴素的善恶观念常常会以碎片化的方式,突破意识形态的规限,点缀在英雄形象的左右。比如:《青春之歌》把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和爱情追求结合起来,《铁道游击队》中刘洪与淮风尘女子芳林嫂的爱情纠葛,《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万绿丛中一点红”白茹的两情相悦,在表现革命者“侠骨”“剑胆”品格的同时,也不

忘人物性格中“柔情”“琴心”的一面,没有回避性别身份在革命战争中的生长。被誉为“革命史诗”的《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身上透着明显的豪侠之气,《红日》《红岩》《创业史》《山乡巨变》中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传统小说“英雄美人”模式,满足了人们对私人生活空间的阅读期待。《青春之歌》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知识女性银环,《三里湾》中的中学生范灵芝,《艳阳天》中的回乡知青焦淑红等,她们与“工农兵英雄”的恋爱过程,也是知识女性的婚姻情感不断调试、走向新生的过程。否则,何以解释历经岁月的淘洗,朱老忠、杨子荣、林道静、江姐、梁生宝等人物形象仍然驻留在人们心中。《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风声》《我的团长我的团》《潜伏》《向延安》《惊蛰》《战神》《归鸿》《寻路》等电视剧中的英雄人物何以能穿越时空界限,还原一段难忘的历史进程,在“80后”“90后”甚至“00后”青年中引起情感共鸣。英雄们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对平凡人生的超越,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寻找一种伟大的人格高标,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从中国新文学史看,“工农兵英雄”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胡适、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茅盾、杨振声、王统照等人笔下的人力车夫、底层贫民、戴旧毡帽的朋友,左联时期《短裤党》(蒋光慈)中的码头工人、《地泉》(阳翰笙)中的林怀秋、《到莫斯科去》(胡也频)中的施洵白、《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丁玲)中的若泉、《春蚕》(茅盾)中的多多头、《丰收》(叶紫)中的立秋、《樊家铺》(吴组缃)中的线子嫂……在无产阶级思想引导下,他们经受住社会现实的严峻考验,认识到剥削、压迫的深层根源,最终走上了火热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身份的改变。

毫无疑问,面对“五四”以来的社会沉疴和沉重苦难,“工农兵英雄”在社会整体变革方面具有强大的有效性。首先,他们是反封建的中坚,憎恨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高举镰刀和斧头,砸碎套在他们头上的四大绳索。其次,他们是反帝的急先锋,对西方的殖民人侵深恶痛绝,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武装下,决意要打败侵略者,建立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要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体系的现代化国家,这个国家的雏形在1949年之前是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1949年以后则是新中国。在解放区,火热的战斗生活、军民一体的鱼水深情、当家作主的主人公精神,使他们由衷地唱出“解放区

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解放区的生活比蜜甜……”的赞歌。《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荷花淀》《芦花荡》《漳河水》《白毛女》《逼上梁山》《兄妹开荒》等作品进而确立了工农兵文学的新人形象,以个性、个体为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情绪逐渐被以集体、阶级为导向的革命英雄主义所取代。在新中国,翻身解放的人们更是用热烈的方式赞美、憧憬新生活,“凡是泉水潺潺流过的地方,就有荷花和稻花一齐飘香”(公木《难老泉》);“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邵燕祥《到远方去》)。伴随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放飞远大理想,歌颂党的领导,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抒发颂歌、赞歌豪情,成为许多作家自觉不自觉的选择。胡风的长诗题目“时间开始了”极富象征意义,预言了一代人的价值追求。

三、英雄人物的身份认同与疏离

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主导话语形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所用,在前进的旗帜上书写新生活,表现新人物,抒发翻身解放的自豪感,较为可行的路径就是塑造有着金属光泽的英雄人物,承载起反帝反封建使命,与新中国想象一路前行。从阶级出身看,“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战士英雄、农民英雄、工人英雄。

战士以及由此支撑起来的革命战争小说,由于深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大读者青睐,在“十七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保卫延安》(杜鹏程)、《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铁道游击队》(刘知侠)、《战斗的青春》(雪克)、《烈火金刚》(刘流)、《敌后武工队》(冯志)、《红岩》(罗广斌、杨益岩)等,都从不同侧面塑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周大勇、沈振新、梁波、石东根、杨子荣、少剑波、许云峰、江姐……构成了一个长长的英雄谱系。在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时代,他们以一种担当者的情怀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进程。被冯雪峰誉为第一部“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6]的小说——《保卫延安》中,杜鹏程倾注了火一般的激情和理想,塑造了一个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的我军基层干部形象周大勇,崇高的愿望,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为他在一系列战斗中筑起了一座生命价值的金字塔。

与《保卫延安》相比,《红日》在人物塑造方面丰富了许多,在紧张战斗之余,读者会出乎意料地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爱情场面和富有情趣的日常生活描写;小说开创了表现军人情感世界的先河,他们在为

艰苦战事日夜操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妻子的温情祝福报以微笑。较之周大勇,沈振新、梁波等更贴近生活,更接近现实。如果说战争中英雄的极致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那么监狱中英雄的伟岸人格依靠的则是信仰的笃诚和意志品质的坚韧,《红岩》中,“许云峰、江姐与徐鹏飞等面对面进行的精神较量,以及有关政治、人生观的论辩,成为强化小说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性质的手段。这种情景类型的设计,极大地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小说和戏剧创作”^[7]。许多年后,我们一提到这段历史,仍会把《红岩》视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怎样认识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勉励人们记忆英雄、学习英雄。

与战士英雄一道成长的还有农民英雄。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农村题材一直是作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土改运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每一个时期作家们都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就是它们中的佼佼者。一方面许多作家出生在农村,对农民生活有深切的体验;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思想立场的根本转变,知识分子纷纷以下乡、蹲点的方式深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由于有充分的生活体验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他们笔下的农民英雄极具感染力,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平添了许多生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程仁,《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不仅健朗明快、积极向上,而且心系集体、大公无私,他们或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或者是忠心耿耿跟党走的先进农民,或者是农村新生活、新风尚的积极实现者。

取材于解放区土改运动的两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一部以心理描写见长,一部以情节紧张取胜。小说中的农民英雄张裕民、赵玉林、郭全海——一个雇农出身,受尽地主盘剥,一个佃农出身,一贫如洗,一个长工出身,苦大仇深。作为先进农民代表,他们在斗争地主钱文贵、韩老六、杜善人中虽然有过顾虑、动摇,但在工作组的教育下,复仇情绪和斗争精神很快占据了上风,身世的艰辛、地主的欺压、宗族观念的沉重非但没有把他们压垮,反而使他们变得越发坚强,成为土改运动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翻身解放、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自主劳动的喜悦,又在党的指引下迈上了农业合作化的征途。这场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

社会运动,在占人口80%的农民身上引起的震撼是深远的,作家也不例外,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等,塑造了一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王金生、王玉生、梁生宝、刘雨生、萧长春等人勤劳朴实、任劳任怨、胸怀宽广,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始终坚信合作化是“创业史”的前提、“山乡巨变”的所在、“艳阳天”里的美丽画卷。为了写好人物形象,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人都曾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有的甚至举家迁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柳青、赵树理去农村不是他们同情农民,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农村是他们创作的根源,更主要的是他们觉得农村是中国历史的重心所在。”^[8]题材的宏大重要、人物的通体闪亮、情节的风云激荡使得这些农业合作化小说取得了与革命历史小说平起平坐的地位。

如果说土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张裕民、赵玉林、郭全海的英雄性格主要表现为苦大仇深的复仇心理、坚定不移跟党走的政治信念,那么合作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干部王玉生、王金生、梁生宝、刘雨生的英雄性格则主要表现为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集体观念、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奉献精神。从情节构成上看,张裕民、赵玉林、郭全海面对的是土改运动中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人物性格的核心是阶级性,解决矛盾的方式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存在任何中间道路可走。到了合作化运动时期,摆在王玉生、王金生、梁生宝、刘雨生面前的是农村的路线斗争——是集体合作还是个体单干,虽然也伴有复杂的思想分歧、阶层矛盾,但情节发展的“阶级性”明显弱化,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束缚,走合作化道路的主要手段已不再是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和榜样示范。

与“战士”“农民”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工人英雄明显缺乏,这自然与工业题材创作的长期不景气有关,虽然周立波、萧军、艾芜、草明、杜鹏程、周而复等人通过深入工厂、矿山,写出了《铁水奔流》《五月的矿山》《百炼成钢》《火车头》《原动力》《乘风破浪》等作品,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小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成熟之作。即使是被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提及的《百炼成钢》(艾芜),也烙有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多种流行观念的印痕,工人形象秦德贵因顾及当时政治需要而不断被概念化和简单化。工人形象的整体贫弱除了与“左倾”教条

主义影响有关,也与作家不熟悉工人生活或少有独到体验的“硬伤”分不开。近代以来,因殖民地而延伸的城市认知中,人们想当然地把城市与“罪恶”“堕落”“腐朽”联系在一起,城市空间被简约为斗争资本家的“场所”。另一部被视为“十七年文学”工业题材代表作的《上海的早晨》(周而复)也存在诸多问题,小说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全过程,既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也叙述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及被改造的经过,但塑造得相对成功的却是资本家徐义德、马慕韩、朱延年等人,工人形象明显薄弱,且留有“政治宣传”的弊病。这一弊病的出现一方面与“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方针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作家对工人生活的隔膜与体验不足所致。这也许是现代文学英雄人物画廊中充斥着农民英雄和战士英雄,读者记起的常常是朱老忠、杨子荣、江姐、张裕民、梁生宝等人,而少有工人英雄孙怀德、秦德贵等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城市的隐匿,工业题材的缺失,不仅弱化了“十七年文学”前行需要的精神、物质基础,也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城市生活特有的审美意义。没有工业题材及城市书写的参照,“红色”中国和“乡土”中国的基因——“革命”“乡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十七年文学”的关键词。

在英雄辈出的工农兵文学中,几乎见不到知识分子的身影,更遑论英雄可言。究其原因,既不是作家不熟悉知识分子生活,也不是对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已经起到并将继续起到重大贡献这一事实缺乏了解,而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所致。事实上,从“工农兵方向”甫一提出的那一刻起,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就陷入了窘境,他们的身份只有在被工农兵同化的过程中才得以确认。综观“十七年文学”作品,知识分子要么沦为汉奸、帮凶(《红岩》里的甫志高),要么被改造、锤炼为革命战士(《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前者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使然,后者则是党的教育、改造的结果。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革命战士,“成长”是他们必须经历的路径。作为成长的引路人,工农阶级尤其是党员,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中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他们既是成长的引路人,也是目标的实现者。

1958年,《青春之歌》刚一发表就遭到批评,指责小说“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9]。为了使林道静的成长符合

“既定路线”,杨沫在被批评的当年就对小说人物作了很大修改,增加了林道静从事农村革命运动的章节。从这一典型事例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走了一条艰难而又狭窄的道路。“小资产阶级”批判一直伴随着他们,从延安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批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批判;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到“反右”“反修”运动,知识分子散漫、软弱、狂热、幻想等根性始终与无产阶级“新人”想象相去甚远。工农阶级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既要吸纳知识分子成为其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又要警惕其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于意识形态的危害;而且由于工农阶级的乡村民粹主义因素,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很容易与都市的罪恶、颓废、庸俗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而成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他者”,受到规训和批判。

对“人的文学”的理解偏差,导致创作的单一化、模式化、概念化,文学开始从芜杂多维走向共同单一。英雄的坚毅勇敢来自信仰的崇高和笃诚,英雄的塑造源自“十七年文学”乐观、明朗、向上的总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强力介入不断强化新中国文学之“新”的要义,进而简化了人物形象序列的“中间”状态。在“坏人”的映衬下,英雄形象更加高大凌然,拒绝退缩,远离平庸,成为“十七年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

四、历史选择的合理与吊诡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英雄形象的时候,当以历史的、审美的眼光看待其存在的价值,而不是以纯粹的、抽象的人性标准将其简单归结为政治畸形产物,更不能把他们与“文革”期间的文攻武斗混为一谈,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其实,百年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诉求一直都存在两种形式:一是思想启蒙,一是行动救亡,前者的代表是思想英雄(如鲁迅笔下的“狂人”),后者的代表则是革命英雄(如赵树理笔下的“工农兵”)。从历史的角度看,戊戌变法的同时有义和团运动,“五四”之后有工农武装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同时也有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两种现代化形式互动共生,前者为后者提供思想资源,后者将前者目标落到实处,忽视任何一方都是对现代化认识的一种偏颇。

如果说狂人英雄的出现契合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题,那么“工农兵英雄”的出现则迎合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

学”一以贯之的救亡翻身主题。不同于狂人英雄的孤寂、悲凉，“工农兵英雄”勇敢而崇高，自觉把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周大勇、沈振新、石东根、杨子荣、少剑波、江姐、张裕民、赵玉林、郭全海、梁生宝、刘雨生……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将自己融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中，自身因为具有“善”的内核而变得伟岸、高大。也许具体到某个人物身上，的确存在拔高、虚美的缺陷，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价值尺度并成为排斥其他精神主题的做法，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消极影响，但作为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却极具有社会价值，是不应当全面否定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联系到当前才能加以理解”，“史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历史。一部历史书可以有其开端和结束，但它叙述的历史本身却没有开端和结束。”^[10]如今，农业合作化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十七年文学”不过是中国文学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但是，有关“工农兵英雄”叙事的研究将会像柯林伍德所说的那样，作为“活着的过去”，不断引发人们的评价与思考。

联系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工农兵文学带来的作家主体精神缺失、艺术水平降低等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考虑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建时期的特殊性，工农兵形象能够不断被书写和传承又具有历史的某种合理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形势由城市转向农村之后，工农兵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为了保护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激发他们参战、备战的决心，在指导思想上必然会适度地抑制知识分子而迁就大众，宣传战线尤其如此。无论就革命队伍的数量构成，还是对敌作战的勇猛刚烈，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比都处于明显劣势。何况武装斗争是那么迫切，改变国民落后性以启蒙思想照亮他们，进程缓慢不说；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下，进行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也是不可想象的。倒是郭沫若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诗人式的呐喊，最容易成为时代的主调。在抗战这场你死我活的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于文学和作家的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言，而是一切服从抗战、一切服从民族救亡的集体力量。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物形象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们的翻身豪情和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不断高涨，汇流成一部振奋人心的交响乐。通过讲述革命历史，来昭示革命的正义性

和必然性；经由讴歌火热的建设生活，来强化现实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就行进中的革命与建设进程而言，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等启蒙诉求也与“新人”想象的整齐划一、集体服从等要求格格不入，延安整风运动中对王实味、丁玲等人的批判，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对萧军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对萧也牧、俞平伯、胡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人的批判，对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战斗到明天》《关连长》《青春之歌》《三家巷》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的批判，都是工农兵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相歧义的结果。每一次运动的开展都是革命话语借助文学批判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规训和整合，从生活情调、审美趣味到思想立场、身份认同，全面为新人物、新生活、新秩序的革命话语让路。李陀在谈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历程时说：“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在整个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时期，他们并不是一生受难的可怜虫，也不只是一些被动、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被种种‘受难史’掩盖起来的事实是：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有过‘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也有过高呼‘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豪迈和气概。这些记忆不应被抹杀。”^[11]

于是，我们说让知识分子去迁就大众，实现角色转换，既是革命的功利主义需要，也是历史进程的一种无奈选择。这里既有被动的征询因素，亦有主动的自觉成分，尽管这其中有着太多的付出与沉重——思想的、审美的，甚至是生命的。

今天，回望“工农兵英雄”远去的泛黄而模糊的背影，反思那段政治性远高于审美性的一体化文学形态，对迈克尔·福柯所言的“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当有更深入的理解。在一个塑造“新人”胜于改造“旧人”的年代，决定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因素不仅取决于作家的主体选择，更取决于时代的意识形态语境，或者说，政治的时代的要求远胜于审美的个体的选择。在这方面，时代选择了工农兵形象的文学，疏离了知识分子和纯文学，这既是政治与文学的歧路，也是英雄与凡人的吊诡。从一定的文学史语境来看，工农兵群体对来之不易生活的礼赞和祝福，体现了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是一种自我想象与认同的实现。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中，人们用一种想象的形式表述自己”，传达“他们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是想象之表征的重心”^[12]。这种放大的主人公

感受与符号化的英雄形象互动共存,催生了工农兵文学的英雄话语和现象,也成就了此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史诗诉求和宏大叙事。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J].文学评论家,1989(2).
[2]鲁迅.摩罗诗力说[C]//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0.
[3]郭小川.向困难进军[C]//郭小川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毛泽东.毛泽东诗词全集[C].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
[5]杨匡汉.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23.
[6]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J].文艺报,1954(14,15).

-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4.
[8]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41.
[9]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几个原则问题[J].文艺报,1959(4).
[10]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
[11]李陀.丁玲不简单[J].北京文学,1998(7).
[12]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C]//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ra Image: the Shadow of Heroic Status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LIU Z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object in new Chinese literature, the heroes in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are loaded with a plenty of social,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messages and the multi-focus on times, objects and evaluation scale. Consequently, their spiritual character is further amplified, which not only leads to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recipients, but also becomes a long-term focus in literature because of replacing the individuality,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llectuals with their advantages of collectivity, practicality and clas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there are the conscription factors of the times and ideology,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Today, when we examine the heroic images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we should face up to the rationality of historical choice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lass groups as while as noticing the lack of aesthetic expressions and of the wealthiness of personalities.

Key words: new Chinese literature; heroes in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identity; historical choice

编者按:作家范若丁和艾云都是在河南开封出生、成长,然后到广阔的世界去,多年后成为广东文化界、文学界的领航人物,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作家和思想者。范若丁(原名范汉生)曾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内纯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杂志主编;同时,多年来坚持文学创作,著述颇丰,其中记忆开封的长篇小说《旧京,旧京》,被誉为“闪耀着奈保尔《米格尔大街》式结构与叙事之美”的反思之书。有着共同背景的作家艾云,书写评析作家范若丁及其创作,有思之高光下的独到发现,亦有灵魂相惜的温馨之处。

摹状那时的民众

——漫谈范若丁和他的创作

艾云

(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 广州 510635)

摘要:作家范若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回望和记忆中,叙写着另一个民国——民国时期真实的民众形象。他写在出生地开封见过的人和事,写随家人逃亡老家汝阳县郭村的所见所闻,写避战乱到南阳南召的昼与夜。他只是写自己熟悉的平凡而又动荡的人与事,因为大时代的不平静,他们经历中的故事都是在悲剧性场景中展开。但人们似乎很少气馁和哀伤,都在动荡中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独特时期普通民众的生存景况。这是对民国叙事的重要补充。

关键词:范若丁;《旧京,旧京》;《失梦庄园》;民国时期;民众形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08-10

有些文字如果你没有接触,也就罢了;一旦有机会相遇,你就会忘不掉。许多论者在评价范若丁的创作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文坛宿将范若丁,文笔蕴藉宛转,波光潋滟。他用干净利落而又精纯唯美的语言,用平静中饱蘸的浓烈情感,用仿佛书写乡愁的慢板,在叙述惊心动魄的人物命运、家国情怀。

我在阅读中,除了惊叹他不俗的笔致,同时我还发现:因为独特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他在有意无意中弥补了我们认识阙如的一些空间。

表面看,他总是在回望和记忆中,用童年或少年的视角观察和叙述,在写记忆的文本。实际上它的意义远不止这些,他在写另一个民国,写民国时期真实的民众形象。这是对民国叙述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关于民国,对它的叙说似乎成了显学。

从事近代史、文化学、文学、教育等专业的研究者和创作者都对这一断代史很感兴趣。

民国是什么?

从时间上说,民国指的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8年。这段历史,不算古也不算新,它就在我们身后的不远处。于是,我们透过历史灰黛色烟岚去回望它:它是致力于乡村改革的晏阳初撩开青布长衫走在定县乡间田塍的身影,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经验哲学讲述的声音在报告厅的回荡,是徐志摩、戴望舒和废名的新诗在夜光熹微中对灵魂的冲撞,也是西南联大在炮火连天的辗转中坚守专业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38年的民国在历史长河中很短暂,其间又伴随

收稿日期:2019-10-29

作者简介:艾云(1957—),女,河南开封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广东省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作品》杂志副主编,多年来从事思想随笔、文学评论及散文创作,曾连续在《花城》《钟山》《作品》开设专栏,获“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等,广受业内和读者注目及称赞。

着军阀混战、党争不停、外敌入侵等艰辛曲折的岁月。但是人们却记忆着民国，并为它赋予深沉美好的想象力。也许，人们记忆和叙述的民国，是前国家政治伦理时期，还有某种缝隙可以生长出自由奇葩的那个民国。

更多的文本描述，大体是关于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民国。而那广袤的城乡，在经历着战乱、饥谨，在政府有效治理几近废弛的边缘地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亟待看到。

我们现在亟待看到的，范若丁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陆续写出来了。他写他在出生地开封见过的人和事，他写随家人逃亡回老家汝阳县郭村的所见所闻，他写避战乱到南阳南召的昼与夜。

他没有选择很宏阔的人与事，只是写自己熟悉的平凡而又动荡的人与事。这些人性情各异，灵魂殊然，他们有的洒脱浪漫，有的卑微粗粝。因为大时代的不平静，他们经历中的故事都是在悲剧性场景中展开。但人们似乎很少气馁和哀伤，都在动荡中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是如一季又一季麦子的普通民众。如果没有人发现、叙述他们，他们就烂在地里或随风飘弃了。

幸好有范若丁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独特时期的民众生存景况。

一、关于开封以及《旧京，旧京》

我曾经编发过范若丁写的一篇散文《家住开封府》。多少年以后，他回到开封这个出生地，去找他童年住过的小纸坊街以及那个院落，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就仿佛大地上从来没有过它的存在一样。作为大的遗址复建的“开封府”，在扩容扩建时已将他住过的院子和街道铲平，成为府中某个内殿的一部分，旧街也湮灭了。

比这篇散文更早的时间，他已经构思并完成了长篇小说《旧京，旧京》，仍是在记忆开封。

开封和开封的那条街道，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1934 年 1 月，在北方的严寒中，开封城西南小纸坊街的一个煊盛的院子里，将军范龙章家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他就是范汉生，后来他的笔名叫范若丁。谁都没有想到三少爷会进入文学生涯。

多少年过去了，他又来到这里：

正午，我来到这条街上。在一个杨花似雪的季节，这里没有杨花，也没有过去的风沙，风沙正吹在我的记忆中。

这条街太苍老了，五十几年过去，它苍老得令我几乎认不出来。

五十多年对它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它

可能已经过无数个五十多年了。在它残破的皱褶里，留下了无数个五十多年风霜雕凿的痕迹；但对我来说，五十多年几乎是一个生命的整部历史。

我从一个叫“州桥”的地方，辨识出一个狭窄灰暗、被岁月尘封的街口。^[1]

踽踽独行中，他仍在寻找那条旧街，寻找街坊们。他在寻找自己住过的几进四合院，寻找熟悉的高门楼，寻找大门的青石台阶，寻找二门里那颗酸石榴树。却是西风独凉，黄叶疏窗，往事残阳。

记忆如风，飘来了开杂货铺的老八、给人做衣服的甘裁缝、推车卖水的刘把子、车夫郭娃、卖五香兔肉的郭汉、卖油饼糖糕的老噪婆、淘大粪的王二黑，以及抽老海的外婆、凡事斡旋操心的公馆女主人母亲、对自己护犊疼惜的陈干娘、失意的将军、妩媚薄情的明星姨、怀才不遇的大哥等亲人的面容。这些人物涌动着，飘散在自己眼前。于是，一部跨文体的长篇小说《旧京，旧京》创作出来。

《旧京，旧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责编是颇有慧眼的名编何启治和杨柳，出版以后受到各方好评。它的文体非常有意思，你可以说它是长篇小说，又可以当散文来读。他写的是旧京旧街上的一组群像，他们可能是引车卖浆者流，也可能是高门大户的显要。复杂的社会层面，也让他的文笔跳宕着，时而深情，时而幽默，但都不乏对人性深层的把握。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街坊甘裁缝和杂货铺老八。这两个人一见面就斗嘴。甘裁缝去老八铺子里买酒喝，还没喝酒就嚷嚷他酒里兑水。说归说，他仍是买酒，喝醉，趴在柜头上睡去，老八将他扶回家。老八找甘裁缝做衣裳，总说甘裁缝做得不合身，让他拆了改，改了拆。

这却是两个互怼中彼此慰藉的男人。他们各有心酸，只有在磨嘴皮子中找些乐子。孤身一人的甘裁缝逢酒必醉，逢醉必是恸哭。哭声凄人，街坊们早已习惯了。他哭时，有时只有老八陪着。老八被抓，甘裁缝以为他会死，做好青布大衫去探监，好让他黄泉路上体面些。后来老八被放，又让甘裁缝将衫子拆了改、改了拆。

这一次，是甘裁缝被抓，老八备上好酒去探监，两个老伙计只喝酒，一切都在不言中。最后甘裁缝被逼无奈，一把火烧了自己和房子。为他收尸安葬的也是老八和邻居们。

《马嫂》一章，我细看下去，才知道写的是陈干娘。在平时的聊天中，我不止一次听到范若丁讲他的陈干娘，他生下来四天，陈干娘就做了他的乳母。

他是吃陈干娘的奶长大的。

陈干娘一生却是命运多舛。当年，她男人的三间门面铺在冯玉祥做督军给开封人修路时给硬扒了，没赔一文钱。男人魔怔了，后来男人被日本人的汽车轧死了，她婆婆死了，小女儿也死了。后来她嫁给了马伯，成了马嫂。马伯待她很好。不承想，原来与她有过暧昧的小排长祸及马伯，马伯被囚死于狱中。又一次成了寡妇的陈干娘愧恨交集却又欲哭无泪。她在暮年仍给人当保姆，借此维生。书中写到最后他去看病重的陈干娘，一声“妈”叫得人肝肠寸断。陈干娘于是年死去。

这个普通的底层妇女，给了作者的是无尽的母性温暖。这是他永远的母亲。

范若丁写的旧京、街道和众者，我并不陌生。

我与范若丁都是开封人，是同乡。从居住的位置说，他住的小纸坊街在市区西南，我住的火神庙后街在市区东北。从时代与经历来说我们也有所不同，但这座古城的秉性和特质都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开封是八朝古都，这里曾经有过煊赫的历史，尤其北宋时期，这里是世界级的一流繁华都市。后来，耀眼的变为黯淡，辉煌的变为坍塌。可它骨子里的东西还在，流在血液里。

开封具有皇都、商业古城的典型特征。1954年之前，它还是河南省省会所在地。这里有官宦等政务人员，还有商贾之人。除此之外，它有广阔的民间，有三教九流的平民社会支撑着某种权力部门的一应用度。在街衢里巷，平民们日常谋生着——剃头搓背的、杀猪宰羊的、送水淘粪的、卖面缝纫的、开饭店卖杂货的，等等。

开封人身上有很高的辨识度。他们显然是见过世面的，遇到棘手难事绝不心虚露怯；他们是洒脱豪爽的，推崇济功好义。他们中间也有奸佞小人，有强势歹人，但这些人成不了大的气候；威望孚众的，仍是解人之困的任侠之人。他们对生死看得超然淡定，认为是瓜果熟透了就会掉进泥土里，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

虽说可以不惧死，但他们依旧希望世事太平，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古城的日子常常是不太平，黄河是条悬河，黄河一旦决口，首先淹的就是开封城。多少次的河殇，黄水过后，一座城市湮灭了，又一座城市建起来。有多少灾难，就有多少抗争。开封城是城摞城。

开封人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却依旧顽强地活着。普通的百姓，有几顿饭食就不用发愁了，就会玩斗鸡、玩画眉、玩古董；也会自己写字绘画。一个杀猪卖肉

的，就能写出一笔好的书法，然后，同行互相品鉴。

日本人进攻中国，入侵开封，这是灾难。终于，抗战胜利了。

范若丁的《旧京，旧京》写的正是抗战胜利后的开封。他写了人们对和平的期盼和对内战的担心。但内战还是来了。该书主题是对内战的反思，对突然而至的“革命狂热”的反思与批判。

从日本人铁蹄的蹂躏和践踏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似乎找不到太多胜利的喜悦，他们依旧受着自己族群中那些握有大小不一权力的强梁者的压榨和欺侮。地痞流氓和心术不正的警察合谋着公报私仇，对得罪过自己的人下黑手。

这本是一个新旧时代的转换，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却没有将这步棋走好。他没有下决心整治好自己的党纪和军纪，也没有将国计民生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说起来，蒋介石作为一个执政党党魁，可他从来没有实施铁板一块的统治，那时各路军阀都很有势力，并且对他的位置时时觊觎造成威胁。话说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学良、河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等人，都对他虎视眈眈。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并将自己占据的行政省变成了家天下。他们有自己的政令，并且开始构建城市规划，改造市容市貌。像广州的陈济棠，他设计城市蓝图、铺路架桥、建筑府第、兴办学校。现在广州的道路交通和城市设施，基本上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济棠主政时的构想。

拥兵自重的军阀以自己管辖的地区为域闾，他们独自经营和控制，根本没有把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放在眼里。蒋介石还没有来得及统御全局，收编各路地方势力，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这各路强人才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并肩浴血奋战。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却是各股势力人心叵测，各打各的算盘。蒋介石的治理又一次陷入失效中，其纲纪废弛、民怨沸腾是这一阶段的写实。在其治下，逐层的大小不一的官员私欲膨胀。接收大员忙着中饱私囊；下边的小官吏，也借机使用各种手段，打击报复那些曾经违逆过自己的人。

范若丁在写甘裁缝被抓一章时，写到的警察局曹局长很有代表性。曹局长在日本人得势时充当狗腿子；日本人战败了，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抓甘裁缝、抓老八的急先锋。他抓甘裁缝的理由是甘曾经给日本女人做过衣服。他又诬陷甘裁缝家藏有银圆，并派人掘地搜索。打开甘裁缝埋在地下的箱子，却是

甘裁缝死去多日的女儿。

甘裁缝死了妻子、儿子、女儿，他已生无可恋，只好一把火将祖屋和自己烧焚。

当民不聊生时，这个政权存在的群众基础在坍塌，它不败才怪。这个政权若是小人得势、坏人当道，它就前景堪忧了。

国民党蒋介石对党内的坏人坏事很难整治，在政治上也难有清明局面，那时候的普通民众，陷入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状态，他们对颓败的统治阶级已无望到极点，亟盼一个代表民众利益的政治集团出现。那边厢，共产党明确提出要推翻压迫人、奴役人的阶级，让穷苦的无权无势的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这样的宣传，是太鼓舞人心了。那边厢，解放区的天空湛蓝晴朗，那具有信仰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对光明前景的憧憬，理想主义的表情甚是动人。范若丁在文字中已经写到，“我”与我的哥哥、表姐们已跃跃欲试，要参加到革命阵营之中。

两相比较，民心有了向背，有了泾渭分明的立场。

范若丁在不动声色中，在叙写普通民众形象时，已经在揭示国民党维持不下去的深层原因。

不光是普通民众，就连那些曾经在政府中供职的军政人员也全无前途可言。在《失意将军》中，曾经的山大王呼风唤雨的黎焕如黎司令官位越来越低已无实权，又无处可去，他只有躲在凡家的客房白住白吃多日。到后来只能贩卖些玻璃丝袜、雨衣、口红、香水度日。魏然堂参谋长也卸甲归贾，干起押车贩烟叶的生意。有一次他在押车途中因太过劳累，从火车车顶上跌落摔死了。而那个酷爱书画、满腹经纶的姬参议，参加完国大会议以后，已对前途彻底丧失信心。

此时国民党内部上下不和、互相齟齬，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已无人收拾。

经济上，国民政府强行推出“金圆券”，一麻袋钱币买不回一个烧饼，实际上是变相搜刮民脂民膏。老噪婆说，你给我算算账，昨天每盒烧饼发货120元，可以卖150元，好像是赚了。可今天却要涨到180元，明天、后天呢？老噪婆干不下去，得了一场大病，被家人接回乡下了。

如果正义阙缺、公平退场，又加上通货膨胀、经济下滑，统治的根基已摇摇晃晃了。

这是城市的写照，那么广大的乡村呢？

二、汝阳、南召以及《失梦庄园》

在范若丁的《失梦庄园》^[2]中，《打孽》这篇，描写了一个想要推行乡村民主政治的七少爷形象，篇幅不长，却是句句段段令人震撼。

七少爷后来当上了县参议员。他恪守公职，提出《本县战时乡村教育的扶助与经费筹集案》，也提出《彻查瞒丁瞒亩与刷新区乡行政案》。七少爷是个读书人，接触过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影响，他是个有开明新思想的人，希望有公平竞争下透明的政治选举。

于是他提出参选县参议长。他有正义理想和道德影响力，有众人捧场，他相信自己已经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原参议长送了县长十亩好地，县长支持参议长。开箱验票这天，一把乌黑油亮的手枪放在了投票箱上，原参议长的内弟是县警察局长，他扬言选票有诈要将箱子收走。

从此，七少爷和县原参议长和警察局长结了仇结了孽。他本人被打了黑枪，手下保镖当场被打死。他左颊挨了一枪，幸亏那匹黑马，驮着他冲出包围圈。看起来，选票没有枪弹厉害。通过这件事也让七少爷明白，在江湖上走，有枪才是硬道理。于是，他卖20多亩水田换回了十几支长枪短枪，并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派手下在麻将桌上打死了警察局长，参议长钻到桌子底下才侥幸逃命。

七少爷当上了县参议长，他还能如愿实施他改革乡村政治和县邑政治的理想吗？不可能。他原本忧国忧民的惆怅被终日里的惊惧恐慌所代替。他有了仇家、与人结孽，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如临大敌。

七少爷已经陷入血仇里边，他无法有安定的人生，也不会有好的命运了。他最后的结局是，在一次搭戏台做会时，他被人打了黑枪。他自己死了，同时被枪击的还有七少奶奶，他9岁的儿子，3岁的女儿。只有16岁的儿子在别处而幸免于难。儿子到远方读书，准备着有朝一日为父报仇。

可以想象，他的后人也将再一次跌进没有尽头的冤冤相报的魔咒里，无从脱身。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范若丁在抗战期间随家人逃难时，曾经住在一户姓吴的人家那里，吴少爷瘦瘦高高的，很儒雅，是个知识分子。他喜欢到我们住的地方聊天，他正在争取当县参议员，后来打孽时被人打死了。七少爷正是以他为原型创造的。范若丁11岁的时候，就想写予坪发生的事，他说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过《予坪八月记》。

范若丁一开笔就这么为七少爷定下命运的基调：“我坪的七少爷是为中国的伟大民主政治捐躯的，是被打孽打死的。”他接着在中间又再一次重申：“是应该在史书上书他一笔的，可惜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难怪他感到冤。”

七少爷应该是死不瞑目。他原本是个眸子清亮、

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却成了一个难逃打孽悲剧的可叹可怜之人。他所挂虑的乡村民主政治，在他痉挛的抽搐中早已成为幻梦。七少爷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政治民主观念到最后又回到帝王思想。

乡村民主政治能够实现吗？不仅七少爷在问，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社会学家、政治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却是百思不得其解。

若说蒋介石对城市管理还显粗率的话，那么他对乡村治理更是缺位。他似乎什么都来不及去做，顾此失彼。在他管理缺失的乡村，一些乡绅走出来，开始做着某种斡旋与平衡，他们也的确起到了维持和稳定乡村秩序的作用，这正是后来许多知识分子对之留恋和赋予美学想象的重要因素。

何谓乡绅？就是在一个较大些的村落，有更多同姓同族的人聚居一起，从这中间产生出德高望重的人。这个人要能秉持公理、主持公道，有担当的能力。在面临外部势力的打压挑衅时，他不怯懦不畏惧，能够与之抗衡。但他还要有化解各种矛盾的平衡斡旋能力，不轻易树敌，否则自己生命的半径就是不安全的、是危险的。也就是说，他要有足够的谋略。大量时间，他要管理自己同族群众的一应事宜。

这个人不仅是道德化身的，他还要有良好的家世、优渥的经济背景。若是自己不仕不商，但自家亲眷却可能在外头当官或经商，他因此是个有背景有权力做后盾的人，否则，他建立不了自己的威权。他如果不是这样的，面对那些刺头、歹人、无法无天的强梁之人，他根本压不住，办不了事。乡村的是非很难断定，有权就有理，这就是乡村的道理和逻辑。

恰巧这个族群中出现了一个有教养、有能量又有魅力的乡村绅士，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就有可能找到说理、仲裁的地方。哪怕这个人手里只握有有限的权力，但这是为村民祈求和信赖的。

也因此，在后来也是当代的乡村政治和文化史研究中，许多学人对乡绅寄寓了许多的溢美，甚至有将乡绅形象一味拔高的倾向。并认为当下乡村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那难以解决的矛盾与症结，乡村堕入沦陷的可悲境地，与乡绅阶级的消亡有关。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也比较认可这种说法。但是现在我对此却在做某种反思。

这种认识当然不能说有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首先得意识到，乡绅在大的村落的同族同姓人中才能发挥作用，同族人一切还好商量。可一个村庄不可能没有外姓人。在处理某事时，可能外族外姓人会认为你们是以多欺少，因此心里不服。如果你硬要压服，这就栽种下怨恨的种子。从来都

是人心叵测，很难预期。人是最复杂的。

说到人的复杂，当然也就包括乡绅本人的人性复杂。人都有七情六欲，也有判断时的个人偏好，甚至是偏见。乡绅也会这样。他如果被赋予道德化身，他很有可能会做出残酷嗜血的行为。比如借口族中女人违背妇道有失风化，硬要将她们浸猪笼、沉深潭的事情屡见不鲜。陈忠实在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写到的田小娥，正是伪善的道德和假门假式的所谓乡绅一手造成了她的悲剧。

再进一步追问，乡绅阶级很难在乡村有普遍的存在。他们多在江浙、广东及四川等相对富庶些的省份产生；更为广阔的乡村，乡绅并不是广泛存在，有同门同宗的大户，但是实力、背景和秉持正义样样不缺的人物似属少见。

乡村仍是那么多难弄的棘手之事该怎么办？许多时候，就只能通过以暴抗暴的形式，以诉诸武力的血拼形式来解决。这就是血酬政治。

在封建社会以及前国家政治伦理时期，宗族势力和血酬政治是乡村交叉一起的混合体。在政府管理有限乃至失效、法纪纲常废弛的广大乡村，血酬政治占更大比重。

范若丁笔下的中原乡野，那是亚秩序下黄河岸边的中原。朦胧陆离的树影中，依稀可见那有着黧黑肤色和层层皱褶的农人的面孔。皲裂的大地，豁出了巨大裂隙，人们在不平、冤屈和哀伤绝望中，只能铤而走险。

范若丁的《打孽》一文，写的正是这种残酷的风气。打孽就是打冤家，这种风气在旧时的豫南一带盛行。人若是互相结了恨，几乎要将对方斩尽杀绝，以剪除后患。这是剽悍而又残忍的民风。范若丁的叔父正是在家乡被局子头无端杀害，父亲避难当兵，几年后带着结义的兄弟打回老家杀了局子头一家以报血仇。当然，后来父亲参加抗战打日本，成了赫赫有名的范龙章将军。

血仇中必须要出现强梁的人物。河南的嵩县有架杆的小红鞋，南方有截路的瘫子，更有刀客。这些人有好侠仗义者，也有横行无忌、杀人越货者。他们再强梁，凭一己之力，能会有更好的未来和命运吗？

范若丁写的《刀客张》一文，非常值得咀嚼。刀客张武艺高强而又行侠仗义，在方圆被称为好汉。日本人进攻，刀客张决不当汉奸。他落入日本人之手，受铡十指的酷刑，他机智中保留下三指。第二次入狱，他被烙焦脚板，仍是逃了出来。第三次被抓，第三次逃脱。

原以为这个刀客张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好汉，

却不承想，别人杀不了他，他却自己杀了自己。在浑浑噩噩之中，他开始吸日本人的白面而日益颓废，他的小老婆二妮儿在劝阻他时被他一怒而起而误杀，他随即也自杀，结束了自己任性而顽劣的刀客生命。

《打孽》中的七少爷和刀客张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七少爷是个有民主政治思想的知识人。他和人血拼，与个人利益、家族关系无关，一切只关乎理想。他想通过竞选实现抱负，能使一方少受肆虐而求民主公平正义之境遇。但他却也难逃血酬政治的厄运。

中国的乡村社会，真是有着难解之谜。

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皇帝，民国了，可是法律却仍然是缺失。尤其在农村，乡人更是苟活着。在受屈辱和受欺凌中，如果有忍不下去的，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冤冤相报中一剑封喉、白刃见血，最后是鱼死网破。

大量的农民是隐忍的。他们想要过安宁的太平日子，我不会欺侮别人；别人欺侮了我，我也面面相觑下去。他们信奉心上能搁把刀的哲学，那就是个忍。

范若丁笔下，对那时候生存于乡村的民众，有多重形象刻画。他除了写极端情境下那些暴烈刀刀般凛然个性的人，还用平静温婉的笔触写了许多小人物，那些普通人。

在《老何家》一文中，他写了一个看牲口的老何。老何贫穷窝囊，一直打光棍，可他却能驯服最难驾驭的烈马。后来他用两石麦子的钱迎娶了一个新媳妇，看把老何乐的。可是过了一年，“一个深秋的早上，大雁悲鸣着拨开迷蒙的晨光，向南飞去。皂角树的叶子落了，几个没有打掉的皂角，在高高的树枝上颤抖”。在这样悲凉的情景性描写中，果然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老何的媳妇跑了。有人出主意，让老何往一个仿若媳妇的稻草人心口扎针，说这样就能把她召回。老何终是不忍，不扎。他说，她临走时没拿走家里一样东西，她过门做的几件衣服也都在。老何犯魔怔了，不久便郁郁而死。

《棺屋》那一篇，写一个会做细活的郭木匠。他原本有个不错的家，媳妇心灵手巧，会剪漂亮的纸花，却不幸害噎食病死了。

郭木匠来为祖母做棺材。豫西一带的风俗是人活着就开始做寿材了，以避凶。郭木匠在后院精雕细刻做棺材。他的白天黑夜都在这一凿一斧中。后来那年夏天，不知怎么，支着棺材盖的木棍倒了，躺在棺材里歇息的郭木匠闷死了。

在范若丁笔下，乡村的农人，这些自然性存在，他们如麦子一样只有一茬的生命。一阵狂风吹来，割茬了，过季了，场光地净了。他们是否曾经来这个

世上走过一遭，原本没人知道，是作家的文字，证明他们曾经活过。

范若丁笔下的女人命运，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夜嫁》一篇，写的是豫西寡妇再嫁的情景。舅爷抽大烟上了瘾，他让儿子卖壮丁。儿子一去无归。他以为儿子死了，于是又将儿媳当寡妇卖了，再嫁了。只能在夜里完成再嫁仪式，新娘倒骑毛驴去往新夫家。

身后舅爷虚假地干号：“你这个没良心的……”这种赶着骂，是寡妇再嫁的规矩。

女人的命运不能自己做主，她被推搡着，不知迈向何处。

《狐媚子》一篇，让我看得很是揪心。

二伯的养女，也是半个丫头的香月生得俊俏媚人。祖母和宅子的人都不喜欢她。她爱上了教书的陆先生。陆先生满口救民众于火海的大道理让香月沉迷。陆先生和香月在棺屋幽会，大家以为半夜闹鬼。当有人问陆先生关于香月的事，陆先生故意反问：“香月是谁？”后来香月怀了身孕，后来她死在了棺材里。

香月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因为顶棺材盖的木棍滑落导致躺在棺材躲避的香月窒息身亡，就像郭木匠那样？还是知道她怀有身孕的陆先生一手导致了她的死，为的是自己逃脱干系？祖母和二伯父对这一切心照不宣地不追究，使得香月之死成了个难解之谜。一朵鲜艳的月季花般女孩儿的生命枯萎了，凋谢了。

一切都写得波澜不惊，却又是如此惊心动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性深处的虚假和伪善。在颜色、自保面前，人命不值一文。可怜的香月啊。

在《失梦庄园》里边，许多篇什都表现了范若丁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为卑微的小人物做传，为凄清的女人命运凭吊。

在中国社会，不乏有意志力强悍的人，他们在用能量和武力去争取或高或低的目标。但在这些人的心里，关于悲悯和爱是匮乏的。也可以这么说，在过于贫困愁若厮杀不断的乱世，很难生长出仁慈美好的情感。

在范若丁的笔下，那个老祖母的形象值得深思。她曾经孤儿寡母，生活在别人的歧视中。她痛失次子，悲痛欲绝。但是当可以享受大儿子给她带来的好运时，她是很难悲悯别人的。她为了让自己在阳间的寿数更长，便让自己的儿媳减寿以为她增寿。《过阴》这篇，寥寥几笔，就将一个人一阔脸就变，人性扭曲的形象刻画出来。

在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中，会有畸态扭曲的人性，范若丁揭示批判的笔力不讳言、不掩饰，这正是一个

作家的灵魂书写。

范若丁用他很少意识形态遮蔽的运思,写出了那中原大地的生灵。那个早熟的少年,躲在无尽的暗夜,在半懵懂半清醒中去观察思索,有朝一日他将听过的、见过的人物描述出来。这些人物的身影不伟岸、不高大,都是些普通的苍生。正是这些形象,补充着我们认知尚显模糊的另一个民国。如果认为范若丁只是童年视角记忆文本,就低估了其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了。

范若丁在每篇的末尾写有落款日期,《失梦庄园》一书中的很多篇章写于1986年8月的鸡公山。那一年,我已经分配在河南省文联工作,我们单位在河南信阳的鸡公山有个创作基地。范若丁在那年8月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在鸡公山的创作基地安心写作。他是从广州到鸡公山的。他说他效率很高,几乎每天一篇,每篇不长,三四千字。涌动中的思绪,只需写出便是。可他写出的却是篇篇佳制啊。

我曾经在1989年夏天去过鸡公山的创作基地。这座小楼,四围是分开的双间,利于作家安静写作;中间有一个公共活动场地,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喝茶。夏天的山上凉爽宜人,只有山风吹着,让人几乎不知暑热。推开窗子,遍野叠翠。

在这里,范若丁写下了他的许多重要篇什。数一数,30年过去了,文字依然美妙,人物依旧鲜活。揭示人性的文字从来不会过时,因为这是一个永恒话题。尽管他低调,不自诩,但范若丁的文字有着稳定的艺术品质,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这在中国作家里边,实属少见。

但是他说,他最想写的那本书还没有完成。

三、关于父亲

201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广州天河北时代广场的一个临街咖啡馆,我与范若丁坐在那里聊天。话题很集中,他想听我谈谈他初稿的长篇小说《滔滔黄河》的读后意见。

先前,他将打印好的上下两卷的《滔滔黄河》拿给我看。这的确是一部展现恢宏壮阔历史的大书。这是发生在滔滔黄河岸边的故事,书中的主人公是父亲,是那个具有传奇而又具悲剧性的父亲。

范若丁想写的正是自己的父亲。

父亲范龙章在刚成年时家中便遭遇横祸,小他两岁的弟弟得罪了强人而被局子头杀死。为避难,范龙章逃走参军。他有勇有谋,从一介武夫成长为凛凛威严的将军。他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参加过几次有名的抗日战役,为民族解放勇敢杀敌。蒋介石曾封他高官,但他仍是向往延安,相信为穷苦人谋幸福的共产

党。新中国成立后,他留任河南省政协工作,直到去世。

范若丁幽幽地说:“往事虽已如烟,但记忆深刻的不会忘掉。我小时候在开封市小纸坊街出生。那时父亲已有了相当的职位,可以买房子置地了。4岁时即1938年,日本人快要打到开封,我们回汝阳县郭村,就是老家。只记得包了一节车厢坐火车,有士兵保护着回到洛阳。在洛阳住到一个院子里。院子前后都是伤兵,他们扎着白色绷带,用灰颜色毯子裹住身体。”

范若丁一讲述就有场景呈现,这是一个感受力强烈的创作者的禀赋。

他继续说:“在洛阳住了几天,我们坐汽车回家,因为公路开不到村里,又换成轿车。记得天下着雨,过杜康河时,轿车震动,我母亲给祖母买的梨子都掉进河里了。回到老家,就见一座大院子,房屋刚刚建成。这就是我在《失梦庄园》里写到的场景。”

他又说:“1944年4月间,日本人已打过黄河,汝阳县成已沦陷区。日本人知道我父亲,天天要来抓他的家眷。无奈中,我们往后边的伏牛山躲避。在这期间,我们家,还有武庭麟一家,王凌云一家,都住在一个村子里。”

我对这两个名字很陌生,于是问:“这两个人是谁?”他说:“武庭麟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当年他负责守洛阳,与日本人正面交锋。守了半个多月,后来突围出来。他带着一百多人上了伏牛山。当时我们家住在柏园的窑洞,听到上边有嘈杂声。我母亲说:‘这是武军长从这里经过。’我父亲当兵后最早跟着他……”

他接着又讲到王凌云:“王凌云是第2军军长,原来与我父亲一个部队,后来调到云南,在龙凌、芒街与日本人作战……”

范若丁说:“我着重说到这两个人,正是想在描写父亲的形象时,将他们都揉进去。”

在他心心念念的长篇重制《滔滔黄河》中,他要处理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太庞大、太丰富了。

他说:“我想避开过于传奇的写法,想用平静淡然的手法来写父亲一生的追求和追问。刚开始他追求的是不被强梁欺负。大量苟活着的农民,在活不下去时只能找到枪杆子,拉队伍。他似乎成事了,可还有更高的权力控制他。他该怎么办?于是我想写的就是他一生的疑问和悲情。”

我敬佩地望着他。按年龄他已是老人,可他依旧身材高拔、腰板挺直、清癯儒雅。林宋瑜早就这样形容过他:“老范才叫玉树临风。能够用这个词来形容的男人并不多见。”

范若丁的生命状态始终有一种饱满、向上的活力，岁月沧桑也不曾凋损他的英气。更为关键的是，他始终对写作抱有不懈的热情，他的书写在路上、在进行中。他的笔力愈发雄健深邃，绝无衰败下坠气息。并且，他自己觉得那更重要的文字还没有写完。曾经在繁忙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余，他记忆着关于旧京飘黄的落叶，伏牛山脉蓊郁的树影，白河岸边晶莹的砂砾。但他最想完成的是那风雨如磐中，从那隐约处走来的父亲，以及他携带的家族历史和满肩的岁月烟岚。

我曾写过许多札记放到抽屉里未完成。这一天，我翻出写于1998年3月14日周六晚纸张早已泛黄的札记。记的正是当日白天我们一行人到顺德的余荫山房游览时讲到的写父亲的这本书。他说他对那部长篇太看重了，因此不能轻易动笔。他总觉得自己没有想好时动不了笔，自己的感觉状态欠佳时也动不了笔。那天，他仍是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着故事的框架。那是乱世，父亲范龙章从血亲复仇到参加民族抗战的前线。他一生有对日作战的勇敢，又有太多悲情。他身上有太多复杂性。

我们总是试图了解父辈，我们能了解清楚吗？

了解不清楚，于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踌躇中，20年过去。

仍记得那天在余荫山房后院地上有棋盘的排列。范若丁说：“艾云，有空时我教你下象棋吧。女人应该会下棋，棋琴书画，棋放首位。女人下棋，女公子的味道就出来了。”

可惜，我品性单调，至今也没有学会下象棋。

范若丁说这种话时，我知道他内藏锦绣，知道他明了世事如棋。每个人命运都如棋盘，都是无解、无底的棋盘。

父亲何尝不是如此。

我很敬佩这位兄长，他的为人、为文都值得尊敬。

他虔诚于文学，不为虚名。他执意为父亲立传，想为父亲的疑问寻求解答。能找到吗？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一个目标鼓励着自己，让自己攒聚着精气神一直毫不松懈地向前走着。他走着，保持着思维敏捷和下笔从容。

我看了他的这部长篇，敬佩之余，仍是希望他悠着点，希望他仍用清疏明丽的笔法，人物线索再单纯一些，涉及的人物也可再删减一些。在这本书中，不仅有大量的历史事件，光是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有上百人。这个工程不可谓不大，他要处理人物关系，得耗多大的精力。我真是希望他不给自己添太大轭重，不要用力过猛。我甚至觉得他不走小说这个虚构路线，仍用长篇散文的非虚构形式写写父亲也不

失为一个办法。

时隔一年，2016年秋，他将修改后的长篇又拿给我看，感觉疏朗了许多。批评家申霞艳也看了。他说他还要修改。他对能否出版甚至是不在意的，他要写得自己满意。他有信心写好此书。

在中国当代作家里边，范若丁的出身、成长背景及文学创作都很独特。我说，希望你能谈谈自己的历史。他说：“当然可以。我给你讲两个人吧，一个是我大哥，一个是农场场长陈仕荣。大哥可以说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而陈仕荣则是在我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给予我重大帮助的人。”

四、关于初心

范若丁说，一个人走上文学这条道路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他5岁时念了半年的私塾，教书先生让他读《千家诗》。他真正对文学有明确爱好，是在小学三年级。年长他很多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喜欢文学，最善诗词，大哥能把李煜、姜白石、温庭筠的词背诵如流。大哥教他背李煜的词，后来又接触到清代才子纳兰性德。

这都是些唯美、感伤、念兹在兹的词。这是如此纯正而浪漫优美的文学启蒙。

大哥曾经带范若丁去开封北门外西北方向去看李煜的墓。他说自己在一本书上发现了这条线索。他们在疲弱的秋阳下找到了一个已被盗的大坟冢。

宋太祖囚禁李煜李后主于开封。在龙亭向北处，至今还有一个叫孙礼唐村的村庄。当年这里正是逊帝被囚之所，原来叫逊李唐村，后来几经改名，简化成如今村名。李煜是否葬在东京开封，尚待考证。只是，李煜美不胜收的词赋，仍将流芳百世。

正是在大哥的影响下，诗词歌赋中传递的人性深处的哀伤与悲凉，已是未来文学家范若丁抹不去的底色。

文学的觉醒与自由的精神相关联。1948年秋天，考上开封高中的范若丁听到同学中悄悄传递的“民主自由”的呼声深感振奋。不久，开封解放了。他父亲已随华北军区到北平。当父亲要他北上继续学业时，他不从，自己报考了一个培养新时代革命干部的学校——中原大学。1948年底，范若丁进入中原大学学习。

在激情澎湃的革命岁月，范若丁不会再读李煜、纳兰性德等人断肠的诗句，而是读《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这时候，他也没有设想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革命与浪漫，其实都是文学的母壤；只是，文学在这个时候，还是被认为太杯水风波了。

中原大学结业后，各项工作急需干部。范若丁

被分到中南局社会部办公室秘书科。在中南局的这段时间,他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业余时间开始摸索着写些东西。1950年,他在武汉的《中南青年报》发表过诗歌和特写。后来他被分配到广东省专卖管理局工作。

1955年,他在《南方日报》发表了诗歌。

1957年,23岁的范若丁因耿直倔强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从干部19级下降到23级。1958年,他被下放到海南岛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

三年饥荒年,只有少量粮食,靠野塘蒿度日,范若丁患上了水肿,人差点儿饿死。他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难忘桃金娘》,讲的正是饿得走不动路,吃了一个桃金娘,才算能动弹,植物果子桃金娘算是救了自己一命。他说,饥饿最能消磨人的意志。

他分别在五山农场、大丰农场、市桥农场干过,然后转到大朗农场。

一切都带有戏剧性。大朗农场的党委书记正是陈仕荣。陈仕荣曾是范若丁的入党介绍人,他了解范若丁的冤屈,被人平白诬陷。那时,他只有沉默,不说话。

眼下,范若丁来到了自己手下,这个东江纵队的老革命,正直不阿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1960年,范若丁摘掉了右派帽子。

在农场干了一年以后,摘帽的范若丁到省化工局化工科当了一名业务员,也就是跑业务、搞销售,这一干就干到1980年6月。1978年底,他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工资待遇。

从1957年到1980年,命运颠簸,并且干的都是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在一个具有纯正文学品质的人那里,什么样的境遇都不曾摧毁对文学的追求。

1957年被打成右派遭批判的日子,在孤寂和绝望中,他阅读巴金的《家》,沉浸在大家族的命运浮沉中,记忆自己经历过的一切,现实反倒虚幻起来。这段日子,他写成了《邃骤的潮浪》《红色暴风雨》。“文革”中,手稿被毁掉。这两部作品几十万字,类似于电影小说,写1945年前后的一群青年为国家为民族寻梦和追求的青春跃动。只可惜,毁掉的稿子再也重写不了了。

他在农场改造时,有时会派去管仓库,有时间就在笔记本上写东西。断断续续,开始想少年时代经历的事,陈干娘、老何家,以及伏牛山、白河、我坪、旧京纷纷在眼前晃动。

文学如梦,它让一个人在一个幻觉的空间自足而忘我,周遭的歧视、不公似已远去。逆境中,一个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积极的人生姿态,文学正是佑助自己度过急流险滩的小乘舟楫。

还在化工局工作的1977年,范若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并未逝去的岁月》,此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广东文坛引起了很多同行的注意。陈国凯当时见到范若丁说:“若丁,你都有书出版了,我们还没有。”

这本书给该社的同志留下了很深印象。1980年6月,范若丁正式调入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编辑部。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成立,他又到了花城社,很快当了室主任。

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的文学艺术进入到繁盛的春天。立足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花城》杂志,以先锋、探索、创新的责任担当,为作家所喜爱,为读者所信赖,它日益行成品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一切,与范若丁、与共同办刊的同事们眼界、胆识、审美趣味分不开,与他们的竭诚努力分不开。

当时,从各地来广州的作家纷至沓来,范若丁是以出版人、编辑家的身份与他们交往,为他们提供帮助。这些作家很多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在《吾师吾友》一书中,对端木蕻良、杨沫、秦瘦鸥、无名氏、戴厚英、白桦、王蒙等人,均有生动细腻的描述。

1984年,他当了花城出版社副社长和副总编辑;1988年,在没有设定候选人的海选中,他在民主选举中当上了社长和总编辑。

五、关于文学品质

关于范若丁这个人,接触过他并且不存偏见的,都知道他待人诚恳笃厚,有了困难找他帮忙,他都尽心尽力。他有君子之风和仁者之态。他个性狷介,因说真话而遭罪,但他从来不曾怨气沸满。他总是平和、达观地笑对湍流疾浪。他永远腰板挺直,身上有军人的凛凛威然,却又有文人的彬彬儒雅。他综合的独特气质,形成生命自身的丰富多彩的密码,在中国作家里边实属少见,非常值得研究。

是的,他从不怨艾。正如同他和中原大学的同学好友朱可先生分别十几年以后再见,两个人不说经历的厄运和磨难,只是唱起苏联歌曲《我亲爱的手风琴》。他们唱歌,止不住泪水哗哗地流淌。这就是范若丁,男子汉的风骨里有着悲悯与深情。

关于他的文字,即使他低调、谦逊,从来不争不抢,但他对文学的贡献愈是随时间流转,愈能见出恒定纯粹的明亮。

20世纪80年代,他以出版人、编辑家的身份扶掖许多的写作者。他压低自己作家的身份,但那文字的魅力仍是历久弥新。他在20世纪80年代已创造了一种跨文体写作,他的《暖雪》《皂角树》,以及

后来的《旧京,旧京》《失梦庄园》等书,你很难区分它的文体。这种文体既有小说的叙事情节,又有散文的真实可信,还有诗歌的语言美质。他将阻碍和藩篱拆除,他为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形象,创造了一种意境全开、妙不可言的文本。

他无意于什么,只是将文学作为精神的拯救。他的无意,却正是纯良的文学品质。他总是谦逊地说:我只是写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时,就下笔通畅,如有神助。

但他不知道,因为那执拗的记忆,看到的最初事物,这个早慧多敏的曾经住公馆的三少爷,他用天然禀赋的文学目光掠过北方旧京昏溟中的屋檐,掠过中原乡野斑驳的树影,他从家族、家谱的叙事中,舒展的是家国情怀。那不是愁肠百结的慰藉式怀旧,不是仅见一方水土一个地域概念的回望,他在寥廓时空中获得的启迪和超拔的精神力量,让他无意中在浮世绘、众生相的摹状中,把握了中国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社会史、民族史、政治史。

范若丁用他朴素简洁却又隽永蕴藉的语言,用他打开尘世细节的敞亮,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民国。

公共知识分子根据卷册的遗存和史料会研究出一个形而上的民国。那个民国会被认为政府管制的缝隙和有限,可以生长出令人缅怀的自由精神。果真如此吗?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看来,自发秩序可以生长出自由精神。但他指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在和平竞争的治世,因为依从自然规律和必然逻辑,可能有抵制奴役的自由精神产生。但在乱世,在纲常废弛、管理不到位,又有外敌入侵、党争纷扰之时,自由精神找不到生长的合适土壤。那时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是有风骨的、倔强的、

狷介的,但这是人格魅力,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推崇的气节。有这气节和风骨总比没有强。

公共知识分子擅长于理论与研究,也有可能忽略尘世细节。这一任务,将由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的创作者来完成。范若丁,这个文坛宿将、文坛常青树,他漫长、曲折的生活经历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他立意高拔,既无意识形态遮蔽、又无说教味的语言,同时又抛弃怨恨记忆,他以活泼的思维能量,以谦卑纯净的写作风格,为我们叙说着特殊情境下人性的深层意味,叙说着公平正义如此艰难,叙说着实现自由精神的缓慢艰辛。

他的叙说带着丰富的原初经验,带着泥土般朴实、钻石般高贵的精神质地,让我们体验着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关于汉语修辞的愉悦,体验着沉潜日久的美学风尚依旧会在天空闪烁,体验着历史与现实打通后的敏感、疼痛的复杂感受力。

他的文字可以被人记住,因此是可以留给历史的。这些文字不需要过多解释和关注,它都是人们心中衡量那时沉甸甸的好东西。他无意于在涣散浮浅中争得什么,他捍卫个人的尊严,同时捍卫文学与语言的尊严。他敬重普希金高高昂着头颅,他自己也是这样。

参考文献:

- [1] 范若丁. 旧京,旧京(长篇小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新版).
- [2] 范若丁. 失梦庄园(散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
- [3] 范若丁. 并未逝去的岁月(散文集)[C].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Describe the Public at That Time

—Discussion of Fan Ruoding and His Works

AI Yun

(Guangdong Writers Associ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1980s, Fan Ruoding as a writer has narrated the real publicimag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wrote about his impression of Kaifeng, the experience of his feelings to hometown with his family. What he described is the ordinary but turbulent society he's familiar with. All the stories they experienced in that era are unfold in tragic scenes. However, those people are seldom discouraged or sad; instead they calmly face the fate. Through the writings, we learn about the ordinary people's living in that unique period. This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nar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Fan Ruoding; *The Old Capital*; *Estate of Dream Lost*;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ublic image

《搜神记》中的民间叙事研究

郭 艳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献信息中心, 郑州 450002)

摘要:《搜神记》记录了许多神奇怪异之事,其中有一部分是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搜神记》记录民间叙事主要有三种方式:直接采自前书、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和作者自行采编而成。其民间叙事具有神异性的美学特点,是社会历史的另类反映,情节模式化,人物大多具有类型化特质。

关键词:《搜神记》;民间叙事;美学特点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3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18-06

随着叙事学研究的深入,民间叙事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者首先对民间叙事的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程蔷从叙事主体的角度把叙事分为民间叙事和文人叙事两大类。董乃斌和程蔷在《民间叙事论纲》中进一步指出,民间叙事具备口头性的基本特征,易变、易散失,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多种异文。^[1]杨利慧打破“文本的历时性研究”的思路和模式,把表演理论引入民间叙事研究。^[2]柯玲认为,民间叙事是指“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叙述活动,是民间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3]。王丽娟指出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区别在于:一是叙述的事件不同,二是即使叙述同样的事,叙述方式不同。^[4]在现当代文学中,民间叙事更多的是指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价值取向,“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5]。

随着多位学者对民间叙事理论的研究及创作实践的分析,国内民间叙事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民间叙事的概念依然不是特别明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对民间叙事进行界定:民间叙事是指在一定群体中传播、体现民间立场对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它的载体既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叙事主体既可以是

无主的民间集体,也可以是文人知识分子。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童谣、民谚、民俗,等等。

一、《搜神记》与民间叙事的关系

《搜神记》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记录了许多神奇怪异之事,其中有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这一类作品是全书的精华,对后世文学影响较大。

干宝在《搜神记》的序中写道:“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如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缺,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6]2}

从《序》可以看出,《搜神记》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考先志于载籍”;一类是“收遗逸于当时”。在“仰述千载之前”时,干宝“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缺,访行事于故老”,不可避免会有“失实”

收稿日期:2019-10-15

作者简介:郭艳(1979—),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小说。

的问题;在“采访近世之事”时,干宝坚持史家秉笔直书的原则,如果“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但不论是考察前代典籍还是采录当世之事,干宝都注意“访”的运用。这个“访”其实就是搜集民间叙事的一个重要方法。

正是由于干宝按照史书实录的方式撰写《搜神记》,因此《搜神记》保留了大量的民间叙事。有神话故事,卷一记载了许多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如:鞭百草神农、雨师赤松子、缙父赤将子舆、陶正宁封子、采药父偃佺、七百岁彭祖、孔甲龙师师门、乘木羊葛由,等等。有民间传说,如:盘瓠传说、蚕马传说、干将和镆钁、韩凭夫妇、董永和织女、杜兰香与张传、李寄斩蛇、丁姑过江,等等。有民间歌谣,如:“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614]“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618]“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6188]“八九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6189]有民间风俗,如节日习俗:阴子方腊日以黄羊祭灶见灶神(《阴子方祭灶》);宫廷节日习俗“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羈,谓之相连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6124]。有服饰习俗:“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6193]“灵帝建宁中,男子之衣,好为长服,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6185]“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异。”^[6196]有妆容习俗:“汉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6183]“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6197]“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缙急束其环,名曰擗子髻。”^[6196]有饮食习俗:“羌煮、貊炙,翟之食也。”^[6194]还有婚丧习俗,在《搜神记》中死而复生的篇目中体现得较为集中,如:《王道平》《河间郡男女》等,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随着《搜神记》的经典化,其中记载的民间叙事又对后世的历史、文学产生影响,成为新的民间叙事

的源头。宋代以前,《搜神记》在目录学中的分类是被归为史传类而非小说。人们往往把《搜神记》的内容当作史料引用,如:《后汉书·方术传》引用《搜神记》11条,其他人物传引用20条;《宋书·五行志》引用70条,《宋书·符瑞志》引用8条;王隐《晋书》引用14条;臧荣绪《晋书》引用6条;《晋书·五行志》引用70条。至《新唐书·艺文志》才将其归为子部小说类。这些史书对于《搜神记》中民间叙事的传播和发展又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搜神记》中的民间叙事对于文学的影响更加直接,唐传奇、《西厢记》《窦娥冤》《三国演义》等文学经典都或多或少地取用其素材。

二、《搜神记》对于民间叙事的继承与创造

《搜神记》记录下来的民间叙事其实是经过干宝筛选编辑过的民间叙事,是原生态民间叙事的静态文本,因此一定程度上带有文人叙事的色彩。《搜神记》记录民间叙事主要有三种方式:

1. 直接采自前书

《搜神记》之内容,“大部分是采录前载,采录的前人书有数十种,主要有《左传》《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列仙传》《孝子传》《汉书》《风俗通义》《论衡》《列异传》《后汉书》《续后汉书》《三国志》《博物志》《玄中记》等”^{[7]303}。虽然是采录前载,但许多内容属于民间叙事的范畴。卷一“赤松子”“赤将子舆”“彭祖”诸条,取自《列仙传》,不仅所记内容相同,而且文字也几近相同。卷六和卷七所载三国以前的灾害奇异之事几乎全部采自《汉书》和《续汉书》之《五行志》。不仅转记本事,甚至引用《易传》《五行志》的解说文字。如:“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马祸也。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上无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6171]京房《易传》认为,马生人这种异事预兆着天子失去权柄,诸侯互相征伐。“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辘轳中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至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五行志》以为王氏之应。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又曰:‘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6176]《五行志》认为雌鸡化雄是王莽篡权的应验,京房《易传》认为这种异事预兆着妇女独擅政权,国家不得安宁。

《搜神记》还取用同为志怪小说集《列异传》中的一些故事。在《列异传》有限的辑存篇目中,就有

十多篇被《搜神记》辑采,如“蒋济亡儿”“三王家”“鲁少千”“弦超”“胡母班”“蒋子文”“宋定伯”等条故事。同一故事《搜神记》明显比《列异传》在叙事上更加具体,但由于《列异传》宋以后未见公私著录,原书已佚,所以仅以当代所存之本进行比较,并不客观。李剑国曾指出,《搜神记》与《列异传》“同一故事相比,文字尽管常常有繁简之别,但我们相信那是由于《列异传》的佚文不完备,并不是《搜神记》对它作了加工补充。照古小说写作的一般情况,大抵是辗转抄录”^{[7]328}。这一点可以从《列异传》中的“冯夫人”和《搜神记》中的“冯贵人”对比加以验证。

汉桓帝冯夫人病亡,灵帝时,有贼盗发冢,七十余年间,颜色如故,但小冷。共奸通,至斗争相杀。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夫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8]19}(《列异传·冯夫人》)

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七十余年,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6]187}(《搜神记·冯贵人》)

两者仅有少数文字不同。其实此事在《后汉书·陈球传》和《后汉书·段颖传》中均有记载,文人辗转抄录必有文字出入。

2. 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搜神记》除了直接取自前载、文字改动较少的故事外,还有一些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素材进行加工整理的篇目。如《搜神记》的名篇《东海孝妇》源自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西汉刘向的《说苑·贵德》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于定国传》中均有“东海孝妇”这一冤案的记载,着重突出于定国判案公正,二者与《搜神记》中的故事相比神异色彩较弱,结局只是冤案得以昭雪,早情解决。而干宝在《东海孝妇》的文末增加了一小段文字:“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极标,又缘幡而下云尔。”^{[6]139}正是这一段文字通过孝妇临刑立誓:如若蒙冤血就倒流,结果孝妇的血呈青黄色,沿着长竹竿向上流,到了竿顶才沿幡下流。这不仅增

加了故事的神异色彩,也突显了冤情至深。

《搜神记》中的部分民间叙事仅以前代记载为脉络,具体情节则由干宝进行二次加工。如卷一《董永》虽取材于民间流传的董永与织女的传说,但大大拓展了先前的情节,丰富了传说的内容。在历代孝子故事的考证中,均认为董永的故事出自刘向所著《孝子传》,但在传世的史志书目中却不见刘向著录的《孝子传》,因此无法比较。现存最早的关于董永遇仙故事的记载是曹植所著《陈思王集》中的《灵芝篇》,现把二者略做比较: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乘机。^{[9]327}(《灵芝篇》)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6]14-15}

《灵芝篇》只是勾勒了董永和织女传说的大致轮廓,而《搜神记》中的《董永》有“丧父——卖身——还主——逢妇——织缣——女去”等一系列情节,有人物之间的对话,从而使得这一民间叙事更加饱满。当然这种差异与二者的体裁不同有很大关系,诗歌对于情节构建和人物塑造具有局限性,而志怪小说则更擅长叙事。

刘玄醉酒千日的故事见于《博物志·杂传下》,全文仅112字: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妄言其节度。归至家大醉,不醒数日,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当醒矣。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10]233}

《搜神记》卷十九《千日酒》,全文已有324字: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疑，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阍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6]235}

两篇主要情节类似，但是《搜神记》增加了人物的对话，故事就显得更加生动有趣。由此，也可一窥干宝对于叙事的理解及运用，对于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3. 自行采编而成

《搜神记》中还有一些民间叙事是干宝自行采编的，尤其是三国及两晋部分。李剑国经过考证，认为：“在今本的四百六十四则中，见载于干宝以前的志怪书和其他书籍者约二百则，这是‘会聚散逸’之所得；其余多是‘博访知之者’的结果。”^{[11]242}

从那些“博访知之者”的篇目，可以更直接地看出干宝对于民间叙事的理解：

一是语言古朴。虽然《搜神记》为文言小说，但语言质朴凝炼，尤其是那些当世作品，这与干宝从民间采访得来、尽量保持基本风貌有关。因此，《搜神记》的语言风格不同于魏晋时期的散文讲究遣词造句骈偶化，而是具有较强的民间叙事的语言风格。

二是情节曲折。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表明他的著述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因此书中不论是取材于前书的故事还是作者自行采集的当世故事，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神奇怪异。不论是奇人怪事、还是托梦预兆，或是人鬼（怪）情缘，情节都比较曲折。这与民间叙事讲求故事的传奇性相契合。仅举一例，卷十八《吴兴老狸》故事发生在晋代，应该是干宝采访得来的民间叙事。故事可谓一波三折：老狸化作父亲，打骂儿子——父亲识破，让儿子砍杀老狸——父亲看望儿子，儿子误以为又是

老狸化作父亲，于是杀了父亲——老狸化作父亲回家——法师识破，老狸变回原形被杀。人与怪斗智斗勇了三个回合，但结局依然是悲剧性的：老狸被杀，老父被误杀，两儿俱死。

三是坚持民间道德立场。《搜神记》的许多篇目只有事件的叙述，没有任何主观评价。作者只是通过故事的展开，鲜明地表达了民众的道德价值观——知恩图报、惩恶扬善，等等。如《丁姑祠》见于《太平广记》二九二、《太平寰宇记》一二九、《方輿纪胜》四二均引作《搜神记》，此事不见于他书，应当属于干宝直接采录的“近世之事”。此条一方面体现了善恶有报的民间价值观：丁姑渡河，两男子戏弄丁姑，被淹死；老翁助丁姑渡河，所以得到了一船鱼。另一方面更体现了民间劳动妇女的美好愿望：在息日可以休息一天。《苏易》见《太平御览》卷八九二引作《搜神记》，此事他书未见，应当也是干宝自行采集的故事。苏易为母虎接生，母虎以野肉来回报她，体现了善有善报的民间价值理念。

三、《搜神记》中民间叙事的特点

由于《搜神记》是带有文人色彩的民间叙事，因此，具有与一般原生态民间叙事不同的特点。

1. 神异性的美学特点

干宝编写《搜神记》主要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因此，在民间叙事的素材选取上“搜神列异”，具有强烈的神异色彩。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丰富的想象力。仅以《搜神记》中的人物为例，就充分体现了想象力的作用。《搜神记》中的神仙大多长生不老，可以随意变幻形态。如：介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啖，不受饷遗。”^{[6]11}介琰可以变幻为童子也可以变幻为老翁。葛玄“嗽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皆集客身，亦不整人。久之，玄乃张口，蜂皆飞入。玄嚼食之，是故饭也。”^{[6]12}葛玄可以把米粒变为大蜂，亦能把大蜂变回米粒。《搜神记》中的妖怪无处不在，万物皆可化为精怪。金、银、钱、树、狐、狗、狸、獭、鼠、鳖等都可以幻化为人，在它们幻化为人时体现了作者的想象力，如卷十八《苍獭》：“有一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汩然作声，衣盖飞散，视之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6]228}大苍獭化作美女“上下青衣，戴青伞”，与末文揭晓“衣伞皆荷叶”前后相扣，令人拍案叫绝。

人鬼恋的故事更加体现了作者浪漫的想象力。如“紫玉”：吴王夫差的女儿紫玉与童子韩重两情相悦，私定终身。吴王不许，紫玉气结而死。三年后韩

重学成而归，在紫玉坟前痛哭，紫玉的魂魄从墓里出来，邀请韩重一起回到墓里。韩重与紫玉在墓里过三天三夜的夫妻生活。临出，紫玉送给韩重一个明珠。这颗明珠既是韩重与紫玉爱情的见证，也使得吴王宽恕了韩重。正是由于作者的想象力才使紫玉和韩重跨越了生死，令原本生死殊途的二人在墓地里完成了结为夫妻的愿望。

二是奇幻的意境。《搜神记》的民间叙事中有一些意境：如梦境、洞窟、墓地等给人荒诞奇异的感觉。梦境中亡人能与生人进行交流，并托梦嘱咐事项。卷十有许多关于梦境的故事，如《徐泰梦》，在梦里徐泰得知叔父即将死去的预言，又在梦里祈请，用本县同名不同姓之人替叔父去死，从而使得叔父免死。

2. 社会历史的另类反映

《搜神记》虽然具有神异性的特点，但干宝创作时依然本着“实录”的原则，至少在作者看来那些荒诞怪异之事都是真实的。神异性与“实录”的结合使得《搜神记》呈现出虚幻和真实并存的特征。正如他在序中所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无失实者哉？”“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不论是取材于前载还是自己于当世采访，作者的出发点还是希望“如实”，虽然由于某些客观原因，特别是取材于前书的事情作者并不能保证不失实，但是作者依然以史书的标准来衡量《搜神记》的价值。正是由于作者坚持史书如实记载的态度，《搜神记》的民间叙事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

一些篇目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风俗具有重要意义，卷四第88条《阴子方》腊日用黄羊祭祀灶神、第89条《蚕神》正月十五作白膏粥祭祀蚕神，还有诸如七月七日临百子池、八月四日竹下围棋、九月九日登山游观、十月十五人灵女庙吹笛击筑等节俗。

一些篇目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特别是那些奇闻异事基本上就是政治变革的先兆。如：“汉景帝三年，邯郸有狗与彘交。是时赵王悻乱，遂与六国反，外结匈奴以为援。《五行志》以为犬兵革失众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交于异类，以生害也。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6]74}狗与彘交这种异事是汉景帝（前154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发起的七国叛乱的征兆。这在

历史上确有其事。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枝如人头，眉目须皆具，亡发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髭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其后有王莽之篡。”^{[6]9}木生人状反映了王莽篡权的政治事件。“晋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京房《易传》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寻有王敦之逆。”^{[6]109}大蛇在神祠空树中居住，反映东晋时期的王敦之乱。

卷七记载两晋时期的灾异事件，也是当时社会自然环境的一种反映。有地震：“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6]106}有火灾：“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灾，火起，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6]107-108}

3. 类型化的人物形象

《搜神记》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初始阶段的代表作，在叙事技巧及人物塑造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其中有些优秀的民间叙事，开始注意到人物的塑造。但总体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些性格单一、类型化的人物。《搜神记》中有好几个孝子：王祥、王延、楚僚为母卧冰求鱼，郭巨为了更好地赡养母亲，甚至要把自己的儿子埋掉。这几则故事描绘了中国传统孝子的形象，其中甚至有些愚孝的成分。但与那些只注重描述事件、淡化人物的文言小说相比，在人物塑造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这种不同人物具有的相同性格是一种显性的类型化人物。除此之外，《搜神记》还有一些“箭垛式人物”。所谓“箭垛式人物”是指民间文学中，当一个具有突出特征的艺术形象树立起来以后，他身上往往会被累积许多同一类型的故事，这种艺术形象即是胡适提出的“箭垛式人物”。“箭垛式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12]471-472}简而言之，“箭垛式人物”就是指民间文学中有诸多附会之说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的某一方面特质比较突出，围绕这一特质就有好多故事（包括一些并不是真正发生在其身上的故事）都追加到这个人身上，这种突出的特质其实也是一种类型化的人物特征。《搜神记》中就有一些“箭垛式人物”，如郭璞、华佗、淳

于智等。以淳于智为例,卷三有四则关于他的小故事:杀鼠、占卜宅居、占卜免祸、筮病,通过这四个故事突出其精通《周易》、擅长占卦的人物特征。

4. 模式化的情节

王明珂认为:“历史叙事情节是否基于‘真实的过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过去’(真实或虚构的)被书写为一种叙事,此叙事便受流行于社会中的叙事文化所影响。而叙事文化,与叙事者所存在的社会情境密切相关。”^[13]这里“范式化情节”也即模式化情节,模式化情节反映了相应的社会环境。《搜神记》中有一些民间叙事具有相似的情节,如城陷为湖的传说就有三则:卷二十《古巢老姥》、卷二十《邛都大蛇》、卷十三《长水县》,这三个传说都具有一个相似的情节就是城陷为湖。虽然三则传说具有神异色彩:巨鱼的父亲感恩老姥不食子,把城陷为湖的消息透露给老姥,老姥看到被小孩子涂成红色的石龟眼睛后忙跑出城去,果然城陷为湖(《古巢老姥》);小蛇感恩老姥喂养、不把自己交出之恩,替老姥报仇,淹了城(《邛都大蛇》);老妪听到歌谣预言城陷为湖,后来预言成真(《长水县》)。三则故事内容不同,但都具有城陷为湖这一情节,其实反映了陆地沉没为湖的灾害事件。

《搜神记》中还有许多模式化情节,如人死复生(卷十五《王道平妻》《李娥》《史殉神行》《社公贺瑀》《戴洋复活》《柳荣张悌》等)、人鬼恋(《紫玉》、《庐充》等)、人神恋(弦超和知琼、董永和织女等)。这些模式化的情节正是民间叙事的一大特点。

总之,《搜神记》保存了丰富的民间叙事,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民间叙事情节曲折,一些人物形象突出,对于中国叙事文

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熟的民间叙事使《搜神记》成为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不仅是文学批评热衷分析的对象,也是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 [1] 董乃斌,程蔷. 民间叙事论纲[J]. 湛江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2).
- [2] 杨利慧. 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J]. 民俗研究,2004(1).
- [3] 柯玲. 民间叙事界定[J]. 上海文化,2007(2).
- [4] 王丽娟. 论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以“连环计”故事为例[J]. 文学遗产,2004(4).
- [5] 陈思和,何清. 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J]. 中山大学学报,1999(5).
- [6] 干宝. 搜神记[M]. 汪绍楹,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7] 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 [8] 曹丕. 列异传等五种[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 [9] 曹植. 曹植集校注[C]. 赵幼文,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0] 张华. 博物志新译[M]. 祝鸿杰,注.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 [11] 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12] 胡适. 三侠五义·序[C]//胡适全集(第3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 [13] 王明珂. 族群历史之文本与情境:兼论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情节[J]. 西北民族论丛,2007(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Study on Folk Narrative in *SouShenJi*

GUO Yan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SouShenJi* recorded many strange things, including some history, myths and legend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folktale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of recording folk narrative in *SouShenJi*: direct picking from the previous books, arranging and compiling on the basis of folk legends, and collecting and editing stories by the writer himself. The folk narrative has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magic and oddities and is an alternative reflection of social history. The plots and characters of the folk narrative are usually patterned.

Key words: *SouShenJi*; folk narrative; aesthetic features

论作家墨白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与创新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出于对时间、现实和人性的独特理解,墨白选择把意识流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法之一,对人物复杂的、隐秘的、非理性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墨白不拘泥成规,对意识流手法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通过情绪的整合作用,祛除了意识流小说惯有的迂缓、滞涩之感;通过让人物意识的直接呈现与叙述者的评说相互交织,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构建起直接的关联,从而更好地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强化了情节,增强了可读性。

关键词:墨白;意识流;情绪;结构;情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24-06

意识流被威廉·詹姆斯创造出并由梅·辛克莱引入到文学领域之后,很快就成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最重要的术语之一。以河流为喻,这个术语揭示出人的意识活动的不间断性,即没有空白,始终在流动。它不是一个个完整片段的连接,也不完全在主体的控制之下,各种信息、记忆、情绪、欲望连续不断地涌现于意识之中,构成人类无比复杂、庞驳的心理现实。相比传统文学中那种秩序化、逻辑化的“心理描写”,意识流写作更能反映人的心理活动的真实,更能揭示人性的复杂。20世纪上半叶,意识流文学蔚为大观,涌现出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一批艺术流小说大师。之后,那种典范意义上的意识流写作虽然退潮了,但意识流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小说手法,受到了更广泛地推崇和使用。

詹姆斯的心理学仅仅是意识流文学出现的诱因之一,除此之外,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柏格森指出,时间以及存在于时间中的人的意识、记忆,乃至个性都具有“绵延”的属性,“我们的全部感觉、全部意念和全部意志……在一个无尽的流动中相互延续”^[1]。在他看来,意识流将当下的意识、感觉、幻想和各种记忆的片段高密度地堆积在一起,是呈现

绵延的最好方式,尽管和真正的绵延仍有差距。弗洛伊德则告诉我们,人的意识领域并不完全受理性的控制和调节,潜意识的意象、本能的冲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人的意识和心理的构建中。传统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心理分析,没有把非理性的意念和情绪纳入视野,而意识流则将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并置,能够更好地呈现人内心世界的纷扰、分裂和挣扎。

墨白对时间、现实和人性的独特理解,使意识流手法成为他小说创作的必然选择。他服膺柏格森绵延的时间观,认为每一个瞬间都无比丰富,包含着我们全部过去、情感和意念,“现实存在于一瞬之间,只有在这个一瞬之间被称作浩瀚的历史才显示出它的意义”^[2]。个体意识的瞬间也无比丰富,无数的记忆会蜂拥而至,构成当下瞬间的心理现实,“时间在我的回忆之中丧失了秩序”,“回忆就是现实”^[3]。现实是什么?在墨白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现实,现实总是人们意识到的现实,它无比复杂,从根本上说,个体一切意识和潜意识都来自现实,也都是现实的一部分。因而,书写人的心理现实应该成为文学追求的目标,而且,这也能最好地体现文学的精神关怀。墨白认为,对小说来说,人性价值

收稿日期:2019-07-20

作者简介:杨文臣(1980—),男,山东兖州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性格价值更重要^[4]，讲述一个人的风趣或沉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个人的剖析让我们看到他（以及我们）的生命中隐藏着的那些创伤、焦灼、欲望、恐惧，等等，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的生存困境，并直接或间接地支配了我们的行为。要揭示这些隐秘的人性的东西，仅仅着眼于人的外部行为是不够的，因为人的行为受种种社会规范和习俗的制约，往往偏离其真实想法。墨白喜欢直接呈现人的心理状态，他的人物往往带有反思或冥想的特征，总是沉浸在回忆和幻想中。当然，这种特征只是相对于其他的文学人物而言，事实上，墨白的人物是最接近我们的真实存在状态的。墨白对意识流的使用非常频繁，也非常娴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人是极其复杂的，墨白以房间作喻，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关闭着的房间，我们站在外面根本无从得知里面暗藏着多少的隐秘；他又以迷宫作喻，说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迷宫，我们自己也很难完全认清自己。^[5]20世纪以来，文学愈发对人的复杂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意识流的兴起既是这种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种认识的体现。之前文学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心理描写作为对行为的解释说明，总是紧扣行为展开，不多也不少。现在人们认识到人的心理要比行为复杂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人的行为不仅受到日益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的管制，而且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塑造，变得越来越趋同化、日常化，越来越失去了文学所青睐的那种尖锐化、戏剧化的品质。与此相反，人的心理却呈现为一副极其复杂的图景——崇高而明朗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浪漫主义激情跌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欲望、迷惘、苦闷、孤独、焦虑、绝望……意识和潜意识交错迭合，理性和非理性缠绕不清。于是，文学关注的焦点开始从外向内转移，意识流就是这种转移的一个最明显的表征——人的心理成为独立的表现对象。

墨白《事实真相》中，主人公来喜的内心独白占了很大的篇幅——这是墨白小说的一个普遍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把意识流和内心独白作为两种不同的技法进行讲述，事实上，二者的界限并不明显，他在“内心独白”中选用的《尤利西斯》的文字片段，在我们看来就是典型的意识流。二者的不同在于内心独白保留了“他想”“他感觉”这类的叙述附加语，而意识流将这些完全省略掉了。如果这些附加语引出的内容是人物

的自由联想或下意识的感觉，那么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有人把第一人称独白作为典型的意识流，把第三人称独白——即保留了第三人称叙述附加语，但仍对人物意识做了纯粹的呈现的意识描写手法——作为非典型的意识流。墨白的《事实真相》以及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这种非典型的意义上使用意识流的。来喜是一个农民工，他在公共领域中没有话语权，作为一个凶杀案的亲历者，警察不屑于听他讲述，所有不在场的人都振振有词，并用极端蔑视的口吻堵回他的话语。他只能在心里对着乡下的对象小巧倾诉，“与来喜在外界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体对于来喜内心那穷形尽相的描述——一种意识流般的声音痉挛与狂欢，它暗含着主体针对外界话语蔑视、剥夺自身存在的反驳”^[6]。

在我们的文学叙事和想象中，来喜这种底层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很简单，或者淳朴，或者麻木，或者辛酸，或者粗俗，或者是这几种类型的混合。墨白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样丰富。把他们想象和设定为简单，流露出我们面对他们时的那种无意识的优越感，尽管表面上我们对他们的简单不无欣赏。来喜在工地上干活时目睹了一场凶杀，“那件事就像身上的一块骨骼，牢牢地长在了来喜的肌肉里”。尽管除了长发、苍白的面孔和黑色风衣之外，他记不起那个被杀害的女人的任何特征，但后者却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看到客车追上了刚才那个骑摩托的女人，可是由于她的头盔，这次他仍然没有看清她的面孔。她长的是个什么样？比得上那个女人吗？比不上，那个脸色有些苍白的的女人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要是能娶个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就好了，可惜那个女人死了，被一个手持尖刀的男人杀死了。

几乎每看到一个女人，来喜都浮现出类似的意念。对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且已经死去的女人产生这种情结，显然是非理性的，来喜也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对来喜这种反常意识的书写，是这部作品最精妙的设计之一，它是人物各种复杂微妙的潜意识情愫的表征，可惜墨白的苦心孤诣被评论家们轻率地忽视了。首先，这是一个城里的女人。虽然来喜在内心对小巧倾诉时，对城市有诸多的非议，比如怨恨城里人对他的侮辱，指责城里人只认得钱，嘲笑城里那些走路一扭一扭的“鸡”，但他并不

纯粹,并不真诚,“我要是能娶个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就好了”,他对城市无比地渴望,甚至那些他反感的事物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这里,墨白超越了用自然淳朴的乡土文明对抗和批判贪婪堕落的城市文明的虚假模式,用更冷峻的目光揭示出人性的脆弱和现代性的不可抗拒。为什么是那个女人?因为她是受害者,来喜也是受害者,来喜同情她吗?不是,来喜对她并没有任何善意。活着的城市女人都像见到艾滋病人一样躲避着农民工们,除了仇恨——想要“干”她们也是仇恨的表达——来喜无法对她们产生任何温存一点的念想,而那个女人可以,因为她不会羞辱来喜,她已经死去。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死去的女人身上,他才能安放自己的白日梦。屈辱、卑微、敏感至此,真令人不胜悲慨!还有什么样的伤害能比这更触目惊心?事实上,来喜对于城市已经绝望,如果说对那个女人的幻想表明来喜还残存着最后一丝希望,那么这一丝希望也很快就消散了。来喜开始时咒骂那个凶手是“婊子养的”,后来换成了“这小子,真潇洒,他玩刀的动作就快成了一种艺术了”。这里不仅为后来来喜击杀黑心包工头二圣埋下了伏笔,也暗示了他已经彻底绝望,对于充满敌对和恶意的世界,他只剩下了仇恨,无差别的仇恨。小说结尾处,来喜疯了:

他看到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从街道里走过来,他就走过去伸手拦住了她,那个女孩害怕地看着他,不知所措。来喜骂了一句,婊子养的,就从裤兜里掏出一根木棍,朝那个女孩的肚子上扎去。那个女孩惊叫一声,丢掉车子就跑了。

“杀”是来喜留给我们的对于这个世界最后的姿态,真让人不寒而栗!

二

一般来说,意识流小说——因其并置了不同时空的记忆片段、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意象并在不同意念间突转、跳跃——会带来迂缓、滞涩的阅读感受,但墨白的作品读来非常流畅,没有丝毫的滞涩之感。这和他对情绪的重视有关,他的小说中,人物的一切记忆、思绪和意念都被情绪浸泡着,水一般地流淌。

这雨能下多久呢?太阳你躲在哪儿?你不在天上吗?你肯定还在天上,只是你还在没完没了地睡觉,你现在变得是这样的懒惰,你睡醒了还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你不肯起来干活,你懒。所以天上才起了那

么多的云彩,灰色的云彩,弄得老天爷也哭丧着脸,老天爷你就管不了他?让他在这几下,下,老是下,我从西安一出来你就这样没完没了地下,你看,你把到处弄的都是雨水。你看,你把一切都弄得湿漉漉的。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古城墙。你看,你把一切都弄得湿漉漉的。和平路。解放路。火车站。哗哗不停的雨水击打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把裤腿都弄湿了。那么多的雨伞,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紫色的。黄色的。那像一些花吗?一些走动的花。哪一朵才能走向我呢?陈林,你在哪?你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吗?你为什么还不来呢?你看,现在离开车只有二十七分钟了,你现在在哪?那么多的车。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一些飘动的颜色。可是哪一块颜色才能使我感到快乐呢?陈林,你看,还有十九分钟,你怎么回事?……我不能再等下去……丁南,你能找到你的生活原型吗?我要演的那个农村的姑娘是个什么样子呢?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你遥远的颍河镇。神秘的颍河镇。黑衣老者。看渠首的盲人。守扳网的女人。你烦不烦呢?你整天都在那个阴雨连绵的河道里守着那个扳网,你的食物就是那些活蹦乱跳的蚂虾吗?颍河是个什么样子呢?像长江吗?像长江一样波澜壮阔?像鄱阳湖吗?像鄱阳湖一样浩渺无边?(下划线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是长篇《映在镜子里的时光》中夏岚的一段思绪,非常典型的意识流描写。这时,夏岚的注意力处于一种休憩的状态,放任意识自由地飘荡。尽管这段文字的内容非常繁复驳杂,现实的、想象的、回忆的各种意象和片段被松散地堆积在一起,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和逻辑关联,但我们读来并不觉乏味。如同雨水把一切都弄得湿漉漉的,夏岚的情绪把所有的内容整合到了一起。夏岚是一个细腻、内敛并带有淡淡感伤气质的女孩,对现实的庸俗、浮躁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所以,她看不上矫揉造作的化妆师和大腹便便的老乔,对深沉沧桑有着一股哲人气质的丁南心存好感。在听完白静讲述的《雨中的墓园》的故事梗概后,她沉浸在一种迷茫感伤的情绪之中。聆听夏岚,如同一首感伤的旋律从心头流过,即便你不留意歌词,也会沉浸其中。当然,这个比方

并不准确，文字的音乐性本身就是文字营造出来的。这段文字开头用的是童谣般的絮语，非常符合夏岚那种略带慵懒、感伤的小女子腔调。对天气的抱怨（见下划线部分）在文中重复出现，既分割又连缀起了不同的意识，从对陈林的回忆，到记忆和现实中的物象，再到对颍河镇和《雨中的墓园》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意识的突转可能导致的读者的不适，而且，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富有美感的节奏。文中还多处并置短语和词组，并以句号相分割（见着重号部分），不仅呈现不同意象在意识流中次第涌现的状态，也在节奏和韵律层面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非常精妙。

意识流不是一种容易的技法，并非打破逻辑关系把一些意象和片段堆积起来就可了事，相比传统的心理描写，它要花费作者更多的心血。如戴维·洛奇所说，意识流虽然看似不着边际，但“它们不但具有自由间接叙述所赋予的弹性，还具有清晰的结构、优雅旋律”^[7]。杂乱无章、漫无边际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意识流的所有成分都是作家精心选择和组织的，不仅具有“优雅旋律”，而且这种旋律还必须与人物的性格气质相契合，或者说必须能够塑造出人物的性格气质。此前夏岚的戏份只有寥寥数语，这段意识流文字是小说第一次对夏岚浓墨重彩，但这之后我们会喜欢上她，因为我们从中感受到了夏岚邻家女孩般的清丽脱俗，娇慵而又大方、温婉而又洗练，打动我们的主要不是文字的内容——诸如对陈林和父母的评价，而是文字的形式，是在节奏和旋律中流露出来的气韵格调。

我们往往在情绪和情感之间做出断然的区分，认为在人的生命结构中，情感是持久的、深层的，具有本质性、标识性，诸如一个冷漠的人、一个沧桑的人；而情绪是暂时的、易变的，不具有标识性，喜怒哀乐对所有个体来说都是共通的。墨白不以为然，他改变了情绪的外延，认为情绪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的外化，不同个体即便在同一境遇中，其情绪表现也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人在欢乐时也会流露出忧伤，有的人在忧伤时仍会让人感觉到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讲，墨白推重情绪，用情绪来组织文本。在一次私下的交流中，墨白告诉笔者，他的文本从开头到结尾在语气上都是贯通的。这种语气上的贯通，正是因为情绪的作用。比如墨白《裸奔的年代》中，谭渔沉重的忧伤始终挥之不去，在他进入城市春风得意的时候，在他心猿意马寻欢作乐的时候，这种忧伤也在到处流淌，充溢整个文本。在多视角的叙事中，比如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也有一种主导整个文本的情绪，这种情绪来自时代的精神状态，它渗入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来看关于丁南的一段意识流描写：

老乔嘿嘿地笑着往车门边走，他一走车身都在抖动。丁南想，你看你像不像个大狗熊？下吧下吧，你不说还好，你这一说我还真想尿尿。跟着老乔下吧。摄影师。美工。小伙子长得多帅，一头长发，远看你就是个女人。艺术家。街头流浪汉。蹲在伦敦或纽约街头为行人作画的艺术师。至少也有一米八的个，你是吃什么长的？苦就苦了我们这代人。浪子，我们都不到一米七呀。不，浪子，你不能和我比。我是二级残废的话你就是三级。下呀，摄影师。下呀，两位女将。白静。她的肌肉富有弹性。吃甘蔗正是好时候，中节。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呀。花雨伞。红雨伞。雨还在下呀，这是什么地方？哪个地方有厕所？就跟着老乔他们走吧，在这儿还会找不到厕所？到处都是田野，哪儿不能尿一泡？喇——这是一辆什么车？奥迪？小舅子开这么兴，慌的就像找不到庙门似的，去吧，去得早了能投个好胎，最起码也能投个正处级当爹……

这段文字使用了不少的口语，有的字眼相当粗俗，有的则带有性的暗示，非常符合丁南的身份——曾混迹底层，并坐过监狱。夏岚的那段文字是细腻的、伤感的，而这段文字则是一副愤世嫉俗、百无聊赖的腔调，在节奏和旋律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不过，在这两段文字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的情绪，那就是迷茫，一种之于浮躁的现实、之于沉重的历史的迷茫。迷茫在夏岚身上体现为忧伤，在丁南身上则体现为无聊。小说最后一句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迷茫像无处不在的雨水一样迷住了他的眼睛。”迷茫的情绪和连绵的雨水一样始终弥漫在小说文本之中。即便是在《风车》的闹剧中，在渠首的婚宴上，我们都能在喧嚣中感受到那种迷茫的存在。从结构上看，墨白的小说是开放的、发散的，但在情绪上、氛围上，又是统一的、有机的。因为情绪的整合作用，意识流的文字在墨白的小说中并不触目，我们很自然地就进入了人物的意识之中，这正是墨白的高明之处。和其他从西方借鉴来的艺术手法一样，墨白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极其娴熟圆融的境界。

意识流的运用导致了小说结构层面的革命。传统小说按照客观现实时空顺序或事件发展过程结构作品,尽管也有倒叙和插叙,但倒叙、插叙部分的时间起始点和正文部分有着很好的衔接,总的来说,时间的前后承续关系非常清晰,构成情节的所有事件的时间基本是按照发生的先后依次在文本中被清晰地标示出来。意识流小说就不同了,它不是在线性的时间中而是在意识的流动中组织文本内容。意识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在某个当下瞬间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过去,这就可以把时间跨度很长的故事压缩在一个较短的当下,加大叙事的密度,从而使读者保持阅读的专注度。

墨白的小说大多发生在不长的时间段中。《来访的陌生人》前后不过四天,但却容纳了此前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这些内容都通过人物的意识零散地呈现出来,当然,零散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经过了作者精心的设计。它们适时出现,看似不经意地传递给我们一些线索,但这些线索又是碎片化的、不完全的,需要我们花费很大的气力在时空和因果关系中给它们定位,并不断调整对情节逻辑的猜测,直到最后才能把所有内容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相比作者把因果逻辑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的传统叙事模式,意识流叙事更挑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专注度。由于大量的信息拥塞而至,叙述和阅读的速度都变得很慢,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

我放下酒杯,这才说道:“我是什么时候去找你们的?”

老许说:“昨天上午。”

“是昨天上午吗?”我先是对老许的话表示怀疑,细细想一想,就是昨天上午。没等老许说话,我就又接着说:“就是昨天上午,可是在我的感觉里那好像已经是很早以前的往事了。”

老许说:“那是因为你想了太多的往事。”

老许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是我的脑海里想了太多的往事,那些往事离我是那样的近,就像近在眼前,伸手可及。我说:“是呀,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一些陈旧的往事越来越清楚,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似的。”

孙铭(“我”)的感受也是读者的感受。“昨天上

午”孙铭去事务所求助是小说的开端,到“现在”小说的篇幅已经过半,我们不时地跟随着人物的话语和意识走进遥远的过去,以致对故事当下的时间进程产生了错觉。博尔赫斯在诗中说,任何一个瞬间都比海洋/更为深邃,更为多种多样。^[8] 每一个瞬间都包含了全部的过去,“任何命运,不管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9]。在一个个瞬间不断停留徘徊,填充进大量的信息,带来了叙事的延宕,也呈现出了世界本身极端的复杂性和密集性。

有论者指出,淡化和取消情节是意识流小说之于传统小说的突破。但笔者以为,没有情节就没有小说,即便在意识流小说中,情节也非常重要。尽管的确存在着一些否定情节的实验性作品,但它们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它们的价值也值得商榷。因为小说必须关照现实,而现实本质上就是由种种关系构成的,抛开情节,关系就无从得到揭示。意识流小说割断了构成情节的诸事件之间的因果逻辑,将它们打散分布在小说各处,但并没有取消情节本身,读者仍需要自己在头脑中对情节进行重建。墨白不仅没有淡化情节,而且通过意识流在过去和当下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使情节得到了强化。《月光的墓园》中,“我”(老手)看到老曹的妻女在鏊子上烙油馍,儿时的场景马上浮现在眼前,那时母亲在为生产队烙油馍,为了给病床上的父亲争取两张油馍,她被柳根压在身下。

后来在我无数次的回想之中,那四条赤裸裸堆叠在一起的腿变得十分的清晰,常常像利剑一样刺入我的胸膛,娘的哭泣声像一支哀曲从天边飘过来,时时敲击着我的灵魂。青萍,你不知道,自从我懂得那重叠的腿意味着什么的那一刻起,仇恨就像寒冬腊月的天气注入了我的血液,使我成了一个冷血动物,尽管有时我眼里还能流出一行热泪。

如此,我们便理解“我”何以娶了柳根的女儿胖妮并冷漠残忍地折磨她,何以变成了一个蛮横凶悍的人。在《欲望与恐惧》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表述:

我不知道牛文藻后来仇恨这个世界仇恨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和女人的种子是不是那一刻埋下的,但有一点我敢肯定,那一刻她品尝到了饱受耻辱的滋味。(第7章 布告)

那个近似疯狂的夜晚清晰地留在了我

的记忆里,同时有一种邪恶的东西也渗入了我的血液。我想,后来我干了许多不知羞耻的事情,或许就跟这场幼年的经历有关。(第8章 模拟表演)

……

当下的一切,都可以在过去中得到解释,而过去是通过吴西玉的意识之流呈现出来的。小说的当下讲述的是吴西玉出车祸前的一段经历,只有短短四五天的时间。虽然这部作品关于过去的讲述并不是严格的意识流形式,而是“我”的回忆,基本上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但心理状态的呈现始终伴随着“我”的讲述。前文我们曾谈到,墨白对意识流的运用非常灵活,很多时候他让人物意识的直接呈现与叙述者的描述评说相互交织,这样不仅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而且在时空的处理上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方便地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构建起种种关联。我们应该谨记,意识流是一种文学手法,而不是文学的目的。意识流理论本身存在着无法规避的困境,如柏格森所说,意识流小说不像理论家们宣称的那样,能够对意识的绵延做出完全的呈现,因为意识流手法也免不了要用语言把情感、意念固定化并排列在线性(而非绵延)的时间之流中,所以它献给我们的不过是“情感的阴影”^[10]而已。退一步说,即便可以,对人的意识进行分毫不差的复制就应该是文学的目的吗?肯定不是。墨白

说,“现实始终是我写作的基点”,关照现实才是文学的目的和使命。手段永远不能僭越目的。所以,墨白从不拘泥成规,对意识流以及其他一切借鉴来的艺术手法和形式,他都自由地、创造性地加以使用,这是一个卓越的小说家必备的素质和标志。

参考文献:

- [1]亨利·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M]. 肖聿,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
- [2]墨白. 事实真相·序言[C].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2-3.
- [3]墨白. 孤独者[C].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82.
- [4]墨白. 博尔赫斯的宫殿[J]. 花城,2010(5).
- [5]李丹梦. 形式的伦理意义:墨白论[C]//墨白研究. 杨文臣,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124.
- [6]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M]. 卢丽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3.
- [7]博尔赫斯. 1964年[C]//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上).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293.(在中篇小说《月光的墓园》题记中,墨白引用了这两句诗)
- [8]墨白. 梦境、幻想与记忆[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491.
- [9]亨利·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吴士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o Bai to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YANG Wench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ime, reality and humanity, Mo Bai uses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s one of his main fictional methods, so as to present the complexity and mystification concealed in characters' inner world. Mo Bai does not adhere rigidly to the rules; instead, his application about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s creative. He gets rid of the obscure that lies in novel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 By intertwi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aracters directly with the narrator's comment, he builds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hus reveals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s more efficiently, and meanwhile strengthens the plot and enhances the readability.

Key words: Mo Bai;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emotion; structure; plot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研究

杨德玲¹, 刘战伟^{2*}

(1.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2 许昌学院 商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2000—2015年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利用核密度估计法和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地区差距及增长分布的动态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考察期内整体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各省份效率水平差异明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核密度估计表明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差距整体呈现扩大趋势,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有所区别;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表明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分布相对稳定,未来高效率省份的引领作用会明显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极大可能实现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地区差距;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30-06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回顾

创新是引领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是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必然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取得了整体性、全局性、历史性的重大成果,研发经费投入增速稳定在20%左右,位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20万,居世界首位。这些资源有力地支撑了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但成绩的背后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达到了70%,科技成果大量浪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不足,创新驱动乏力,造成科技成果转化难的结果。因此,积极推动新时代产学研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协同创新平台,建立新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提高协同创新效率,对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一项复杂和系统的创新模式,是以企业和高校为核心主体,政府和中介服务机

构参与的多元创新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更为深入的创新活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采用的是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从研究视角上看,主要包括:(1)区域层面的研究。姜彤彤^[1]采用DEA模型,测算了2002/2003—2011/2012年我国30个省(区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及省际/区域差异;黄菁菁^[2]采用两阶段链式关联网DEA模型,分析了2010—2012年辽宁省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廖名岩、曹兴^[3]应用DEA模型和四阶段DEA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10—2012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2)产业层面的研究。车维汉、张琳^[4]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实证分析了上海市13个主要制造业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刘营、李存金^[5]采用DEA—Malmquist模型,以全国14个政府重点投入行业为研究对象,对行业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评价;刘兴凯、张靓媛^[6]运用数据包络分

收稿日期:2019-10-18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9A630027)

作者简介:杨德玲(1963—),男,河南许昌人,博士,许昌电气职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通信作者:刘战伟(1979—),男,河南许昌人,博士,许昌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技术创新。

析(DEA)方法实证测算了天津市制造业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3)高校层面的研究。孙世敏等^[7]采用DEA方法评价了我国29个省(区市)的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赵晓阳、刘金兰^[8]使用非参数的DEA和Malmquist指数方法,综合评价了37所“985高校”2006—2009年科研投入产出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变化;姜彤彤、吴修国^[9]以我国6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模型测算和分析了2005—2006、2008—2013年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采用DEA方法从区域、产业和高校层面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进行静态或者动态分析,但目前尚未有文献采用分布动态方法,基于区域层面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动态分布和演进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使用核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方法,系统探讨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以期制定缩小各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的政策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一) 研究方法

1.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Malmquist指数通常用于测量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Caves等首先将该指数用于测算生产率变化。本文应用Malmquist指数来测量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首先定义产出的距离函数,在时期 s ,技术效率可以表示为:

$$d^s(x, y) = \min \left\{ \theta : \frac{y}{\theta} \in P(x) \right\} \quad (1)$$

其中,最小化 θ ,意味着使 y/θ 最大化。这个距离函数衡量了给定投入下产出的最大值,因此, θ 表示技术效率指数。同理,我们可以定义 t 时期的产出距离函数:

$$d^t(x, y) = \min \left\{ \theta : \frac{y}{\theta} \in P(x) \right\} \quad (2)$$

在此基础上,以时期 s 作为参考标准,从时期 s 到时期 t 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变化可以定义为:

$$m^s = \frac{d^s(x^t, y^t)}{d^s(x^s, y^s)} \quad (3)$$

同时,以时期 t 作为参考标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变化为:

$$m^t = \frac{d^t(x^t, y^t)}{d^t(x^s, y^s)} \quad (4)$$

上述两个指数在一种产出和投入的情况下是相同的,但是在多种投入和可变规模收益的情况下则

是不同的,为了避免这种不一致性,Färe等^[10]根据上面两种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推导出产出导向的生产率指数的变化:

$$m(x^t, y^t, x^s, y^s) = \left[\frac{d^s(x^t, y^t)}{d^s(x^s, y^s)} \times \frac{d^t(x^t, y^t)}{d^t(x^s, y^s)} \right]^{1/2} = \frac{d^t(x^t, y^t)}{d^s(x^s, y^s)} \times \left[\frac{d^s(x^t, y^t)}{d^t(x^t, y^t)} \times \frac{d^s(x^s, y^s)}{d^t(x^s, y^s)} \right]^{1/2} \quad (5)$$

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项 $\frac{d^t(x^t, y^t)}{d^s(x^s, y^s)}$ 衡量了从时期 s 到时期 t 的技术效率的变化 EC ,其中,技术效率 EC 又可继续分解为纯技术效率 PTE 和规模效率 SE ;等式右边括号内的部分衡量了两个时期之间技术变化率 TC 。即

$$\text{技术效率变化, } EC = \frac{d^t(x^t, y^t)}{d^s(x^s, y^s)} = PTE \times SE \quad (6)$$

$$\text{技术变化率, } TC = \left[\frac{y^t/y^b}{y^t/y^c} \times \frac{y^s/y^a}{y^s/y^b} \right]^{1/2} \quad (7)$$

当Malmquist > 1 时,表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TFP)的增长;当技术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大于1时,表示其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反之,则是导致其下降的原因。

2. Kernel 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属于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主要用于对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进行估计。与直方图相比,它多了一个用于平滑数据的核函数,可以较好地弥补直方图非连续性的缺陷。假设随机变量 X 的密度函数为 $f(x)$,则其密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f(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_i - x}{h}\right) \quad (8)$$

其中 N 为样本量, $K\left(\frac{X_i - x}{h}\right)$ 为核函数, h 代表宽带,由于核函数对宽带选择非常敏感,因此使用合适的宽带对核密度估计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讲,宽带 h 要满足如下条件:

$$\lim_{N \rightarrow \infty} h(N) = 0; \lim_{N \rightarrow \infty} Nh(N) = N \rightarrow \infty$$

核函数根据分组数据的密度程度,可以分为高斯核、Epanechnikov核、三角核、四次核等类型,本文选取常用的高斯核函数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动态演进进行估计,其表达式如下:

$$f(x) = \frac{1}{\sqrt{2\pi}} \exp\left(-\frac{x^2}{2}\right) \quad (9)$$

由于非参数估计无确定的函数表达式,一般采用图形对比的方式考察其分布变化。通过估计结果可以从变量分布的位置、形态和延展性3个方面进行分析。

3. 马尔可夫链

本文通过构建马尔可夫转移矩阵并计算平稳分布,分析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增长的内部流动性,从而刻画其增长的动态演进。该过程将各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序列离散化为具有“无后效性”的马尔可夫链序列 $\{X_0, X_1, X_2, X_3, \dots\}$,则表明各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现有状态”条件下,其“未来状态”的条件概率分布与其“过去状态”无关。假设 X_t 为离散时间马尔可夫链,对于任意状态 $i_0, i_1, i_2, \dots, i_t, i, j$ 和对任何时间 $t \geq 0$,则有

$$P\{X_{(t+1)} = j | X_0 = i_0, \dots, X_{t-1} = i_{t-1}, X_t = i_t\} = P\{X_{t+1} = j | X_t = i\} \quad (10)$$

如果马尔可夫链存在转移概率矩阵 $P = (P_{ij})$ 和概率分布 $\{\pi, i \geq 0\}$,且满足 $\pi_i = \sum_0^{\infty} \pi_i P_{ij}$,那么马尔可夫链的平稳分布 $\pi = \{\pi, i \geq 0\}$ 。如果 π 集中于一点,反映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呈现趋同现象,可消除区域间效率增长差距。如果 π 集中于两点,则反映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呈现“两极”分化,区域间难以绝对趋同。

(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性,同时参照吴和成等^[11]学者的研究,选取的投入指标主要包括人力、财力、物力3个方面,产出指标则主要包括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申请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备注
投入指标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才投入
	R&D 经费支出	资金投入
	R&D 机构数	物力投入
产出指标	专利申请授权数	中间产出
	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企业产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中间产出

投入指标中 R&D 人员全时当量体现了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投入的人力资本,R&D 经费支出则体现了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广度,R&D 机构数体现了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深度。产出指标中专利申请授权数表示区域内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总量,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说明了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直接经济成果,技术市场成交额强调了专利技术转化为实际经济收益的能力。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 30 个省份(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由于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从投入到获得

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选择大部分学者的做法,将其滞后期设置为 1 年,投入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0—2005 年,产出指标数据为 2001—2006 年,以此类推,相关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相关省份科技统计年鉴,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区域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依据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法,测算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从而分析其增长变化情况,表 2 列示出了中国各省份及三大区域的测算结果。

表 2 中国各省份平均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变化及分解

省份	TEC	TC	ML	省份	TEC	TC	ML
北京	1.000	1.129	1.129	湖南	1.008	0.998	1.006
天津	1.000	1.098	1.098	广东	0.966	1.079	1.042
河北	1.019	1.028	1.047	广西	1.010	0.998	1.008
山西	0.977	1.060	1.035	海南	0.929	0.995	0.925
内蒙古	0.910	1.016	0.924	重庆	1.000	1.090	1.090
辽宁	1.003	1.030	1.032	四川	1.062	1.068	1.135
吉林	1.020	1.017	1.038	贵州	1.020	1.021	1.042
黑龙江	1.053	1.023	1.077	云南	0.982	1.020	1.002
上海	0.970	1.057	1.025	陕西	1.166	1.028	1.199
江苏	1.027	1.174	1.205	甘肃	1.021	1.032	1.053
浙江	1.000	1.124	1.124	青海	1.113	1.083	1.205
安徽	1.070	1.056	1.130	宁夏	1.005	0.959	0.963
福建	0.959	1.037	0.994	新疆	0.956	1.003	0.959
江西	1.035	1.037	1.074	东部	0.988	1.073	1.060
山东	0.992	1.048	1.040	中部	1.025	1.026	1.053
河南	1.009	1.018	1.028	西部	1.022	1.029	1.052
湖北	1.034	1.002	1.036	全国	1.009	1.043	1.053

从表 2 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考察期内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 5.3%,说明了近年来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这与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励产学研合作是密不可分的。从增长动力来源看,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 4.3%,技术效率指数年均增长 0.9%,出现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增长的现象,属于一种典型的“双驱动”增长模式,但技术进步增长的速度远远大于技术效率增长的速度,说明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从增长动力来源看,三大区域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东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而技术效率存在恶化现象,是一种“单驱动”增长模式;中西部地区则都是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驱动,属于“双驱动”增长模式。同时各省份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本文根据差异性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持续下降型”,主要指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值小于1的省份,包括内蒙古、福建、海南、宁夏、新疆等5个省份;第二类是“缓慢增长型”,主要指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值介于1.000—1.100之间的省份,包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等18个省份;其余的北京、江苏、浙江、安徽、四川、陕西、青海等7个省份为“高速增长型”,这些省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值都大于1.100。由此可见,各个省份之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各省份的创新意识、经济发展水平、科技人才储备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同,造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的差异性。从增长动力来源看,除湖南、广西和海南3省区外,其余的省份的技术进步指数均大于1,而技术效率指数大部分省份大于1。

(二)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的动态分布

为了进一步考察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本文借鉴 Hall 和 Jones^[12] 应着重考察不同经济主体生产率水平相对差异的思想,首先度量中国各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相对效率。其中,第 h 个 ($h = 1, 2, \dots, 30$) 省份在 t 年的累积产学研协同创新相对效率 CML_h 为:

$$CML_h = D_h^{2005}(x_h^{2005}, y_h^{2005}) \times \prod_{t=2006}^T ML_h^t \quad (11)$$

上式中 t 表示时间, $D_h^{2005}(x_h^{2005}, y_h^{2005})$ 为第 h 个省份在 2005 年的距离函数, ML_h^t 为第 h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 Malmquist 指数。

利用公式(11)可以计算出历年的累积产学研协同创新相对效率,在此基础上,本文以 2006、2010 和 2015 年作为考察年份,采用 Kernel 密度估计法做出相关年份的密度分布,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核密度估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1) 全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核密度估计。整体上来看,核密度曲线呈现向右移动的特征,说明考察期内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与 2006 年相比,2015 年核密度中心明显增

大,再次证明了这一结论。从波峰来看,主峰高度呈现小幅下降趋势,说明各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差距正逐步减小。从形状来看,2006 年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表现出“分散式单峰”分布,到 2015 年则转化为“双峰”分布,说明这一时期各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之间的差距从多极化趋势逐渐演变为两极化趋势。

(2) 东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核密度估计。从演变趋势看,与 2006 年相比,2010 年核密度曲线峰值显著下降,变化宽度小幅减小,“双峰”分布趋势显著,说明该阶段东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区域内差异逐渐演变成了两极分化的格局。2015 年与 2010 年相比,核密度曲线峰值持续下降,但变化宽度加大,反映出区域差异在不断加大,核密度中心右移,波峰则显示出从“双峰”分布逐渐转变为“单峰”分布,说明该阶段东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不断提高,区域内效率有从原来的两极化趋势向均衡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3) 中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核密度估计。从演变趋势看,与 2006 年相比,2010 年核密度曲线中心轻微右移,峰值显著下降,“双峰”分布明显,说明该阶段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区域内差距在加大。2015 年与 2010 年相比,核密度中心明显右移,峰值高度在降低,波峰则从“双峰”分布演变为“单峰”分布,说明该阶段中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持续增长,正从两极化向均衡发展转变。

(4) 西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核密度估计。从演变趋势看,与 2006 年相比,2010 年核密度曲线中心左移,峰值减小且“单峰”分布明显,变化宽度增大,说明该阶段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增长的省份数量减少,地区差距有一定程度的降低。2015 年与 2010 年相比,峰值持续下降,但波峰则从“单峰”分布演变为“双峰”分布,说明该阶段区域内效率差异明显并逐渐演变成两极分化趋势。

(三)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区域差异的长期演化趋势

为了详细刻画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各省份的动态转移特征及长期演化趋势,本文采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进行分析。按照四分位数方法把测算出的效率值离散为四种类型,分别为低、中低、中和高效率水平。为了更好地对比不同时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分别构建了“十一五”(2005—2010 年)、“十二五”(2010—2015 年)和 2005—2015 年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及稳态分布,如表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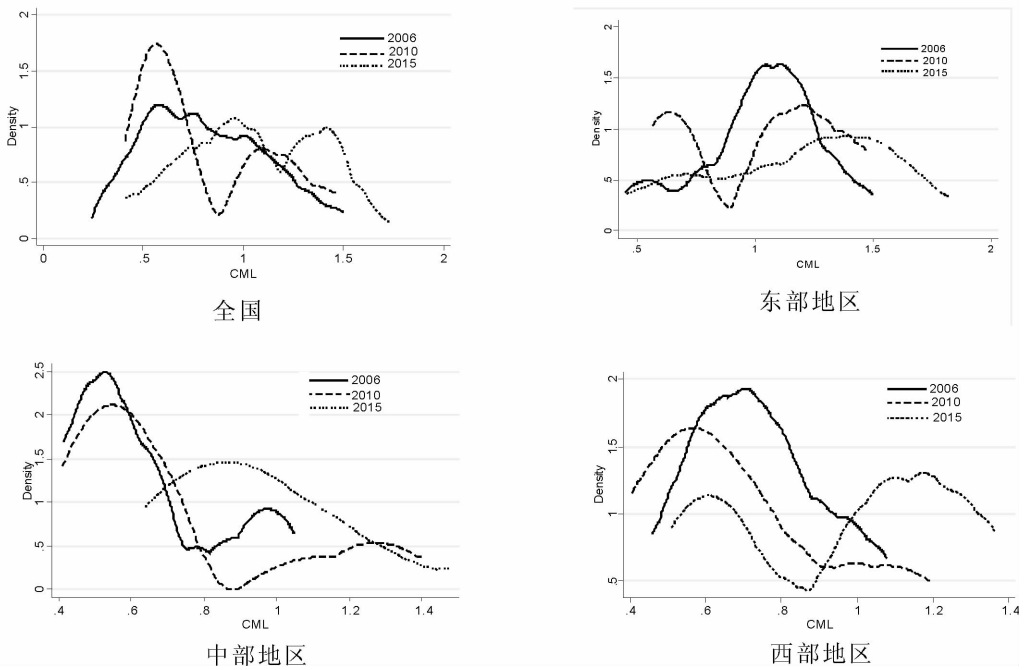


图1 全国及三大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核密度估计

表3 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及稳态分布

时间	类型	高	中	中低	低
2005—2010年	高	0.732	0.268	0.000	0.000
	中	0.249	0.751	0.000	0.000
	中低	0.000	0.000	0.883	0.117
	低	0.000	0.000	0.147	0.853
2010—2015年	高	0.902	0.098	0.000	0.000
	中	0.038	0.785	0.177	0.000
	中低	0.000	0.062	0.891	0.047
	低	0.000	0.000	0.106	0.894
2005—2015年	高	0.824	0.176	0.000	0.000
	中	0.165	0.778	0.057	0.000
	中低	0.000	0.047	0.893	0.060
	低	0.000	0.000	0.138	0.862
	初始分布	0.248	0.232	0.281	0.239
稳态分布		0.326	0.255	0.263	0.156

表3结果显示,无论是“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时期,还是2005—2015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对角线的概率均大于非对角线的概率,说明各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相对稳定,向其他水平类型转移的概率比较低。尤其是高水平省份处于高效率水平的概率为82.4%,向中等效率水平转移的概率仅为17.6%,说明高水平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增长存在趋同趋势,反映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增长的持续性。中等水平省份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为16.5%,高于向中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中低水平省份向中等水平转移的概率为4.7%,小于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说明中等水平省份和中低水平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双向变化的可能性较大。低水平省份向中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为13.8%,远远小于维持在低水平的概率86.2%,说明低水平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很难实现跨越式增

长。从稳态分布来看,无论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初始处于何种状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处于高效率水平、中效率水平、中低效率水平和低效率水平的概率分别为32.6%、25.5%、26.3%和15.6%。与初始分布相比,高效率水平的省份比例增加,中等和中低效率水平的省份比例变化不大,而低效率水平的省份则出现了减少,这种变化说明未来高效率省份的引领作用会明显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极大可能实现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30个省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方法对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动态演进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考察期内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属于典型的“双驱动”增长模式,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各省份效率水平差异明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各省份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根据差异性将其划分为“持续下降型”“缓慢增长型”“高速增长型”三类。(2)核密度估计表明,考察期内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差距整体处于扩大的态势,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差距经历了从两极化趋势向均衡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部地区差距经历了从“双峰”分布演变为“单峰”分布,说明地区差距从迅速增大到逐渐缩小的过程;西部地区差

距则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表现为向两极化趋势演变。(3)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表明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相对稳定,难以实现跨越式提升,未来高效率省份的引领作用会明显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极大可能实现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针对地区效率的差异性,各省份应因地制宜,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才能发挥最大效应,实现区域间的良好互动和优势互补。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水平较低的省份,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水平低和技术效率退步导致的,这些省份应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加大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产学研合作项目,进一步深化提升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推进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三是加强合作与交流。各省份之间应打破产学研合作壁垒,促进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跨省份的协作与分工,共同推动区域间人才、技术、知识的交互与对接,从而促进整体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缩小地区差距,形成协同创新与开放共享的格局。

参考文献:

- [1]姜彤彤. 省域范围内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评价及分析[J]. 学术论坛,2015,38(3):168-172.
[2]黄菁菁.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软

科学,2017(5):38-43.

- [3]廖名岩,曹兴. 中国省域协同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J]. 系统工程,2017(9):45-55.
[4]车维汉,张琳. 上海市产学研合作效率评价:基于分行业数据的DEA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3):20-25.
[5]刘营,李存金. 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评价研究:基于全国十年间行业数据[J]. 科技和产业,2014,14(3):58-63.
[6]刘兴凯,张靓媛.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基于天津市制造业的DEA分析[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28(4):70-74.
[7]孙世敏,项华录,兰博. 基于DEA的我国地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28(7):18-21.
[8]赵晓阳,刘金兰. 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的985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评价研究[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94-100.
[9]姜彤彤,吴修国. 高等学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评价及分析: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J]. 高教探索,2016(8):24-29.
[10]Färe R, et al. Production Frontier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吴和成,刘思峰. 基于改进DEA的地域R&D相对效率评价[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07,19(2):108-112.
[12]Hall R E, Jones C I. Levels of economic activity across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2):53-6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YANG Deling¹, LIU Zhanwei²

(1. Xuchang Electric Vocational College, Xuchang, Henan 461000,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th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15, and on this basis, the regional gap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th distribu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and Markov transfer matri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non – equilibrium are obvious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eriod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efficiency level between provinces is obvious, and that the efficiency decreases from east to center to west.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gap betwe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is expanding as a whole.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Markov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indicate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level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at the leading role of efficient provinces will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future, and tha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is likely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ustained growth.

Key words: industry – university – 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regional gap;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arkov chain

边境旅游发展水平的地域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赵建平¹, 明庆忠^{2*}

(1. 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云南财经大学 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以云南边境8个市州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边境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2008年、2012年、2017年为3个时间节点,并运用SPSS 24.0软件对边境旅游发展指标进行测评分析。结果显示:2008—2017年,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呈现绝对差距逐渐扩大,相对差距逐渐缩小的趋势。红河、西双版纳边境旅游发展综合状况最优,普洱、德宏、保山、文山次之,临沧、怒江边境旅游发展综合状况较差。边境各市州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边境旅游发展水平较高市州集中分布于滇南地区,经历了先集中后分散的演化过程;旅游发展水平中等区域和旅游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呈分散状交叉布局。研究发现:旅游政策、交通条件、经济基础、旅游资源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等因素是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和云南边境旅游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据此,针对性地提出从政策落实、整合旅游资源、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等方面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提升云南边境旅游整体实力的建议。

关键词:边境旅游;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力;云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6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36-07

随着边境旅游的发展,学术界对边境旅游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国外对边境旅游研究的重视缘于1978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GU)游憩工作组会议及其相关会议论文的发表,此后学者们对于边境旅游的关注度逐渐增加。首先,从概念上,国际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认为边境旅游应包含“过夜”和一定的旅行距离等要素, Timothy认为边境旅游吸引物包括边境线及其界碑等实体景物以及购物、色情、赌博等活动^[1];张广瑞认为边境旅游是人们通过边境口岸所进行的跨越国境的旅游活动;刘小蓓定义边境旅游为旅游者采取某种旅游方式在边境地区开展旅游活动或是从指定的边境口岸

入境,在双方政府商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进行的旅游活动。另一方面, Bucher采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衡量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13个评价因子,比较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的旅游竞争力^[2];钟林生等对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资源进行了质量等级评价并提出总体开发策略和分级开发策略;王娟等通过对比广西和云南边境旅游发展条件,讨论了两省区的竞合关系,提出了合作发展机制和策略^[3];赵多平等在对新疆、内蒙古、云南三省区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边境入境旅游的客流演化态势及其动因。在边境旅游合作开发方面,满海峰论述了“北黄海经济带”对于中朝边境旅

收稿日期:2019-09-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南陆疆边境跨境旅游发展空间格局、机制及模式研究”(41671147);云南哲社基地重点项目“云南省旅游景区优化布局与管理改革研究”(JD2017ZD02)

作者简介:赵建平(1995—),男,四川绵阳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旅游规划与管理。

通信作者:明庆忠(1963—),男,湖北黄冈人,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旅游发展与管理。

游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李英花、崔哲浩调查分析了图们江区域边境旅游合作现状和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罗奎、张蕾提出中哈自由旅游区建设空间布局^[4]。此外,边境旅游产品规划与开发、边境旅游区域合作机制研究也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要热点,国内边境旅游研究力度和范围在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然而,目前关于边境旅游的空间格局演化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云南省是我国的旅游大省,自20世纪90年代初云南省开展边境旅游业务以来,云南省边境地区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大批旅游者。近年来,随着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公共服务条件的改善和人们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长,边境旅游取得了飞速发展。因此,本文以云南为研究案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边境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云南边境8个市州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变及驱动力进行研究,针对性提出边境旅游发展建议,以期为促进云南边境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域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地区,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相毗邻,有着无可替代的沿边地理区位优势。在长达4060km的边境沿线分布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8个市州25个县(市)。有16个国家一类口岸和7个二类口岸。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多个指标变量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因此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多指标进行测度。主成分分析法是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些较少的重要变量被称为公因子,公因子具有携带信息量大、对原始指标解释性强等特点。对公因子进行数据运算与测度,可以减少计算分析工作量,便于将复杂问题简化。

(二)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18年《云南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云南省各市州2009—2018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等。

三、测评过程

(一)评价指标构建

旅游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与社会各行各业关联度极高。边境旅游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应综合考虑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测算结果的客观准确,选取对边境旅游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进而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运用SPSS 24.0软件对被测评指标进行运算,得到主成分特征值和累计方差贡献率。特征值大小代表主成分影响程度大小,原则上选取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指标项作为主成分(见表1)。由表1可见,前4项指标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4.438%,表明前4个公因子携带的原始数据信息量大,能较为全面地解释原始数据,可选为主成分因子。

表1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1	6.355	48.884	48.884	6.355	48.884	48.884	5.670	43.617	43.617
2	2.757	21.209	70.093	2.757	21.209	70.093	2.348	18.058	61.674
3	1.942	14.941	85.034	1.942	14.941	85.034	2.220	17.077	78.751
4	1.223	9.405	94.438	1.223	9.405	94.438	2.039	15.687	94.438

通过表2旋转成分矩阵可看出,主成分 F_1 主要在入境旅游人次、旅游外汇收入、旅游业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和3A级以上景区得分等指标上载荷较高,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出区域旅游业发展实际情况、区域旅游市场规模的大小以及旅游市场规模经济效益状况,可以将其命名为旅游发展现状因子。主成分 F_2 主要在边境口岸数量和口岸入境一日游人次等指标上载荷较高,反映出边境口岸旅游发展情况,可以命名为边境旅游发展现状因子。主成分 F_3 主

要在近3年旅游总人次年均增长率和近3年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等指标上载荷较高,反映出区域未来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命名为旅游发展潜力因子。主成分 F_4 主要在公路网密度和私人车辆拥有量等指标上载荷较高,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出地区旅游业的市場空间拓展能力和区域旅游业外部支持力,与旅游业发展的基础环境具有较大关联,可以命名为旅游发展基础环境因子。

表2 旋转成分矩阵

指标变量及编号(单位)	成分			
	F_1	F_2	F_3	F_4
入境旅游人次 C_1 (万人次)	.945	.292	-.005	-.127
旅游外汇收入 C_2 (万美元)	.872	.447	-.113	-.158
旅游业总收入 C_3 (亿元)	.931	.206	-.097	.265
国内旅游人次 C_4 (万人次)	.741	-.036	-.056	.662
国内旅游收入 C_5 (亿元)	.925	.195	-.092	.290
边境口岸数量 C_6 (个)	.059	.883	.150	.053
口岸入境一日游人次 C_7 (万人次)	.308	.923	-.142	.029
3A级以上景区得分 C_8 (分)	.856	-.165	.145	.448
公路网密度 C_9 (km/km ²)	-.023	.544	.451	.487
私人车辆拥有量 C_{10} (万辆)	.092	.102	.149	.956
近3年旅游总人次年均增长率 C_{11} (%)	-.019	.096	.986	-.027
近3年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 C_{12} (%)	-.150	-.039	.952	.207
人均GDP增长率 C_{13} (%)	-.938	.078	.138	.079

表3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指标变量及编号(单位)	成分			
	F_1	F_2	F_3	F_4
入境旅游人次 C_1 (万人次)	.207	.046	.092	-.207
旅游外汇收入 C_2 (万美元)	.168	.136	.023	-.198
旅游业总收入 C_3 (亿元)	.150	.010	-.022	.052
国内旅游人次 C_4 (万人次)	.080	-.093	-.075	.316
国内旅游收入 C_5 (亿元)	.147	.005	-.024	.068
边境口岸数量 C_6 (个)	-.069	.409	.013	-.008
口岸入境一日游人次 C_7 (万人次)	-.040	.424	-.114	-.003
3A级以上景区得分 C_8 (分)	.169	-.180	.090	.133
公路网密度 C_9 (km/km ²)	-.083	.231	.108	.218
私人车辆拥有量 C_{10} (万辆)	-.105	.024	-.093	.547
近3年旅游总人次年均增长率 C_{11} (%)	.086	-.020	.513	-.193
近3年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 C_{12} (%)	.034	-.071	.450	-.025
人均GDP增长率 C_{13} (%)	-.223	.123	-.039	.151

基于以上,本文选择旅游发展现状、旅游发展条件、旅游发展潜力3个指标层,13个具体量化指标来衡量云南边境各个市州旅游发展情况(表4)。

表4 云南边境旅游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总指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单位	指标解释	
边境旅游发展指数	旅游发展现状	入境旅游人次	C_1	万人次	区域国际旅游规模	
		旅游外汇收入	C_2	万美元	区域国际旅游规模经济效益	
		旅游业总收入	C_3	亿元	区域旅游经济发达程度	
		国内旅游人次	C_4	万人次	国内旅游市场规模	
		国内旅游收入	C_5	亿元	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效益	
	旅游发展条件	口岸入境一日游人次	C_6	万人次	边境口岸旅游规模	
		边境口岸数量	C_7	个	边境旅游基础条件	
		3A级以上景区得分	C_8	分	旅游资源禀赋	
		公路网密度	C_9	/km ²	旅游业外围层市场空间拓展能力	
		私人车辆拥有量	C_{10}	万辆	区域旅游业外围层支持力度	
		旅游发展潜力	近3年旅游总人次年均增长率	C_{11}	%	区域旅游业未来接待规模水平
		近3年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	C_{12}	%	区域旅游业未来接待规模经济效益水平	
		人均GDP增长率	C_{13}	%	经济发展潜力水平	

1. 旅游发展现状指标体系

旅游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旅游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入境旅游人次、旅游外汇收入、旅游业总收入、国内旅游人次、口岸入境一日游人次以及国内旅游收入等具体指标,表明区域旅游市场规模、旅游业经济效益。

2. 旅游发展条件指标体系

旅游发展条件中,旅游资源和旅游交通是区域旅游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吸引旅游者聚集的核心要素。3A级以上景区得分 $S(S=5A*10+4A*8+3A*6)$ 代表旅游资源禀赋的优劣,私人车辆拥有量代表旅游市场客流扩散与拓展的能力,公路网密度代表区域中转或运输客流的能力,是旅游市场规模空间拓展与延伸的保障。

3. 旅游发展潜力指标体系

评估边境旅游发展指数时,旅游发展潜力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它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旅游业未来发展趋势。本文选取云南省边境8个市州近3年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以及人均GDP增长率作为具体衡量指标。

(二) 计算方法

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表3)可得三个主成分因子的计算公式,如下:

$$F_1 = 0.207C_1 + 0.168C_2 + 0.150C_3 + 0.080C_4 + 0.147C_5 - 0.069C_6 - 0.040C_7 + 0.169C_8 - 0.083C_9 - 0.105C_{10} + 0.086C_{11} + 0.034C_{12} - 0.223C_{13} \quad (1)$$

$$F_2 = 0.406C_1 + 0.136C_2 + 0.010C_3 - 0.093C_4 + 0.005C_5 + 0.409C_6 + 0.424C_7 - 0.180C_8 + 0.231C_9 + 0.024C_{10} - 0.020C_{11} - 0.071C_{12} + 0.123C_{13} \quad (2)$$

$$F_3 = 0.092C_1 + 0.023C_2 - 0.022C_3 - 0.075C_4 - 0.024C_5 + 0.013C_6 - 0.114C_7 + 0.090C_8 + 0.108C_9 - 0.093C_{10} + 0.513C_{11} + 0.450C_{12} - 0.039C_{13} \quad (3)$$

$$F_4 = -0.207C_1 - 0.198C_2 + 0.052C_3 + 0.316C_4 + 0.068C_5 - 0.008C_6 - 0.003C_7 + 0.133C_8 + 0.218C_9 + 0.547C_{10} - 0.193C_{11} - 0.025C_{12} + 0.151C_{13} \quad (4)$$

根据解释的总方差(表1)可知,主成分 F_1 的权重系数为43.6%,主成分 F_2 的权重系数为18.1%,主成分 F_3 的权重系数为17.1%,主成分 F_4 的权重系数为15.7%。由此可得边境旅游业发展综合得分 F ,计算公式为:

$$F = 0.436F_1 + 0.181F_2 + 0.171F_3 + 0.157F_4 \quad (5)$$

(三) 边境旅游业发展综合水平测算

运用公式(1)~(5)可计算2017年云南省边境8个市州旅游发展水平公因子综合得分(表5)。

表5 云南省边境8个市州旅游发展水平公因子综合得分

地区	F_1	F_2	F_3	F_4	F	排名
红河	43.14	-29.90	-11.01	125.21	357.20	1
西双版纳	277.35	-71.01	-165.69	709.38	265.39	2
普洱	283.70	-232.23	-161.28	854.02	210.77	3
德宏	201.24	-159.37	-98.57	627.59	191.11	4
保山	424.45	-279.98	-232.70	1087.91	188.16	5
文山	313.48	-265.19	-197.83	993.15	161.27	6
临沧	541.76	-388.72	-370.11	1621.91	140.57	7
怒江	232.42	-154.65	-165.82	740.65	31.17	8

因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此前云南边境旅游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此后开始加速发展,故本文的研究时间阶段为2008—2017年,本着科学性、阶段性、对比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原则,选取云南边境旅游初期发展阶段(2005—2010年)的2008年、全面恢复阶段(2011—2014年)的2012年、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的2017年等共3个时间节点来测度云南省边境旅游发展水平。通过对云南省边境8个市州2017年的13项旅游发展量化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8个市州近10年的旅游发展水平综合状况及其排名(表6):

表6 2008、2012、2017年云南省边境8个市州综合得分及排名

地区	2008年	排名	2012年	排名	2017年	排名
红河	64.97	1	136.36	1	357.20	1
西双版纳	43.39	2	117.88	2	265.39	2
普洱	16.89	6	75.91	3	210.77	3
德宏	32.68	3	73.29	4	191.11	4
保山	31.95	4	72.74	5	188.16	5
文山	22.79	5	58.95	6	161.27	6
临沧	15.27	7	35.46	7	140.57	7
怒江	5.42	8	17.35	8	31.17	8

四、云南边境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根据云南省边境8个市州旅游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结果,以2017年得分均值(193.21)为界,上下浮动30个单位,得出分值区间(163.21—223.21),可解释为旅游发展综合状况中等的市州,即第二等级;在此区间以上的为旅游发展综合状况较好的市州,即第一等级;以下为旅游发展综合状况较差的市州,即第三等级。依据同样的方法可得2012年和2008年云南省边境地区8个市州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状况分级。

表7 2017年云南省边境8个市州旅游发展综合状况分级

等级	分值区间(分)	数量(个)	区域
第一等级	223.21—360	2	红河、西双版纳
第二等级	163.21—223.21	3	普洱、德宏、保山
第三等级	30—163.21	3	文山、临沧、怒江

为更直观地展示云南边境8个市州的旅游发展水平地域演变,根据表7、表8、表9测评结果,运用Adobe Illustrator CS6软件做出2008年、2012年、2017年云南边境旅游发展水平差异空间演变图(图1)。

表8 2012年云南省边境8个州市旅游发展综合状况分级

等级	分值区间(分)	数量(个)	区域
第一等级	103.49—140	2	红河、西双版纳
第二等级	43.49—103.49	4	普洱、德宏、保山、文山
第三等级	10—43.49	2	临沧、怒江

表9 2008年云南省边境8个州市旅游发展综合状况分级

等级	分值区间(分)	数量(个)	区域
第一等级	39.17—65	2	红河、西双版纳
第二等级	19.17—39.17	3	德宏、保山、文山
第三等级	0—19.17	3	普洱、临沧、怒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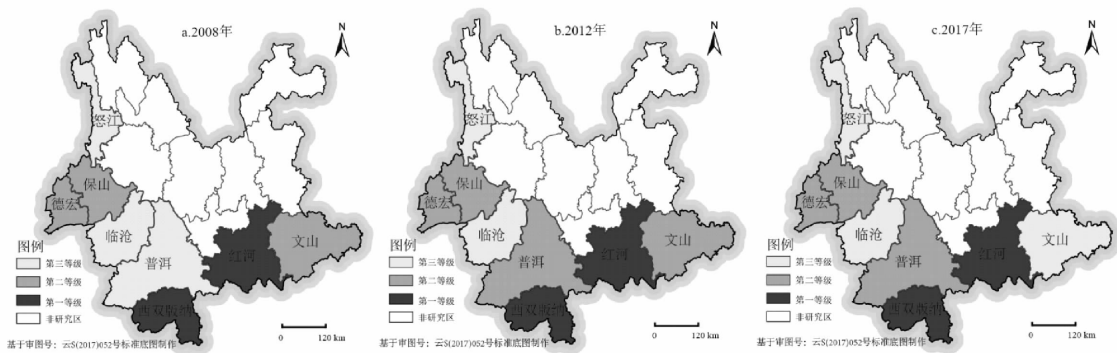


图1 2008年(a)、2012年(b)、2017年(c)云南边境旅游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

注:该图基于云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云S(2017)05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分析图1发现,2008年,各边境州市发展水平地域分布差异较大,呈分散布局,地区发展等级分布极不均衡。至2012年,发展水平较高州市在滇南地区呈现“趋同俱乐部”现象绵延发展。2017年,边境地区各州市差距有扩大趋势,发展水平第一等级州市主要分布在滇南地区,第二、第三等级州市在滇西、滇东地区交叉、孤立分布。地处滇西的德宏、保山呈组团式发展,在3个时间节点上都处于第二等级。对表6至表9及图1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红河及西双版纳十年来一直处于边境旅游发展的前列,红河地处滇东南,昆河高速、昆河铁路穿境而过,其北部与省会昆明市相接,交通区位优势条件较好,经济和旅游服务水平高。河口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口岸贸易对旅游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西双版纳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起步较早且旅游服务水平较高,市场占有率大,因此旅游发展水平仅次于红河。普洱的排名近年来上升较快,从第三等级跃升至第二等级靠前,数据显示,普洱旅游发展基础环境较好,旅游发展速度较快,2008年仅有1家3A景区,到2017年已有4A景区3家、3A景区5家,旅游开发潜力巨大。德宏、保山近年来基本上处于第二等级,排名变化不明显。德宏边境口岸较多,口岸贸易和旅游较发达,拥有云南边境第一大口岸瑞丽,这极大地促进了德宏旅游经济的发展;而保山受制于偏远的地理位置、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对比发现:文山的排名有所下降,文山虽有特色旅游资源但相较于普洱、红河等边境州市来说资源开发力度不足,缺乏高等级旅游资源。临沧地处偏远,高等级旅游资源稀缺,加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旅游发展综合实力

不强,近年来排名始终靠后,处于第三等级;怒江位于滇西,交通可达性较差,旅游开发程度低,没有A级景区,旅游接待设施不完善,排名始终处于末位。

五、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旅游资源是核心要素,交通条件是基础要素,经济发展是重要支撑,基础设施是重要保障,边境旅游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除了以上因素的驱动之外,政策会对其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结合本文对评价指标的计算与分析过程,得出边境旅游发展驱动力如下:

(一)政策驱动

旅游政策是影响边境旅游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的直接驱动力。2011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同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随后云南省实施了一系列利好政策,云南边境旅游在政策支撑下开始全面加速发展。对相关政策分析可知,云南边境旅游重点发展区域主要有红河、西双版纳、德宏等州市,其他区域较少,因此政策对边境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控制作用。

(二)交通驱动

旅游交通是连接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必要条件。一方面,良好的交通条件能影响游客旅游目的地决策,提高游客重游率。如红河旅游综合发展指数排名第一,缘于其位于昆河经济走廊和昆玉红旅游文化产业经济带的中心,交通便捷,加上滇中城市旅游圈的游客溢出,旅游区区位优势明显。另一方面,良好的交通可达性对扩大客源市场有极大的帮助。另外,交通网络的形成发展促使旅游产业要素不断

汇聚到交通沿线,形成旅游产业经济带。

(三) 经济驱动

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驱动边境旅游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旅游产业发展以及旅游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旅游开发规模与开发程度都会受到限制。其次,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本地旅游消费市场较大。最后,旅游目的地景区经济效益的提升使景区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建设景区软硬件设施,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加大宣传营销力度等,从而提高景区吸引力和关注度。

(四) 旅游资源驱动

旅游资源丰度差异是影响边境旅游客流分布与格局演变的根本驱动力,特别是优质的旅游资源,能吸引大量旅游客流聚集。例如红河的世界自然遗产资源哈尼梯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热带雨林、保山腾冲火山热海旅游区等高等级景区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客流,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2017年,红河、西双版纳拥有3A级以上景区数量分别为13家、10家,排名第1、第2,其旅游总收入排名为第1、第2;而怒江、文山拥有数量为0家、2家,相应的旅游总收入排名靠后。

(五) 旅游基础服务设施驱动

该因素驱动边境旅游空间格局演变主要体现在对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影响上。旅游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旅游饭店、旅游交通、旅游厕所、旅游观景设施及各类型的旅游体育、娱乐设施等。完善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能够极大提升游客满意度与重游率,为旅游目的地创造经济收益。反之,则可能降低游客出行意愿,减少旅游客流。如在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的德宏瑞丽、西双版纳景洪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旅游基础设施落后的临沧和怒江。

六、对策建议

从图1可知,近10年云南边境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虽然各边境市州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云南边境旅游整体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一) 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协调发展

首先,云南8个边境市州各旅游部门间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建设云南边境旅游特色品牌。合作设计跨区域旅游线路,整合开发联动复合式旅游产品,提高边境旅游竞争力。其次,加强与区域旅游中心城市(如昆明、大理、丽江)的合作,依托它们的旅游要素扩散,增加边境旅游客流量。再次,与四川、贵州、广西等邻近省份开展包括旅游资源开发、线路规

划、旅游营销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旅游流广泛流动,形成跨区域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 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首先,旅游企业和景区经营管理机构应以提高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为核心,提供符合相关标准的旅游产品,建设高品质景区。其次,充分发挥政府对旅游市场的监管职能,严厉打击旅游市场违法行为,营造和谐的边境旅游市场环境。再次,积极拓展宣传营销渠道,建立与携程、飞猪等大型旅游网站的合作。最后,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边境旅游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完善旅游在线营销、预订、支付及评价等一站式服务的智慧旅游模式。

(三) 整合旅游资源,打造优质旅游产品

为避免旅游产品、市场定位趋同,建议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红河、西双版纳等旅游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应根据自身特色做好市场定位,延伸旅游产品产业链,与周边邻国开展深入合作,整合资源打造优质旅游产品和线路,增强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怒江、文山等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要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力度,依托当地特有的民族民俗、自然风光,科学设计旅游产品主题,以优质的旅游产品和丰富的产品体系形成优势。

(四)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服务设施

以政府为主导,加大对边境旅游目的地尤其是边境旅游集散中心城市的资金投入,重点投入建设交通、信息、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旅游饭店等配套设施,提升边境口岸、沿边公路等级,加强地区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区、口岸之间的交通联系,提高边境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同时,加快推进与周边邻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建立并完善以云南边境为中心的国际旅游大通道,扩大海外客源市场。

(五) 抓住政策机遇,积极发展旅游业

在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边境各州市应抓住政策机遇,加快推动建设边境旅游试验区和跨境旅游合作区,推进边境地区特色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开发高品质旅游产品,加强重点旅游城市和景点建设。同时,加大沿边口岸开放力度,简化通关手续,提高关检效率,构建快速、便捷的通关环境,建立高效的出入境管理体制,完善跨境旅游签证政策,减少边境旅游制度性障碍,从而实现云南边境旅游便利化。

七、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文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用2008、2012和2017年3个时间节点分析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特征及驱动力,得出以下结论:

a) 2008—2017年,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呈现绝对差距逐渐扩大,相对差距逐渐缩小的趋势。红河、西双版纳边境旅游发展综合状况最优,普洱、德宏、保山、文山边境旅游发展综合状况中等,临沧、怒江边境旅游发展综合状况较差,边境地区市州旅游业发展层级差异明显。

b) 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边境各市州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边境旅游发展水平较高市州集中分布于滇南地区,呈现出先集中后分散的趋势,旅游发展水平中等区域和旅游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呈分散状交叉布局。

c) 旅游政策、交通条件、经济基础、旅游资源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对边境地区的旅游发展水平和分布有重要影响,决定着云南边境旅游格局形成与演变。因此,提出从政策落实、整合旅游资源、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等方面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升云南边境旅游整体实力。

(二) 讨论

本文以3大层次13个具体量化指标构建边境旅游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试图分析云南省边境旅游发展水平综合状况及演变趋势,研究结论比较

符合现实,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合理性。本文的研究比较依赖于客观数据的准确性,主观条件如政策因素难以量化,今后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注意对具体指标的细化与分类,将主观调查评价与客观分析相结合,加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此外,文章所研究的时间范围可进一步扩大,以便更全面地揭示边境旅游发展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

参考文献:

- [1] Dallen J T. Political boundaries and tourism: borders as tourist attrac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5, 16(7): 525 - 532.
- [2] Bucher S S, Pasternak S T. Travel &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 in Slovakia and Czech Republic[C]. *Central Europe Area View of Current Geography*, 2016: 246 - 252.
- [3] 王娟, 明庆忠, 姜思元. 西南沿边省区边境旅游竞合发展研究[J]. *学术探索*, 2018(1): 57 - 62.
- [4] 罗奎, 张菁.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 - 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边境旅游发展与自由旅游区建设[J]. *干旱区地理*, 2016, 39(5): 959 - 96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Regional Change and Driving Force of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ZHAO Jianping¹, MING Qingzhong²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Tourism Cultural Industry,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Yunnan 6502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is paper takes eight cities along the border of Yun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uild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border tourism. It takes 2008, 2012 and 2017 as time nodes and uses SPSS 24.0 software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index of border tour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8 to 2017, the absolute development gap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in Yunnan border area has gradually expanded, and the relative gap has gradually narrowe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border tourism in Honghe and Xishuangbanna is the best, followed by Puer, Dehong, Baoshan and Wenshan,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border tourism in Lincang and Nujiang is relatively poo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border cities and states is not balanced, and the cities and states with a high level of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rn re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tourism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entralization first and then decentralization. The medium area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lower area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re scattered and intersected. The study finds that tourism policy, traffic conditions, economic base, tourism resources and tourism infrastructure ar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ifferenc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evolution of Yunnan's border tourism pattern. According to th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narrow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n term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urism resources integration, tourism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service quality improvement,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Yunnan border tourism.

Key words: border tourism;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driving force; Yunnan

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缺位及建构路径

——基于空间正义视角

管其平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城市空间是人类社会空间的一种基本类型,城市新区作为一种“空间产品”是城市现代性、城市转型、空间结构重组的表现。纵观城市化进程,权力与资本的“共舞”不断生产与重组城市物质空间,进而推动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城市新区的生产与重构积累了众多的“空间—社会”问题,引起城市新区空间生产的正义价值缺失。基于空间正义视角对新时代城市化进程进行反思与批判,探寻弥合空间生产价值缺失的路径,完善城市空间生产的正义供给,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特色正义发展之路,这不仅是新时代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满足人们对美好城市空间需求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空间生产;空间正义;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7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43-05

时间与空间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空间不仅是通过几何学或者地理学来表达,空间更是表达了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重构的动态过程,正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换言之,城市空间不仅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象征,物质生产与空间生产分别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社会空间。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引起了服务性经济的发展、知识领域的专业化及职业分布的差异性,作为承载社会微观与宏观变化的城市空间发生了重要变化,人类文明也进入了一个现代性“善”的城市社会与健康文明时代。但是,以权力、资本所组成的“城市联盟”塑造的城市空间并非全部是“善”,也有“恶”,这些“恶”使人们不得不对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生产进行批判与反思。正视“恶”、分析“恶”以发现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公众美好城市生活的愿望,实现城市空间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新时代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

要求,也是不断满足人们对城市空间需求的应有之义。

一、空间正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观

城市一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聚集区,公平、正义也一直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城市空间则是人们开展生产、生活的物质载体,空间的社会性、城市空间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开始由空间“前台”的物质性走向“后台”的社会性。正因如此,才存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价值缺失现象。“正义”一词源自拉丁语 *justitia*,由“*jus*”演变而来,“*jus*”有公正、公平等含义。我国《荀子》中有“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也暗含了正义、公平的价值理念与伦理诉求。换言之,自古至今,正义都是一种理性价值追求与伦理关怀。

(一)城市空间的社会性

地理学是较早系统研究“空间”的学科,它从空

收稿日期:2019-1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场秩序生成中的道德缺位与重建研究”(12BSH048);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研究项目(2019FCFN0398)

作者简介:管其平(1993—),男,山东临沂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空间规划与社会治理研究。

间结构的分层、地理空间的拓扑关系等维度分析了空间。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理论的融合,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矛盾的出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与透视“空间”的意义。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哈维、索贾深刻阐释了空间的社会性属性,推动了空间的研究从“物质性”向“社会性”的转变,出现人文社科“空间社会”“空间正义”“空间治理”的社会科学转向。当然,这种转向并不是对空间“物质性”的抛弃,而是强调要关注空间“物质性”中所隐藏的“社会性”。换言之,空间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并非客观静态的抽象存在,它是动态、变化、延伸的有机体,是能被生产、改造、塑造的抽象实体,它不仅是社会的产物,更会对蕴含在其中的关系、秩序产生影响。

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来源于空间生产理论,城市空间是空间生产典型的代表“产品”,是空间生产在物质空间层面的一种符号表达。如今,“空间中的生产”已经转变成“空间本身的生产”^[2]。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果分别用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及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呈现了城市空间的更新与扩张路径,三者之间一脉相承,循序渐进。城市空间是空间表征在空间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更新与扩张,并进而重塑表征空间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生产的实际意义其实就是物理空间不断被权力、资本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进而重塑的过程,是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等空间的形态来影响城市空间组织形态的过程。^[3]

城市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它是资本转移自身危机并进行利润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载体;城市空间是一种政治工具,它源于权力又为权力所用,实现对空间使用者的监控;城市空间是一种消费对象,它是人为建构的景观实体,给人一种符号的象征,以此来供人消费。因此,城市空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政治工具还是消费对象,都是社会生产出来的。它来源于社会又塑造社会,空间亦是社会,是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因此,城市空间的社会性属性集中体现在其本身作为生产资料、消费对象以及政治工具,任何物质空间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空间正义的价值意蕴

“现代化的建设也是城市化的发展,都市现实的危机比某种其他的危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2]哈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时空修复以及资本循环建构了一种空间正义理论。城市空间正义是指“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

中的公民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它包括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正义性”^[4]。因此,空间正义的价值意蕴一是平等参加空间生产过程的权利,二是平等享受空间生产成果的权利,三是对空间资源的共享权利。换言之,空间正义蕴含空间正义(Spatiality of Justice)与正义空间(Justice of Spatiality),空间正义强调城市空间本身作为一种空间产品的共享性、公平性;正义空间则强调在城市空间的生产中要遵循正确的价值准则与要求,在城市空间生产要均衡地分配空间资源。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心灵空间的辩证结合体,因此,空间正义也是自然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合体。自然正义,要求人与自然空间和谐共生,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城市空间生产要妥善正确地处理好人与空间的关系;社会正义,要充分保证人在空间资源方面享有的平等权利、共享权利,城市新区的空间生产应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的基本价值诉求,以公平正义为前提,完善空间治理的法规政策来实现空间保障以确保实现空间共同参与、空间共享。空间正义是空间生产过程中自身发展的逻辑诉求,违背空间生产的正义性属性与正义性要求,势必会导致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三)社会主义国家城市空间生产正义缺失的必然性

空间正义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基础与载体,而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为城市发展的本质,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目标。列斐伏尔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必须生产自己的空间,不过是在完全意识到其概念及其潜在问题的清醒下的空间生产。”^[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避开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空间正义缺失问题,而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空间生产是一种“了解”的空间性过程,是一种“问题意识性”的空间生产过程,是生产、正义兼具的过程。因此,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正义缺失对我国的城市空间中的问题仍然具有可以借鉴的现实意义,资本的逐利性及资本的矛盾要求资本通过空间掠夺、空间积累进行自身的空间再造直至自身危机的缓解及转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直至新时代的发展阶段,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城市化不断突飞猛进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空间生产也是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空间正义缺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社会现象,这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的需

要来看。

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脉络看。从人文与社会的角度分析,国家是指被人民、文化、语言、地理区别出来的领土。国家需要发展进步并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思想观念的进步,开发、建设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大量人口聚集在农村,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农村空间,继而实现农村到城市再到特大城市的发展脉络,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城市化空间生产,一方面这是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实现国家长久发展的基础,

从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的需要看。从工业革命到二次工业革命再至全球化“流动性”经济的发展,资本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为了加快流通赚取更多的利润,不断进行空间扩张与再扩张,进行资源的掠夺与再掠夺。以葡萄牙、西班牙等为代表的国家利益集团在新航路开辟中,通过掠夺开拓空间、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被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过经济、文化、政治掠夺的,必然受到资本的影响。我国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地盘”开商置地,建设城市,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发展以及近代化的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直至新时代,建设城市,满足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是我国政府不断追求的目标。城市的建设需要资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建设一样需要资本的介入,资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城市空间进行开发建设的关键因素。无论是政府融资还是企业投资,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以企业命名的居住区、商业区的空间表象。虽然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资本进行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空间正义缺失的现象。

二、空间阵痛:城市空间重构的正义缺位

权力、资本对空间生产的主导性支配是城市空间不公平、不公正进而造成正义缺失的原因,权力、资本共同组成的“城市联盟”推动了空间“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变化,在空间生产中权力与资本遵循自己的发展路径规划、建设、发展空间,忽略空间使用者的价值诉求,使其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场域,成为空间正义缺失的重要来源。总括起来,空间正义的缺失集中呈现在空间区隔与社会排挤、居住

空间异化、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性、倾向性、生态环境恶化方面,而这些社会问题也是继续保持我国空间生产活力转向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空间区隔与社会排挤

城市空间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结合体,城市“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和流动等,无不透露了社会界限与抗衡的界限,以及主体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6]空间区隔是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已经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公民对奴隶的剥夺现象。城市新区空间生产的客观实体是城乡接合部以及近郊农村的闲置土地资源。资本对房产的开发是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以较低的成本购买土地然后以高价的空间产品售出,建设高档别墅区、高档私人空间,因此,空间的置换及再造势必会对原有主体的生存产生影响,使得空间区隔随着城市新区的建设愈演愈烈,引起空间的分割化、碎片化、等级化。哲学家柏拉图曾描绘过:“任何一座城市,无论其规模多么小,事实上都是一分为二的,一个是穷人世界,另一个便是富人世界,两者之间总是处于冲突状态,而且,在任何世界中,还有许多更小的部分。”^[7]首先,在城市空间中普遍存在着富人及穷人居住空间的异化与隔离,富人区地理位置优越,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出行便捷、生活便利,且集中于权力较为集中的空间区域,拥有较多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性资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集中于市中心更新的边缘角落抑或城乡过渡带的边缘空间的穷人区,这些区域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公共空间资源的聚集度、可及性远远低于富人区。其次,土地与农民分离,使农民被迫转变为市民。农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发生改变,市民所享受的权利并不能立即由被“市民”者所拥有,被“市民”者居住生活的空间被排挤,进而导致社会交往的频度与广度降低,对自我的认同感与社会认同感有所减弱。城市空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阶层识别系统,成为衡量社会阶层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

(二)空间多样性与共享性的冲突

物质空间形态同质化,造成城市空间中所具有的人文精神的丧失与活力的衰减,盲目追求空间消费的符号价值,导致空间商品的经济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忽视了地方应有的民族特殊性以及城市文化,尤其在如今的古城更新的空间实践中,空间形态趋于同质性,同质性在社会心理上进一步加剧了空间异化,城市化从“外”看是物质空间的重新组合

乃至全面更新,实现更大范围资源的有效整合,以提升城市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从“内”看是社会空间的变化,涉及不同阶层以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实现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多样性也是空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是在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的空间生产过程中,不同个体以及群体能够秉承的形态各异的文化,空间不是一部分人的空间,同样城市也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城市”。在城市中,如果“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那么结果就相当于“把它们从文明中排出,甚至是从社会中排出”^[8]。

(三) 自然生态环境恶化

空间正义是新时代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尺度,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有机结合体,人类生活的再现性社会空间是以自然空间为载体的,列斐伏尔认为自然是诗性符号的空间,在某种意识形态中,自然被当成了认识的材料,被当成了技术的对象,他被统治,被征服了,因为被统治、被征服了,他也就远离了我们。^[9]马克思曾深层次剖析了社会发展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的破坏,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力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然而,在权力、资本的主导逻辑之下,空间生产的利益化、逐利性导致自然环境的渐进性破坏,各种工厂污染事件频繁发生,空气恶化,土壤污染,湿地“人化”,林地、草地被破坏,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地位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城市空间中,自然空间的有机组成逐渐萎缩,被高楼大厦、广场占据,自然意义上纯粹的自然空间被人为侵蚀,资本的二级循环把更多的自然空间人化为社会空间,自然已经被它所在的空间社会化了,人与自然空间的矛盾加剧并恶化,城市空间发展的道路受到抑制。

三、空间正义:空间生产价值建构的弥合路径

城市空间治理本身就是在空间生产中的一个阶段,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保留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10]。以空间正义为理论价值视角的城市空间的生产,更强调关注边缘空间中社会的弱势群体及社会底层对空间的需要,缩小“近端(order proche)”与“远端(order lointain)”的差距,以人为本推进空间发展与优化空间结构的主体,不再仅仅关注治理过程中手段、技术等传统治理要素,要考虑空间位置以及空间的特殊性对城市治理可能产生的

限制性与束缚性。

(一) 构建新型的权力—资本模式是实现空间正义的根本

城市的历史也是资本扩张与追逐利润的历史,资本实质上是一种资本生产关系,资本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城市空间中,资本不断介入空间是城市得以生产并进行扩张的必要条件,资本依据自身的发展规律塑造着城市空间。空间能够为权力的运作提供载体,新空间又会加速权力体系的进一步配置,政府通过“权力”出让国有土地资源,能够获得巨大的财政收入,增加政府的良好形象。大量的土地出售,房地产开发商进驻,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哈维运用资本的流动性循环解释资本与城市空间发展的逻辑,资本是通过三级循环来实现对自身资本的积累并缓和自身的危机。第一循环是大量的资本介入到工业生产并带来空间规模的扩大和物质形态的变化,通过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以获得集聚与规模优势,在这一期间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物质空间中生产资料的变化。第二循环,资本为了寻找新的营利空间转向对街道等生产性以及住宅等消费性空间的投入,这一时期主要是各种企业集团、房地产开发商的进驻投资。第三循环,资本在前两个阶段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地增值开始转向教育、科研等领域,资本开始实现由城市物质生产扩展到社会空间的生产及其他具有重要资本流通的服务领域。因此,要想实现空间正义,在空间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在资本二次循环基础上加以调节,这不仅有助于化解城市空间中的危机,更有利于实现空间的正义,要将资本的空间循环模式转变成一种新型的资本循环模式,在二级循环中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权力与资本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推动力主导着城市空间的生产,权力要认清自身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政府要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控,调控资本在空间中的参与程度与深度。政府要亲身实践,改变以政绩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同时加强对资本运行的监督,避免建设高档的小区、别墅区,使公共性空间成为私人性空间,加剧空间区隔与排挤。

(二) 空间的人本性与资源的共享性是实现空间正义的应有之义

实现空间的人本性与资源的共享性是空间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城市空间治理价值的核心所在。以人为本,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融合性,加强城市公共空间的供给。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全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

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11]空间权利作为社会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并因此形成了以居住权、环境权、网络表达权为代表的新的社会运动形式,以对抗国家、资本等垄断力量。^[12]马克思认为:“一切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3]换言之,在城市空间治理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公众,尤其是关注空间使用者在空间资源的分配中的平等性,平等使用公共空间、空间公共资源共享。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融合性,加强城市公共空间的供给,减少对边缘空间地区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挤,保证所有公民和群体能够拥有空间生产与空间重组带来的价值。

(三)链接与重组空间生产与公众参与之间的机制是实现空间正义的有效方式

空间生产应为社会公众生产,城市治理应是为广大公众的治理,空间的正义应是广大公众的正义。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主体作用下,被运用到城市经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但是,城市空间的生产与重组是多种生产力量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充满了众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空间的使用者则处于劣势的地位。目前在城市的空间治理以及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参与度是较低的,从空间生产到城市治理表现的是权力—资本的循环路径而非权力—公众—资本的循环路径,这往往形成“精英决策”与“资本决策”的结合,而非“民主决策”“精英决策”“资本决策”的结合。公众的参与是断裂的,空间的实践过程中,要通过媒体、座谈会等方式链接与重组良性的空间生产与公众参与的权利与秩序,提高公众参与度,培育责任意识、协同合作意识。

(四)完善空间生产的“上下”与“内外”的有机结合是实现空间正义的理性选择

新时代,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完善已有的治理体系,加强对空间生产与重组的战略引导,避免分散开发以及不必要的大规模的无序开发,造成空间生产“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失调,这样空间正义与权益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完善空间生产的“上下”与“内外”的有机结合,是保证空间生产的活力转向,避免因过度强调物质空间而忽视了社会空间,造成空间的差异性分层与隔离,进而重塑城市规划的管理理念应有之义,空间的“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国家的政策进行正义原

则的空间生产与更新;“下”要广泛听取空间使用者的声音,重塑个人活力与空间活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内”蕴含着作为政府要谨慎行使权力避免权力自身的正义缺失,同时要严格监督资本的运行所引起的空间剥夺的社会事实;“外”要明确物质空间的变迁是显性的变化,要注意空间生产过程中社会空间的深刻且不易察觉的隐性变化。只有协调四者之间的关系,充分了解物质空间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性空间变化,形成系统性、整体性的城市空间生产路径,才能借助合理公平的空间规划与政策,协调空间资源,推进空间治理法律法规的建设,实现正义空间与空间正义。

四、结语

空间正义理论虽然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中,但是对我国的城市空间中存在的正义缺失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无论城市化进程如何发展,以权力—资本所形成的“城市联盟”仍然是推进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公平正义依然是社会公众的终极追求。“谁的空间”“为谁生产”,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实现空间正义是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属性与终极追求。城市空间治理需要政府、资本、公众等相互合作,保证空间文化的多样性与协调性,实现多方合作的参与机制,避免空间的更新与扩张中对弱势群体的进一步空间剥夺,造成空间的边缘化。切实关注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与空间利益,实现城市快速空间扩张中为人民发展的本质,是新时代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城市治理转型所必须批判与思考的。

参考文献:

- [1]张有才,茵茵,崔玲.生态导向下的城市边缘区规划探析[J].规划师,2016(4):132-139.
-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3]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J].城市发展研究,2006(5):1-4.
- [4][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C]//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8.
- [5]Lefebvre Henri. Production of space[M]. 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4:39-45.
- [6]任政.空间正义论:正义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的批判[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107.
- [7]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04.

(下转第54页)

我国虚拟货币的货币地位与法律监管

——日本虚拟货币法律规制的借鉴与发展

刘 凡

(皖西学院 法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货币去中心化趋势,货币从纸币到虚拟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是,由于虚拟货币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等特点,导致其难以监管,容易滋生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等犯罪。纯粹通过紧缩的政策与法律来否定虚拟货币的货币地位,不符合互联网技术和货币发展的趋势。我国可以借鉴日本法律监管模式,在承认虚拟货币法律地位的基础上,针对金融机构设定登记义务、确认义务和报告义务等的同时,结合我国《反洗钱法》的规定,配套客户尽职调查、交易管控和法律遵循科技制度。

关键词:虚拟货币;法律监管;洗钱犯罪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8

中图分类号:D922.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48-07

一、“货币”的演变:从纸币到虚拟货币

最早期的人类社会的交易行为,乃是以物易物,又可称为直接交换,即由有需要的双方,自行发现、寻找交易对手并直接商议交换条件的方法。然而此种交易模式,只有在意愿双重巧合的情况下,交易才可能达成。也就是只有在刚好买卖双方都对对方产品有兴趣的情况下,交易才有可能成功。这种交易方式往往旷日废时且徒生纠纷,人们经常要花费相当巨量的交易成本,且产能的增加必定受到限制。^[1]因此,为了解决此种交易模式所产生的成本耗损与缺失,交易市场开始发展具有可替代性的交易中中介物,而开始了货币的创造,亦为间接交换。在财货或劳务的交换过程中,可作为计算的标准且在交换过程中对方愿意接受的中介物,亦可称为商品交易的通常媒介,此即货币之功能定义。^[2]因此,货币必须为一般大众能够普遍接受,在具备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大众才愿意以收受货币作为交易财货或劳务的对价。故凡是具有普遍接受性的物品,在该时期即可能成为货币的一种。

由于电子商务、科技与信息不断地进行着演进与变革,新的技术项目与程式系统不停地增加与扩大范畴,电子货币定义势必也会随着科技发展的脚步而持续变更其意义与性质。以表现的形态来定义电子货币,有学者以“电子货币是指利用电子资金移转方式,交易时由一方下达转账的命令,将资金由己方移转至另一方”来做定义。^[3]当前,根据国际机构对电子货币特征的描述,基本上可以将电子货币定义为,能够进行储值或预付的产品。电子货币的使用流程是由使用者以一般法定货币向电子货币发行商进行储值、预付的行为,而发行商则就使用者所支付的法定货币进行兑换后,给予相当价值的电子货币,并以电子、磁力或光学等形式储存在使用者所持有的电子装置上。

然而,货币发展的步伐并未止步于电子货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已经进入世界各国的视线。虚拟货币是以中本聪(比特币创始者),在关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相关的论文中的信息处理技术和使用公开键、秘密键的既有的密码技术

收稿日期:2019-10-15

基金项目:安徽法治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2018年度公开招标课题“类型化新型网络犯罪防治的比较法研究”

作者简介:刘凡(1991—),女,安徽岳西人,硕士,皖西学院法学院讲师。

为基础,在2009年1月3日比特币这一虚拟货币的运用为起始的。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的牢靠支持,比特币的使用范围在迅速扩大。而且,虚拟货币不仅限于比特币,还出现了以太币(ETH = Ethereum)、瑞波币(Ripple)以及萌奈币(MonaCoin)等数百种以上,而比特币则占时价总额的约90%。其后,在既有的虚拟货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被称之为彩色币(Colored Coins)或者比特币代替品(Altcoin)的虚拟货币。在此期间,2014年2月28日,当时世界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MTGOX有限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其后开始了破产程序。这一案件是由经营者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并不是比特币的系统问题。^[4]

二、虚拟货币的风险亟须监管

比特币系统是以分散式点对点计算的网络设计,不需要中央银行、票据交换所及其他金融机关监管,使用者可以独立运作,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而其点对点的特性是指比特币的交易记录皆为公开,理论上可以查到每个账户金额及相关交易记录,惟无法确认拥有者,此即比特币所具有的透明性与匿名性。

基于这些特性,比特币从技术上使得每一个比特币位址中的比特币处于不可侵犯和不可追踪的状态。因为此种性质的关系,比特币在无政府发行独自生产而形成的难以管制的性质与其特殊的匿名性为一把双面刃,虽然透过技术手段保障了个人财产的私密性,但也使得交易难以追踪,容易成为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的工具。^[5]

简而言之,比特币的出现降低了整个洗钱程序的成本。首先,移转比特币几乎不用成本;其次,绕过金融体系,降低金融交易纪录遭侵入的损失成本;其三,学习比特币交易相当容易,技术门槛极低。这几项特性便于犯罪者以比特币作为洗钱工具,降低洗钱成本并提高洗钱效率。比特币对洗钱防制机制造成漏洞,原因在于比特币的匿名性、透明性及去中心化的特性,因为无法辨识及对应使用者与比特币位址之间的关系,因此,当执法单位要追查洗钱案件时,虽然每一笔比特币交易的纪录都是公开在网络上,但也只能看到某个比特币位址移转多少比特币到另一个比特币位址,而无法查出比特币位址背后的拥有者是谁,所以执法单位极难追踪罪犯对不法所得的“处置阶段”“多层化阶段”及“整合阶段”。此外,比特币交易纪录是由分布广泛的比特币矿工

处理,且比特币系统会自动地依矿工规模调整采矿难度,这意味着要中断比特币网络的运作,相当于要求每个矿工都必须停工,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使得比特币的洗钱防制困难重重。

2011年年初,全球最大的网上非法毒品匿名交易黑市“丝绸之路”设立,其使用者可以在该网站上使用虚拟货币比特币购买、销售冰毒、可卡因、海洛因、军火和其他非法商品。洗钱必须先有前置犯罪行为,而后将犯罪之不法所得透过洗钱三阶段包装为看似合法的外观,“丝绸之路”贩卖违禁品就是前置犯罪行为,而该网站直接以比特币做交易,取得比特币后再将其移转或转卖成法定货币,等于是犯罪行为与洗钱行为一步到位。据统计,“丝绸之路”被查封前交易额达2.14亿美元,有近100万名客户,营运者从网络交易中赚取了相当于8000万美元的佣金。直到2013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打击犯罪活动为由查禁了“丝绸之路”,该网站29岁的创办人Ross Ulbricht遭到逮捕,而后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遭判终身监禁,法官形容他是“最大的毒贩”。然而,丝绸之路的“品牌价值”并没有随着Ross Ulbricht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减损。2013年11月,丝绸之路2.0由Ross Ulbricht的追随者Blake Benthall所创建,于2014年底,丝绸之路2.0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查获,其创办人Blake Benthall亦因此入狱;另于2015年1月,名为“Silk Road Reloaded”的第三代丝绸之路在黑市上线,其交易所使用的虚拟货币包括比特币、Darkcoin、Dogecoin和Anoncoin。不过,“Silk Road Reloaded”的经营并不顺利,于2016年1月,“Silk Road Reloaded”高举白旗,以技术原因为由暂停服务。^[6]

由此可见,随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的迅速崛起,其带来的社会风险也与日俱增,亟须通过相关法律进行及时规制和监管。

三、虚拟货币监管的日本模式

(一)日本进行虚拟货币监管的背景

如前所述,关于虚拟货币,一方面要认识其有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陷入货币危机的国家,避免使用本国的货币,而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违法交易的结算、洗钱行为以及“伊斯兰国”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恐怖活动资金的调转等,也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因此,2015年6月德国举行的G7峰会中国际合意,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发布了

《对虚拟货币的风险规制路径指导规则》，设定了许可制度和登记制度。受此影响，日本依据本国的《金融科技法》，将《资金结算法》和《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进行修正，于2017年4月1日起实施。

日本《金融科技法》就虚拟货币的部分，主要是以《资金结算法》和《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的修改为主要内容。相关的修正，主要有以下两个背景^[7]：

第一，大型比特币交易所出现破绽。2009年开始运转，作为虚拟货币先驱的比特币，其根基技术——区块链的革新性受到诸多技术者的支持，致使其认知度渐渐提升。在相关的状况中，以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等为发端，不再依附特定国家信用的数字货币——比特币的价值开始登上舞台，交易量大幅提升。这一趋势正在如火如荼时，2014年2月，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位于日本的MTGOX有限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其后开始了破产程序。因为这一案件，使得在该公司预存的约65万比特币以及约28亿日元的现金全部消失。其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以涉嫌业务上侵占罪（日本刑法规定的罪名）被起诉，截至目前，该案的整体情况尚没有明确。基于本案，有必要对日益扩大的虚拟货币利用者进行保护这一课题，开始浮出水面。

第二，防范洗钱、恐怖活动资金供给的国际需求。比特币具有极高的匿名性特征，早就被指出，会被用于洗钱或者恐怖活动资金的供给。其中，2015年6月8日，G7峰会上公布了“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虚拟货币及其他新型支付手段的适当规制，以确保提高所有金融流动的透明性”这一首脑宣言，在该宣言的基础上，关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于同年的6月26日，发布了《指导规则》，其中规定：“针对交换虚拟货币和法定货币的场所，需要课附登录和许可制的同时，还应当就如下行为作出规制：顾客本人的确认、可疑交易的备案、记录保存的义务，以防控洗钱、资助恐怖主义资金等行为。”受此指导规则的影响，日本紧急针对虚拟货币制定相应对策。

需要说明的是，当初，媒体对于MTGOX公司案件大幅报道，当时的导向似乎认为比特币自身是具有欺骗性的，这种理解当然不正确。MTGOX公司是进行法定货币和比特币兑换业务的公司，该案是该公司资产管理上存在问题，比特币及支持其的区块

链技术，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因此，该公司破产之后，比特币的交易仍然在扩大，区块链技术的使用也仍然在不断进展中。

（二）日本监管虚拟货币的主要手段

日本《金融科技法》中，关于虚拟货币的规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修改《资金结算法》。预先定义了作为规制根基的“虚拟货币”的同时，引入了从事虚拟货币交易从业者的登记制度，作为各种行为规制的准备工作。第二，修改《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具体而言，将“虚拟货币交易从业者”纳入到作为本法适用对象的“特定行业从业者”范围之内，在实施虚拟货币交易时，课附虚拟货币交易从业者确认可疑交易的报告等义务。以下是对修改后的《资金结算法》和《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的内容要点进行解析。

1. 修改《资金结算法》的概要

（1）虚拟货币的定义

修改《资金结算法》第2条第5项。本法律当中所说的“虚拟货币”，是指如下所列：一、购买物品，或者租赁、接受劳务提供的场合，为偿还这些对价，而能够向不特定人使用，且具有能够以不特定人为对象，买入或者卖出的财产性价值（限于通过电子机器及电子方法记录，但除了本国货币、外国货币和货币存款），能够通过电子信息处理组织进行转移的物体。二、以不特定的人为对象，和前述的物体能够进行交换的财产性价值，能够通过电子信息处理组织进行转移的物体。根据第一项所规定的虚拟货币的定义，大概可以分为三个要件：第一，在购买物品，或者接受劳务提供的场合，能够以不特定人为对象使用，且能够以不特定人为对象进行卖出。第二，能够通过电子信息处理机构进行转移的财产性价值。第三，不属于法定货币和货币存款。上述三个要件当中，最为重要的要件当属第一个，而其中，又属能够对不特定人进行使用和卖出这一点，是重中之重。

作为电子货币种类之一的虚拟货币和《资金结算法》上的“预付式支付手段”之间的界限问题值得关注。预付式支付手段，“从发行者所指定者处购买（物品），或者在接收劳务的时候，为偿还对价，通过提示、交付、通知及其他方法来使用”（《资金结算法》第3条第1款第1项）。它通常只在预付式支付手段的发行者，以及和发行者之间缔结了合同的加盟店中，代金结算时使用。与此相对，虚拟货币是即

便不特定的人和发行业之间没有缔结任何契约,甚至都没有承诺的意思,也能够接受这种虚拟货币,在这一点上,虚拟货币和预付式支付手段存在差别。作为虚拟货币的典型——比特币,是一种被称为没有发行业存在的货币,修正后的《资金结算法》上的“虚拟货币”没有将发行业是否存在作为要件。

关于第二个要件,作为电子货币的特性,表明虚拟货币是能够通过电脑进行转移的价值。第三个要件则明确法定货币和存款债权等不属于虚拟货币。

关于虚拟货币的定义和虚拟货币具有相互交换可能性的财产价值,即便不属于第一项中所规定的虚拟货币,但是也明确是具有更广范围的规制对象。

(2) 虚拟货币交换业务的定义

修改《资金结算法》第2条第7项。本法中“虚拟货币交换业务”是指实施如下所述行为为业:一、虚拟货币的买卖或者和其他虚拟货币的交换;二、以前述行为为媒介,代办或者代理;三、与前述行为相关,管理利用者的金钱或者虚拟货币。

第一种虚拟货币交换业务的典型例子是,对自己的顾客,将自己拥有的虚拟货币进行卖出的行为。自己不进行虚拟货币的买卖,而是为顾客间虚拟货币的买卖进行匹配而提供平台的行为,就属于第二种所规定的虚拟货币交换业务。第三种则是与前两号所述行为相关,将管理虚拟货币的行为作为虚拟货币交换业务。因此,如果只是为虚拟货币的管理提供钱包功能的话,则不属于虚拟货币的交换业务。

(3) 虚拟货币交换业务人的登记义务

要经营虚拟货币交换业务,需要对财务局长,提交记载所要操作的虚拟货币的名称、概要等必要事项的资料,必须接受登记。登记的要件虽然规定了一些登记拒绝的事由,在登记时,除了有一定的资产基础之外,还要求有应对各种情形的预案(遵守法令的情形,反社会势力的应对、个人信息管理情形、索赔处理情形、外部承销方管理情形等等)。就虚拟资产交换业务从业人员,通过内阁府令规定,财产基础需要达到两个条件——最低资本金为1000万日元,纯资产不能是负资产。

另外,既存的虚拟货币交易从业者,在修改的《资金结算法》实施后的六个月内进行申请登记。但是,即便没有完成登记状态,在新的《资金结算法》实施后,也是以虚拟货币交易者的身份接受法律规制。

(4) 对虚拟货币交换业务从业者行为的规制

对于虚拟货币交换业务从业者,要进行以下行为为规制。第一,信息的安全管理义务;第二,对承销方的指导义务;第三,采取相关措施(如向利用者提供信息的措施等)保护利用者的义务;第四,利用者财产的管理义务;第五,金融ADR的应对义务。其中,被认为尤为重要的是第一项和第四项。

众所周知,包括海外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在内,经常会受到外部网络攻击。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大型的交易所因受到外部攻击,导致财产流失、系统失灵等损害事件被报道出来。针对这些攻击而维持系统的坚固性,是虚拟货币交换业务人的最大义务。另外,修改后的《资金结算法》规定,虚拟货币交换业务者,有对自己的金钱、虚拟货币和顾客的金钱、虚拟货币进行分别管理的义务,接受注册会计师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分别管理监督的义务。这些相关的行为规制,在MTGOX公司案的基础上,成为虚拟货币交易者的特征。而且,在《面向虚拟货币交换业务者的事务指南》^[8]中规定,关于顾客的金钱和虚拟货币,账户上的金钱、虚拟货币额与银行余额、钱包上的虚拟货币额之间出现差异的时候,要在一定期间内消除这种差异,尽可能地将顾客的虚拟货币在离线钱包(Coldwallet)中进行管理等。

2. 修改《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的概要

(1) 交易时确认的义务

虚拟货币交换业者,在修改后的《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中,因为被作为规制对象的“特定行业人”,在实施以下的交易(特定交易)的时候,被要求进行交易时的确认(本人确认)。第一,缔结继续或者反复进行虚拟货币交易等为内容的合同(开户契约等);第二,额度超过200万日元的虚拟货币的买卖和交换等;第三,额度超过10万日元的虚拟货币的转移。

虚拟货币交换业者在其特性之上,几乎都是非对面性的交易。因此,要实现《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上交易时确认义务的话,在进行上述特定交易的时候,在网上上传运行许可证等本人确认资料之外,以本人资料记载的住所为收件人,必须直接将交易相关文书送达到本人手中。在此之前,虽然虚拟货币交换从业者也要自主地进行一定程度的本人确认,但是,修改后的《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实施后,这种要求更加严格。

(2) 可疑交易的报告

特定行业从业人员,在业务实施过程中,认为所

收财产有是犯罪收益的可疑性时,有义务向行政机关呈报可疑的交易。修正后的《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要求虚拟货币交换业者,在其特定业务中,也必须履行可疑交易的呈报义务。可疑的交易该如何判断呢?考量交易时确认的结果,交易的样态及其他情形以及国家公安委员会制作的《犯罪收益转移危险度调查书》的内容,来对应地判断交易的性质。

另外,2016年《犯罪收益转移危险度调查书》指出:“虚拟货币,具有利用者的匿名性高、虚拟货币的转移具有国际性、实施迅速性等特点,一般认为,虚拟货币有通过犯罪获得的收益转移等恶意使用的危险性。”^[9]

四、我国虚拟货币法律监管的框架构建

(一)基本前提:承认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

早在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了比特币的性质,认为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此可见,我国当前对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是持谨慎保守态度的。

但是,笔者认为承认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并不具有理论上的困境,即便是作为国家发行的纸币也是另外一种虚拟货币。本来对于人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的必需品、生产工具、有意识的活动所必须的物品,都是需要有价值的,无论是货币或者是虚拟货币都不过是价值计算的单位、交换的手段或者积累的手段,其自身并不具有价值,这一点是两者所共通的。换言之,从现金货币和存款货币的本源价值来看,其实都只是虚拟的。如果说虚拟货币是通过电磁来进行处理的话,那么存款货币自身早就已经是电磁化的,两者的虚拟性不过是在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因此,虚拟货币不是货币这一结论无非只是定义的差别而已。^[10]

具体来说,现金货币自身也并没有使用价值和消费价值,其只不过是计算单位、交换手段和储蓄的手段而已。人类生活生存所必要的物资,或者是自行捕获,或者是通过交换来获得。人类狩猎后,将其作为食物、衣物和工具加以利用,当捕获量超过消费需要时,要么进行保存,要么用来交换其他必要的物资。从本源上来看,价值的单位不是货币,而是自身有使用价值和消费价值的物(如动产、不动产等),它们才是交换手段和价值的储蓄手段。其后,随着

社会的扩大,不再进行物物交换,表征价值的动产产生。金、银等金属钱币虽然没有使用和消费价值,但是其自身作为贵金属拥有经济价值,即便没有国家主权的支持也可以流通。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所制作的银币在全欧洲流通就是这一情形的显示。而近代以来引入的银行券的发行,使得纸币成为货币,虽然其自身既没有使用价值、消费价值也没有经济价值,但是其又和金银贵金属的兑换性作为信任支持。而19世纪银行制度的产生,使得存款货币诞生。存款货币的信任根基是,其具有兑换现金货币的可能性以及国家对银行的监督。

货币最终还是要被还原为物资。现金货币是有物理性的实体,其自身可以被交换、流通,最接近物资。而存款货币不同于现金货币。另外,如果是支票的话,则是在票据交易所这样的具有清算功能的场所中,出票人A向收款人B支付一定金额的信息进行传递,其后银行网络会在A和B所拥有的存款账户的银行间进行结算,在此基础上,有账户的银行会就A和B的账户进行对应记账。存款人能够从银行账户中取出银行券或者货币,并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易,在进行银行账户的转账或者通过信用卡进行支付的时候,就成为获得物资的手段。^[11]而且,虚拟货币通过和虚拟货币共同体的其他组成人员进行交易,能够获取物资。受一定共同体信任支撑的虚拟货币,其属性和赌场的筹码类似。筹码在赌场这一共同体当中,拥有财产性价值,而一旦出了这一场所,就变成了单纯的塑料制品。假设这种筹码币在赌场之外也能交换,具有价值表示单位和价值保存的机能,就会变成虚拟货币。赌场的筹码币因为是现实物体所以能够交换,而如果是区块链中的电子数据的话,其交换则不得不通过虚拟货币内部的系统进行。如果不想将其只视为系统上的数据,而是想和存款货币或者现金货币进行交换的话,就要如同支票交换一样,将虚拟货币系统连接到银行系统,进行清算,进一步通过中央银行网络来进行结算。换言之,虚拟货币如果只是在系统当中就终结的话(如同赌场筹码),则在一般的社会实体经济当中,不具有财产性价值,而和外部系统相关联的时候,才会具有货币的机能。在这一意义下,所谓货币都只是虚拟或者形而上的存在。由此可见,将虚拟货币与货币等视之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障碍。

(二)基本方案:发挥金融机构虚拟货币监控职责

如前所述,虚拟货币在现实流通过程中,最大的

危险在于会有被利用来洗钱的风险。因此,防止犯罪分子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是对虚拟货币法律监管的核心所在。

金融机构在整个洗钱防制体系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许多洗钱行为都会通过金融机构做资金的转移。我国《反洗钱法》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在借鉴日本监管模式的诸多有益经验的同时,仍需要有针对性对虚拟货币的细化制度予以配套,具体而言可以参考如下制度:

1. 客户尽职调查

金融机构对于涉虚拟货币业务的风险防范,最初步骤还是须从认识客户等与实际交易有关的环节开始做起,只有这样才有足够信息判断客户风险及交易风险。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就规范初期如何落实 VCPSS 洗钱防制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犯罪,在指引第 42 条至 54 条提出规范层面的建议规范。^[12] 如建议参考 FATF 建议,课予 VCPSS 践行客户尽职调查的义务,不论是对新客户还是既有的客户,均应执行此尽职调查义务。因此,与新客户建立商业关系时,应利用可靠的、具有独立来源的文件、资料或信息,完成尽职调查,如果属于高风险客户则再进行加强客户调查,以完成整体的认识客户程序。

具体而言,可以要求转换虚拟货币汇兑的金融机构采用多重技术,于合理范围内验证客户身份。利用多重技术进行识别客户程序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较容易执行与风险相对应的尽职调查方式进行客户验证程序,实现以风险为基础的评估方式。针对高风险客户,可采用多重技术认证程序,加强客户调查;针对中风险或者低风险的客户,则无须执行多道认证程序。如就高风险客户或是欲开启超乎平均值的交易权限时,要求本人亲自完成验证程序并留下生物迹证(如指纹辨识),如此便能确保日后的每一笔交易均是本人为之,除了以科技实现每笔交易的确认客户程序,又可杜绝人头账户问题。

2. 交易管控

落实认识客户程序后,落实交易管控的困难度将减少许多。利用 NPPS 的多重签章技术(Multi-sig),与去中心化 VCPSS 相整合,以降低交易上的风险。多重签章技术能提供 VCPSS 限制交易执行的能力,如通过在欲限制的钱包中载入一个总交易额

上限,限制可移转之价值以及交易的执行速度。即便如此,以上限制也只适用于本地端 VCPSS 发送虚拟货币时,至于发送后的虚拟货币移转至何地或是做于何种用途,均非现在科技所能限制的范围。

3. 法律遵循科技

为尽快克服去中心化可转换虚拟货币在法律遵循以及执法方面带来的挑战,上述身份上及交易上的辨识与验证刻不容缓,金融机构应努力开发有助于提升法律遵循的科技。

对此,我国似可尽快建立一个负责统筹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的国家级研究中心,以利于公私部门间的整合及沟通。如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6 年 1 月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对外宣布正在研发数字人民币,并于同年 11 月就其辖下研究单位,开始招聘金融科技与区块链领域专才;又如,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发布了《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文件详细列出区块链标准建立工作的日程表,其后于 2017 年 5 月由“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论坛”公布了《区块链和分散式账本技术参考架构》标准,成为首个政府指导下的区块链基础标准。

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的设置能让金融机构可参与有助于客户身份辨识、确认、交易监督系统的开发过程,进而拟定一个能被众 VCPSS 机构所接受共同规范框架和标准。通过制定一个产业的标准化规范,更能凝聚所有虚拟货币机构,促使机构间的交易信息相互流通,这样更便于辨识资金来源及流向,共同打造强化防制洗钱和打击资恐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 [1] 尹龙. 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J]. 金融研究, 2000(2): 34-41.
- [2] 刘昌用. 货币的形态: 从实物货币到密码货币[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1-14.
- [3] 宋俊贤, 林安邦, 董泽平. 虚拟货币于电子商务之发展及其法律上的冲击[J]. 电子商务研究, 2014(2).
- [4] 李聃. 比特币会成为货币吗[J]. 当代经济研究, 2015(4): 60-65.
- [5] 时延安, 王熠珏. 比特币洗钱犯罪的刑事治理[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9(2): 49-64.
- [6] 师秀霞. 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防控策略[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6-16.
- [7] 藤武宽之. FinTech 法的概要[J]. LIBRA, 2017(4).
- [8] 原謙一. 仮想通貨(暗号通貨)の法的性質決定及び法的

处遇[J]. 横滨法学, 2018(2).

[9] 杨俊建. 关于金钱符号的理论分析[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11): 47 - 52.

[10] 小梁吉章. 仮想通貨の法律構成[C]. 広島法科大学院 论集, 2017(13).

[11] 杨庆明. 虚拟货币支付领域反洗钱监管的国际实践与借鉴[J]. 武汉金融, 2017(1): 67 - 69.

[12] 龚鸣. 非基于 KYC 的区块链反洗钱技术探讨[J]. 清华金融评论, 2017(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Currency Status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Virtual Currency In China

——Japanese Legal Regulation Model and Development of Virtual Currency

LIU Fan

(Institute of Law, West Anhui University, Liu'an, Anhui 23701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s well as monetary decentralization trend, the trend of currency turning from paper to virtualization is irreversible. However,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anonymity, virtual currencies are difficult to regulate and easy to breed money laundering, financing terrorism and other crimes. However, it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urrency development to negate the monetary status of virtual currency purely through tightening policies and laws. China can learn from Japan's legal supervision model. On the basis of recognizing the legal status of virtual currency, China can set registration obligations, confirmation obligations and reporting obligation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upport customer research, transaction control and "legalcompliant to technology" system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gulations in Chinese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

Key words: virtual currency; legal supervision; money laundering crime

(上接第 47 页)

[8] 诺南帕迪森城市研究手册[M]. 邹爱军, 王贻志,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0] 何增科. 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4(1).

[11] 孙江. 空间生产: 从马克思到当代[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2008. 108.

[12] 陈晓彤, 杨雪冬. 空间、城镇化与治理变革[J]. 探索与争鸣, 2003(11): 51 - 55.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44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Lack of Value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Urban Space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Justice

GUAN Qiping

(Colleg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Urban space is a basic type of human social space. As a "space production", new urban areas are the manifestation of urban modernity,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power and capital coexist has continuously produced and reorganized the urban physical space, thereby promoting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urban social space. The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 areas has also accumulated a large number of "space - society" problems, causing the lack of justice value in the new urban area's space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justice, we reflect on and criticiz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new era, explore ways to bridge the lack of space production value, improve the just supply of urban space production, and take a path that is suitable for China's urban space production. This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for realizing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the era, but also the intended meaning to meet people's needs for beautiful urban space.

Key words: space production; space justice; path

人工智能对传媒业影响及发展趋势分析

朱涛,黄夏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当下,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使得传媒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报纸、杂志等传统传媒业正在经受新一轮的冲击。通过对人工智能与传媒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智能化传媒业的发展存在数据安全、人才短缺以及侵权频发等问题,提出了传媒业的发展存在着使用端移动化、知识付费化、监管严格化等趋势。

关键词:人工智能;传媒产业;发展趋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0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55-05

一、文献综述

媒体的发展与技术创新息息相关,技术的创新对于传媒业的转型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宫京成认为人工智能对传媒业有推动力,传媒业的边界将会越来越模糊^[1]。刘娜、李娜认为智能传播技术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机遇,重视新媒体人才的培养^[2]。李宇认为人工智能在传媒业有可实现的价值,强调传媒业应充分把握机遇^[3]。白岩通过探析得出5G技术将对未来的媒体融合产生深刻的影响^[4]。陈新民、高晓晓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在AI技术的驱动下,传媒产业的内容领域实现了创新^[5]。陈晓红认为,人工智能助推了传媒产业生态重构,提升了信息生产速率、更新人才知识结构^[6]。郭全中通过研究发现,5G极大地释放了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的潜力,给传媒业带来的短期机遇已经显现^[7]。刘通和熊忠辉把传媒业看作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智能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了传媒业建立了更广泛的社会连接,技术的发展是推动传媒业变革的源动力^[8]。周蔚华、杨石华从十个方面说明了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促使了传媒业的重大变革,开启了传媒业的新时代^[9]。苏涛、彭兰回顾总结传媒业在中国四十年的发展,思索了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技术冲击下的未来传播图景。”^[10]王辰熙以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新闻传媒的积极发展方向^[11]。

纵览已有文献,目前国内在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在人工智能化传媒业发展存在的潜在问题分析甚少,本文将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以后的传媒业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二、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影响

1. 改变媒介内容生产模式,为新闻从业人员赋能

在技术浪潮的推动下,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大众的认可,个性化新闻、机器人写稿等新型媒介内容呈现方式,以职业传媒业从业人员为主题的传统传媒业生产正在走向智能化与专业化时代。

人工智能在媒体这个行业主要是两大块的应用,第一块是内容生产,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已经有自动写稿、自动做摘要等技术,这减轻了媒体人的负担。人工智能相较于传媒业从业者的优势就是全天候的工作模式,仅需支付设备的维修费等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得到一个24小时工作的“劳动力”,这大

收稿日期:2019-10-12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人工智能对传统服务业外溢效应、路径及对策研究”(2019BJJ023)

作者简介:朱涛(1972—),男,河南柘城人,经济学博士,河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公司成长。

大解放了传媒业的生产力^[12]；第二块是内容传播，人工智能拥有较快的传播速度和反应速度，在这个时代也赋能了媒体知识的传播。

2. 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智能化交互体验

各种形式的媒体上的技术进步正在带来一场革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内容收集、生产和交付方面的巨大改进，传统媒体系统正在不断发展，试图跟上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快速变化。技术已经成为与新媒体联系最紧密的词。想想你最普通平常的一天，你会被手机上的闹钟吵醒，你手机 APP 里的音乐或者音频 FM 可以帮助你迎接崭新的一天。你起床后，在电脑上查看电子邮件后，打开客厅的高清电视看早间新闻。随后，你开车去上班，打开全球定位系统来避开拥堵。你上班时用短信和电话与客户沟通，并用电脑做一一记录。下班回家后，你打开投影仪，放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以缓解一天的疲劳。它为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了便捷。

3. 改变传媒受众的地位，降低媒介技术门槛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依靠传媒业从业人员自上而下地把信息传播给大众，媒体行业处于主动的地位，受众被动地接受所传播的信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传媒渠道的多样化，受众开始自主加入新闻内容创作，从大众传媒时代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信息的主动传播者^[13]。全民生产、全民共享打破了传媒业对传播主导权的垄断，大家都可以随意地在很多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文字，发声的渠道会更加多元化。非专业人员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微博、微信等媒介传播信息，也可以在新闻信息等发布以后表达自己的评论和看法，这就对传媒业传播内容的真实性 and 客观性提出挑战。社会上出现了多种声音，使少数者的话语霸权成为过去，有助于大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4. 改变媒介内容呈现形式

从传统传媒时代的看新闻，到现在的点新闻、读新闻、答新闻的文字与语音交互式提问，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媒介内容的呈现形式，传统媒体时代的以报刊和广播等为媒介发展至今，媒介已变得多种多样，虽然电视市场、纸媒市场内缩，但是诸如电影市场、短视频和音频等新媒体市场繁荣。根据 CNNIC 的统计，2018 年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 6.18 亿人，占整体网民规模的 78.2%，网络视频规模占网民整体的 73.9% 视频市场有被垄断势力的平台几乎垄断，此外，碎片化、实时化、场景化的新兴媒介形式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以“短平快”为特征的短视频和竖屏剧引领新趋势，短视频应用飞速

发展，诞生了美拍、快手、抖音等以一系列短视频社交软件，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李佳琪、李子柒等一系列“网红”，他们是视频内容的生产者，如今短视频行业吸引了明星等有影响力的人的加入，更促进了短视频行业的飞速发展^[14]。音频市场繁荣，2018 年网络音频用户规模达 3 亿人，年增长率高达 15.4%。传统收听终端的选择率继续下滑，2018 年占比不足 30%，车载收听终端的选择最多，接近 60%。有声书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用户规模达 2.32 亿人，占总体网民的 28.9%。如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网络广播电台积极改编有声书产品，“阅文听书”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未来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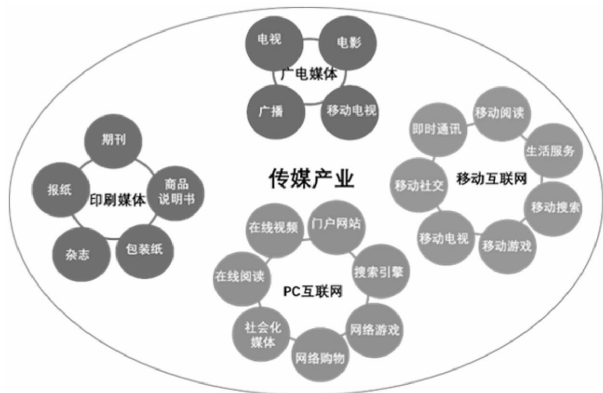


图1 媒体形式

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市场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介，如何筛选信息成了受众的一大难题，随着大数据、算法推荐技术的完善与成熟，各个媒体平台为用户制定个性化内容，推送定制化报道，如搜狐新闻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针对不同的用户推送不同的新闻，从而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和体验感，媒介内容的个性化、对象化、差异化特征，激活了用户市场^[15]。此外，媒介内容的方式呈现形式多元化，应用 VR/AR 技术成为趋势，可以让用户从第三视角转变到第一视角，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感知体验，VR/AR + 直播也成为流行趋势。AI 合成主播、智能语音等技术带来了受众全新的感官体验。

三、智能化的传媒业需要应对的挑战

1. 数据安全与隐私问题浮现

大数据等新的科技在给大众带来福利的同时，同时也造成了数据隐私、数据失范等问题。数据造假、社交媒体操纵舆论、个人信息被轻易泄露，成为传媒组织发展的绊脚石和痛点^[16]。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同时，外挂程序等应用的发展，使得网络数据造假并非只是娱乐圈中的“流量造假”，更是存在于各行各业，甚至成为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中的普遍性问题，滋生出巨大的数据造假的黑灰

产业。例如,2018年8月,AdMaster 研究调查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无效流量占比为28.8%^[17],媒介数据的虚假等问题影响了中国媒体行业整体信誉,造成媒介市场数据“信号失灵”。

针对媒介市场的数据问题,我国应该强化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各部门加强对媒介数据虚假、数据合谋、数据泄露等打击力度;鼓励媒体组织与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媒介数据企业合作;规范媒介数据调研市场行为,以确保数据真实性,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2. 媒体智能化趋势下专业人才短缺

对于媒体行业来说,人工智能既降本又增效,降本可以让以前比较重复性的人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来做,宝贵的流量能够得到更精准的变现,赋能到一些媒体行业的工作,但是,传媒业整个行业专业人才少,供给端缺乏,传媒人才流动进入紧缩期。当前高校虽然培养了不少有专业素养的新闻传播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但是整个传媒业状况发展的不景气,压力不小,待遇不高。大部分媒体还不能解决户口、编制等现实问题,晋升通道不畅,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不强。如今的企业慢慢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给他们可以带来很多福利,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大大降低人力劳动力成本,从而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如何吸引和培养专业化人才成为一大难题。未来几年,控制人工成本恐怕是任何一家传媒企业都无法回避的工作。

3. 人工智能与传统传媒业从业者冲突

传统媒体时代,传媒业由专业机构的新闻记者掌握,大众只是媒体内容的接受者;互联网时代,受众地位开始转变,自主生产内容^[18]。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写新闻成为主要发展趋势,机器人根据“5W1H”模板,能够迅速准备的完成一篇新闻稿件。此外,非专业人员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信息,这不仅对传媒业者的能力提高了要求,更是对其生产的内容提出更高的标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新闻岗位或部分被淘汰。2018年河南传统媒体离职调研报告显示:《大河报》近五年人才流失近80人,占采编人员总量的1/4左右;《河南商报》近五年采编人员累计流失60多人,其中中层职员12人;《东方今报》近5年采编人员累计流失105人^[19]。人工智能与人类传媒业从业者逐渐出现了各种冲突。

表面上行业越来越焦虑,拉长时间看,新兴技术在淘汰传统传媒岗位的同时,也为各行各业创造出全新的工作机会,例如数据分析师、机器新闻监督员、直播编辑等。而有些公司诸如有书、得到等公司

可以搭乘人工智能的顺风车而崛起,反过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传媒业从业人员,应该以人为本,对技术保持理性期待,将技术更好地为工作赋能^[20]。

4. 同质竞争现象明显,侵权现象频发

我国传媒产业中,同类媒介的同质竞争现象比较明显,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存在趋同趋势,呈现形式也大同小异,媒介的定位也有重叠趋势。比如一些报纸在选题策划、新闻报道和栏目设置等方面相差无几,同类新闻在传播时相互模仿。由此一来,侵权与抄袭问题渐渐浮现,有创意的点子很快被其他媒介“借鉴”,如今,版权保护的法律还亟待完善,在版权纠纷中,执法效率低、维权的成本高更放纵了侵权的行为,挫伤了创作者的积极性。

近年来,各种侵权模式花样百出,从盗版网站抓取内容,到现在的微博、微信、浏览器、论坛、网盘、应用程序商店以及贴吧等多种传播方式。比如在有声书市场上,仅在1月17日—5月15日期间,喜马拉雅FM就有多达26条开庭信息,其中包括15条案由为“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开庭公告,其中喜马拉雅FM有6次为相关案件的被告方。作家曾鹏宇、编剧张璐都曾发声称,喜马拉雅FM有声书没有征得本人和出版社的授权同意,直接影响到正版有声书的推出从而造成了损失。对此“剑网2018”专项行动已将有声读物列入着重规范领域。

在未来,更多的传统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将会认识到知识产权和版权的重要性。随着AI技术的发展,为版权保护带来了清新之风,区块链技术的难以篡改和公开透明的特征,使得作品的确权、用权、维权得到保障,确定作品的真实和唯一性,保证作品在未来可以被追踪,为今后的司法取证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相关证据。

四、智能化传媒业的发展趋势

1. 媒介产品差别化、使用方式移动化。

传媒产品差别化是衡量传媒产业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受众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这就要求媒介产品差别化。如今媒介产品的同质竞争会使得受众过多的接受同一类型、同一风格的信息,从而使用户的使用感降低,反过来会导致传媒产业的需求下降、市场收缩。因此,在未來越来越多的媒介会意识到异质性和差别化产品的重要性,对侵权现象的监管和控制也会对同质竞争现象的降低产生积极的影响。

2017年,观众从电视端向网络端转移的趋势仍在持续,根据《中国传媒经济发展报告(2019)》,2014年到2018年,电视观众人均每日收视时长从

161 分下降到 129 分。截至 2018 年 12 月,网络用户对智能手机的使用率高达 98.6%,用户的媒介使用方式从电视、电脑等固定端转为手机等移动端,图 2 为 2017 年至 2018 年网络用户的设备使用情况,可以看出,手机的智能化使其成为使用最多的传播媒介。媒介的使用方式渐渐地从电视、电脑等固定端变为智能手机等移动端。



图 2 2017—2018 年网络用户对终端设备的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CNNIC《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 年 2 月 28 日

2. 用户付费习惯逐渐养成,知识服务付费化

知识付费是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购买知识服务从而学习一门知识或技能,充实自己的一种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知识、技能的不断学习成为刚需,这种需求使得知识付费市场的快速发展,诸如知乎、喜马拉雅等 APP 被装载进手机,成为人们排解压力、充实生活的方式。《2018 年中国在线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知识付费的用户规模达 2.92 亿人,预计 2019 年知识付费用户规模将达 3.87 亿人。图 3 为我国在线音乐用户付费意愿的调查,全体中愿意付费听歌的用户比例高达 59.8%。在线视频市场上,2018 年爱奇艺的全年会员服务收入为 106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72%,会员总数超过 8700 万人,腾讯视频的会员数量也超过了 8900 万人。可以看出,在线视频、音乐流媒体等平台,经过两年多的培育,付费机制已经较为成熟,付费会员能够享受更好的内容推送,付费率仍有提升空间,付费用户保持高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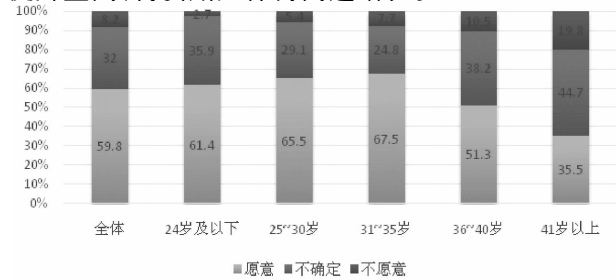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在线音乐用户付费意愿调查

资料来源:QuestMobile《2018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在线音乐行业报告》,2018 年 9 月

知识付费的用户群体有限,大多是高知识分子,还未构成体系。此外,知识付费的内容良莠不齐,付费知识的“含金量”低,给予用户的体验感不高,人们对于知识的真实性、准确性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付费知识未来趋势可能发展缓慢。输出优质内容是解决知识付费发展限制的基础,有关政府部门要加强对知识付费平台的监管,此外,互联网知识平台方应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建立核实知识提供者身份机制,以保持平台和用户的可持续性联系。

3. 传媒业的监管程度更加严格化

小红书曾凭借着“种草宝库”的名头,红极一时,2019 年 7 月开始,相继被华为手机、OPPO、等平台下架,早在今年 3·15 前夕,小红书就被曝出“种草”代写、数据造假,之后一直备受争议。上海 2019 年上半年投诉排名情况显示,小红书投诉数量超过 1000 件,位居前十。

现在很多诸如小红书的平台近几年为了片面的追求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率,忽略了对平台生态的治理,放纵了这些违规内容的滋生,因为违规内容可以带来关注度,而关注度就是流量,带来的就是可观的收益,为此国家及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对传媒产业的监管,如在短视频市场上,国家广电局联合网信办在去年上半年约谈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多次召开短视频企业内容安全管理会议,在会议上主要强调对平台内容的把控。2019 年 9 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正式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和《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为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树立了明确的管理标准。

除了政府监管外,更要提高社会责任感,同时也要推动全民的人工智能教育和学习,提高大众的素质,拥抱新技术,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传媒业,更好地辐射大众。

4. “内容+技术”融合深度化

随着 5G“高速公路”的铺设不断推进,传媒组织的信息传播将步入万物皆媒的新纪元,传媒业从以前的内容为王,已经变成了内容与技术融合的竞争。几乎所有与新媒体密切相关的技术都与计算机技术密切相关。马诺维奇曾说:“照片本身并不是新媒体,但 DVD 上的照片却是新媒体。网站上发布的是新媒体,而报纸上发布的是不是。”无论是在 DVD 上还是在网站上,它都与新技术有关。机器之心产业服务的负责人樊晓芳提出:“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进入第三波,这一波我们更关注的是技术如何应用到各个产业,现在遇到人工智能落

地应用最大的两个挑战是场景和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现在还处于一个低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困难。我们的一些基础科学,包括计算能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更大的突破,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传媒产业应该更加注重技术研发的投入与运用,做到内容与技术深度融合。

五、结语

在科技创新未来的媒体进化过程里,将会形成一个漫长的人机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对机器能力的挑战,更是对人的挑战。现在 AI 在各行各业发生一些落地,中国的 5G 也进入产业全面冲刺的重要阶段, AI 蓬勃的趋势还是非常的势不可当。“智能 + 媒体”不断践行出新的成果,如今的传媒业,已经一只脚迈入了技术的快车道。未来的趋势很可能是,谁能够率先掌控最新技术,谁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参考文献:

- [1] 宫京成. 人工智能在当前传媒业崛起的推动力及影响[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6(6): 16-18.
- [2] 李娜, 刘娜. 智能传播技术带给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J]. 传媒论坛, 2019, 2(20): 108-109.
- [3] 李宇. 人工智能研发及在传媒领域的应用[J]. 中国广播, 2019(9): 36-39.
- [4] 白岩. 5G 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探析[J]. 传媒论坛, 2019, 2(20): 121.
- [5] 陈新民, 高晓晓. 新科技赋能: AI 技术参与传媒内容创新[J].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19(11): 28-31.
- [6] 陈晓红. 人工智能助推的传媒产业生态重构[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8, 25(5): 2-6, 132.

- [7] 郭全中. 因为 5G, 传媒业原来有这么多新市场[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9-08-20(5).
- [8] 刘通, 熊忠辉. 智能技术: 传媒业态未来发展的核心能力[J]. 视听界, 2016(4): 23-27.
- [9] 周蔚华, 杨石华. 技术变革、媒体转型及对传媒业的新挑战[J]. 编辑之友, 2018(10): 5-11, 16.
- [10] 苏涛, 彭兰. 反思与展望: 赛博格时代的传播图景: 2018 年新媒体研究综述[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1): 41-57.
- [11] 王辰熙. 浅谈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J]. 传播力研究, 2018, 2(33): 33-35.
- [12] 汪莹. 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人工”与“智能”[J]. 传媒, 2019(8): 63-66.
- [13] 娄冠群. 媒介技术视域下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影响[J]. 新闻世界, 2018(10): 59-62.
- [14] 曾洁. 5G 时代短视频的内容逻辑与媒体转型新思路[J]. 出版广角, 2019(9): 67-69.
- [15] 张洪忠. 如何从技术逻辑理解人工智能对传媒内容生产的影响[J]. 中国传媒科技, 2018(8): 10-11.
- [16] 刘霖文. 大数据背景下传媒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 中国报业, 2018(24): 61-62.
- [17] 廖秉宜. 中国媒介市场数据失范现象与治理对策[J]. 编辑之友, 2018(10): 32-35.
- [18] 张文娟. 传媒产业再思考: 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J]. 今传媒, 2019, 27(9): 90-93.
- [19] 高金光, 张靖, 施宇, 等. 失衡与重建: 河南传统媒体人才流失状况调研报告[J]. 新闻爱好者, 2018(11): 8-12.
- [20] 赵江丰, 巴典曲查.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关键与路径[J]. 新闻传播, 2019(13): 82-8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Analysis of the Impact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Media Industry

ZHU Tao, HUANG Xia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when everyone is a communicat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kes the boundaries of the media industry more and more blurred, and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other traditional media industry are undergoing a new round of huge impac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edia industr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edia industry has problems such as poordata security, shortage of talents, and frequent infringemen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industry has the trends of mobile usage, knowledge payment, and strict supervis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dia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

媒介视角下维新报刊的政治中介作用及其实现

许莹

(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从媒介视角来看,维新报刊对政治变革的推动作用与其“新媒介”特质密切相关。现代报刊所运用的工业化技术使其以快速而广泛的发行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媒介空间,拓展了政治交往,实现了政治信息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政治变革所需的思想认同与政治力量积聚。同时,现代报刊的版面空间及表达形式形成新的媒介讯息,使其构建了政治讨论的公共平台,形成了舆论与政治的互动。维新报刊的出现推动了晚清政治现代化进程,体现了政治媒介化特征。

关键词:维新报刊;新媒介;政治媒介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0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60-05

以麦克卢汉等媒介理论学者的观点来看,是“媒介”而非“内容”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更大影响,因为“对任何媒介的使用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1]。这一论断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中的正越来越清晰地突显出来。当前社会被描述为“所有事物的媒介化”^[2],随着媒介化理论的发展,对于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也经历着以“媒介”为中心的重构。如果将报刊置于媒介发展的纵向进程中,作为技术驱动下媒介变迁中的一环,其对于传播时间与空间的重构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化是通往包括政治变革在内的社会变迁的重要桥梁。在现代报刊产生的近代中国,报刊的中介作用在维新运动这一具体历史时期有着突出表现。对维新报刊政治中介功能的探讨,有利于拓展维新报刊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在传播发展史的整体意义上增强作为特定媒介形态的报刊与其他媒介或“新媒体”理论探讨的相关性。

一、政治中介化与维新报刊

本文所谈论的“政治中介”是与“媒介化”相关的概念。“媒介化”所讨论的是“媒介如何延伸至政治、战争、宗教等领域或社会机制中,与其相互交织,并影响其他领域或社会机制”^{[3]23},是纵向历史视角

的、宏观的、关注媒介技术的演变与宏观社会变革的关系的概念^{[4]154}。媒介在各个社会中都影响着政治权力的运行,“政治媒介化”所指代的正是这样一种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具体来说,它呈现的是政治制度化逐渐依赖媒介逻辑,即适应媒介生产进程中的系统性规则的过程^[5]。所有的“媒介化”现象都建立在“中介化”现象之上,作为社会交往基本过程,“中介化”即经由传播中介的社会交往和互动^{[4]156},正是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中介化”现象在历史中的积累产生了“媒介化”现象^[6]。据此,“政治媒介化”也建立在“政治中介化”基础上,传播媒介成为政治变革的中介物,即“政治被中介”,也是“政治中介化”及“政治媒介化”的必要条件。

政治媒介化始于媒介与政治的关联。斯托姆巴克将政治媒介化的整个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步是政治中介化,这使媒介成为政治最重要的消息源,在政治传播中取得主体性地位;第二步是媒介逐步独立于政治机构,获得更高的自治权;第三步是政治机构有目的地发布政治消息,以适应媒介标准;第四步是政治机构不仅迁就媒介逻辑,而且将媒介逻辑内化,使对媒介的考量成为日常政治思考和行动的重要部分^{[3]48}。政治媒介化过程涵盖了从现代

收稿日期:2019-10-09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微信传播的社会心态作用机制研究”(2016BXW002)

作者简介:许莹(1975—),女,河南开封人,新闻学博士,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闻史。

报刊到新媒体的媒介发展阶段,并在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特征。这是因为政治媒介化并不表现为媒介对政治的单方面影响,而是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任何媒介的产生及其活动都处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在媒介渗透于政治时,也受到具体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影响。由这一互动特征所决定,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政治媒介化的表征也不尽相同。

在媒介化视域下纵观我国报刊发展的轨迹,自现代报刊产生,其与政治之间一直呈现出紧密的关联。我国现代报刊虽起始于19世纪初的在华外报,但国人自办报刊很快兴起且成为主流,并在长期的政治变革与斗争环境中形成了政治化发展的方向。这一方面体现为内容的政治化,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不同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与传播媒介之间的互动。在近代由专制走向民主的政治进程中,我国政党报刊与商业化报刊长期处于共存状态,但在革命与改良交织的政治背景下,即使商业化报刊也多带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发挥政治作用。报刊的政治属性处于显著地位,在政治生态中的作用也较为突出。

作为政治媒介化的第一步,政治中介化,即媒介在政治传播中主体性地位的获得是政治媒介化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媒介主动的、有目的的、自主的政治传播在维新报刊时期得以实现。这里所指的维新报刊,并非仅为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报刊,而是包含清末政治改良中所有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维新运动是一场危机背景下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晚清时期西方政治文化冲击下的政治改革诉求在制度层面的实现,这一过程与维新报刊的政治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维新报刊出现之前,在华外报已经存在多年并开始由宗教性向商业化发展,出现了《申报》这样获得大众认可的商业报刊,但其重心明显偏向于商业化经营和商业信息的传播,而第一份维新报刊《循环日报》“办报立言”宗旨的树立及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使政治性进入现代报刊,此后《时务报》等维新报刊的出现则使进一步增强了报刊的政治性,成为政治参与和政治变革的重要途径,继之而起的国人办报高潮则推动了以报刊为中介的新的政治变革模式。可以说维新报刊的出现是政治媒介化的一个开端,其实现路径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技术与政治连接下的“办报参政”

“办报参政”是报刊政治中介化的突出体现,其实现与媒介技术支持密切相关。在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印刷术的发明被称为一个“分水岭”,但正

如德布雷所言,“信息和信使各自活动范围的脱节是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而产生的”^{[7]29},机器工业发展中传播工具和运输工具的飞跃带来的传播速度提升改变了社会时间刻度,使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普遍性得到实现,由此空间不再局限于身体所在的某个地理位置,在身体空间之外重构了一个媒介空间。这一空间的存在为共同体的结成提供了超越现实的一种可能,对政治活动来说同样如此。这或许多少可以解释为何中国最早出现了古代报纸,但却迟迟没有出现“办报参政”的先例——这一方面由于长期专制统治下的严厉“报禁”,另一方面也在于古代报纸印刷和传递工具的局限令人无法找到超越现实空间中身份限制的政治参与途径。

《循环日报》是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中最早获得成功的报纸,这份报纸不仅使创办者王韬完成了由“旧士子”到“报人”和“政论家”的身份转变,更是现代报刊主动传播政治成为政治交往中介的开端。在创办《循环日报》之前,王韬对印刷技术及其作用已有所认识。1848年,科举失利的王韬初入上海协助其父设馆授徒,这期间他曾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开办的墨海书局参观,那里的新型印刷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8],这是现代传播技术给他带来的最初震撼。太平天国书信事件后,王韬避走香港,于1867年12月开始欧洲游历。欧洲见闻使他对于技术的社会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验。在英国,王韬乘坐了火车,惊叹于它的迅捷,并得知铁路不仅不会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使牧人和车夫失业而造成民生困苦,反而有利于公众安全,并为国家与人民带来财源;他参观了爱丁堡的印刷厂,看到了从铸字到印刷装订全部机械化的流程;在伦敦,他参观了造纸厂,对造纸的速度和纸张切割码放的整齐深感震惊;他的到来在英国引起了小小轰动,因此登上了晨报,短时间内被广为谈论^{[9]44}。技术带来的震撼使王韬得出结论:19世纪是一个金属、蒸汽和化学的时代^[10]。

技术向王韬展示了另一种参与政治的可能。此前,他也曾意识到西方技术的优点并提出过在轮船、火器方面学习西方,但那仍然属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并不指向政治制度变革,如他所言“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9]19}。而当造纸和印刷的速度与质量因机械化形成了质的提升,使标准化报纸的定期、高频出版具备了条件,当传输工具变成火车甚至电报,可以在更大范围实现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同步性,这种条件

下,信息流动的快速、规律、多向使报纸在传播者与阅读者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也使更多的阅读者通过报纸联结起来,构建起一个新的交往空间。由此,现代报纸与政治变革的连接在王韬心目中显现。后来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他描述西方报纸“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请议”;英国《泰晤士报》“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而其基础则在于“大日报馆至于电报传递,以速排印。夫岂第不胫而走也哉”^[11]。当他重回香港筹办《循环日报》时,对创造一个作为参政中介的报纸应已胸有成竹。

早在1862年,王韬就在《臆谈》中指出政治体制的弊病在于君民之间的隔阂,而此时他将报刊看作消除这一弊病的最佳手段,认为报刊能够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如果“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并有效阻止当政者的滥用权力^{[9]52}。这里首先可见王韬对报刊政治中介角色的定位。同时,他认为“广泛发行”是报纸政治传播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也是他格外重视的方面。“广泛发行”只能通过技术来实现。1873年,王韬与黄胜集资2.1万元买下英华书院印刷机两部,组建中华印务总局,《循环日报》即由印务总局出版,是世界上第一家采用西式中文铅活字的华资中文日报^{[12]425}。先于《循环日报》的将机器工业技术用于广泛的文化传播只有《申报》,后者于1872年购入手摇转轮机,但机器印刷的政治传播影响是在《循环日报》得以突出体现的。

借助于机械化的印刷和传输,《循环日报》的发行遍及中国内陆各通商口岸,在日本、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新金山、旧金山、秘鲁等地都有发行,创办之初发行量为800份左右,1879年后发行量明显增加,1893年达2500份^[13]。报纸除星期日外每天都出报,而当时香港报纸皆间日出版,独《循环日报》每日出版以副日报之名^{[12]426},这已属最大程度缩短出版周期的中文报刊。《循环日报》于1878年改为晚报,比其他报纸提前12小时发行,1882年又改为晨报,以便赶上到广东和澳门的末班船。更短的出版周期和更快的运输保障了信息的更新速度和传播速度,也促使通过报纸获取政治信息成为人们普遍性日常活动之一。

自《循环日报》广泛发行后,王韬有关“洋务”的论说受人瞩目,在17岁考中秀才科举道路就遇挫终止后,王韬找到了另一条参政和“兼济天下”的道路:“一些官吏开始征询他的建议,而中国年轻的改革者也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指正……王韬作为记者

和政论家而‘达’了”^{[9]53}。他的选择和《循环日报》的影响提供了“办报参政”的先例,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代表性的维新志士无一不选择“办报参政”并由此成为政治活动家。1895年,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签订,洋务运动宣告破产。这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等云集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发起了“公车上书”,提出了“变法图强”的主张。其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宣传维新变法。

梁启超在解释其办报意图时说:“要开通风气,非合大群不可,要合大群,非开会不可,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论议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4],这种“办报参政”的清晰思路为报刊的政治化发展奠定了方向:“使用报纸和杂志做评论社会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工具,无疑为19世纪90年代后期将要出现的、新型的社会政治性的中国报业树立了榜样”^{[15]276}。由于早期近代报纸“报”“刊”不分,这里所说的“杂志”其实也是“报纸”,报刊介入政治不仅成为维新活动的一种特色,也成为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

同时,这段话也显示维新派探索出了“报会并举”的新的办报参政模式,即在以报刊为中心扩大政治交往的基础上创办政治机构。政治变革既需要思想认同又需要组织集结,然而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下,思想传播与政治交往都受到极大限制,因此首要问题就在于突破由权力所构建的现实政治秩序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交往空间,并由此形成新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报刊是一个中介,办报其实是一个间接策略,“报会并举”则是这一途径的具体形式,“利用学会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15]290}。最重要的一份维新报刊《时务报》的诞生,即源于主要创办人汪康年要实现长久以来的参政意愿,他的首要目标是组织“中国公会”,“以齐天下之心,以作天下之气”^[16]。正如《时务报》合作创办人之一邹代钧所言:“若能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互相切磋,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17]86}。

“报会并举”模式下,维新报刊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仅1896年后的两年中,全国由改良派或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主办的鼓吹和赞助变法的报刊达数十家之多,一共建立了40多个改良派的学会团体^{[18]86}。1897年秋,长沙“时务学堂”成立,此时维新派已借助《时务报》等报刊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思想热潮,部分维新派走向政治激进主义,“国民参

政”的观念更为突出。并不处于当时报刊中心地区的湖南,由于维新气象的浓厚也成为报刊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湖南维新组织“南学会”在维新报刊《湘学新报》(后更名为《湘学报》)基础上组办起来,而被康有为称为“维新运动时期办得最好的一份报纸”的《湘报》,则与《湘学报》形成了相互补充。《湘学报》《湘报》提倡民权,《湘报》明确提出了“平等亡,公理晦,而一切残酷蒙蔽之祸,斯萌芽而浩瀚矣”,“贵民、重民、公权于民”的“平等”与“人权”观点^{[19]596},提倡政治民主化。通过维新报刊及其所集结的政治力量,维新派向传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报刊的政治中介功能也进一步强化。

正如马克思所言:“日报和电报将新发明即时传播至全球各个角落,它们在一日之内制造出的神话比从前人们在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创造的还要多”^{[7]385},传播新技术使现代报刊能够将政治信息即时播散到广泛的地区,从而使阅读者成为政治观点的接收者与讨论者,使普通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变革的参与者,构成了新的政治交往和政治力量。这一意义上,维新报刊不仅成为报刊政治化发展的开端,更成为政治变革的中介。

三、媒介讯息构建中的政治舆论形成

当技术与政治的连接建立起之后,媒介对政治变革的影响还通过特殊的外在形式实现。正如德布雷所说:“技术阶段一旦蒸发或雾化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够获得一个轻盈、灵活和殷勤的介质。‘渠道’就是以这种方式变成简单的代码矢量,变成讯息的传播者”^{[7]72}。相对于另一种印刷品书籍来说,报纸是汇集各种信息的集合,也是一种特殊讯息,借此可以表达意图,并通过定期的连续出版传递给阅读者,由此形成政治思想的传播与政治变革的影响。

再回顾王韬所言,报纸“如果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其中“编排得当”即指对报纸这一媒介讯息的构造。现代报刊的大众化使其成为多种内容的集合,而高频率定期传播的特征又使其对各类信息分类排序,以便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因此,报纸由版面构成,版面形成了内容的分类与排序,版面又由不同栏目组成,各栏目同样有各自的秩序。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报纸形式的秩序化使这种媒介本身而非其内容即能够影响人们对“何为最重要”这一问题的判断。

《循环日报》创办于香港,其时香港已有商业化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与香港中文报纸一样有商业信息版刊登大量广告,但也重视新闻版,初创时

期新闻信息占多数^[20],商业信息印在土纸上,而新闻信息印在进口纸上,这种形式本身就蕴含了对新闻的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循环日报》最为固定的栏目为“中外新闻”,从创办起从未间断,为所有栏目中仅有,每期“中外新闻”几乎都有一或多篇“论说”,从1875年后基本固定。有论者指出这一惯例很可能效仿《申报》,后者每天固定在头条刊登评论,但一方面这同样可以说明《循环日报》突出论说的编排方式,另一方面《申报》的评论并不指向政治变革,而《循环日报》的论说主要包括内政与中外关系,指向变法维新,因而也有论者称《循环日报》某种意义上可称《变法自强报》^[21]。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时,“每册刊登论说一篇,长篇论说则分期连载”^{[19]543},《时务报》创办时期,汪康年等人主张“广译西报为主”,但梁启超力主将言论放在首位,办一份政论性报刊,最为折中为以译报为主,同时辟设言论栏发表政论,每期政论刊于卷首^{[19]555}。这都体现出政论在维新报刊中的焦点地位,也构成了维新报刊所特有的媒介讯息特征,而这种特征使维新报纸被称作一种新型报纸的开端,“维新报纸有两个主要版面,一版专用于报道新闻,另一版专用于社论,主要是关于国事的社会政治文章”,有了这种报纸,民族主义的出现才成为可能^{[15]328}。

在占据版面编排的首要地位之外,政论也因媒介变化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形式。《循环日报》时期,王韬开创了“报章文体”,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更契合报纸特征的文本形式,最为突出的在于政治观点表达的直接与通俗,其标准在于“直抒胸臆,辞达而已”。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了近千篇政论,篇幅固定在1000—1200字之间,如果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较长篇幅才能说清,报纸就会采用连载的方式^[22]。政论标准的树立成就了“明快畅达”的文风,破除了时文繁复冗长的弊病,政治观点得到更为有力的表达。

报章文体所提出的“直抒胸臆”“辞达而已”固然可溯源于中国古典文论的某种形式,但更是报刊这一“新媒体”所赋予的特色。报纸出版周期短,版式固定,时间上的快速和版面空间的有限要求文章的篇幅不宜过长,重点要突出,发行广泛的特征则要求其通俗易懂。这种标准在此后的维新报刊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自《循环日报》形成了以维新报刊为突出代表的政论报纸主流。《时务报》时期,“报章文体”得到梁启超的进一步发展,形成“时务文体”,切近现实,寓政论于新闻之中,成为政治讨论的公共平台。《变法通议》连载21期,造就了令人瞩目的

政治话题,这多被看作政论成就了报刊,但媒介角度来看,也可说是报刊成就了政论,进而成就了维新变革的舆论环境。

在媒介讯息的构建中,报刊与政治的互动关系逐渐清晰。正如汪康年所言:“夫报者主持舆论者也,引导社会者也。善则大局蒙其福,不善则大局受其殃”^{[19]543},借助报刊,维新派营造了以变法图强为核心的舆论,形成了现代公共舆论的开端。《湘报》对“不缠足运动”的推动是典型一例。1887年,康有为曾在广东南海县与开明士绅成立“不缠足会”,但遭到民众的抵制而失败。维新运动中,“不缠足”作为“移风易俗”的政治主张再度被提出,维新报刊发表大量论说宣传“不缠足”。其中,《湘报》发文力陈缠足“损生命”“伤人伦”“害国家”“戕生命”,通过媒体的传播,集结起了不少支持者,在《湘报》馆内成立了“不缠足会”湖南分会,并依靠报纸发布“不缠足会”的章程、活动、公示。湖南不缠足会成立后,迅速发展了邵阳、新化、善化、衡山、湘乡等地的分会,各个地方纷纷成立不缠足团体,各级官员主动通过《湘报》表明立场、发布政令^[23]。湖南成为当时全国“不缠足”运动最为有生气的省份。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提出了“耳目喉舌说”,这一理论高度概括了报刊在政治传播中的地位。实践中,报刊也逐渐显现出主动性,政治思想和诉求转化为报刊政论,通过意见传播获得舆论影响,从而积聚力量,达成目标,成为政治变革的一种模式。百日维新时期,“创办报刊,开放言路”作为政治改革内容之一被提出,光绪皇帝“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应亟为倡办。……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的上谕^[24],则宣布了报刊论政的合法性,从而使报刊的政治中介功能进一步强化。尽管戊戌变法遭遇了失败,光绪的上谕随之失效,但报刊论政的政治影响得以沿袭。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他在报纸出版一百期时发表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称报纸“彼如预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觉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25],对报刊的政治舆论功能给予了全方位的描述与评价。

如《中外日报》所言,维新运动时期,“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未有之事”,1895至1898年间,全国报刊总数增加了3倍^{[18]87},其中最主要的是维新报刊。现代报刊所具有的新技术使维新报刊得以广泛传播,拓展了政治交往空间,实现了知识阶层的“办报

参政”,从而为从思想变革到政治实践所需要的观念认同与力量积聚提供了基础与条件。同时,在现代报刊的媒介特征作用下,维新报刊创造出政论新文体并发挥出强大作用,形成舆论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借助“媒介之新”,作为政治中介的维新报刊成为政治媒介化进程的发端。

参考文献:

- [1]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M]. 北京: 社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49.
- [2] 索尼娅·列文斯通就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的演讲, 转引自戴宇辰. 走同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 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批判性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5): 47.
- [3]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 刘君, 李鑫, 漆俊邑,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 [4] 潘忠党. “玩转我的 iPhone, 搞掂我的世界”: 探讨新媒体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 苏州大学学报, 2014(4): 154-156.
- [5] 戴宇辰. 走同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 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批判性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5): 52.
- [6] 王琛元. 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 概念、路径与启示[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5): 9.
- [7]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宣言[M]. 黄春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8] 王韬. 漫游随录[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51.
- [9] 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10] 芮哲非. 谷腾堡在上海: 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 张志强,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09.
- [11]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71.
- [12] 万启盈. 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13] 萧永宏. 循环日报之编辑与发行考略[J]. 南京: 江苏社会科学, 2008(1): 180.
- [14]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8.
- [15] 费正清, 刘广京. 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下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6] 清华大学历史系.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79.
- [17] 邹代钧. 致汪康年信[C]//汪康年师友书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637.
- [18]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上[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19]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1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596.

(下转第76页)

新时代残疾题材影视作品传播影响力及策略分析

唐海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学校办公室, 郑州 450044)

摘要: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视野虽小众化,但在受众层面上却享有普适性。通过对残疾题材影视作品中的消极影响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优化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影响力的策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传播效果,为新时代的受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文化作品。

关键词:残疾;影视作品;传播;影响力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1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65-05

一、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在传播中所受到的消极影响

(一)某些影视作品的残疾歧视辨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1]。中国当代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存在着歧视残疾人的文化现象,这不仅导致观众对残疾人产生错误的认知,也不利于残疾人身心健康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文明进程。这些歧视残疾人的影视作品大多是为了博取观众的眼球或迎合部分观众低级趣味,以此来提高收视率。演员夸张地模仿残疾人的肢体语言,错误地将残疾人的身体缺陷进行放大、宣传和炒作,扭曲观众对残疾人形象的认知和态度。其中包括曾一度引起热议的著名小品,多次模仿残疾人走路、说话,搞怪的表演引得观众捧腹大笑,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再如,个别影视剧中,主要演员模仿肢体残疾人、智力障碍人士,将他们行动不便、口吃等身体缺陷进行渲染,包装成一大卖点,通过践踏残疾人的尊严来赚取低俗观众的掌声,不免让人感到心凉和无奈。

而有些影视作品则会出现大人或小孩打骂嘲弄残疾人的桥段,反映出社会对待残疾人的不良抵触心态。影视作品如今具有大范围的受众群体和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影视作品对待残疾人的态度,能够

反映出其作品的修养和文明程度,也能映射出观众自身的文化气息和人文素养。不包容、不接纳、不尊重残疾人这一思想若利用影视作品形式传播开来,将会造成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二)某些影视作品的夸张呈现

与现实部分残疾人所处的惨淡环境相比,大部分关于残疾人的影视作品都呈现出超现实主义浪漫情怀。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同于新闻事件或者纪录片,在表现手法上往往追求更多的艺术形式,而不完全是真实的生活。无论影视作品本身多么地接近于真实,也不具有彻底的真实性和真实性,所以大多数的影视作品都是对真实事件的改编或虚构。现实生活中,残疾人在求学、就业、婚配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或多或少地遭受到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和嘲弄的言语,他们生活困苦,得不到尊重和善待,久而久之导致产生自卑和自我封闭的心态,不愿意或不能走进健全人的社会,惧怕和他人交往,这才是残疾人真实生活的部分写照。总体而言,残疾人和身体健全的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落差。

这类超现实主义浪漫情怀的影视作品,虽然也立足于真实性来讲解残疾人的事迹,但是由于影视作品本身的艺术内涵等原因,一些真实被掩盖起来,残疾人真正的生活并没有完全被搬上大荧幕,作品

收稿日期:2019-10-20

作者简介:唐海龙(1982—),男,湖北襄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校办公室讲师,研究方向:特殊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中更多的是寻求打动观众的情节点,结局通常也是以主人公走向圆满成功而落幕。优秀的影视作品应该告诉观众:残疾人与一般人本质无异,不需要歧视,不需要过分的怜悯,也不需要盲目崇拜。残疾人的形象既不是悲惨的弱者,也不是身坚不摧的英雄,只是平凡百姓中的一员。过分夸大残疾人的形象和生活,只会导致社会对残疾人的认知出现偏差。

(三) 某些影视作品的异化价值观

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促使了影视文化市场的欣欣向荣,影视作品存在的价值除了向受众展现出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更重要的在于引领正确的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借助影视作品的形式帮助受众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段时间内,影视市场呈现出较为浓重的商品性,不少影视作品是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产生,服务于商品经济,因此其体现出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很多是消极负面的,当然,不少影视作品根植于人文关怀,有思想深度,但是这类有价值的影视作品相比于那些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影视作品,有时缺乏较大的反响,甚至很少被受众所知道,这就是影视作品面临的现实尴尬。这种现实尴尬更加驱使大量商品化影视作品的产生,以残疾人为题材的影视作品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也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商品性。

残疾题材和其他题材的影视作品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残疾题材更加倾向于真实性,旨在教化,不会像其他题材那样过分夸大,渲染喜剧、暴力、性和浪漫,所以残疾影视作品着重讲述的是残疾人平凡的生活和平凡人的形象,若过分渲染残疾人懦弱或者英雄的形象,都会偏离这类影视作品应该具有的真实性。其他题材的影视作品立足于受众的喜好,寻求情节点赢得观众的掌声,有时甚至越偏离现实越容易获得受众的青睐。这就导致了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特殊性,同时对该类作品的要求和审核也会更加严苛。目前影视市场中关于残疾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但不少都被商品化。某些残疾影视作品的出现是为了市场利润,利用部分低俗受众的恶趣味,通过歧视或者过分夸大渲染来吸引受众的目光,从而提高收视率和票房。如果呈现出的残疾人生活和普通人生活无异、完全真实一致的话,就不容易形成影视作品,所以,他们并没有将残疾人真实的生活完全搬上大荧幕,少部分的真实性加上大部分的商品性,就构成了许多残疾影视作品的全部。

如果残疾题材影视作品过度商品化,会导致受众价值观念异化,若创作者更多的是关心收视率和

票房,则会很少在乎残疾影视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消解了残疾人影视作品本身该有的价值意义诉求,这种缺失会对受众价值观念产生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残疾题材影视作品较强的商品性,使得受众仅仅满足物质欲望,不利于其精神世界的满足,导致成为消费主义者和拜物主义者。其次,某些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过度商品性消解了社会中残疾人的现实问题,不利于受众真正地了解残疾人的形象和生活,导致受众不尊重和歧视残疾人现象的出现,加大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阻碍,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某些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过度商品性不利于受众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影视作品中过多掺杂商品化,使得本该表现出的价值观念和商品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晕染受众的精神世界。

(四) 某些影视作品的单维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影视文化市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各种题材的影视作品被搬上了大荧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媒体欣赏到国内外多种形式的影视作品,娱乐生活和精神世界日益丰富。但是,在影视作品繁荣发展的表面下仍然存在着一一些不良问题,其中就包括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批量化和齐一化。影视作品的批量化和齐一化指的是影视作品的创造者在商品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按照一定的行业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影视作品,使得影视作品被打上相同的印记。这类批量化和齐一化的影视作品无论是在表现手法、叙事情节还是传达的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上,都有惊人的相似,机械式的复制抑制了影视文化作品的个性化发展,同时导致受众机械式的被动接受这类影视作品的污染。影视文化市场本该是一个充满艺术和理性的思想圣地,然而批量化和齐一化导致一些影视作品犹如工厂生产出的相同规格的零件,大量涌入消费群体后,这一圣地开始被同质化的工具所充斥,进而影视作品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受众都物化为机械式的工具。这种批量化和齐一化造成影视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由多样性和丰富性转变为单一性和单调性,抑制了受众思想行为的创造性,导致受众思维模式单向、认知领域片面。

以残疾人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批量化和齐一化主要体现在作品叙事情节、表现手法和传达理念上。叙事情节上,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大部分都是按照弱者成长为英雄的人生轨迹来开展,残疾主人公一开

始以懦弱的形象出现,生活和工作过程中受尽常人的欺凌和歧视,经过一些特殊事情的转折,最后成长为坚强的独立自主的人物,都以主人公成功作为圆满结局。故事线索就是“困苦——不得志——振作——成功”的固定模式。另外,在残疾题材影视作品中,普遍存在一个“帮助者”的形象,在主人公遭受身体和心理双重打击的时候,就会有人适当地提供帮助,助其走向成功。表现手法上,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基本都是过度渲染,寻找吸引观众感情的情节节点,利用艺术的感染力烘托作品主题。同时,利用音乐、色调等手法,进一步渲染主人公由苦难走向人生顶峰的励志情怀。传达理念上,残疾题材影视作品普遍传达一种身残志坚的伟人思想,缺乏对人性的深层次挖掘,忽视残疾人既不是需要怜悯的弱者,也不尽是英雄伟人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一些残疾题材影视作品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模式进行复制粘贴,这不仅扼杀了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个性化和创造性,不利于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市场的发展,还会对受众产生消极影响。固定的情节和人物设计,只会造成受众对残疾人片面的认识和了解,导致受众对残疾人形象和文化的单向思维模式,阻碍残健融合。

二、残疾题材影视作品传播策略分析

(一)营造文化环境,提升创作品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2]。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因其切入的角度、针对的对象较为特殊,同时能够彰显人类最为纯朴的感情,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怜悯与共鸣,因此受到编剧者以及导演的关注和青睐。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需求逐步提高,而在快速的经济进程发展中,影视文化的功利化短视化快餐化甚嚣尘上,在影视文化圈中弥漫着一种简单浮躁的气息,商业资本的融入更是推动一些影视文化偏离了其发展的本质,一些影视文化开始为资本服务,导致出现一些低俗的作品。残疾题材本身是一个热点,在这种浮躁的意识文化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的影响。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在叙事的模式上延续优秀的国内外同类型优秀作品的框架,可谓新瓶装旧酒,本质无明显差异。

影视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对社会大众的教育,但如果是在一种功利性文化环境下,教化的作用将被弱化,大众更多的是被逗笑,能够让受众发笑的作品能够热卖,影视作品在创作中没有考虑其艺术本质,既没有教化也没有艺术,呈现这种尴尬的境地与环

境有关也与影视作品创作的角度和方式有关。^[3]残疾题材影视作品本身的切入对象就应是普通人的定位,而一些创作却偏离了对普通人的叙事常规,向英雄致敬。英雄虽能激起情感上的自豪与向往,但却失去了平民意识在大众时代的传播,也失去了影视作品创作品位提升的机会。

优秀的影视文化作品创作后,需要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进行传播。事实上,传播环境是影视文化作品能否被受众所接触所了解的关键,社会观众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文化作品在共同的认同与传播下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而在一个其标准本身就是病态的文化环境中,再优秀的影视作品也无法突破重围。因此,需要传播主体、传播受众能够自主的以净化文化环境为重任,打造一个健康的影视文化传播环境。

(二)加强监管力度,创造良好影视文化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2]。一般而言,可以在主流媒体上进行播放和传播的影视作品都是经过政府审核和批准的,受众出于对政府监管的信任,也会对影视作品有先入为主的信任感。政府作为影视市场监管的主体,应该充分发挥其职能,加强影视题材作品的监管,引入优秀的影视作品,努力为受众创造一个良好的影视文化环境。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监管。

首先,制定和完善影视作品监管的规章制度。由于部分残疾影视作品中充斥着消极负面的思想,对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制定和完善监管制度,更加有效地抵制不良信息的传播。政府先后颁布过不少关于影视作品的规章制度,旨在通过正规的手段发展先进的影视文化,改造消极落后文化,帮助受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保护受众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国外影视业的一些经验表明,建立完善的影视分级制的监管体制,能更好地尊重受众和规范影视市场。影视分级制是建立在影视内容细分的基础之上,能够有针对性地抵制侵害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思想的不良信息。^[4]我国目前的监管制度稍显粗放,注重规定能够播放和限制播放的影视内容,缺乏细化,所以政府对影视作品的监管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其次,加强互联网管理,整顿新媒体传播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

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2]。随着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观看影视作品的主要渠道。良好的互联网环境才能使受众获得积极健康的思想传播,而目前的互联网环境呈现出鱼龙混杂的特点,极大地污染互联网环境。因此,政府应该持续加强管理,整顿新媒体传播,为受众营造一个干净文明的互联网环境;应该引导和优化网络舆论环境,进而加强互联网环境的管理力度。互联网影视市场中活跃着一些意见领袖,他们通过网上影视点评和影视排行榜的方式将影视作品的信息进行二次传播,对其他的影视受众有隐蔽性的教育作用。同时,由于这些意见领袖也是影视受众中的一分子,所以其他影视受众比较容易信任和跟随意见领袖的观点。政府应意识到这些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通过意见领袖引导受众观看优秀的影视作品,抵制不良影视作品的侵害。

最后,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和谐共赢的影视市场秩序。十八大以来,我国影视市场发展势头迅猛,但银幕数量、票价高低和少数盗版影视作品的存在,均影响着正常的影视市场秩序。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制定合适的票价制度、严厉打击盗版市场等手段,加大力度建设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营造一个透明、共赢、公正的影视市场。

(三) 引导受众审美,树立正确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2]。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受众的目光,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从而实现影视作品本身所传达的中心思想和价值观念。但是,不少残疾影视作品传达出的却是不良的思想,污染着受众的精神世界,所以,应该提高受众的审美意识,使受众能够分辨出影视作品的优劣,有选择性地观看符合自己审美需求的、有品质的良心作品。主要应从培育受众影视辨别力和提高受众影视审美水平两个方面来努力。

第一,培育受众的影视辨别力。影视辨别是指受众依靠自己的知识、素养和经验等来区分影视作品的好坏。培育受众的影视辨别力,有助于受众自主地分辨出残疾题材影视作品中的消极思想,有意识地抵制不良思想的污染,从而正确地对待残疾人。培育受众的影视辨别力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丰富受众的人生阅历,增强社会实践。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基本都是根据现实中的真实事件进行改编,来源于生活,具有较为丰富人生阅历的受众,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去判断出作品中哪些是真

实存在的,哪些是过度夸大渲染的,从而有选择性地吸收影视作品中的信息和思想。二是坚持科学的人生观,具备优良的政治素养。某些残疾影视作品中含有不利于社会融合的负面思想,受众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抵制这种负面思想的侵害,才能产生免疫力。同时,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受众才能有意识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和要求。三是受众要学会用辩证思维去评判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优劣。由于教育背景和价值观念不同,受众对于残疾题材影视作品褒贬不一。所以要吸收残疾影视作品中的积极影响,抵制其消极影响,掌握辩证思维,提升受众自身的影视辨别力。

第二,提高受众的影视审美鉴赏水平。残疾题材影视作品良莠不齐,受众要具备较高的审美水平,才能通过影视作品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一是提高对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审美。残疾影视作品内容主要包括思想主题、叙事情节两个方面。思想主题是影视作品的根本,当下的残疾题材影视作品传达的主题思想就是身残志坚,对于贴近事实传达的思想,受众要学会审美鉴赏,而对于一些过度渲染的思想主题,受众要学会抵制。叙事情节体现在有些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只是简单地叙述事情,而忽视内在人性和思想的剖析传达,受众在鉴赏时要将思想主题和叙事情节相结合,理性地评判作品。二是提高受众对残疾影视作品表现手法的审美鉴赏水平。部分偏离残疾人真实生活的影视作品有一个共性,就是利用故事渲染和氛围烘托,引起受众情感的波动。受众要提高对其表现手法的审美鉴赏水平,对于偏离实际的渲染与烘托,要理性对待和鉴赏。

(四) 提高编剧能力,推出精品良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2]。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质量和创作者的综合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具有较高审美和能力的影视创作者能够生产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心作品,相反,只知道一味迎合低俗观众趣味的影视创作者只能创作出不良的影视作品。所以应该提高影视创作者的综合能力,引导创作者树立正确的创作思想,这样才能制作出良心作品,才能完善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增强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创作者的综合能力。

一是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做到思想性和娱乐性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

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2]。当下不少残疾影视作品更倾向于娱乐性、过度渲染性,只有少数能够体现出思想性,并深刻剖析残疾群体的人性。残疾题材影视作品过于思想性就和新闻事件或者纪录片无异,而过于娱乐性就变成了低俗搞笑。只有残疾影视作品的创作者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将影视作品的思想性和娱乐性相统一,既符合大众的审美,又传达出一定的思想内涵,才能创作出精品良作。残疾题材影视作品不同于其他题材,需要平衡大众欲望和主流意识,这对影视创作者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创作者在创作伊始,应清晰知晓受众能通过自己的影视作品得到什么,对残疾群体是尊重还是嘲笑戏弄,是以平常心态和残疾人士交往还是怜悯或者仰视,找准残疾影视作品应该体现的内涵,而后再精雕细琢。

二是树立正确的盈利观,做到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2]。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有时被商品化裹挟,导致部分创作者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一味迎合低俗观众的恶趣味,且将其体现在作品风格、表现手法以及框架结构上。残疾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者如果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抛弃作品该有的社会效益,只会抑制影视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导致受众不理解残疾人,更不懂得去尊重残疾人。残疾影视创作者应该明白单靠低俗、哗众取宠的作品是无法吸引受众的,甚至会遭受有一定文化修养人士的抵制和唾弃,更不可能在影视创作上有较高的造诣,因此,创作者要提高自身的素养,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主要目标,增强自己的社会

责任感和艺术责任感,始终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放在首位,从而提高影视作品的品质。

三是树立正确的受众观,做到引导受众和尊重受众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文艺作品“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2]。一些残疾题材影视作品往往通过模仿或者过分渲染残疾人的形象和生活来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既没有尊重受众,也没有尊重残疾人士,更谈不上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残疾题材影视创作者只有树立正确的受众观,尊重受众的需求、审美和特点,才能创作出贴近受众生活实际和需求的影视作品,引导受众去尊重、帮助残疾人士,而不是依靠低俗来迎合受众的审美。残疾题材影视创作者也只有通过树立正确的创作观、盈利观和受众观,才能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打造出精品良作。

只有在健康的文化发展环境中,优秀的作品才不会为了市场和资本而沉没。相信随着新时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受众文化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未来残疾题材影视文化的发展一定会更加繁荣!

参考文献:

- [1]李炳孝.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EB/OL].(2019-03-11).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311/c40531-30969149.html>.
- [2]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 [3]许人冰.当代影视作品对受众人生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2:43.
- [4]毛园芳.社会文明与社会代价:以残疾人问题为例[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责任编辑 许峻)

Study on the Strategy and Dissemination of Film and TV Shows about Disability in the New Era

TANG Hailong

(School Offic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creative vision of film and TV shows about disability is in a minority, they have general significance to the target audience. By summariz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 contained in films and TV shows about disabilit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optimized strategies, so as to get better communication effects and provide some more splendid cultural works for audien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isability; film and TV shows; dissemination; influence

汉代铺首衔环的造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杨 远,朱畅然

(郑州轻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铺首衔环的造型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众多造型艺术融合而成,经历了西汉早期的初步发展,到西汉中晚期逐渐趋于成熟、稳定,兴盛于新莽和东汉时期,主要呈现出随意与工整、模版化与创造性、夸张与变形的风格特点。其山字形冠主要是神兽的标饰,而兽面主要为驱鬼镇墓而设,所衔之环可能起着避邪的作用,而其整个造型又体现了汉代时期的丧葬习俗、社会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汉代;铺首衔环;造型特征;文化内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2

中图分类号:J52;TS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70-07

汉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成期,考古发掘出土的重要遗存、遗物成为汉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被后世广泛使用的铺首衔环尤为突出,在很多遗物中极其常见,在两汉时期发展到一个极为繁荣时期,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装饰符号,也具有深刻文化意蕴。结合考古发现,对汉代铺首衔环的造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研究,以供相关研究参考。

一、汉代铺首衔环的造型演变

两汉时期的铺首衔环发现以画像石、画像砖上的更为突出,造型也更为丰富多彩,体现出不同时代特点,下面以画像砖、画像石上面的铺首衔环为例,对其造型特征进行分析。

(一)西汉早期

西汉早期是画像砖中铺首衔环发展萌芽期,铺首衔环造型较为简单和质朴。如上蔡县卧龙岗 M2、M7 出土画像砖所见铺首衔环^[1],主要见于阙门武士图像中。阙门武士的画面可分为三部分:上部为武士图像,中部为铺首衔环,下绘重檐式双阙,画面四周饰几何形图案装饰。铺首基本呈方形,头顶三角均呈长方形凸出,兽面模糊不清,下衔一细环,考古报告将其时间推测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二)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

西汉中期的铺首衔环发现较少,造型较简单,基本沿袭了早期的造型特点。南阳县(今并入南阳市)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的铺首衔环^[2],整体造型较小,兽面颊部较尖,同衔环大小一般。山字形冠饰中间一角高于两边,使用凹面阴线刻技法,整体刻画仍较简单。

唐河石灰窑汉画像砖墓中的铺首衔环^[3],铺首面部呈长方形,山字形冠中间一角呈箭头形,三角眼,粗鼻延伸至脸下,衔一细环,其刻画技法与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墓中的铺首相同。

郑县黑庙墓地 M24、M27、M32、M55 中均发现铺首衔环图像^[4]。其中 M24、M55 为线刻,方型脸,圆眼,三角形鼻,下衔一细环,山字形冠中间一角为三角形。M27、32 为横竖衬地纹浅浮雕的雕刻技法,造型特征和前者同。

西汉晚期,铺首衔环的使用急剧增多,造型上多与四神图像结合。河南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中均较常见,以南阳画像石、郑州画像砖所见最具代表性。

南阳市万家园 M244^[5],共有铺首衔环图 4 幅,均为上下组合方式,上有朱雀或白虎,下为铺首衔环,两两对称。以正视图左边第一幅为例,兽头为扁

收稿日期:2019-09-25

基金项目:2019 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汉代传统装饰符号研究——以‘铺首衔环’图案为例”(2019-ZZGH-604)

作者简介:杨远(1975—),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术考古研究。

圆脸,三角眼,山字形冠中间一角高于两边,呈水滴形,张嘴,鼻衔一环。其刻画技法为横竖纹衬地的剔地浅浮雕刻方法。其时代属西汉晚期偏早。

郑州出现一批带有铺首衔环的西汉晚期画像砖墓,较为代表的有郑州新通桥汉墓^[6]、郑州市向阳肥料社汉墓^[7]、密县密新商场汉墓、密县周岗汉墓、新密李唐画像砖墓、新郑山水寨沟画像砖墓等。如李堂画像砖墓^[8],侧立柱、墓门均印有铺首衔环图像。因采用模印技法,所以图像造型相同。墓门图像可分为六层,第一层为龙;第二层为两铺首衔环图像;第三层为山峦禽兽;第四层为并列的五幅双重檐阙,阙上有朱雀,阙下有常青树;第五层为犬逐兔;第六层为常青树图。铺首衔环的刻画较为简单,单线刻画。山字形冠基本平齐,中间角为菱形,三角鼻,张嘴衔一圆环。

从西汉中、晚期画像砖、画像石墓看,铺首衔环多出现在墓门扉砖、石的位置。从铺首衔环组合来看,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多采用上下、上中下的组合方式。上下组合中上为朱雀、白虎等组合的元素;上中下组合中,铺首位于中部,上下为其他组合元素,其组合物像多为白虎、朱雀、青龙、玄武等四神图像,偶尔出现人物图像。画像砖中均为混合式构图方式,没有固定的格式。常见凤阙、常青树等一些模印图像。密县等地的组合元素基本相似,图像较为简单,装饰性元素较多。郑州市区内组合元素较为丰富一些,例如郑州市南仓西街 M2 中的斗虎图、鹄图、鸿雁图等^[9]。

西汉晚期铺首衔环的山字形冠变化更为丰富,根据中间角的不同可分为箭头形、菱形、三角形、水滴形及矩形等几种造型。山字形冠的整体形象基本平齐,偶有中间角高于两边。衔环的方式主要为鼻衔环,或鼻部延伸到脸下的鼻衔环。郑州境内画像砖中的衔环方式多为张嘴衔环或张嘴的鼻衔环,但郟县汉墓中发现有脸部衔环的造型^[10]。

从刻画技法看,西汉中期的画像石中铺首衔环使用凹面阴线刻的雕刻技法,西汉晚期多使用横竖纹衬地的剔地浅浮雕。画像砖中的表现技法多为阴刻印模在半干的空心砖坯表面交错拍印,少部分为平面浮雕加阳线。

(三)新莽时期至东汉初期

新莽到东汉初期是铺首衔环发展的繁荣期,铺首衔环基本呈模版化发展。出土数量逐渐增多,范围分布也扩大。以南阳蒲山 M2^[11]、方城县城关镇汉墓^[12]、洛阳市金谷园村汉墓、禹州新峰 M123^[13]、

永城固上村汉墓^[14]、陕西绥德汉墓^[15]、陕西神木大保当 M11、M23^[16]、沛县栖山 1 号墓等为代表。

南阳蒲山二号汉墓中的铺首衔环,集中在墓门位置,共四幅。均为上下组合方式,上为朱雀、白虎。使用横竖纹衬地的剔地浅浮雕雕刻方法。铺首山字形冠饰中间略低于两边,呈倒心形凸出,兽面为圆脸,圆眼,鼻下衔一环。

洛阳市金谷园村壁画墓中,出现壁画形式的铺首衔环。山字形冠饰基本平齐,中间角呈水滴形凸出。粗鼻延伸至脸下,衔一细环。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墓中的铺首衔环为上中下组合方式,上为朱雀,下为牛,中部刻一铺首衔环。山字形冠中间一角高于两边,呈倒心形凸出。方眼中刻一小眼珠。张嘴露齿,鼻衔一环,鼻部没有明显的刻画。画像石制作方法是在厚 8—10 厘米的石板上墨画轮廓,朱色点染,减底平雕。

沛县栖山 1 号墓中的铺首衔环图,头挡板外壁绘制三重方形,方形内部又被分割为四个方形,分别刻画四幅图像,中间以玉璧图分割。最上面两个小方形内部绘制的是铺首衔环图,图像较小。最下面的方形内部绘制的是两个行拱手礼的人物,右边刻画的是一匹马。

从以上新莽时期至东汉初期的汉代铺首衔环图像中,可以看出豫南、陕北地区画像石组合方式仍为上一时期常见的组合方式,洛阳地区出现位于中部和上部的组合方式,这类组合方式往往没有其他元素的组合。苏北在头挡板位置出现铺首衔环,构图形式为“田”。这时期仍习见白虎、朱雀。东汉时期出现其他神人、祥瑞动物及一些简单的装饰纹样,尤其是南阳地区,出现熊、牛、应龙、羽人、武士等,但常见的仍是白虎、朱雀。苏北地区,出现一些故事题材的组合元素,例如出土于睢宁县九女墩汉墓的侍者献食图,画面上层刻羽人戏凤,下层右方刻一巨大铺首衔环和侍者敬奉食物,其中一侍者面部刻有侧面、正面两个鼻子。其余部分刻纹饰装饰,画面丰富饱满。又例另一幅图,画面上格刻凤凰衔瑞草,下格刻巨大铺首衔环,右下方刻一门吏,空间填以飞鸟、云纹等。应是受到山东地区礼教的影响,在铺首衔环的组合中加入故事题材。河南地区常见剔地浅浮雕空间饰以横竖地纹也对周边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鲁东常用的表现技法为减低平面刻、浅浮雕。苏北常见剔地平面阴线刻、平面浅浮雕的技法。

此外,画像砖开始减少,铺首衔环组合方式仍和上一阶段相似,但组合元素更为丰富,有几何形装饰

纹饰、方相氏图、骑马射鸟图、常青树纹样、边框纹饰等。表现技法为多为平面浅浮雕和阴线刻。例如2004年在禹州新峰墓地 M355^[17]，以斜线纹为边框，框内纹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常青树间立一持笏人物，下部以蟠虺纹为框，中间填以菱纹、水滴纹、柿蒂纹等。框内上部一铺首衔环，铺首造型模糊，大致可看清三字形冠中间一角为长箭头形。

造型特征方面，这个时期的山字形冠饰中间一角呈水滴形、倒心形、箭头形等几种造型，相比上一时期，这时期的角更加规则。山字形冠饰的造型与上一时期基本相似，许昌、陕北等地出现两边平直的角度。铺首衔环的衔环方式呈张嘴的鼻部衔环造型。许昌、郟县等地的环在脸部环绕。苏北及山东地区的环上多系绶带。

山东、许昌等地还出现人面铺首。例如泰安市旧县村发现一块人面铺首画像石，共分四层，第一层刻二鸟交颈，第二层刻二人，面相对。第三层刻一人手中持彗，左一人手中举棍。第四层刻铺首衔环，为铺首人面，宽脸，两尖耳，戴山字形冠，平齐。月牙形眼，直鼻阔口。环只刻上半，铺首周边和口、鼻、眉、环边缘细线阴刻锯齿纹。减地平雕技法，细部用阴线刻出。2012年，许昌十王墓地出土一块封门砖，长条形，分为三个区域，左边刻车马出行图，中部刻一双阙及宫殿，宫殿中饰有拟人化的铺首，右边刻一常青树。铺首五官清晰，细眉小眼，细鼻下一小圆环。

（四）东汉中晚期

东汉的中晚期是铺首衔环发展的式微期。陕北、晋西地区的画像石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以新野县前高庙村汉墓^[18]、南阳市第二化工厂 M21^[19]、新密打虎亭汉墓、浚县贾胡庄汉墓^[20]、临沂白庄汉墓^[21]、山东泰安市汉墓^[22]等为代表。

临沂白庄汉墓共发现4幅铺首衔环。整体造型较为对称，山字形冠饰基本平齐，中间角为不规则的水滴形或三角形。兽头三角眼，粗鼻衔环，环上系绶带。为上下组合方式，上为青龙或白虎，下为铺首衔环，外有五重边框。

山西吕梁离石牛产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山字形冠中间高于两边，中间角呈不规则的水滴状凸出。只有外轮廓的刻画，无细节刻画，拓片效果如同剪影，几乎没有鼻子衔环的刻画，是该地区的一大特色。整个门扉为上下组合方式，上为朱雀，下为衔环。该地区的边框很厚且无装饰。

新密打虎亭的汉代壁画墓中的铺首衔环。铺首衔环山字形冠饰基本平齐，中间角呈箭头形凸出。

粗眉上扬，鼻子短粗，下衔一环，环中饰龙纹。整个门扉都刻有装饰纹样。

综合来看，东汉中晚期的铺首衔环数量逐渐减少，刻画差异较大。有非常精美的，例如新密打虎亭汉墓、后土郭汉墓；也有相对粗糙的，如新野县前高庙村、南阳市第二化工厂21号。东汉中期铺首衔环中的山字形冠的中间角，为箭头型铺首衔环，末期出现三角形、菱形、水滴形等造型。山字形冠饰多为平齐状，偶有中间高于两边和两边平直型。衔环的方式种类更加多样，有铺首张嘴的鼻部衔环、鼻衔环、环被包在脸颊里的鼻衔环、环在脸部；鼻延伸到脸下衔环等，造型众多，晚期的发展较为随意。

画像石的组合方式与上一时期相似，多与朱雀组合，南阳与白虎组合居多，造型元素较单一。但密县两座壁画墓中的铺首衔环造型种类极为丰富，虎、龙纹、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云气纹、鹿、樟、熊、虎、牛、驼、麒麟、羽人骑璋、老人乘驼、力士驯牛等。河南地区仍沿袭了上一时期的表现技法横竖纹衬地的剔地浅浮雕，但多加了阴线勾勒。出现一些更加逼真的高浮雕技法。山东地区则多用平面浅浮雕技法，陕北、晋西仍为高剔地浮雕，是其地域特色。

东汉早期之后，大空心画像砖墓急剧衰落，甚至很少发现，但小砖墓一直存在，但铺首衔环的发现情况较少。

二、铺首衔环的风格特征

整体来看，汉代铺首衔环的造型既有工整规范的，也有随意率性的；既有模版化、程式化，也有不少创新型的造型；既有写实的图像，也有夸张变形的造型特点。

（一）工整与随意

工整与随意是人们对艺术作品两种对立的视觉感受，中国画就有“工笔”与“写意”两种泾渭分明的艺术风格^{[23][129]}。汉代画像中的铺首衔环也有工整与随意之分。

从文化角度看，受楚文化影响较大的南阳地区造型风格较为随意和浪漫。如南阳市万家园发现的铺首衔环，造型随意浪漫，粗犷不羁。而在山东等地，受礼教影响较大，其造型风格就倾向工整和刻板。如诸城市的十字穿壁纹饰铺首衔环图，铺首衔环整齐地刻画在方框中，两重方框中整齐地排列着十字穿壁纹饰。

从石材角度看，南阳地区质地粗糙的石灰石刻画的风格自然会随意一些。四川沙石松脆，无法雕刻精细的线条。采用青石及页岩的晋西、陕北、山

东,刻画会工整一些。

从功能角度看,地位较高、规模宏大的墓室画像形象多工整些。例如密县打虎亭,一座有纪年及墓主人姓名的壁画墓,规模较大,刻画工整细腻。地位低下、构造简单的墓室画像形象则多随意一些。

从设计匠师角度看,“负有盛名、技术成熟的或者是宫廷匠师创造的作品较为工整一些,而民间匠师不受约束的作品则相对随意一些”^[23]¹²⁹。

(二) 模版化与创造性

汉画中的铺首衔环整体来看,呈现出的是模版化,其不仅反映出某一个时代相对稳定的审美理想与审美类型,还标志着该技艺的成熟与总结。

河南南阳新莽时期以后的铺首衔环基本呈模版化发展,山字形冠中间低于两边,兽面为圆脸、圆眼,鼻下衔圆环,很少创新性。这种模版化的特点同样见于晋西、陕北的画像石墓中所见铺首衔环,形制近似,整齐划一。

而苏北、四川等地铺首衔环,造型多变,组合方式不固定,规律性不强,但是艺术风格显得较丰富。从发展的眼光看,模版化是艺术“枷锁”的形成,会对艺术创新起阻碍作用。但是模版化,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美术的造型规律具有重要意义。^[23]¹³³

(三) 夸张与变形

汉画像艺术上的震撼力量,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夸张与变形的艺术处理手法。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故意夸大,比实际住宅门上的铺首衔环要大几倍,这种夸张的造型,使得该图像更具艺术魅力,也被赋予了不同于住宅门上的文化内涵。

四川的铺首衔环造型,多为变形图案,多上肢的刻画及不衔环,失去了铺首本该有的实用功能,甚至装饰功能也失去,仅仅为镇墓所用。四川地区对神话故事的刻画较少,神仙主题的内容不多,因此铺首衔环并不用来升仙,所以铺首的刻画没有神圣感,可能传达的是避邪的功能。

三、铺首衔环的内涵探讨

汉画像中铺首衔环多刻画在墓门中,有一定的装饰功能,也有驱鬼避邪的含义。我们将铺首衔环分为三字形冠、兽面及环三部分组合成的造型。

(一) 山字形冠的内涵

关于山字形冠饰的内涵,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神兽地位的标识。良渚文化的三叉形器是“山字形冠”的雏形,其是为神王特制的随葬品,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淮阴高庄铜器刻纹中的神人头戴的山字形冠,也是神人地位的象征;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太

一将行”图》帛画,不仅体现了神武士的地位,同时对“山字形”冠饰赋予了保佑等功能。由此我们推测汉代兽面衔环“山字形”冠饰也应是其地位的象征,具体来讲应该表明该“兽面”地位身份的特殊性^[24]。

(二) 兽面纹饰的文化内涵

铺首衔环的兽面是由饕餮纹饰演化而来这一结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广泛认同^[25]。根据史料记载,铺首曾被称作椒图。神话故事中,饕餮、椒图分别是龙的两个儿子。从本质上说,椒图和饕餮是两种神话原型,造型上有相似之处,但不能直接将其定义为继承关系。《怀麓堂集》中记载“龙生九子,皆不成龙,各有所好”。从九子的形象来看,从古代文献及文物的对比中发现:椒图,狻猊,狻猊等都是狮的化身^[26]。狻猊的外形和四川带上肢的铺首造型有相似之处;椒图的外观形象似生宅门上的装饰。外形上的椒图和饕餮并没有直接的发展与继承关系。但在画像中,铺首衔环的造型和饕餮纹饰有相似之处,作者推测汉画像中的铺首衔环作为丧葬艺术符号时,加入了饕餮纹饰元素。有学者曾提出:“有可能将饕餮纹饰的变异和演变之后在门上作装饰,但它只是铺首形象中的一种而已。”^[27]

铺首发展到今天,门上多为狮子衔环造型,其与椒图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而画像中为什么没有狮子造型的铺首衔环?根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28]可知狮子属外来进供者。又记:“……于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跟曳锁而走,帝大笑。”^[29]狮子取代虎成为百兽之王在古代广为流传。但这些进贡来的狮子数量极为有限,作为异兽,历史上只供帝王观赏,民间无缘一睹。而虎伤人食畜,百姓只知狮子能食虎,但狮子毕竟是舶来物,可望而不可及,只能寄望狮子制服恶虎。随着时间推移,对狮子的信仰、崇拜在中国广泛传播,逐步演变、进化、完善,成为无所不在的狮膜拜,并人为地给狮子以神化,增加了避邪、镇煞功能。之所以狮文化能在中国影响甚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则起了发扬光大的作用。因此生宅门上使用“狮子”衔环保平安镇宅,墓中使用四不像的兽面衔环驱鬼镇墓,各司其职,也更好地区分了生宅门与墓门的功能。“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左传》),也为汉画像中墓门注入了凶、恶等元素。

我们认为铺首与饕餮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继承与发展,而是发展到两汉时期出现新的丧葬艺术的前

提下,将饕餮纹饰注入汉代丧葬艺术中,使其成为汉代特有的铺首衔环中众多兽头、怪物中的一种,之后随着丧葬艺术石刻的衰落,兽面衔环销声匿迹。而生宅门上的铺首衔环仍然保留了狮头衔环的造型,但广义上,都称作铺首衔环。

(三)环的文化内涵

早期青铜器及生宅门上的衔环都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汉画像中的铺首衔环失去实用价值,主要作为装饰,具有一定的功能性。

铺首衔环下部圆环,形式有些类似现代“牛鼻环”。牛鼻环目的是为了便于驯牛人驯牛,铺首衔环中的圆环也是为了方便人们叩门、拉门,在功能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把铺首穿上环之后,被驯服,要为主人看家护院了。

还有学者认为铺首衔着的环,是《山海经》中操蛇演化而来的。《山海经》中,对山神的描述多有“操蛇”之语。董良敏认为,操蛇图像包括操蛇、珥蛇、践蛇、衔蛇等多种方式,其中衔蛇有避邪的含义^[30],若按此说,铺首衔环也有避邪的功能。神人操蛇图像体现出古人对于吉祥的向往和对于凶恶的辟除心理,用于趋吉避凶的目的。“土伯是地下的主神,土伯吃蛇,就是对于蛇的防御,以防止蛇对尸体的钻扰、侵害。”^[31]对蛇的防御也就是对地下恶鬼的防御,从而引申为一种避邪风俗,因此把蛇衔在嘴里,是对地下鬼怪的防御。

卜友常认为,汉代画像中的铺首所衔之环应是玉璧^[32]。而在其他汉代画像石墓门中,有铺首衔环和铺首衔璧两种,铺首所衔之环,窄者为环,宽者为璧。而这种玉璧的作用应与铺首一样,是用来避邪以保护墓主人尸体的。

苏北发现的韩山 M1、睢宁县官山汉墓、铜山县(今铜山区)凤凰山 M1、铁刹山 M3 均为西汉早期画像石墓,基本图案有“常青树”图案(有的树下悬挂玉璧)、“玉璧”图案、凤鸟图案等。这三种图案应是苏北地区西汉早期汉画像石墓固有的组合模式。玉璧是古代人非常喜欢的一种礼器,它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还有避邪、保存尸体、引领灵魂由此进入仙界的功能。苏北的汉墓中的玉璧多绘制在头挡板的位置,其寓意可能与保存墓主尸体不腐、不被鬼怪侵扰,能够平安“重生”以达到升仙目的。

在河南扶沟吴桥村^[33]、西华东斧柯村^[34]及许昌博物馆的一块馆藏画像砖中,都出现铺首与挂壁图,年代大致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之间。但画像

中的玉璧,均为单独出现,换句话说,基本没有铺首衔璧的图像。早期的玉璧刻画简单,晚期的玉璧装饰有乳钉、绶带,造型与环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我们认为,铺首所衔之“环”与璧不同,但可能有近似的避邪功能。

(四)铺首衔环的文化内涵

据前述,铺首衔环中的“山字形”高冠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历史发展的内涵,不仅是兽头上的一个装饰,还象征了其神兽的地位。铺首衔环多与四神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组合,一般多朱雀在上。洛阳、许昌、徐州、四川等地单独出现较多。铺首中的兽头用其恐怖外形产生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来驱鬼避邪,山字形冠用它神圣的地位象征来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能更好地保证墓主人在升仙的道路上不受其他鬼怪干扰。

厚葬风俗方面,几乎每座被发现的汉画像墓墓门上都刻有铺首衔环。建筑的“门面”如人的“脸面”,其作为一种门上的装饰,象征墓主人身份地位。铺首衔环在生宅门上是有级别之分的,成为封建统治时期专制集权的另一道具。这种象征性的装饰系统也反映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小见大的思想观^[35]。而墓门刻画并没有明确的等级划分,所以往往墓门上铺首衔环要比生宅门上的铺首衔环大很多,虽然极少有实用功能,但仍然能体现该石墓的“排场”。多地区的墓门上铺首与神兽、神人纹饰等组合,让墓主人把生前无法享受的生活,转化为死后享受,可能与“炫耀”孝心的目的有关,也从另一个角度映射出汉人对待丧葬习俗有着迷信、自私、炫耀、孝顺等复杂思想的影响。

神仙信仰方面,罗伟先先生通过考古证明汉画像石是汉代中下层人群的遗存,它所反映的是民间信仰^[36]。在汉代墓葬中出现了较多有关“仙界”的描绘,如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的上端,主要描绘的是九十仙界的场景,说明在两汉时,民间形成了众多关于升仙的信仰与想象。这种民间信奉“升仙”的习俗,在画像中也有很多体现,其中铺首衔环在“升仙”方面的体现,表现技法与造型等都与生宅门上的铺首衔环有着明显的差异,墓门上的铺首形象看起来更加的变形、夸张、恐怖,也更具有狰狞之美,被赋予了“升仙”神话特色。

神话故事方面,死者在生前劳劳碌碌,死后想通过升仙来通往极乐世界享受生活,而门就是进入这种世界最重要的媒介,而铺首衔环是这个重要媒介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将铺首衔环刻画在自己的石墓

墓门上,是墓主人走向升仙道路的开始,是死者与生者大门上的开关,从大门进去就通往极乐世界。因此笔者认为铺首也有着引导升仙的功能。而铺首衔环在墓门上除了是装饰构件,也有作为镇墓兽的作用,具有驱鬼镇墓、避邪作用,保佑墓主人在极乐世界不被打扰,通过刻画铺首衔环来传达人们内心的真实愿望,寄予了人们祈望逝者升仙的热切期盼。

审美观念方面,当设计师在创作画像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意识已经无意识地隐藏在汉画像中,也体现着人们内心审美意识的更迭。墓门的刻画能体现汉代一个地域的人们审美情趣的更迭。体现在铺首衔环上的审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画面的装饰纹样饱满。除了铺首,往往会有一些装饰纹样的伴随,尤其是山东等地区,纹样多而精细。即使单独出现的铺首衔环,如洛阳金谷园壁画墓墓门上的图像,也会在铺首衔环上刻画精美的纹饰增加装饰性。其二,对空间有序安排的“谨毛而失貌”的整体美学观。南阳地区的铺首衔环一般会伴有其他神兽、神人等组合出现,但是并没有因为其他物像的出现,影响主体造型的空间层级的有序安排。其三,铺首衔环作为一种符号的表达,并非是绝对的模仿,而是“必有其质,乃为之文”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美学观。可以看出河南地区铺首衔环在新莽后期虽呈模版式的发展,但如同树上落下的秋叶一般,没有两片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铺首衔环的造型是由中国先秦时期的众多造型艺术融合而成,经历了西汉早期的初步发展,到西汉中晚期逐渐趋于成熟、稳定,兴盛于东汉时期。其艺术风格鲜明,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国传统装饰符号之一。虽然应用至今,但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还是不一样的,具有独特的时代性意蕴。

参考文献:

- [1]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河南上蔡县卧龙岗战国西汉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2005(1).
- [2] 闪修山,刘玉生. 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J]. 中原文物,1982(1):4.
- [3] 赵成甫. 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J]. 文物,1982(5):81.
- [4] 河南省文物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第13号:平顶山黑庙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72.
- [5] 蒋宏杰等. 河南省南阳市万家园汉画像石墓[J]. 中原文物,2010(5):11-16.
- [6] 唐杏煌. 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J]. 文物,1972(10):41-48.

-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市向阳肥料社汉代画像砖墓[J]. 中原文物,1986(4):34-38.
-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博物馆. 河南新密市李堂画像砖墓的发掘[J]. 华夏考古,1998(3):29.
- [9] 安全槐. 郑州市南仓西街两座汉墓的发掘[J]. 华夏考古,1989(4):86-87.
- [10] 王宏伟. 河南郑县黑庙墓地汉代画像石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18(9):53-73.
- [11]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 河南南阳蒲山二号汉画像石墓[J]. 中原文物,1997(4):48-55.
- [12] 高桂云.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J]. 文物,1984(3):38-46.
- [13] 姚军英等. 河南禹州新峰墓地两座汉代画像砖墓[J]. 中原文物,2013(2):4-11.
- [14] 王与刚,周到. 河南永城固上村汉画像石墓[J]. 中原文物,1980(1):37-41.
- [15] 吴兰.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墓[J]. 文物,1983(5):28-32.
- [16] 王炜林等. 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7(9):26-35.
- [17] 姚军英. 河南禹州新峰墓地两座汉代画像砖墓[J]. 中原文物,2013(2):4-11.
- [18]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新野县文化馆. 新野县前高庙村汉画像石墓[J]. 中原文物,1985(3):3-7.
- [19] 张卓远. 南阳市第二化工厂21号画像石墓发掘简报[J]. 中原文物,1993(1):77-81.
- [20] 霍宝臣,司玉庆,高同根. 浚县贾胡庄东汉画像石墓[J]. 中原文物,2000(4):4-9.
- [21] 管恩洁,霍启明,尹世娟. 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J]. 东南文化,1999(6):45-55.
- [22] 程继林. 山东泰安旧县村汉画像石墓[J]. 考古,1988(4):307-313.
- [23] 杨絮飞. 汉画像石造型艺术[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29.
- [24] 杨远,朱畅然. 中国早期“山”字形冠饰研究[J]. 黄河·黄土·黄种人,2018(20):10-16.
- [25] 谭淑琴. 试论汉画中铺首的渊源[J]. 中原文物,1998(4).
- [26] 陈绶祥. 中国的龙[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24-25.
- [27] 常艳. 铺首与饕餮称谓考[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2).
- [28] 尚荣译. 洛阳伽蓝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2:239.
- [29] 朱存明,董良敏. 肖形印“神人操蛇”图像的产生及演变[J]. 中国美术研究,2012(Z1):32-48.
- [30] 孙作云. 美术考古与民俗研究[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130-131.
- [31] 卜友常. 由汉代铺首画像看铺首的流变与功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39-45.
- [32] 吴恒. 徐州汉墓形制与装饰画像变迁研究[D]. 江苏:江

[33]郝万章.扶沟吴桥村发现汉代画像砖[J].中原文物,1984(3):52.

[36]罗伟先.汉墓石刻画像与墓主身份等级研究[J].四川文物,1992(2).

[34]张志华,王富安.西华东斧柯村发现汉代画像砖[J].中原文物,1987(1):2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nimal Face and Ring of Han Dynasty

YANG Yuan, ZHU Changra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shape of the animal face and ring is a fusion of many plastic arts in the pre-Qin period of China. It experience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gradually matured and stabiliz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It flourished in the XinMang and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animal face and ring has features of both casualty and neatness, modularization and creativity, exaggeration and distortion. Its mountain-shaped crown is mainly the ornament of the beast, and the animal face is mainly designed to exorcise ghosts and protect the tombs. The ring may be used as talisman. The overall shape reflects the funeral customs, social beliefs, and aesthetic perspectives of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Han Dynasty; animal face and ring;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nnotation

(上接第 64 页)

戊维新时期的《湘报》为中心[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4):109.

[20]萧永宏.循环日报之版面设置及其演变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沪华文报纸间的影响[J].新闻大学,2011(1):19-26.

[24]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54.

[21]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与《循环日报》的创办[J].历史研究,1990(2):158.

[2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76.

[22]袁新洁.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4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23]陈文联,杨华.晚清报刊对妇女解放话语的构建:以戊

The Political Mediating Function of the Reform and Renewal P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XU Y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 the role of the reform and renewal press in promoting political chan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new media” characteristics. The industrialized technology applied by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enables them to construct a media space beyond reality with rapid and extensive distribution, which expan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alizes extensive dissemination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d promotes the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accumulation required by political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the layout space and expression features of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orm new media messages, which make them build a public platform for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for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s. The emergence of the reformist press promoted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mediatization.

Key words: reform and renewal press; new media; politics mediatization

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 及其对新时代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价值研究

王沛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佩特曼在批判当代民主理论,吸收卢梭等人的参与民主思想,以及援引了工业领域民主参与研究的实证之后,剖析了参与民主的价值和多种功能,思考参与性社会的构建。通过分析佩特曼参与民主理论的价值及存在的不足,提出要吸收其合理成分,以促进新时代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关键词:参与民主理论;基层民主;新时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3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77-04

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 1940—),生于英国,早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欧洲、澳大利亚、美国任教和从事民主、契约和女权主义等领域的研究。1970年,她出版的《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标志着参与民主理论的正式形成。佩特曼在书中批判了自由主义理论,深化了古典民主理论,促进了现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对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佩特曼参与民主理论的来源

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既植根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也来自对卢梭、穆勒、科尔等人政治思想的汲取和对当代民主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参与和“政治效能感”关系的实证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古雅典的城邦民主时期。除了妇女、奴隶、外邦人等没有选举权外,成年男性公民通过投票选举执政官,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近代以来,随着人们公民意识的增强以及对暴民政治的警惕,古典民主逐渐被代议制民主所取代。特别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女权主义等“新左派”运动逐渐兴起,为公民进一步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时代契机。1960年,美国学者考夫曼首次提出了参与民主的概

念,之后佩特曼对参与民主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出版了《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全面地阐述了参与民主理论。

首先,佩特曼吸取了卢梭、穆勒和科尔等人政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卢梭认为,参与民主的首要功能是教育。在参与的过程中,人们相互合作,学会节制私欲,投身于公益事业,不断锻炼实践能力,提升心理素质,从而学会如何“做自己的主人”^{[1]25}。通过参与,人们学会服从法律而非某个人的统治,能够平等地追求个人自由。此外,参与所具有的整合性功能,有助于民众加深对政策的理解,提高接受的能力和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穆勒提出,代议制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其基本功能是广义上的教育功能,即为大众的广泛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保障,这有益于促进“人们知识、道德、实践活动和效率在内的社会精神的进步”^{[2]22-25}。科尔沿袭了卢梭的思想,认为工业组织的目标除了商品生产,更重要的是保障所有成员具有参与和表达的权利,即号召人们充分参与到团体事务的管理中^{[1]34}。这样民众才能认识民主,掌握民主的方法,明确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逐步养成适合大规模管理的民主品性。在卢梭、穆勒、科尔等人理论的基础上,佩特曼认为,研究参与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要分析公民及其所处的环

收稿日期:2019-09-10

作者简介:王沛(1993—),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境和相应的制度,通过“基层社会的民主训练,实现所有人最大程度地参与,并发挥参与教育和整合功能,培养人们在公共活动中所需要的心理品质、民主技能和程序”^{[1]39},提高政治效能感,从而推动参与性社会的构建和发展。

其次,佩特曼批判了当代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面对20世纪初工业社会不断推进、官僚组织日渐庞大,以及魏玛共和国高度的大众参与后来蜕变为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状况,人们对古典民主理论产生了怀疑。在此背景下,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少数精英获得普通大众的选票支持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这一理论得到了贝雷尔森、达尔、萨托利和H·埃克斯坦为代表的当代民主理论家的肯定。对此,佩特曼认为,其一,当代民主理论夸大了选举的效应。按照熊彼特的理论,政治精英通过竞选获取民众的支持,相应地,公民也可以通过投票来牵制其代理人。事实上,佩特曼指出,在下一个选举来临之前,“选民难以‘经常地’控制其领导者”^{[1]5},并且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会淡化此“控制”。其二,当代民主理论弱化了公民参与的地位。在熊彼特看来,民主的典型要素是少数精英的竞选,至于制定政策等行为,选民则是无法胜任的。佩特曼认为,公民参与并非仅仅是选择其代理人,而应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通过较高级别的公民参与,保障民主社会的多元互动与稳定。其三,当代民主理论忽视了参与的多重功能。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参与仅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家独断专行的危害,而参与的教育、整合、提高政治效能感等功能,则被不同程度地弱化。

再次,佩特曼通过研究工业领域参与民主的案例,论述了参与和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佩特曼提出,工业领域的参与活动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而且政治效能感越高,其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越大^{[1]45}。为验证这一观点,佩特曼引用了多位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其一,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揭示出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联系,并且相较于国家层面,人们在地方层面上的政治效能感更高。其二,R·布劳纳通过比较汽车业、纺织业等四种工业环境,认为当工人拥有较多机会参与管理、能够对工作程序和方法实施更多的控制时,有益于激发其创新意识和工作动力,提高政治效能感。另外,佩特曼通过分析梅尔曼、卢因等人的考查,以及格兰西金属公司、基尔马诺克工厂理事会的运作,区分了什么是“假参与”“少量参与”“部分参与”和“充分参与”,认为

低层次的参与能够培育人们的政治效能感,但从民主政治的发展角度来说,更高层次的参与不可或缺。

二、佩特曼参与民主理论的主要内涵

通过分析并吸收卢梭等人的思想和批判当代民主理论,佩特曼梳理了公民参与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重申了参与的地位和功能,并思考了参与性社会的构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古典民主理论。

第一,参与是民主的核心。佩特曼认为,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民的政治参与仅局限于投票选举,看似广泛参与,其实是法律所保障的最低程度的参与。这种以少数政治精英为核心、公民参与为陪衬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民主的核心要素在于公民参与,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公民的直接参与。佩特曼认为,真正的民主应是所有公民直接、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全过程,而非由他人简单地代理。其二,公民的平等参与。佩特曼认为,“政治平等指在决定决策结果上的权力平等”^{[1]39},在政治活动中,人们依据同等的投票权平等地参与,不存在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投票者。其三,公民的广泛参与。佩特曼认为,所有符合法律条件的公民都应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另外,就参与的领域来看,除了在政治层面上全国和地方的政府选举外,还应包括工厂、学校、家庭等广泛的非政府领域。

第二,参与的多重功能和价值。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参与仅限于保护公民自由的功能,佩特曼则主张发挥参与的多种价值。其一,参与的教育功能。佩特曼认为,个体通过参与不同形式的公共活动,不仅能够增强民主所要求的心理品质、技能和程序认知,锻炼参与能力,还能增强民主体制的稳定性,二者相得益彰,相互裨益。其二,参与有助于提升个人的政治效能感。佩特曼认为,参与民主活动能够促进个人及整体的发展,激发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兴趣,降低政治冷漠感,从而培养积极参与、追求知识、关注政治的理性公民。相应地,政治效能感的提高也会提升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和能力,推动参与性社会的构建。其三,参与的整合性价值。佩特曼认为,在公共活动中,个体通过参与,发表各自的看法,领导者对这些建议加以整合,归纳出一个体现民意的结果。一方面,领导者可以广泛听取民意、汇集民智,发扬民主,接受民众监督。另一方面,公众也能更好地理解、接受自己参与制定的政策,增强集体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第三,参与性社会的构建。佩特曼指出,良好的参与性社会的构建,对于人们获得参与决策的机会、选择适当的代表、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以及个人

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参与性社会重视公民的基层参与。佩特曼认为,相较于高层次的活动,普通民众更关心自己所在的社区、村庄、学校等基层领域的事务。当有机会参与基层决策时,民众能够深入地认识、学习公共事务,锻炼参与能力,为民主的实践打好基础。同时,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民众可以循序渐进地了解更高层次的公共事务,进而参与整个社会的管理。其二,参与性社会在工业领域的实践。佩特曼非常重视工业领域的参与,并引用前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例子来说明参与性社会的形成。在南斯拉夫的工厂结构中,由全体工人组成工人委员会,并从中选出执行机构即管理委员会,其职能包括监督厂长、起草生产规划、保障生产任务等,厂长由工人委员会选举产生,并负责企业日常运行。佩特曼认为这种“三权制衡”的结构,保障了工人的高度参与,在形式上是较为民主的,但由于普通工人自身参与能力有限,使得这一参与结构的民主效果并不明显。不过,佩特曼认为,从长远来看,这对于培养工人的参与能力和政治效能感,推进参与性社会的构建,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修正和完善了代议制民主,提升了参与在民主中的地位,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扩展了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内容。但其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赋予参与过高的地位。民主参与固然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但佩特曼过于夸大了参与的作用,似乎随着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所有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其实,参与并非具有如此的神力,关键要依据国情和民情,给予其合理的地位,从而有效地发挥参与的功能和价值。其二,重理论,轻实践。在参与民主理论中,佩特曼较多地梳理和分析了他人的思想和研究成果,而只研究了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用以佐证参与对民主的作用,论证略显单薄。另外,虽然参与的意义重大,但公民应该怎样在社区、工厂等领域进行参与,佩特曼并未具体地阐明,也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参与方法和路线。其三,虽然佩特曼批驳了卢梭的“公意强制下的自由”,但并未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进行相关的论述。概览历史,从“苏格拉底之死”到“希特勒的选任”,假民主之名、行集权专制之实的例子俯拾皆是,人们对于民众高度参与所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充满了恐惧和警惕。佩特曼关注更多的是人们参与不足、政治效能感低这一现象,而忽视了民主可能走向暴民政治这一歧途的倾向,这也是其

理论易受诟病之处。

三、佩特曼参与民主理论对我国新时代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价值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在党的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打造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保障人民享有更多切实的民主权利。十九大以来,我国农村进入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期,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为深化公民参与提供了时代契机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3]32}。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虽有纰漏之处,但其理论对于我国新时代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目前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来看,部分农村和城乡开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村民自治虚化和弱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宗族、黑恶势力干预基层选举、“一言堂”现象突出、村民民主意识淡薄、监督反馈渠道不畅等方面,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和民主建设。因此,要在党的领导下,深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

第一,完善基层“四个民主”,强化参与的制度保障。在民主选举方面,要持续开展“扫黑除恶”的专项行动,打击黑恶势力和宗族势力对基层自治的染指,依法惩处暴力和贿选事件;要落实“一人一票”制,保障选民的法定权利;要考评候选者的人品和能力,公开公正选举。在民主决策方面,要落实“四议两公开”议事程序的每个环节,加强民主评议,推进农村基层事务与财务的透明化,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民主管理方面,要坚持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原则,广泛动员群众,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合法合理合情的村规民约。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核算集体资产,摸清“家底”,推进公正享有。在民主监督方面,要引导民众正当监督,纠正“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打造多样化的民主监督方式,为民众提供方便快捷的监督渠道,同时要发挥村民代表、党员对村干部的监督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的廉政建设。

第二,提高民众的直接参与程度,改善参与质量。在农村日益“空心化”的情况下,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着公民参与程度低、机会少、范围小的问题,因此,要打造充满活力、良性互动的基层群众自治机

制。一方面,要扩大参与的群体,除了既有的符合法定资格的公民外,还要关注妇女、未成年人、残障人士、老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等的民主诉求。另一方面,要提高广大群众、普通党员对村庄日常事务的参与程度,广集民智,形成良好的决策机制。在共同决策中,民众也能更好地理解、接受决策结果,提高参与的成效。在参与机会上,除了“村两委”换届选举“台上一分钟”的机会,更要注重在评议村务、监督财务、乡风建设、生态建设等日常事务上,特别是“村改居”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要激发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和培养群众民主参与的“台下十年功”。在参与范围上,要鼓励、引导群众建立生产合作、民俗交流、公益互助等协会,拓宽参与的范围;要不断推进民生建设,健全农村医疗、养老、住房保障体系,加大教育资源的供给力度,逐步实现农村地区的“十二年义务教育”,为民众参与提供智力支持;要打造热线电话、邮件、微信等多样化的参与途径,创新“线上线下”的参与方式。

第三,打造法治、平等、协商的参与环境。由于“官本位”思想的浸染、“情理法”观念的飞轮效应、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等原因,部分农村基层群众的参与呈现出无序、自私、偏执、情绪甚至暴力化的图景。因此,要在法律的约束和指导下,开展人人平等、有序地参与,而不是混乱的、暴民式的参与,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妥协,培育具备民

主品质和技能的理性公民。在各方携手下,共同营造法治有序、彼此平等、协商交流的参与氛围,推进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规范化、理性化。在参与过程中,基层政府要依托信息技术,协同各类法律人士和组织,普及法律常识,解读法律运作流程,增进民众的法律意识,培养法治思维,推进依法参与、有序参与。要持续开展“两学一做”教育,严厉整治乡村“四风”问题,打击不作为、乱作为、欺压百姓的官僚主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村基层的平等参与。基层政府要督促村委会及时公开村务、财务,通过开展村务评议会、民意听证会、民主议事会等座谈会,加强议事协商,提高透明度,强化权力监督,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夯实协商式民主参与的基础,促进农村基层的良性自治。

参考文献:

- [1] 卡罗尔·佩特曼. 参与和民主理论[M]. 陈尧,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代议制政府[M]. 汪瑄,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Patman'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ory and Its Value to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the New Era

WANG Pei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After criticizing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theory, absorbing th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oughts of Rousseau and others, and cit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y, Patman analyzed the value and various function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consi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icipatory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value and existing deficiencies of Patman'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ory, the paper proposes to extract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this theo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ory; grassroots democracy; new era

林语堂想象中的“文化中国”

潘水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10;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自20世纪以来,林语堂思想价值在中国文坛学界一度出现了诸多争议。事实上,林语堂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研究,特别是他向世界阐明中华民族思想核心意念所体现出来的想象中的“文化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现当代学者的重视与关注。以林语堂想象中的“文化中国”为切入点,考辨、勾勒、阐扬和梳理他的儒道佛耶思想的,以达到对林语堂与现代中华文化复兴的把握。林语堂想象中的“文化中国”图景有如下四大面相:一、合情理的精神: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二、德性:控占着人类的整个心灵;三、尽量图人生之快乐:中国人生活的艺术;四、自足于和平:中国人民的生存之道。期待对林语堂这一补充式的窥察研究,可以为当下人们深入探讨林语堂思想价值张力问题提供某种新的确证与认知。

关键词:林语堂;诗意思想;新时代人文精神建构;中国文化智慧;中华文化自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81-06

鉴照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智慧考察的相关内容,不难看出他对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向世界昭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底色。有论者指出:“林语堂通过文化闲谈、故事讲述、未来想象等路径,操持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生态主义等话语体系,阐发出了正统方式所无法揭橥的历史真相和人文识见。他的传统阐释是多元的、不固定的,这与现代多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环境有关,也是人文阐释的魅力所在。”^{[1]105}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范式表达及文艺思想批评,林语堂今昔渗透且中外镜照般地再现了中国文化真正

的内涵、智慧和价值,并对时代变局更迭且思潮此起彼伏的中国20世纪产生了深刻影响。有论者这样点评:“作为独特书写形式的编译活动是林语堂对编、译、创的会通与整合,其间体现出的‘和谐’的文化观与翻译观,系统、通俗的翻译模式,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的‘中国腔调’,以及对副文本的合理利用,特别是从国内到国际的合作形式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提供了诸多启示并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2]30}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总体上抱持着显著的肯定、领受与认可的态度。20

收稿日期:2019-11-03

基金项目:2018年度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平台项目“民族传统文化自信视野下林语堂与中国新人文精神建构的批判性辩证研究”(序号18);2019—2020年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教改研究课题“新时代职业院校人文素养教育背景下美育在当下教学中的时代诉求与使命肩负研究”(1910105);2018年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信息化发展战略响应条件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2018LXB0026);2018年度全国轻工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重铸新时代新青年精神品格视域下关于加强艺术素养培育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多元教育融合与强化使命担当新视域下加强学生艺术素养培育研究”(2018ZD13);2019年校级科研创新团队的立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美育艺术研究团队”(2019-TD-05);2017年校级科研重点项目“凝聚中华精神”与“助推民族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2017-SZZ-2)

作者简介:潘水萍(1979—),女,广东化州人,博士,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西文论,中西哲学。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及诗意思想在林语堂那里得到认同、赏识及接受。他的书写表达及文艺批评思想,无比有力地开拓、激活并拨动了人们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情感之弦。唐君毅先生曾就“中西文化精神形成之外缘”的问题谈及“中西文化之来源为多元与中国文化之来源为一元”^[3]的理论观念。事实上,坚守中国数千年智慧积累的传统文化基因之根、之魂,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特有的根基。毕竟,唯有最优秀的人类文化精气神,最能滋养人们的身心灵。

一、合情理的精神: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

林语堂作品里“中”与“西”两大文化思想维度之相异或相通的问题,是很值得关注的。他身上突显出来书写文风及文艺思想审美批评,正是林语堂想象中“文化中国”的形象表达。特别是他的著述《给思想一个高度》折射出其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之上全面地考察了中西文化思想的审美特质及其现代的转型性、传承性。实际上林语堂在儒道释基督文化精神里敏感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核心问题——中国文化随手可拈的“近情”精神。林语堂非常有意义地阐述:“哲学本应是最贴近人们的胸怀和事业的物事,但现在倒反而远在千里之外。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型的文化便不是如此的,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如此的。很明显地,现在所需要的似乎是一种需经过改造的思想方式,一种更为富有诗意的思想,方能更稳定地观察生命和观察它的整体。”^[4]³⁵¹⁻³⁵³林语堂直言现代哲学已经成了一种不受欢迎的、形而上的、冷漠麻木、术语连串的乏味学说。关键在于它已经“远离人生”了,不再教导人们予以人生的意义及生活的智慧。这实在是很可悲的。记得尼采说过:“人本身就是现实、真理、自然的一部分。”^[5]²³⁵的确,人人都是自然天地的一部分。林语堂借此所要说的是现代社会在生命精神及生活态度问题上,对思想人性化之近情精神概念在本质上的盲视及疏忽。事实上,林语堂在简述诸如此类危机隐患的背后,进一步阐明了其所提出的关于近情的思想、近情的精神、近情的人、和平的生活等近乎情理问题的哲学观点——即儒道哲学。

林语堂认为合情理的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而合情理的精神则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对林语堂而言,中国文化蕴有的那种近情理的智慧,始终让人有一种亲切之感。以儒道为根基脉理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素来崇尚和合、大同、仁爱、诚信、美善、正义等价值观念。“近情”顾名思义是近乎情理、接近人生。林语堂以“近情”的精神哲思来批驳

现代文明中的冷漠与高傲。由此看来,儒道生命哲思及生活艺术概念对林语堂最基本的诗意思想书写具有更加深刻的学理本源因缘作用。中国近情思想对林语堂审美观念的影响甚深:“希腊文化之理想是‘达才’,故称人生之理想是‘达才’,故称人生之理想为得达其才,中国文化之理论是达情。这达情的境界是难做到的。为什么难做到呢?……人总是矛盾,破碎。谁能抱一,守一,就能一贯。现代人就像一面破镜,原来一物,照到镜里影就乱,或是像一架破琴,发出的是沙沙的哑声。欲音声韵和,必先自身调和。由破碎达到完整,由矛盾达到调和,这就是仁的境界。”^[6]²⁷⁷在这里,林语堂如实地表达出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内涵的理解。同样,这里当然也许能够看出林语堂中西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的出发点。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林语堂在20世纪向西方大力彰显了中国文化内涵及中华文化语境。他以一种跨世界文化视野,前所未有地辨识了具有民族厚重历史感的中国文化精气神的独特存在。在20世纪现代各种文艺思潮的派生、涌现与碰撞中,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普遍直面着自身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文精神等的解构和重建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的是,林语堂颇为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原初语境基因的清晰勾勒和基本内涵意义的思想价值发掘。他认为儒道正统文化精深哲理正是真正东方思想本色的烛照。

二、德性:控占着人类的整个心灵

林语堂想象中的“文化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深深地折射出20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新人文主义精神建构的自觉重视与自主思考。回到自身民族精神文明及文化智慧中找寻中国现代社会新建构的路向,这也许正是20世纪林语堂身上体现出来最为难能可贵的东西。不可不加以注意的是,中国文化蕴有人类灵智的一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内生性演化及开拓性发展,提供从历史“迈向”未来的有益启示。“德性”是体现中国人洞察天宇而探知人生之正统价值、信念、尊严所在。当然,它归根到底也是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意义、生活艺术、人生态度等的集中体现及开启点。更重要的是,儒道人文思想自然流溢着中国文化精神的某种丰富性及独特性。林语堂指出:“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

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恶劣的德性,它们麻痹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性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不是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的,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容受,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以内必须快快活活地过此一生。”^{[7]51}林语堂在这里庄谐并用且自有意趣的文字风格见解背后,集中表达与阐释了中国儒道生命精神之源的新高度。林语堂透过内心的表达,阐明了中国文化的底蕴内涵。最为可贵的是,林语堂较为前瞻地洞见出中国中庸之道归根结底“依然是最优越的哲学”。这是世界上“最合于人情”的哲学。当然,它应该理解为中国儒道积极观念的糅合与调谐。在林语堂看来,人生终归是“百年苦乐半相参”且“人人都是尘世过路的旅客”的。中庸哲学审美内涵恰恰遥相呼应地教会人们理智而美妙地看待人生。林语堂相信且承认获得最快乐的人生与颇为逍遥自在的尘世生活,才是最智慧成功、最清醒裨益且最神性实在的精神观念。这一点倒是人们值得知晓与注意的。

以德性、情味、情理为内涵绪感的中国文化滋养了林语堂有趣而质朴的性情。因而,其诸文的思感旨要也尤为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一种至为调和、谐适与优美的文风格调。中国人晓得把儒道积极的入世思想与消极的出世人生观念相当适当地中和调合起来,这一点使得中华民族能够获得一种最为显著的“和谐的中庸哲学”。这是中国人在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获得的一种和谐人格及生之欢快。这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观念之中可以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且美满”的理想。从思维认知的视角上看,中国中庸哲学固然来源于中华民族所有历史时代命运遭际症候的经验总结及其曾经相当辉煌灿烂的意味书写。这是恶与善、愚昧与文明、封闭与开放、落后与先进、糊涂与清醒、短视与高瞻等等的冲突碰撞背后所熔铸出来的一种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智慧哲学和人生态度。林语堂在《中国人的德性》一文中,层层推进地揭示:“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德性‘Character’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资遵奉的人生

哲理。……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7]38-39}在林语堂看来,中国文化智慧在人们生活时也是十分需要。中国人本身是真正地觉知“生活的艺术”的。林语堂津津乐道的隐逸笔墨充溢着中国哲思中最为风雅放逸的风味气息,最为中国人所爱读。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中国儒道思想(孔孟老庄等)获得了林语堂一以贯之的推崇。他对儒道生命精神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解读,同时也对其所隐含着的生命内在的意义表示出其少有的虔诚敬意。

三、尽量图人生之快乐:中国人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中西文化比较意识很重,他引人注目的书写本身渗透着一种置身于自由之中的那种洋洒豪然之感。当然,他笔下文艺批评思想散发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自信的风味。这是不可否认的。他以儒道思想文本文献作为探讨中华文明特质的依托,在充分挖掘孔孟、老庄原典话语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文化的演进流变对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进行了专门的考究与取证。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文中谈及“日常的娱乐”问题:“人生是残酷,政治是污浊,而商业是卑鄙的,是以依着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下批评,往往是不公正的。……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促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肾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7]284-285}林语堂思想价值在其系列创作文字里得到了坦率的表露与明晓的述略。特别是他那虔诚而达观、轻松而超逸、乐天而恬适、诙谐而快意、清淡而悠然且不失沉稳持重的书写格调,特别是其可谓“无所不谈”且自成一格的笔触,自然而然地彰显并凝集了他一生的文学成就和思想要旨。简单地说,林语堂成果斐然的篇目文字始终蕴有他的“真”、他的“诚”、他的“情”、他的“味”、他的“理”和他的“境”。林语堂内质里是一个有着深沉情感而极富性灵的人,同时也是一位追求自由表达而尤具

志趣的学者。林语堂的文段字句没有任何艰涩抽象的学术用语,没有令人望而生厌的训斥说教,字字句句尽显其超然卓识的诗意思想。

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在贵“和”而持“中”,道家则更是表现在贵“适”持“道”。儒道这种人生美学之意念思感、思维原则之观念内涵及超越世界之理念思辨,实际上深深地浸透、融和在中国国民的身上。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及生命态度,来自儒道释文化精神本源上的影响。作为炎黄子孙,林语堂留学回国执教后曾立志发愿把中华民族文化智慧全部摄纳而融通之,特别是对于中国人生活的态度及人生的理想问题。《生活的艺术》一文对中华民族文化智慧作出了另一种可谓贯通性的解读:“中国的人们都知道生活的艺术。一个文化较晚进的民族,或许是热衷于企求进步,文化老大的民族,天然在人生历程上长了许许多多见识,则但切心于求生活。中国者,以其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文主义使人成为一切事物为中心,而人类幸福为一切知识的最终目的——侧重于生活的艺术,没有什么不自然。……17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作《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至于饱学而富裕的文人,当其计划自己的花园时,有些意境近乎宗教的热情和祠神的虔诚。……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中国人当其神志清明之际,透彻地知道怎样的生活法。生活的艺术对于他们是第二本能和宗教。谁说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便是撒谎。”^{[7]286-303}以上文字论断恰好说明了儒道哲学影响下的中国人生活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之真谛。他无比清晰地揭示了中国人心灵特有的生命镜像及思想内涵。实际上,林语堂对中国人生活艺术所做出的全面讨论与剖析,深刻揭示出中国人生活艺术背后独特的中国思想文化资源与审美经验生成的背景。中国人内心深处所抱持并追求一种实在清醒的尘世生活而疏离一切抽象渺茫、徒然粉饰的虚幻想象。这一点足以见出中国人伟大的心灵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印记与生活艺术取向的经验诉求。

20世纪中国文坛学界极少有人博通中西古今且对中国文化高度自信,这应该是林语堂不同凡响之处。对于中国人的心灵来说,对尘世人生本身持守某种近情合理的生命观念和简单质朴的审美视野,特别是人与“周遭自然的环境和谐相处”,才是人生最大的智慧。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以

一种诗意智慧为本的学问。中国人不仅本能地崇尚简朴、和平和知足的生活,而且是依自然天地规律而生活的。在林语堂眼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比较成熟程度的人生智慧及无穷的生命活力。林语堂认为:“中国有一种优越的生活本能,一种战胜天然之非凡活力,是不可否认的。她已尽量发展其生活之本能,随时局之变迁而适应其自身之经济、政治、社会的环境。假令种机构不及其强韧者处此,要不免于陨灭。她接受了天然恩施,依附其优美的花鸟山谷,资为灵感与道德之营养。”^[7]林语堂这里的分析见地突显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思想价值的标度。以一种较宽广的审美眼光看来,“自然”是中国人理解人生世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范畴,也是中国人知足常乐的一个重要哲思观念根底。人是自然天地的一部分。这种理念一直根植于中国文化精神智慧中。守本分、贵中和、尚简朴、重人伦等中国人卓越的性格特质和较睿智的思想特性,无不突显出人与世界和平共处的理想观念。整体而观之,中国人这种知足常乐的理想生活艺术和本能的生命信任,深刻放射出一种强有力的沉潜体察人生变迁的通感意识。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且影响最巨的爱幼、尊老、敬老、齐家等至简思想观念,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永续无穷的特定人生智慧、价值意识和精神优点。可以说,中国文化智慧给人们提供了日常生活切实所要的。

四、自足于和平:中国人民的生存之道

林语堂在其文艺思想批评中,致力于彰显与再现中国文化哲思中一种最为优越且睿智的东西。特别是中国人闲适的生活艺术与快乐的人生态度中所产生出来的“闲适哲学”。毕竟,它指出了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生存。在林语堂眼中,唯有中国人闲适哲思中的人生观才是真实而有益于人类本身的。无论怎样,中国文化在林语堂的凝想中获得一种更崇高伟大的感觉。在林语堂心目中,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智慧的学问观念、最为崇高的性格特征和最为清醒而高明的人生觉悟。据林语堂看来,中国人普遍都是“天生一半道家主义者和一半儒家主义者”。中庸之道可以称为中国人生活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庸哲学内含有中国人天性上半隐半现的固有的东西。至少,它获得了千万年以来中国人世代生存的本能感应和现实诉求。它实际上在更高层次上对人们是极为有益的。毕竟,它涵纳着人们所热切需要的且不容回避的经验智慧和情怀精神。

在林语堂眼中,中国由来已久的“中庸哲学”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哲学。这是中国思想上最为崇高且最为精明的理想——“适于生存”的哲思智慧

观念。其实,“执两用中”的思想正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天性质素和灵魂表征。它成了中国人正常生活的情感根基。在另一方面,它蕴藏着中国人内在对快乐与幸福人生伏在追求的生活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情”的中庸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中国人内心的温暖和情感的通达。林语堂对中国人灵性情的分析,着实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中国文化智慧的角度思路。林语堂在《中国人民》一文中说:“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7]23}这段文字的考量与阐释,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濡染下的中国人较为温和、近情与中庸的思维意识与情味性格。不可忽视的是,林语堂在20世纪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毕竟,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内涵在林语堂的著述中一再得以充分的释放、概括、理解、界定、拓展和推崇。在林语堂看来,中国文化智慧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使然下的结果。中国文化智慧自然是一种至为实用的常识性的东西,也是一种最感动人心且影响尤大的理论观念。中国文化哲思的话语思维与审美经验,是偏于消遣、闲适、自适、自由、健康、情味、感知、日常与生活的。

在当下,中国文化自信及新人文精神现代建构的问题很重要。林语堂中西文化对照比较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文化思想观念。更准确地说,林语堂立足于“传统”文化如何切入“现代”建构的问题意识,以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智慧及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为起点,将中国传统文化纳入世界视野的话语体系中概述、整合与综观。明白和理解这一点,尤为关键。林语堂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智慧与美妙理想,自始至终是一种对人生实实在在教益的学问。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富含有着中国人的情味气质、眼光思维和艺术态度。中国文化智慧是最大限度地关注并更多的关注与服务于人类日常生活的。的确,把人生过得充实快乐而不枉此行地珍视光阴,使得以投入并享受当下现实生活,终究是中国文化哲思的智慧指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值得引起

关注的。事实上,林语堂着实颇为自觉地给中国哲学下了一精深的解释。林语堂极为清楚而确凿地指出:“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导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而在中国是民族的。”^{[7]48}这里的话语蕴有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智慧的洞见。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看,林语堂的著述里有着较为开阔的中西文化对话意识与比较视野。不仅如此,林语堂从“老子的智慧”到“孔子的智慧”内涵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他追寻“中国文化本色”为主体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肇始,而且也是他启开了20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先河,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其中,“给思想一个高度”以一种鲜明而强烈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彰显与宣示了一种以“儒道”为内核旨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文本解读,建构并确立起一种中西文化总体性观照视野下中国文化自信的自觉表述。

五、结束语

对林语堂想象中的“文化中国”的综观与述略,在大力倡扬中国文化自信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里,具有广阔而又深刻的意义。《赛珍珠序》中有这么一段言简意赅的文字:“一本阐述中国的著作,它的价值足以当得起阐述中国者,不能犯上述任何一点毛病。它必须坦白从宽而无愧,因为真实的中国人是宏伟的人民。宏伟足以坦白而称无愧于其生活言行;它必须敏慧而明达,因为中国人彼此内心的灵悟、敏慧明达过于其他民族;它必须是幽默的;因为幽默是中国人民天生的根性,这机敏、愉快、慈和的根性是基于惨愁的经历和乐天的观念而产生的;它必须用流利恰当而美丽的词句来表现,因为中国人常重视精细和恰当的美。”^{[6]5}其实,对林语堂的看法,有论者这样表述:“林语堂致力于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化,有着‘以我为主’‘中西融通’的文化姿态。”^{[8]33}更是有学者认为“可以说,林语堂的个性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一方面心系人间,与不食人间烟火的深林遁世者不同;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冷静超远看待人生。……这种个性主义一半属于儒家入世的人生观,一半属于道家避世的人生观。”^{[9]41}的确如此,林语堂骨子里一方面欣赏儒家贴近情理的人世哲思智慧;另一方面又颇为赏识道家隐逸放

浪的生活艺术。这一点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林语堂思想理论谱系是一个矛盾杂合体。

林语堂脚踏中西文化比较对照的视角,尝试突破纯文本解读的思辨与批判的惯常考察方式,总体上侧重对老庄、孔孟特定原生态思想语境现象的有益梳理和中华民族智慧的揭示,藉此想望纠偏世人对中国老庄孔孟思想的讹误的理解,最终深入探讨与还原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思想核心体系与现当代乃至未来中国新人文精神建构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的关联问题。可以说,林语堂的创作表达更加坚定了人们传承中国文化的信心。他始终都在清醒地思考一个重要的命题——何谓生生不息而代代相继的中国文化精神及其重要内涵。林语堂想象中的“文化中国”及其对中国文化精髓的解读背后,透露出了他对自身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民族精神之充分认识、肯定、坚守与自信。林语堂的系列著述彰显着他对中国文化的那股更基本、深沉且持久的精气神之无限尊崇、自信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总而言之,林语堂对中西古今文化另辟蹊径的批判,富有创造性地拓展了现代人的文化审美观念。这正是林语堂思想于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更为突出的存在价值意、学术启示和影响意义。对林语堂想象中的“文化中国”的回顾、描绘、梳理与讨论背后,意在反思20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立场的价值

取向与现代学术思路的方向,为现当代中国新人文主义精神的构筑找寻某种伏在的参照与启示。这正是本文撰写的根本初衷与设想所在。

参考文献:

- [1]肖百容,郑少茹.论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3).
- [2]冯智强.“译可译,非常译”:跨文化传播视阈下林语堂编译活动的当代价值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8).
-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4]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 [5]尼采.尼采著作全集(第十三卷,1887—1889年遗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6]林语堂.我站在自由这一边[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
- [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1.
- [8]孟祥春.林语堂古文小品误译与思考[J].上海翻译,2016(10).
- [9]陈漱渝.“相得”与“疏离”: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思考[J].鲁迅研究月刊,1994(12).

(责任编辑 许峻)

Lin Yutang's Imaginary "Cultural China"

PAN Shuip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10, China;

Institute of Taoism and Religious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Lin Yutang's ideological value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It is rare to make a deep insight into Lin Yutang's imaginary "cultural China" issue and to make a realistic speculation. In fact, Lin Yutang's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a and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China" in Lin's imagination,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ore ideas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not been highly valued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How to treat this academic issue is crucial. This article chooses Lin Yutang's imaginary "cultural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sketching, elaboration and combing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in his heart, to grasp the revival of Lin Yuta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Lin Yutang's imaginary "Cultural China" picture ha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the spirit of rationality; the highest ideal of human culture. Second, virtue; the control of entire human mind. Third, trying to figure the joy of life; the art of living in China. Fourth, self-sufficiency in peace; the way of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peopl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supplementary research, we can provide some new confirmation and cognition for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f Lin Yutang's ideological value.

Key words: Lin Yutang; poetry meaning; humanistic spirit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Chinese cultural wisdom; Chinese culture self-confidence

改革开放四十年河南姓氏文化寻根述论

陈建魁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河南的姓氏文化寻根可分为萌发期(1978—1989)、成长期(1990—1999)、发展期(2000—2009)、繁荣期(2010—2019)四个阶段。河南丰富的姓氏文化资源,是河南姓氏文化寻根发展的基础;姓氏文化寻根带动了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了具有特殊背景和意义的寻根经济,也成为河南各地发展姓氏文化的内在动力;河南根亲文化资源的优势,使河南有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的主要承载地。

关键词:姓氏文化;中原寻根;百家姓;根亲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5

中图分类号:G122;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87-04

1978年改革开放后,河南省姓氏文化寻根经历了四十余年时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萌发期(1978—1989)、成长期(1990—1999)、发展期(2000—2009)、繁荣期(2010—2019)。

一、河南姓氏文化寻根之萌发期(1978—1989)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外交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与中国大陆的联系的通畅,许多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到大陆寻根问祖,促进了河南姓氏文化的发展。

同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寻根热潮也带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寻根潮。早在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出版了家史小说《根》,此书风靡一时,寻根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不仅引发了美国黑人到非洲的寻根,也牵动了海外华人心中叶落归根的情结。1978年,台湾举办了《根——台湾的过去和现在》的展览,出版了《五百年前是一家》,还拍摄了电影《源》,展示了

民族魂、中国根。1981年春,厦门大学教授黄典诚到河南进行语言学考察,寻找闽南语的根,并在4月22日的《河南日报》上发表了《寻根母语到中原》的文章,称“河洛中原是故山,永嘉之乱入闽南”,指出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此文对中原寻根具有里程碑意义,引起了较大反响。

姓氏寻根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课题,从一开始就呈现了海外与国内、政府与民间等的互动,而媒体、社团等则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寻根,首先在福建和广东,以姓氏为缘到河南寻根,较早的是方姓和郑姓。

1982年,香港实业家方润华致函河南省省长戴苏理,不仅要寻找方姓的祖根,也建议河南要派出巡回大使到东南亚去宣传河南的根文化。方先生多次到河南寻根,并成为河南省禹州市荣誉市民和河南省许昌市荣誉市民。

而郑氏到祖地荥阳的寻根则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九十年代初达到顶点,其标志便是规模庞大的全球郑姓祭祖盛会在郑姓祖根地荥阳的召开。

1992年12月7—9日,“世界郑氏宗亲荥阳祭祖

收稿日期:2019-10-1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家族史研究”(2016BLS006)

作者简介:陈建魁(1965—),男,河南荥阳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方向:先秦史及家族文化。

大会”在荥阳举行。参加大会的有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郑氏宗亲 173 人，另有来自福建、浙江、广东、北京等省市的代表。

1994 年 9 月 7—9 日，荥阳召开了纪念郑桓公受封立国 2800 周年大会，参加会议者 1000 余人，其中来自美国、泰国、加拿大、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郑氏宗亲 413 人，来自国内沿海地区闽、浙、粤、苏、鲁、赣等省的郑氏宗亲 776 人。

1992 与 1994 年海外郑氏族人大规模到河南荥阳寻根，树起了河南寻根的一面大旗，在河南海外姓氏寻根上占有突出地位。

这波寻根潮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

中国的姓氏一般由父系代代相传，而且中国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传统，使探索中国家族的遗传密码成为可能。而且，20 世纪 80 年代，电子计算机的逐渐普及为我国当时各姓人口的统计带来了方便。1986 年到 1989 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文字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 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别进行抽样统计，得出了中国 100 大姓排名，前 10 个大姓都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只是排列顺序有所不同。在这三种抽样统计中，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抽查影响最大，当时被称为新《百家姓》，在 1986 年 5 月公布。这 100 个姓氏共占全国人口的 87%，其中前 5 大姓李、王、张、刘、陈分别占汉族人口的 7.9%、7.4%、7.1%、5.4%、4.5%。列在 5 大姓之后的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这 14 姓的人口也都占全国人口的 1% 以上。姓这 19 个大姓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55.6%。

由于新《百家姓》是按人口数量排列的，这种排名机制引发了中国人对自己姓氏排名的兴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当时的姓氏文化研究，扩大了姓氏文化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为盘点河南姓氏文化资源在全国的历史地位打下了根基。

二、河南姓氏文化寻根之成长期(1990—1999)

浓浓的血脉亲情温熟了中原寻根之旅。有学者称，8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初是河南寻根的第一个高潮。

除前面提到的方姓和郑姓外，90 年代初，邓、谢、钟、南、许、林、尹、柯、蔡、江、廖、叶等姓氏的海外华人，陆续到河南寻根。规模较大者有：

1991 年，全欧客属崇正总会共 245 人到河南寻根，此举拉开了海外客家人集体到河南寻根的序幕。

1992 年 5 月，台湾陈氏宗亲总会代表陈延厚先

生一行到河南寻根谒祖。

1993 年，海内外林氏第一次组团到林氏太始祖比干的墓葬地河南卫辉。一行 527 人，当场捐出 500 万元。

1995 年 10 月，新加坡、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陈氏宗亲 334 人，到河南省淮阳县参加了陈胡公诞辰 3145 周年纪念活动。

90 年代末与新世纪初河南寻根掀起第二个高潮。一种文化流行起来了，随之便是这种文化产业的兴起。其实，1992 年 12 月，荥阳举行的“世界郑氏宗亲 92 荥阳祭祖大会”，河南即首次以“根”文化搭建招商引资桥梁。自 90 年代以后，李、张、刘、陈、郑、谢、许、宋、林、蔡、钟、叶、南、韩、赖、詹、黄、方、牛、温、禹、千、范、邱、尹、柯等姓氏都组团到河南寻根，并出现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潮流。1998 年，郑源实业公司在郑州举办“首届郑源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吸引了 10 余个国家与地区的郑氏宗亲参加，签约总额达 14.2 亿元人民币，这种单姓经贸会的举办为河南首创；1999 年，在长葛举办了“世界舜裔联谊会第 13 届国际大会”，姓氏全球盛会在河南举行，尚属首次；2001 年，在印尼华侨宋良浩屡次无偿捐助商丘教育的启迪下，商丘创办了戴氏工业园区，这种情况亦为首创。

在这股寻根热潮的带动下，黄河边上炎黄二帝巨像基础工程也于 1994 年开工建设。

在这一阶段，河南多地市都有恳亲活动展开，一方面海外来寻根，另一方面河南祖地的人主动出去找亲戚。姓氏文化、根文化不仅增强了文化归属感和向心力，还能够给地方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著书立说是文化热潮的另一种形式。1994 年 12 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作者主编的《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一书，此书是河南乃至国内第一部大部头的姓氏文化研究专著。这部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参加者数十人，本书的编写，培育了河南第一批姓氏文化较为专业的研究者，此后相当长时段内，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成为河南姓氏文化研究的两个中心。同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家姓寻根探秘”丛书、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夏姓氏丛书、气象出版社出版的“大姓寻根与取名”丛书、天津出版社出版的百家姓书系等，河南作者成为全国姓氏研究著作编撰主力军。姓氏文化研究也渐臻高潮，有学者统计，在“当今中国 100 大姓中，有 73 姓源于河南或有一支源头在河南，另有 7 姓望于河南或其起源与河南密切相关；前 5 大姓中，李、张、陈均出自河南，王姓最早的一支及刘姓

最主要的源头也都在河南。”“除李、王、张、刘、陈5大姓外,还有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14姓,均各占汉族人口的1%以上。姓这19个大姓的加起来的总人口,约占汉族人白的55.6%,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使用这些姓氏。而在后14姓中,有10姓源于河南或有一支源头在河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海内多数华人的祖根大都在今河南。”^[1]

而河南教育出版社(后改为大象出版社)创办于1994年的《寻根》杂志,开辟了寻根寄语、寻根专题、百家纵横、民俗志、东西风、寻根扫描、名门望族等姓氏文化栏目,对推动河南的姓氏文化研究起到很大作用。与此同步,1992年3月,河南省成立了中原族史学术委员会,这是河南第一个研究姓氏文化的综合性学术团体。1995年,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通过这个学会,来自地方志、高校、科研单位等姓氏寻根团队初步建立。

三、河南姓氏文化研究与寻根之发展期(2000—2009)

21世纪初,全国出版界掀起了一波姓氏书出版热潮,河南作者是主力部队。2000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姓氏文化研究会,挂靠在历史研究所。后又在中心下面设立谢氏文史研究中心和陈氏文史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陈氏文化研究会暨新郑陈氏三宰相学术研讨会。这两次学术研讨会开研究部门主导姓氏文化研究会之先河。在2002年4月11日至14日召开的河南省第二届国际陈氏文化研究会暨新郑陈氏三宰相研讨会上,美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内各省市3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收到专家、学者有关陈姓的论文70多篇。

200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联合编纂的大型姓氏文化专著《中华姓氏河南寻根》,作者队伍数十人。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明确要求涉及河南省有关姓氏祖地和名人里籍的争议,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统一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和认定。因此在2009年,“河南省姓氏祖地与名人里籍研究认定中心”正式成立。

寻根热带动了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交流发展,由此产生了具有特殊背景和意义的寻根经济。由于有相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认同,通过举办寻根文化活动,形成了通过文化交流带动经济发展的好局面,不少海内外华人通过寻根祭祖活动加深了对祖国大陆和故乡的了解,并积极为故乡投资效力。

2004年世界刘氏第四届(寻根)联谊大会在平顶山举行,2005年世界张氏总会第二届恳亲大会在濮阳举行,2006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第19届国际大会在濮阳举行,等等,这些活动极大地提升了河南寻根的档次。2006年、2007年,连续举办了两届高规格的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2007年在黄河岸边矗立的炎黄二帝巨塑的落成,均将河南寻根的活动推向高潮。可以说,河南的根文化,已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重要纽带。

21世纪初,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在全国依然大行其道。同时,专家与媒体的结合成为姓氏文化热潮的突出表现。2003年初,中央电视台10频道开始播出《百家姓》文化专题节目,共15集,创作议案是河南学者王大良提供的。参加节目撰稿和录制的河南作者也占半数。2005年春节,大河报社策划和组织了“大河报发行百万邀百家姓百业人商都过大年”活动。2006年春节,为扩大影响,大河报社又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策划和组织了“2006新百家姓商都大团圆”活动,《大河报》拿出十几个版面,对河南各地市的根文化资源进行了盘点,极大地点燃了民间对姓氏文化的热情,对河南的姓氏文化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06年,中国科学院学者公布新《百家姓》;2007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也根据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分析,排出了新的《百家姓》。稍后,《大河报》2007年9月15日,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公布了河南《百家姓》。全社会对姓氏文化的关注,致使姓氏文化节会盛行一时。当时河南有多种重大节庆活动,2006年后,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郑州公祭炎黄二帝活动、周口姓氏文化节相继被定为省级节会,寻根活动得到空前重视。

四、河南姓氏文化寻根之繁荣期(2010—2018)

随着姓氏文化的普及,河南卫视2012年推出大型姓氏文化电视栏目“知根知底”。“知根知底”以解读姓氏文化、弘扬寻根文化、传承家族文化为核心,每期节目分为“寻根问底”“自说家事”“百姓追击”和“真假后人”四个环节。这个栏目共播79期,涉及100多个姓氏。河南卫视的《知根知底》栏目的编采模式,为其他省的姓氏文化栏目部分借用,如2015年安徽卫视开播的大型姓氏文化寻根节目《中华百家姓》、2015年山西卫视制作的大型姓氏揭秘互动脱口秀节目《你贵姓》。

同时,河南形象广告突出“老家河南”的定位,拍摄了《壮美中原,老家河南》《记忆中原,老家河南》《大美中原,老家河南》《豫见中国,老家河南》广

告片,使“老家河南”在海外华人的心中已经成为一个魂牵梦绕的向往。

河南姓氏文化繁荣的表现之一是“根亲文化”概念的提出。2008年河南信阳在多年的实践中提出了“根亲文化”。2010年以后,根亲文化成为河南姓氏文化的代名词,而陕西的姓氏文化多用祖根文化的概念,山西姓氏文化则多用根祖文化概念。

这一时期,姓氏文化研究更加深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与社会和地方合作,召开过多次全国性的关于姓氏文化的学术研讨会,编辑了“河南历史与考古研究丛书”多种,如:《颛顼帝誉与华夏文明》《鹿邑与中华李姓之根》《比干文化研究》《武王伐纣 宁氏源流:获嘉历史文化论丛》《葛天氏与上古文明》《共工氏与中华龚姓》《登封与大禹文化》《柏皇氏与中华柏姓》等,由出版社正式出版,扩大了河南姓氏文化的影响。

这一阶段,姓氏文化节会通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固始根亲文化节、新郑黄帝拜祖大典为代表的高规格节会。同时,姓氏社团的发展表明了河南姓氏文化寻根的广泛和普及。2009年5月,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更名为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通过十年的发展,成为在全省颇具活力的社团。2010年初,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仅有7个二级分会,到2019年6月,已发展到92个分支机构、7个团体会员,成为全国姓氏文化社团中分会最多、规模最大的社团组织。

姓氏文化寻根繁荣的标志,还在于姓氏文化进入国家和省重大项目规划。2012年国务院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提出把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需要“挖掘中原历史文化资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升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影响力,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2016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提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发挥中原根亲文化资源优势,开展寻根拜祖文化活动,发展根亲文化主题旅游,建设根亲文化主题基地,确立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使河南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的主要承载地”。

我们相信,河南姓氏文化寻根会越来越辉煌。

参考文献:

- [1]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华姓氏河南寻根[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 [2] 袁义达. 中国姓氏对传统文化和血缘寻根的影响[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
- [3] 张新斌. 根亲文化的讨论与思考[J]. 中原文化研究,2014(2).
- [4] 陈建魁. 洛阳学与地方学研究[J]. 中州学刊,2016(12).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Roots of Henan Surnames Culture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EN Jianku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oot-seeking of Henan surname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germination (1978—1989), growth (1990—1999), development (2000—2009), and prosperity (2010—2019). The abundant Henan surnames cultural resources are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enan surnames culture province, which have led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us giving rise to the root-seeking economy with special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It has also becom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nan surname culture. The advantages of Henan root-related culture make Henan to possibly become a main spiritual hom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surnames culture; root-seeking in Central Plain; a hundred family surnames; root-related culture

基于《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开展思政教育的几点认识

苏 炜,汪 菁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课程思政以课程为载体,发挥课程内在价值对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相互支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证明,依托课程内容开发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是做好课程思政的基础,培养一支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教师队伍是保证,要加强对课程思政的领导与管理,重视课程思政的大纲与教材建设。

关键词: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91-05

高校的根本目的是育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问题。在具体实践中,怎样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和有力人才支撑,既是一项深远的战略任务,又是一项紧迫的现实工作。

面对国际与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西方文化思潮、价值观对青年学生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带来的就业、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也给青年学生的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有的青年学生价值取向扭曲、理想信念模糊、政治信仰迷茫,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团结协作观念和心理素质不佳。这些问题对高校如何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保证。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使命担当,听党话跟党走,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集体主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观念,提高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培养青年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一、课程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高校普遍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作用,取得了很好的育人效果,但也存在需改进的地方,要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要改进课程形式单一、教育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不断丰富教材内容,提高课程的鲜活性和对学生的吸引力,真正做到入脑入心。

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课程思政是“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一种有效形式。“课程思政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知识、经验或活动过程中”^{[1][1]}，“课程思政作为重要抓手,引导学生在课堂

收稿日期:2019-11-10

作者简介:苏炜(1962—),男,吉林长春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长期从事高校课程思政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和教学。

中不仅学到知识技能,而且学会做人做事,重视对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塑造,使课堂教学的过程成为引导学生学习知识、锤炼心志及养成品性的过程,充分体现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从而将‘两张皮’真正变为‘一张皮’,实现育人效果最大化。”^[11]

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核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课程思政是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有效途径,结合不同课程的内在价值对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使各类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同向同行,形成相互支撑,产生协同效应,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立德树人落到实处。

二、课程是课程思政的载体

《土木工程概论》^[2]课程一般开设在大学第一学期,是土木工程类专业的概论课程,主要包括土木工程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土木工程的发展与成就、土木工程的技术活动、土木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与素质、能力等内容。以《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为基础,紧密结合课程内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四个自信”,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等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土木工程发展史的育人价值

1. 土木工程发展史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土木工程是关于各类土建工程设施建造的科学技术的统称,一是包括建筑工程、道路工程、铁路工程、桥梁工程、港口工程等与人类生活、生产活动有关的各类工程设施,再是指为建造这类工程设施所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检测和维修等工程技术活动,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而发展进步,受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资源等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充分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进步的状况。

(1)古代土木工程

古代土木工程一般是指约公元前5000年到17世纪中叶,跨度6000余年。这个时期我国土木工程成就斐然,有一大批人类文明的代表性工程。如西安半坡村遗址中的人类早期建筑遗迹,分析认为是直径为5—6m的土墙圆形房屋,土墙内夹有竖向木柱,用以支撑用作屋顶龙骨的密排树枝,树枝上覆盖茅草;经千余年尚能正常使用的河北赵州桥,为敞肩式单孔圆弧弓形石拱桥,拱肩上设有四个小孔,用以减轻桥体自重、排泄洪水、增加美感,无论功能、艺术造型还是结构和受力都可谓古代土木工程的巅峰之作;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四川都江堰水利枢纽,为无坝引水工程,灌溉面积一千多万亩,其设计原理在今

天也是十分合理、非常巧妙的;还有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山西应县木塔等杰出的工程以及青铜枋木房屋框架和斗拱等建筑结构。

在古代土木工程时期,西方也有一大批优秀的土木工程项目,如埃及帝王墓建筑群、土耳其索菲亚大教堂、意大利比萨教堂、法国巴黎圣母院等。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些对土木工程的经验总结和形象描述的著作,如我国公元前的《考工记》和北宋时期的《营造法式》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论建筑》等。

(2)近代土木工程

近代土木工程一般是指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跨度约300年。这个时期,西方以数学和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取得了突破性进步,土木工程有力学与结构理论作为指导,混凝土、钢材、钢筋混凝土及早期预应力混凝土得到发展,以电梯为代表的机械技术在土木工程中得以应用,使西方土木工程产生了巨大进展,产生了一大批以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技术为基础的土木工程项目。如美国芝加哥11层住宅保险大楼,英国建设了世界第一条铁路和世界第一条地铁以及不同结构形式的金属桥梁,德国建成了3860km长的高速公路网,美国和日本的土木工程抗震技术逐渐成熟。中国在20世纪初建设了京张铁路,解决了列车爬上33.3‰坡度的世界难题。

2. 土木工程发展史带来的启迪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帮助我们看清过去,弄清楚事物的脉络。结合土木工程古代和近代的发展,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和思考一些问题。

(1)从土木工程发展史的视角认识中国历史,增加文化自信

土木工程是人类利用材料等资源,经勘测、设计、施工等多种技术活动的结果。土木工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证。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有伟大的古代文明,形成了数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包括建筑技术在内的中国古代技术和发明,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被描述为“3—13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国古代土木工程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巨大贡献的代表。“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科技有过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3]9}。通过土木工程发展史的学习,能增强学生对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2) 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近代土木工程技术落后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落后的具体表现。“近现代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西方国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了。”^[39]张雁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与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展望》一文中,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国情以及重工匠和实用技术,轻科学实验、理论研究的科学传统,是制约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透过中国从古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到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现象,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事实,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想,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形态更替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深刻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充分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3)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詹天佑先生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界的先驱,在他的领导下修建了代表当时先进科技水平的京张铁路,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人民和古代科学家、工程师的伟大精神传统和创新才能,为深受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

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有一大批以李四光、邓稼先、钱学森、于敏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为祖国的强盛奉献了毕生精力,还有一大批以“时代楷模”等称号为代表的新时代先锋群体,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工作中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爱国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青年学生要把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对国家尽责、对工作负责上,把个人发展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把爱国落实到具体的学习和工作中,实现在务实的行动上。

(4) 通过建筑艺术提高美学素养

美育重在熏陶,以建筑为代表的土木工程艺术是实用艺术之一,直接对人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有着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对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建筑艺术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净化、升华心灵,充实精神世界,培养高尚情操,扩大视野和胸怀。

(二)今天的土木工程建设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

各项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今天我国土木工程取得了重大突破,建设了一大批代表现代人类文明的伟大工程,如建设难度极大的港珠澳大桥采用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突破了国外技术壁垒,填补了多个领域技术空白,获得了超过400项的专利。还有以三峡水电站为代表的中国水利、以上海金融中心为代表的中国建筑、以上海洋山深水港为代表的中国港口,以及营运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三分之二的中国高铁。这些土木工程成就是当今世界先进土木工程技术的代表,是在大量的科学技术突破基础上实现的,蕴含着诸多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是中国先进技术和先进制造的具体体现。

我国土木工程发展经历了从近代的落后到今天的崛起并影响着世界土木工程技术的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发展的缩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00多年,中国处于一个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之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国家一贫如洗,人民生活困难。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奋斗,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很好地引导学生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新中国为什么能成功。结合我国今天的土木工程发展成就,用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事实可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土木工程的发展前景,激发青年一代坚定使命担当和创新创造精神

人类离不开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在未来将向更高更深更快的方向发展。更高是利用超高层大型建筑在有限的土地上求得更多的使用空间,更深是大力发展地下空间、海洋空间,建设地下城市、海中城市,更快是利用磁悬浮列车系统和真空隧道系统等快速交通工具缩短空间距离,还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绿色建筑,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到土木工程的生产与管理全过程。土木工程未来的发展对土木工程材料、结构理论、施工技术、管理理念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土木工程未来发展前景的实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密不可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各项发展的保障。美好的愿景不会自己到来,也不会轻而易举实现,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努力拼搏,社会才能不断发

展。青年学生要有责任担当意识,勇于担起发展大任。

习近平总书记给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回信中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青年学生要牢固树立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社会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影响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创新创造是青年一代的责任,当代青年要发扬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在创新创造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科学技术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学习,打好基本功,培养严谨的作风、科学的态度,锤炼坚强的意志品质、坚韧不拔的心理素质和勇于争先的进取精神。

(四)土木工程培养大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土木工程的发展过程是同如地震、海啸、火山、台风、冻害、滑坡、泥石流、洪水等自然条件,以及战争灾害、恐怖事件、人为破坏生态平衡、工程事故灾害等人为灾难抗争的过程。土木工程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有投资大、不可移动、对社会经济影响显著等特征。土木工程灾害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经济损失,还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甚至社会动荡。

土木工程灾害事故时刻提醒学生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培养“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担负起保护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增强法纪观念,做到知法、懂法、守法,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担负起社会责任。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可以进一步将课程中松散存在的思政元素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人文审美等主线串联,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构建《土木工程概论》课的课程思政体系。

三、课程思政重在建设与管理

课程思政能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既传授知识,又教书育人的作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原则性,应从课程开发、大纲建设、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上下功夫,注重谋划,开发在先,将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在授课中育人。

(一)加强大纲建设

课程思政应结合课程的内在价值,把课堂和实践等教学环节的课程思政教学纳入教学大纲。

明确课程思政教育原则与要点,围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等主题开展课程思政,避免实际教学中的随意联想发挥,甚至出现错误。

根据专业课程体系整体规划,以课程安排顺序为依据,建立以课程体系为依托的课程思政主题计划,提高课程思政主题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形成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避免不同课程思政主题的过多重复,影响育人效果。

根据课程性质确定思政主题,“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要注重政治导向,挖掘政治文化的育人价值;自然科学课程要挖掘其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重点强化创新意识、科学素养、生态文明和工匠精神教育;应用技能型工科课程实践环节较多,可以通过整合教育实践资源,探讨有效的实践活动形式来挖掘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如自然科学可能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等,有些课程适合时事政策等”^{[1]14}。避免忽视课程性质开发思政主题,既影响授课质量,又无法取得应有的育人效果。

根据课程内容规范思政内容,注意课程内容与思政主题的有机结合。在一门课程中重点突出几个思政要点,做到主题明确,有的放矢,引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共鸣和认同感。避免面面俱到的碎片化和生搬硬套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坚持实事求是、逐步实施的原则,在尝试中推进,在改进中提高。避免形式主义、跟风走过场。

(二)加强教材建设

课程思政的教材建设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要以课程为载体,坚持课程思政服从于课程教材的原则,借助思政元素把思政内容有机融入课程教材。课程思政教材的内容与形式要突出灵活性,对类似《土木工程概论》等课程,可以直接尝试把思政内容加入教材内容当中,成为教材内容的一部分,形成有机整体。对于系统性很强的自然科学课程,可以在章节后面增加思政主题,引导学生结合课程理解、思考和认识思政内容。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授课教师是课程思政的主体,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勇于担当的教师队伍是做好课程思政的保证。打铁必须自身硬,要加强授课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广大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严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忠诚教育事业,成为“四有”教师,献身教育事业。自觉担负起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使命,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育教师人格魅力。教师应在各方面做到为人师表,热爱学生,尊重、理解学生,用自己的言行影响教育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课程思政教学中,任课教师应积极参与课程思政教学计划的制定,主动开发课程的思政主题,认真备好课程思政课,结合相关内容充实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做好知识积累,做到理直气壮地讲,耐心细致地引导,在自己真学真信真教的基础上,使课程思政达到入学生的脑、入学生的心效果。

(四)加强课程思政工作的领导与管理

课程思政是高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高校党委要加强领导,统筹全局,学校相关部门要明确任务责任,落细做实。高校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课程思政,带头走进课堂听课、授课,形成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浓厚氛围。

高校党委宣传部要管理到位,落实管理责任,严把意识形态关。建立课程思政管理机制,组建由党务工作者、学生工作人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等组成的课程思政专家组,加强对课程思政大纲的指导和课程思政内容的审核,做到授课过程有检查,育人效果有检验。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定期对授课教师进行培训,使教师及时掌握形势与政策,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教务部门要把课程思政纳入教学管理,加强课程思政教学大纲标准建设,推进课程思政进教材,做

好课程思政教材建设的试点、示范和推广,开发一批较为成熟的课程思政系列教材。将课程思政纳入教学评价体系,探索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把教学效果与课程思政教学综合考核,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推广课程思政覆盖面,在实践教学环节中思政育人,使学生在实践教学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支撑作用,需协助做好课程思政的规划、开发和实施,以及授课教师的备课和培训等工作。

四、结语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可以发挥很好的价值引领作用。结合土木工程课程内容,可以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培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实现教书育人。实践证明,课程思政是一种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是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有效途径,需在及时总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提高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

参考文献:

- [1] 邱伟光. 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7): 10-14.
- [2] 熊辉主编. 土木工程概论[M].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 [3] 张雁.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与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展望[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02(2): 8-1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View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Based o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SU Wei, WANG Ji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as the chief means of college-lev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carried out during the time period of individual courses, aims at enhanc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each individual course. Thu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as an effective t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based o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designing the specific political training the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course conten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goo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It is imperative to train a team of teaching staff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olitical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Good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i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should be enhanced, and emphasis should also be put on syllabus design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Key words: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路径研究

和 伟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不仅仅是靠大学课程的思政课,其他课程也同样需要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各门课要深挖课程里的思想政治元素,与思政课形成协同效应。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必修基础课,因为受众面广、学时长而成为“课程思政”的重要阵地,教师应充分发掘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德育内涵及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课堂内外健全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课程思政; 大学英语; 课程教学; 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7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096-05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1]就大学英语课程而言,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渗透育人理念、推行课程思政的实际应用、与课程在教学中达到既完成教学任务又促进教育“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从而提升大学英语教学的思想深度,创新大学英语的教育教学方法,为课程思政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课程思政”的概念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课程教学新的教育理念,指在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理论,把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同时兼顾,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进课堂内外、走进学生心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达到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各专业教学过程的不同环节、不同阶

段、不同方面共同利用大学英语这个资源而产生的整体效应,即协同效应。高校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将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是“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有机、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培养作为课程教学的首要目标”^[2]。

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德行”是做人的根本,在教学过程中应为学生提供一种“净化的环境”,注意引进成人榜样,使学生在完成本专业之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美德与学识历来就是人们所需具备和追求的。所谓“修德”,就是要让学生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培养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质。高等学校是育人的场所,培养的人才能否拥护党的路线方针,为国效劳,为社会所用,决定了教育的成败。因此,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正所谓教育为本,德育为先,尤其是如今我国高等教育渐趋大众化,更应如此。当前很多大学生存在着思想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观念相悖的现象,如学校、宿舍人际关系冷漠、理

收稿日期:2019-11-13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新形势下地方性本科院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2019-JKGYB-0235);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厅全省大中专院校就业创业课题“强化高职人才外语能力提升就业竞争力”(JYB2019054)

作者简介:和伟(1972—),女,河南信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想信念淡化、道德选择偏差、道德行为缺失、人生观价值观迷茫等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表面呈现的是一方面,而归根究底却是教育的问题,大学是青年成长的重要单位,要解决这些看似普遍的社会问题,就要从学校的“课程思政”教育入手,最终形成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学校风气。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传递文化的重要媒体,语言和文化是共存和相互依赖的,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本身也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任何一种语言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包含有与这种语言相关的价值和道德因素。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种沟通英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和道德桥梁。语言的工具功能、相互作用(交往)功能、启发功能、想象功能和信息功能决定了它在教育体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要求上至国家和学校政策,下至教师和学生观念都要转变,才能在形势新、时间紧、任务急的形式下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and 形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因此对大学英语的教学不仅是对纯粹语言基础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通过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等受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熏陶与影响,给学生带来思想震撼,学会辨别是非善恶,并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通过“课程思政”德育教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提升其民族自豪感,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体系。

三、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现状

(一) 大学英语课教师思想政治意识欠缺

由于大学英语课程的特殊性,高校中很多英语课教师大多有海外教育背景。由于常年在海外求学,部分英语课教师更熟悉国外的风土人情,对国内社会的认识有局限性,部分教师又受海外所谓“自由主义”思想的蒙蔽,对国内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缺乏了解,个别教师言行失范、不能为人师表,缺乏实施“课程思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缺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部分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专注传授专业知识、专业教学与专业发展,不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缺少思政理念的融入,不理睬大学生的思想状态,不关注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碰撞。有时候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有些英语教师还会在课堂上用碎片化的手法解构中国文化完整

的历史,甚至以娱乐化的手法戏说严肃的历史,更谈不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了。部分大学英语教师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课老师的事情,是辅导员的事情,与他们相距甚远。他们所接触的思政教育也仅限于每年有限的“学雷锋活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种传统节日教育等,严重影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二) 大学英语教材思政内容比例偏小

目前高校大学英语课程通用教材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系列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综合教程》(第二版)系列等,这些教材编辑时充分考虑了当今电子时代大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现状与未来,西方国家的各种风土人情等,但是“课程思政”的内容却占比相对偏小,其内容整体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适用性更是有待商榷。这些教材的编写使中国文化在这些大学英语教材的内容选取上被忽视和削弱,西方文化所占比例较大,大学生过多地受到西方节日、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和培养不利。如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为例,全套四册教材中的信息大多涉及英美国家的人物、事迹、各种节日及风土人情,而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比例不到1.3%^[4],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课堂几乎不占分量。这种过分重视国外文化及外来文化而淡化中国传统文化输出的现象导致学生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削弱,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足及对外交流与输出。

(三) 师生在课堂内外过分注重专业课知识

目前大学英语课堂学习没有把思政理念与英语教学结合起来。学生也十分重视英语学习,渴望上进,希望能在专业知识学习方面有所进步,因此在课堂上也会更多关注英语母语国家背景、英语语言掌握、英语知识的灵活应用等。大学生在学习英语专业知识时,经常会忽略掉思政思想,难以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课外的学习兴趣小组也过多关注在英语语言的应用、英语国家的认识、英语思维的认同上,如各种英语角、英语演讲社团、英语故事大赛等,没有将思政理念渗透到大学英语的专业学习中。

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5]。随着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今后走向世界的步伐将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也

将是深入而广泛的。因此,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的的课堂、课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修订大学英语人才培养方案,增加、补充大学英语教材与“课程思政”相关的教学内容,完善新时代、多媒体教学设计,加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管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

(一)坚持办学正确方向,发挥高素质教师作用

《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因此要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育人意识与能力。教师的思政意识是指教师要意识到自己在教学过程中自身不仅仅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传统教师的角色,还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将“课程思政”与大学英语教学相融合必须提高英语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才能引导学生为实现中国梦不断努力奋进。引导激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研究实践,组织教师结合大学英语课程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本课程所蕴含的育人元素,丰富“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将“课程思政”覆盖到大学英语的各个学期。

教师在课堂内外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来实现大学英语教学与“课程思政”的有效结合,如可以采用辩论赛等形式。如在《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第六单元“Earn as you learn”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英语辩论赛的形式让学生分组,讨论大学生“勤工俭学”的优势和劣势,注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珍惜父母养育自己的亲情和做好未来人生的规划。大学英语的学习还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发展,学校教育的中心是围绕学生的工作,2017年林蕙青副部长指出要注重培养学生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等,使他们从入校开始,就要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即可以独立学习、思考,进行英语语言表达,进行英语文字书写等,并且养成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意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未来踏入社会,要学会过集体生活,学会与人合作,学会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学习中,要勇于尝试,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培养学生的未来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通过分组讨论、辩论分析等潜移默化的教学形式让学生理解父母养育自己的辛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来人生的起步等,以推进学生学习潜力的有效挖掘,进一步实现英语教学

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真正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二)用好课堂主渠道,筑牢“课程思政”主阵地

1. 利用第一课堂,守住“课程思政”本性

用好大学英语课堂的主阵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传授语言知识,又要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教师单纯的英语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即使教师将专业知识传授的很具体,也无法使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知识的过程中主动接受德育教育,达不到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知识时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的目的。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大学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课程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为“课程思政”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7]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第一册第二单元的“Loving parents, loving children”。从文章题目“爱父母,爱孩子”入手,引导学生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尔雅》:“善事父母曰孝。”^[8]《说文解字·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9]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根植于古代中国的个人、社会、国家各个层面,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慈爱”和“孝顺”,构成一对和谐的整体。因此,结合文章内容引导学生要实现传统孝道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对中西方孝道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传统孝道价值的基本前提,也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由此看出,教师充分挖掘教材上的现有资源,从众多的语言素材中筛选出有助于学生语言能力学习和思想品德提升的内容,整合凝练其中的德育教育资源,在解读知识符号的同时关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

2. 开发第二课堂,提升“课程思政”实效性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因此,除课堂之外,教学过程的相关步骤应该开发第二课堂,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效性。教师和学生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大学英语社团活动,深层次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发掘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引导学生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围绕国家热点举行英语演讲比赛活动,2019年最热的“热点”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阅兵历来被认为是展国威、扬军威的重要方式。70周年国庆阅兵既可以展示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崭新风貌,又可以展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信心,向全世界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力量”。看完阅兵后,组织以“阅兵感受”为主要框架的英语演讲比赛、英语知识竞赛等,帮助学生了解新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将自身理想追求上升至振兴国家、民族事业层面,进一步帮助大学生树立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展示外语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12]。利用英语第二课堂的实效性,引导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掌握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将语言学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各种比赛过程中自然渗透这些思政要素,润物细无声。“人”是信息的载体,是“活”的传播媒介,“人”既可以获取信息,也可以传递信息,通过人的杠杆作用将信息对外传播,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学生个体既是独立存在的,也是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个体在中国文化、河南对外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以点带面加深学生对中国故事、河南故事的切身感受。学生通过各种比赛既学到了英语,又规范了其道德品质和理想信念,真正实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目标,这样不仅大学英语课堂内外重输入轻输出的情况得到初步改善,思政教育也能在大学英语课堂内外绽放出新的光彩。

围绕社会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结合书本内容展开英语辩论赛。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第一册第七单元的“Hoping for the better”,观察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粗鲁”与“文明”现象,引导学生与良好家风家训家规结合进行英语辩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家风家训家规的传承能够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对抵御西方社会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促进当代中国社会有效治理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家风家训家规作为中华文化传统道德规范的内容,属于文化范畴的观念形态,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文化同源性,其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着高度的契合性。依托这些辩论赛培养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开拓第三课堂,把握“课程思政”关联性

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各种互联网平台纷纷出现,QQ聊天工具、微信等多媒体软件也蜂拥而起。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电脑客户端、手机APP等现代化通信手段,学生在方寸之间,感知大千世界,发挥第三课堂网络平台的育人功能及关联性,丰富学生课外知识,陶冶学生情操,拓展大学英语相关知识背景,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从2011年1月21日发布第一个微信版本,到2012年3月底,微信用户突破1亿大关。《2018微信年度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每天有10.1亿用户使用微信;日发送微信消息450亿条,较2017年增长18%;每天音视频通话次数达4.1亿次,较去年增长100%^[10]。

微信不仅是一款实时沟通工具,而且具有非常强大的分享功能,目前成为相当普及的交流平台。大学里几乎每个学生都有微信号,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中可充分利用微信的沟通分享功能进行课程思政教育^[11]。在信息化时代,“课程思政”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融合要充分利用这些互联网平台,将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有效地向外扩展,引导学生关注“国才”“外研社Unipus”“CHINADAILY”“微英语”“21世纪英文报”“外国文学研究”等英语微信公众号,了解当今时代发展脉络、每日新闻等,利用好这些非常好的语言学习和“课程思政”的素材,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学习,既激励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又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利用“学习强国”里的每日英语新闻,学生可以利用课外时间,比如中午或晚上休息前的时间,在23个阅读学习栏目中,来浏览、阅读当天的“学习强国”里英语学习内容,让学生在幽默、新鲜、轻松、活泼的氛围中了解国内外每天发生的大事,学生们利用好这些平台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政治文化素质。

(三) 挖掘大学英语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教材是教学内容、教学资料的汇总和反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深挖教材中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元素,培养学生在提高语言技能的基础上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四册教材涵盖了古今中外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文资料丰富、数据细致翔实、紧跟时代脉搏。在立足大学英语教学实际的基础上,教师们应在课程教学中通过文中的学习材料和教学活动设计,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与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认识世界、了解社会、发现自我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进文化理解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

国庆期间网上曾流传一张1949年国庆阅兵时周恩来总理一句话的图片,“您说飞机不够就飞两遍。这盛世,如您所愿,如今山河无恙,国富民强”。结合《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第一册第八单元的“Heroes of our time”引导学生讨论当今时代“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不幸与世长辞。举国悲泣,全球同哀!北京十里长街送英灵、百万民众哭总理的情景,成为中华民族空前的哀悼!而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又成了一次罕见的“世界纪录”。结合课文中的“Heroes of our time”素材,引导学生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做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开展类似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当今中国是一个空前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丰富、物质充盈的时代。因此要深刻领会“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增强先行先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探索出大学英语教学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新路。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生人文素养、家国情怀培育的重要性,将德育因素渗透到英语教学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吸收知识、接受德育教育,以完成学科教学和德育教育的最佳结合。将大学英语教学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健全全员育人、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掘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德育内涵,加强思政课程的适用度。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做好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
- [2] 安秀梅.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功能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8(11).
- [3]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R]. 新华社, 2019-01-21.
- [4] 刘晓阳.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研究[J].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18(5).
- [5] 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J].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2017(6).
- [6]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R]. 新华社, 2018-05-03.
- [7] 习近平.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R]. 新华社, 2018-09-10.
- [8]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637.
- [9]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48.
- [10] 中国新闻网. 2018 微信年度数据报告: 每天 10.1 亿用户登陆微信 [EB/OL]. (2019-11-10). 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9-01/10/c_137732668.htm.
- [11] 黎卿. 基于英语微信公众号的思政教育进课堂模式初探[J]. 文教资料, 2017(27).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 into the Teaching Path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

HE 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tas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educate students with proper moral values”.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task does not only rely on the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but also the other courses in the college. Therefore, each course shall pay attention to tho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to form synergy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he college English course, which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 due to its wide audience and long hours of study. The teachers should perfect the system mechanism of total education, process education and all-round educ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to fully explore the mor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and build a construc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 suitable for English subject.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 college English; course teaching; path

德国语言文学类博士生跨学科结构化培养研究

——以柏林自由大学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文学研究院为例

张宇,高稳

(太原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2007年柏林自由大学成立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文学研究院”(Friedrich Schlegel Graduiertenschule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FSGS),这是“卓越计划”中唯一一所文学领域的研究生院。FSGS是德国以结构化模式培养杰出文学博士的权威机构,其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文本间的关系、文学文本与语言反射过程间的关联、修辞学与诗学、文学与美学的交互关系以及文学与知识话语的相互依存关系等。以FSGS为研究对象,考查其跨学科研究领域、课程体系与学术活动特色,以期形成对德国跨学科语言文学研究生结构化培养模式较为系统的认知。

关键词:跨学科;文学;结构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8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101-06

自2005年起,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发起并实施了旨在进一步提高德国高校科研水平与国际竞争力、促进科研后背力量培养、推动高校等学术机构间与科研人员间交流的资助项目—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其资助主要面向三个层面:未来构想(Zukunftskonzept)、卓越集群(Exzellenzcluster)和研究生院(Graduiertenschule)。经过激烈的评比竞争,柏林自由大学一举入选,成为卓越计划三个层面共同资助建设的11所德国精英高校。

一、柏林自由大学卓越计划概况

柏林自由大学的卓越计划项目共包含4个卓越集群、7个研究生院项目、1个未来构想项目。其中3个卓越集群项目分别为:神经疗法—神经性疾病治疗的新视角(NeuroCure—Neue Perspektiven in der Therapie neurologischer Erkrankungen 2007—2017)、古文明空间与知识的构成与转化(Topoi—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and Knowledge in Ancient Civilization 2007—2017)、催化反应中的一体化设想(UniCat—Unifying Concepts in Catalysis 2007—2017)、情感的语言(Language of Emotion

2007—2012)。^[1]

7个研究生院项目:柏林数学研究院(Berlin Mathematical School 2006—2017)、柏林—勃兰登堡新生疗法研究院(Berlin—Brandenburg School of Regenerative Therapies 2007—2017)、穆斯林文化社会研究生院(Berlin Graduate School Muslim Cultures and Societies 2007—2017)、弗里德里希·施雷格尔文学研究生院(Friedrich Schlegel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ry Studies 2007—2017)、北美研究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North American Studies 2007—2017)、柏林肿瘤学综合研究院(Berlin School of Integrative Oncology 2012—2017)、东亚研究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2—2017)。^[1]

此外,2007年,柏林自由大学以“网络大学”(Internationale Netzwerkuniversität)的战略规划入选卓越“未来构想”计划,并在这一计划资助下先后建立了三个战略发展中心:研究战略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Strategy)、国际合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达雷姆研究院(Dahlem Re-

收稿日期:2019-09-06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德国研究生跨专业结构化培养范式研究”(20181026)

作者简介:张宇(1980—),女,山西太原人,博士,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教育和德国文化。

search School)。

目前,柏林自由大学共有12个专业学院,4个核心研究所,11个跨学科研究中心,超过150个专业方向。在基本的学科设置外,自由大学形成了以文学、文化国际比较、国际关系以及区域研究等为研究中心的跨学科科研特色。^[2]柏林自由大学的科研特色是以项目为核心、全球化跨界合作,^[3]其研究重点通过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实施,如:跨专业聚焦(Focus Areas)、精英集群(Exzellenzclustern)、特殊研究领域(Sonderforschungsbereich)、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en)等。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分布在两大学院几十个研究所的学术人员在“伊斯兰文化学”“天主教神学”“古典时期考古学”“艺术史”“闪米特语言与文学研究”“阿拉伯文学”“韩国研究”“土耳其研究”“西亚考古学”“犹太学”“埃及学”“古东方学”“古前考古学”“汉学”“区域学”“日本学”“伊朗学”“历史人类学”“中东社会和文化史”“欧洲语言”“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早期”等跨学科研究课题下展开合作研究。2007年柏林自由大学建立了“弗里德里希·施雷格尔文学研究院”(Friedrich Schlegel Graduiertenschule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FSGS),这是“卓越计划”中唯一一所文学领域的研究生院。FSGS是德国以结构化模式培养杰出文学博士的权威机构,研究生院的54名教授的专业背景涵盖哲学、历史学(全球史与区域史)、文化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与媒体学六大学科的近20个专业方向。其研究对象为欧洲与非欧洲文本,鼓励不断开创与挖掘独特新颖的文学研究视角,并尝试跨越语言民族与全球化技术的障碍,批判性地研究文本,同时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语境中研究文学文化现象。^[4]

二、FSGS 博士生相关的数据概况

FSGS 博士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平均年龄为29岁,平均毕业年限为3.7年。71%的博士生可以三年毕业。院内整个博士生群体内,41%为男性博士生,59%为女性博士生。34%为国际联合培养博士,65%的博士生为德国本国学生。FSGS 每年招收12—15名博士生,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国际学生。在国际博士生中,43%的博士生来自英国,26%来自美国,16%来自欧洲,15%来自亚洲。此外,在研究生院的博士后群体中,40%的博士后来自美国,16%来自德国,15%来自英国,9%来自欧洲,5%来自亚洲。客座教授中,52%来自美国,15%来自欧洲,12%来自英国,12%来自亚洲,9%来自德国。他们每学期至少要在研究生院教学指导两个月。60%

的博士生均有海外学期经历。42%的博士生除了进行海外学期的学习,还会经历海外学术研究考查。^[5]每位博士生需至少参加两次国际会议,举行一次专题报告。

从毕业输出方向来看,55%的博士毕业生直接进入德国大学的相关科研部门。16%的毕业生在大学外就职,如:教育管理部门、媒体与出版部门或企业咨询机构等。13%的毕业生在科研管理部门就职。4%的则在研究生院资助的科研项目中继续研究。^[5]

三、FSGS 的研究领域

FSGS 的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文本间的关系、文学文本与语言反射过程间的关联、修辞学与诗学、文学与美学的交互关系以及文学与知识话语的相互依存关系等。^[6]研究对象既不受时间(从古典艺术作品到现代文学)也不受语言(世界文学)的限制。其中,FSGS 重点开展文本、媒体与文化以对比性方式进行创新性的反思研究,从历时和共时角度,以比较的方法研究文本性与语言性现象,挖掘文本与意义建构间、社会形成与知识结构的关系。总体来看,其研究主要涵盖以下五大领域:

1. 文学作为文本实践

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任务是以比较的方法与视角继续发展文论的相关论点,挖掘文本的阐释过程,历史重构并系统性鉴定文学作品的核心概念。^[6]FSGS 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深入的方法论讨论,当前其文学研究具有方法多元化的实用主义特点。在文论研讨课中,主要考察当前文学理论的一致性、隐含前提、阐释内容的作用范围等。就博士论文的选题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其中一部分博士论文关注上述基础研究领域,尝试验证特定文论观点的阐释可能性。另外一些项目论文则关注新文论的描述方法与哲学前提,尝试发展文论观点,借助文学作品验证文论观点。

互文性研究,是该研究领域的另一重要方向。去目的论与非目的性研究文本的内部关联性、话语模式的重构、文本模式的解构与异化、文本的讽刺形式、元文本的核心内容、文学反思的形式等。^[6]互文性研究促进了民族文学间以及文化学与文学间的对话。在历史的视角下,关注文本与其他媒体的动态关系。

此外,文学作为文本实践的研究还包含了修辞学、美学等领域,在近些年来,逐步走上了跨学科比较方向的研究路径。

2. 文学的跨民族视角

FSGS 文学的跨民族视角研究始于2012年。当

前研究重点为对比视角下的欧洲文学,同时辅助以非欧洲文学研究,并借助引入新的科研团队逐步涉及并发展日本文学研究。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为跨文化、翻译与世界哲学的方法论与理论。^[7]今天,该研究领域已成为 FSGS 的理论研究中心,为院内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比较性与跨文化的研究聚焦点。比较的方法使文本置于本文化语境与他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因此,文学研究为调解文化矛盾、研究文化融合现象、反思欧洲内与欧洲外科学传统的差异做出了重要贡献。^[7]

由文化关系衍生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视角是翻译。翻译研究将翻译视为真实意义的传递过程。翻译包含文化语境的转换,译者是文化间的传递者。因此,他们必须要关注等值、真实与意图性等问题。尽管今日文学作品翻译的出发点是去等级化,然而旧归因与新身份间的斡旋始终影响着权利关系,并继续成为现实极具争论的文学翻译研究话题。

3. 文学与知识

在知识的接受与生产关系下,该领域主要研究文学的认识论功能。文学以知识客体为主题,存储知识库存,推动知识循环,加工且科普科学知识。鉴于文学并不局限于其归属的知识客体或某一确定的知识领域,因此文学知识的特色更多的是通过语言和题材的形式来凸显,它融合了同质和矛盾性的话语,以相对的独立性规划了现实模式。在这一研究领域中,FSGS 先后开展了:运动中的认识论 - 旧世界与新时代早期的知识转化(Episteme in Bewegung - Wissenstransfer von der Alten Welt bis in die Frühe Neuzeit)。^[8]研究者将文学置于不同知识文化语境以及自然与人文科学话语下考查并研究。

4. 文学、媒体与艺术

该领域研究则关注口语与书面文学手法的媒介以及对文化技巧的依赖性。^[9]当前研究热点为:沙龙文化、抨击诗歌、绘画小说、博客以及多模态文学形式。文学文本与其他媒体的交叉是该研究领域的衍生课题。其主要考察在近些年出现的跨媒体现象,即借助其他媒体来描述艺术作品,在电影描写或虚构作品的音乐化中记述或模拟其他艺术形式。如:FSGS 的第三个年度学术会议主题为:艺术与媒体对比下的虚构作品。

四、FSGS 的课程体系

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研究生院的课程培养体系的特色是跨学科结构化教学。跨学科教学是以一个学科为中心,在这个学科中选择一个中心题目,围绕这个中心题目,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对所指向的

共同题目进行加工和设计的教学。^[10]

跨学科的学习以及开放式的交流极大地激发了博士生对自我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以实践为导向的工作坊不仅为年轻的博士生展示了未来的职业前景,亦消除了他们对进入职场的担忧。从整体结构上来看,FSGS 的课程体系主要包含四大模块:个人博士论文的准备、方法论与文论、实践模块、专题研讨会。^[11]

1. 博士论文的个人准备

FSGS 的课程为博士论文的个人准备以及个性化指导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区间。鉴于院内所有科研项目均为在不同的专业语境下解决对比性的文学文化问题。因此,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因不同专业的科研传统形成的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随之产生,研究方法要与研究素材匹配。在博士论文的个人准备过程中,博士生需要不断反思各自专业视角与习得的方法,并尝试将其以特定的方法与本院研究生院的其他博士研究方向联系或链接起来,逐步形成网状点式的研究结构。^[11]

2. 方法论与文论研讨课

改变传统的单一学科教学,实施跨学科教学,创设多种层面、多种问题交织的形式与情境,训练学习者的跨学科思维^[10]是结构化培养课程的主要特色。FSGS 的跨学科博士生研讨课是由院内教授就方法论与文论开设的必修课程,在课上设定年度主题。该课程博士生共需参加三次研讨课,其中一次是 FSGS 组织实施的。研讨课需要涵盖 FSGS 的三个研究领域。博士生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HUB)以及海外合作院校学习的课程同样可以被认可。FSGS 的研讨课是冬季学期的必修课,且不可以通过其他课程代替。

3. 以实践为导向的工作坊 - 软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

为了提高博士生未来的职业能力,使其尽早适应未来科研工作,FSGS 开设了大量的以提升个人软实力能力的工作坊。如:教学实践(个人或资深学者共同授课),组织科研活动,出版会议论文,撰写文学批评与学术论文,科研管理;组织媒体、出版、文化、企业咨询等相关领域活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研究生院的组合科研活动(Alumni - Netzwerk):参与者借助午餐论坛(Mittagsforum)和夏季咖啡(Sommer - Cafe)馆活动研讨实习、国外访学、未来职业发展等。

柏林自由大学校内的达雷姆研究院(Dahlem Research School, DRS)提供针对未来职业核心技能

的工作坊课程:时间管理,冲突调节,项目展示,语言技能,辩论技能。此外还包含顾问工作坊。博士生亦可参与洪堡研究生院(Humboldt Graduate School)的相关工作坊。

4. 年度学术研讨会

年度学术大会是一个面向院内院外所有参与者开放的学术研讨平台,FSGS的博士生一般需参加三次年度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学术年度研讨会旨在为博士生展示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帮助他们以对

比的视角来进一步细化个人的研究问题。从研究对象出发,摒弃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讨论中澄清研究方法和文学理论背景的关联。之后的两次年度学术研讨会则以展示各自研究项目进展和成果为主。这三次跨学科年度学术研讨会(冬季学期)为必修课,由资深教授组织,以确保在跨专业视角下课题的开放性。除了博士后与国际客座教授,研究生院的全体博士生导师均需参与该研讨会。

表1 FSGS的课程体系

I 个人博士论文的准备	II 方法论与文论模块(选修)	III. 实践模块(选修)	IV. 专题研讨会(必修)
针对个人课题项目的灵活性学习 包含国外访学	文学作为文本实践 跨民族视角下的文学 文学与知识 艺术与媒介理论	DRS 课程 博士网络课程 FSGS 课程	年度学术研讨会 年度学术研讨会 年度学术研讨会

五、FSGS 学术研究活动的结构化特色

FSGS 专注于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文学文化研究,在多元整合的理论关切下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努力跨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把握语言的多样性,逐步形成了一大批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学文化研究的杰出成果。FSGS 学术研究活动的核心理念是推动跨专业、跨学科的交叉性,实现结构化的培养理念。^[12]其结构化特色主要体现在:

1. 研究内容的跨学科

FSGS 的学术研究活动融合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政治学、媒体学、艺术学、宗教学、美学等多种学科。所有的学术活动均以学科群为基础,按研究问题需要,以不同的集合方式将学科群链接为网状结构,^[13]用以分析解决各种广义文学文化问题。如:2018年11月的学术活动:文学中的鬼怪-哲学现象与视觉媒体,将文学、哲学、媒体学融为一体,整合上述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一个小的研究切口入手——“文学中的鬼怪”,尝试将欧洲内(进而扩展到欧洲外)文本中的这一主题以历时和共时结合的方式进行对比性深挖,逐步形成完整的文学文化认知。这种学术活动对扩展参与者的研究视野、促进其跨学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意义突出。

2. 研究对象的跨民族

FSGS 对文本的研究往往不会设定一定的地域民族界限,而常常是以某一特定文本现象为研究对象,以跨学科的视角展开研究,如:2017年10月的学术活动:文学生活研究作为文学场域的柏林;该研究活动致力于不同民族文本中文学场域柏林对文本叙事的作用和意义,进而分析比较叙事空间—柏林

在不同文本中文化差异。这种跨民族的文本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研究单一民族文本的视角局限性。在大量跨民族文本研究的基础上,FSGS 同样重视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一贯富于高度争议的跨民族文学艺术的种属问题,FSGS 每年的学术活动中均会多次涉及并深入探讨:关于最新文学类型的研究。

3. 研究方法的跨学科

FSGG 的跨学科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边界的交叉和渗透,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方法论的互设以及传统学科基于新的分析维度、新技术或者新的研究问题的重组或融合。^[2]对文本和文学文化现象的分析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历时、共时法,注释与经验法,语境与系统法。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以批判与自我反思的态度、以跨学科和国际化的研究方法不断开启文学的研究领域。如:2019年2月的学术活动:人物研究的新视角——数字化人文学科、人口统计学与统计学,就是一次文学人物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大融合的积极尝试,该项目整合了信息学、媒体学、统计学与文学文化学研究方法,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内涵和新成果。

4. 研究思路的对比性

FSGS 对文本的研究思路往往从比较出发,纵观其2016—2018年所有学术科研活动,不难发现,其三分之二以上的科研活动均涉及以下八类比较中的一类或多类:

- ①文本比较:文本性与文本间性;
- ②系统比较:修辞、诗学、审美;
- ③表征比较:语言与文学;
- ④认知秩序的比较:文学与知识话语;
- ⑤语境中的文本比较:文学与文化差异;
- ⑥媒介比较: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

⑦理论比较:文学种属与理论的定位;

⑧版本比较:编辑学研究。^[2]

这种研究吸收了广泛的跨学科比较研究路径,以分析的视角不断挖掘文学、文化以及语言的内涵与建构规律。在多元整合的理论形成下,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对比性文学文化研究成果。

5. 研究成果的跨区域

FSGS 的跨区域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以跨文化的对比方法研究世界文学系列。截至 2018 年底,已由 De Gruyer 出版社发表 16 册世界文学研究成果系列。其中第一册主要深入介绍和描述了世界文学的研究渠道、视角、方法等。之后的十五册则分别以某一研究主题为切口,深入展开多元跨文化对比研究。

世界文学 16 卷本:

第一卷: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2013;

第二卷:奥斯威辛的叙事空间,2013;

第三卷:边缘符号学——浪漫主义文学的边缘现象,2013;

第四卷:死后之爱——中世纪与现代欧洲早期死后之爱的概念,2014;

第五卷:诗歌电影——视听媒体中的抒情诗歌,2014;

第六卷:三岛由纪夫“保卫我们的文化”——全球语境下的日本身份话语,2014;

第七卷:世界的文本化——福斯特、洪堡与沙米索的文学访学之旅,2014;

第八卷:精明的恶行——愤世嫉俗的变体,2015;

第九卷:文艺复兴的荷拉兹接受,2015;

第十卷:怪异——十九世纪文学与科学的偏离,2016;

第十一卷:1756—1832 英德文学的转换,2016;

第十二卷:语境下的文学——现象学中的认知论,2016;

第十三卷:艺术与媒体对比下的虚幻文学,2016;

第十四卷:现代散文的哲学诱惑——对比视域下的波兰与德国作家,2017;

第十五卷:真实历史,自由编撰——超文本虚拟文学的协商与市场化,2018;

十六卷:自传与自传中的非人性生活,2018。^[5]

6. 研究课题的国际化

国际化是柏林自由大学学术科研发展的特色,截至 2018 年,该校已于全球 100 所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与 330 所大学成立了伊拉斯谟高校联盟,并

与 45 个全球知名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除了机构合作和人员交流上的国际化,FSGS 的学术研究的布局也贯彻了“世界视野”,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其对广义文学文化学的各种科研项目中。

FSGS 先后申请并实施了相关课题项目。如:20 世纪中期中欧观察项目(Mitteleuropäische Observationen einer Neuen Mitte 1900—1945):分析了亚美当代关系的东方学解释以及欧洲势力的殖民化尝试。国际访问学者项目:移动的传统——对比视野下近东文学(Travelling Tradi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Near Eastern Literatures)。以及由 FSGS、肯尼亚肯雅塔大学(Kenyatta University)与南非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三方共建,并由 DAAD 赞助支持的三国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南北文学与文化互动(North-South Literary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14]此外,该项目还吸纳了来自亚洲、近东以及非洲的相关研究者,以利于扩展研究课题的国际视野。

7. 饱含人文关怀的科研之路

博士培养过程,不仅是知识和方法的传授,同样也是人格与情感的完善。FSGS 在教学与科研活动中,注重心理疏导,通过创设各种文化活动来促进博士生群体的多层面交流,以缓解其学术科研压力。其中最为成功的是每年举行的世界咖啡馆:读博之路。在该活动中,博士生们畅所欲言,交流自己的学术科研困惑,倾诉生活情感烦恼,分享个人国外访学经历,等等。该活动的意义在于:越来越多的博士生走出自我封闭的研究与生活空间,袒露心声,不断地排解自身的负能量,缓解科研焦虑,避免极端的心理问题出现,从而保障自身的身心健康。

六. 结语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FSGS 以其精深的研究领域、多元化的研究项目、深入的个性化指导不仅为博士阶段培养创设了最优的条件,同时亦为博士生毕业后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效的准备。目前已成为全球文学研究成果与人才的重要产出机构,其结构化培养模式在不断调整和变革中逐步走向成熟。该模式对促进学科整合和推动前沿科学发展,加速人文学科课程与理工科学科课程相融合,发展跨学科学术组织,深化国际科研合作网络,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意义重大,且成果突出。此外,在该模式下,FSGS 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建立跨机构的研究平台,打通科研人员在高校、企业以及研究机构间的行走边界与障碍,为其特色化发展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 Ergebnis der Sitzung des Bewilligungsausschusses am 15. Juni 2012 [EB/OL]. (2019-09-01). www.bmbf.de/files/Ergebnis_der_Sitzung_des_Bewilligungsausschusses_vom_15._Juni_2012.pdf. 2019;22.
- [2] 秦琳. 德国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研究: 知识生产转型视角[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2.
- [3] Michels Carolin, Conchi Sonia, Frietsch Rainer. Indikatorbericht – Bibliometrische Indikatoren für den PFI Monitoring Bericht 2014 [R]. (2019-08-30). PFI Karlsruhe/Berlin/Bielefeld 2015;15.
- [4]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Promovierende in Deutschland [R].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Statis). 2016;55.
- [5]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Auf einen Blick: Ein kurzes Porträt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EB/OL]. (2019-08-31). www.fu-berlin.de/presse/publikationen/_media/kurzportrat.pdf. 2019. 15, 16, 23.
- [6]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Wissenschaftsrat. Bericht der Gemeinsamen Kommission zur Exzellenzinitiative an die Gemeinsame Wissenschaftskonferenz [EB/OL]. (2019-08-30). https://www.bmbf.de/files/1_Bericht_an_die_GWK_2015.pdf. 2018;39, 41, 45.
- [7]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Monitoring des Förderprogramms Graduiertenkollegs. Bericht 2014 [EB/OL]. www.dfg.de/download/pdf/dfg_im_profil/evaluation_statistik/programm_evaluation/bericht_dfg_monitoring_grk.pdf. 2015;15-17.
- [8] Möller Torger, Antony Philipp, Hinze Sybille, Hornbostel Stefan. Exzellenz begutachtet. Befragung der Gutachter in der Exzellenzinitiative [R]. iFQ – Working Paper No. 11. Berlin, 2012;55.
- [9] Hillenbach Anne – Kathrin, Hacke Marion, Schlegel Martin, Witter Barbara. Empfehlungen für den Übergang von der Master- in der Promotionsphase [M]. UniWiND – Publikationen Band 2, 2014;67.
- [10] 杜慧洁, 舒尔茨. 德国跨学科教学理念与教学设计分析 [J]. 全球教育展望, 2005(8).
- [11]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MBF). Bundesbericht Wissenschaftlicher Nachwuchs 2013: Statistische Daten und Forschungsbefunde zu Promovierenden und Promovierten in Deutschland [R].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3;98-110.
- [12] Jaksztat Steffen, Nora P, Briedis Kolja. Promotionen im Fokus. Promotions- und Arbeitsbedingungen Promovierender im Vergleich [R]. Forum Hochschule 15/2012, Hannover, 2012;33.
- [13] 张炜.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跨学科学术组织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3(9): 61.
- [14] Prognos, Joanneum. Studie zur Exzellenzinitiative des Bundes und der Länder (Graduiertenschule und Exzellenzcluster) [R]. (2019-09-01). Prognos AG und Joanneum Research Forschungsgesellschaft mbH. Berlin / Basel / Graz / Wien, 2015;76.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Interdisciplinary Structured Training of German Doctoral Student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ke Friedrich – Schlegel Graduate School of Berlin Fre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ZHANG Yu, GAO W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24, China)

Abstract: In 2007,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established the Friedrich Schlegel Graduiertenschule (FSGS), the only graduate school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in the Outstanding Program. FSGS is an authoritative institution in Germany to train outstanding Doctors of Literature in a structured mode. Its research fields mainly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texts and language reflex proce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hetoric and poetry,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and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knowledge discourse. This paper takes FSG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amines it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curriculum system, and academic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with a view to forming a mor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d training model of Germa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postgraduates.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ructural

思想政治教育的“势”“市”“适”“是”探析

王苏琪

(郑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党的十九大之后,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新的强劲的态势和趋势,思想政治教育之“势”更加旗帜鲜明,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共同的“市”,其程度和效益取决于“适”,而要做到“适”就必须遵守教育规律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助推“势”,专家学者纷纷“入市”,党政协作、社会合力依照“是”,探索新时代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之“适”,形成闭环式的无缝衔接,以持续巩固和推动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大势。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势;市;适;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19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107-05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势”“市”“适”“是”解读

势,古字作“執”,字形从“壘”从“丸”,“壘”为土敦成的斜面,“丸”为圆球,字面意象为圆球处于土墩斜面即将滚落的情形。《说文解字》大徐本注:“势:盛力,权也。”可以理解为势利(权势和利益)、威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资治通鉴》中“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都表达为形势、情势。到了近代,一方面,在相关词语后面加上“势”字,如局势、形势、态势、姿势、情势、国势、火势、风势、时势、运势、走势、涨势,表示事物的演变趋向;另一方面,势又指某种影响力,如权势、地势、山势、势力等,用以表征事态演变特征的“加速度”,以及产生这种“加速度”的影响力,综合起来,就是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助推力。

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承担着解释、教育、引导、提升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的重任,开放式地进阶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解读。思想政治教育遵循“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符合一定社

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开始了它的使命之旅和演进起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2]。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迈入新征程,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立意高远、本正源清、旗帜鲜明的新态势和趋势。

市,会意字,上面是“之”(往),下面是“兮”,古意指人们聚集的嘈杂声。《说文解字》解释为买卖之所,即市场。隋唐之后,既可用作市场,也涵盖市场活动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教育,是国家意志在民众中的宣传和引导,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任何国家概莫能外。我国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从中小学阶段的素质教育到高校的政治教育,从理想信念教育到职业素养教育,主要的实施场所

收稿日期:2019-07-20

作者简介:王苏琪(1970—),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是各级各类学校。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形成了切实可行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课程和学科,是思想品德、素质能力、技能素养等全方位的培养,场所切换之多、时间延续之长,陪伴着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贯彻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

适,《康熙字典》解释为切合、相合、适当,有时也讲正好、符合、匹配。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做到因材施教,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即使对于相同的受教者,也要像《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节点、火候。

是,《说文解字》:是,正也。可以是认定、断定、承认、接受、确认时的一种状态,肯定的意思。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释实事求是“……‘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4]。他接着说,“实事求是,就是我们要从事物本来的实际出发,去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发现其发展规律”。思想政治教育遵从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它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教育,而是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必然性、客观性、规律性,而且,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超越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是”,随着网络新环境的迁移,探索虚拟入场,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青少年成长规律,与互联网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形成线上线下思政教育域场成为研究的切入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势”“市”“适”“是”的现行形势

思想政治教育迎来发展的“劲势”,一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累积的优势。经过改革初期的思想大论战,形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体系,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我们始终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引领了思想政治教育上的热点和话题,通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持续解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深入解析,坚定探索中国道路,构建中国理论,制定中国方案,使用中国话语,形成了“四个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5]。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已经成为政治教育的特色,也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和递进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二是来自党和国家高屋建瓴的助推涨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增强政治意识,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生,引导广大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7],并将2019年确定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标准年、质量年、基础年”。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8]。信息化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要“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新时代的“奋进之笔”和教育改革的成果,使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扭扭捏捏,而是理直气壮,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强势。

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市”,也一样遵循市场规律。首先加大供给投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资源配置。我国“十三五”期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4%,长期的教育投入,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财政保障。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35亿元,比上年增长8.39%,其中,国家财政教育经费为36990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3%^[9],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水涨船高,持续增长。中宣部、教育部于2015年启动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全国高校开始建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一批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10所,2017年增加了12所,2018年年底增至46所,成为先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阵地和宣传阵地。师生的群聚、辐射,带来市场的热效应,思想的汇聚、碰撞,传播,越来越多人思考、了解、认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带来了超越物质享受而追求思想道德境界的提升,也带来了超越个体欲望而追求社会整体发展的理念提升。教育供给侧改革,还涉及理论更新、实践训练、课堂教学改革、教学技术运用、生活场景再塑、理想愿景创设、教师队伍

提高等等,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的提升契合了经济学的三大规律,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始终处于阈值和效能的“双高”。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适”,首先是育人环境的优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的,必然以人为本。人首先离不开环境,18届三中全会后,党通过反腐倡廉,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党内氛围,带动社会风清气正,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社会环境。其次,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环境。网络作为青少年学习、交流的虚拟所在,充斥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国家反人类的暴力、黑恶势力和粗鄙言辞,拜金主义、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不一而足,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争夺青少年,国家重拳出击,坚决打掉这些在年轻人成长路上布下的陷阱,保持干净阳光积极的网络环境。再次,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心理环境,推动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身体素质锻炼共同走进义务教育,并在高等教育中更是增加了分量,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适”不仅仅是个技术要素,更多的是个“攻心工程”。为此,严把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师资关,专业对口、政治觉悟高、师德高尚,教学能力强,爱国爱党,热爱教育事业,爱护学生,并且“自己信道才能讲道”,自觉研读、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完成思想政治课教育目标。顺应了信息化教育和现代化教育改革的要求,自觉在教学教法上实现了“四个转变”,把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寻求学习,从传授知识为主向培养学生的素质、能力为主,从课堂讲授向多种学习方式并举转变。建设“大思政”,课堂、第二课堂、慕课,名家讲坛、社会实践、校企联合等等,不同形式、不同方法多层次并举,多渠道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例“陈果现象”和群案“马克思主义学院”显示了“适”的偶然性和普遍性,也实证了我国在探索寻找“适”上的新举措,新方法。

求“是”见初心,求实有成效。教育的根本是立德树人,遵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青少年的“拔节孕穗期”,我们“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

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0]。在青年中,“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对青壮年“要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做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我们既要讲清道理,润物细无声,又要付诸实践,知行合一,将青少年成长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规律统一于立德树人,贯穿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各领域,使受教育者成为能够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健全的社会实践活动个人。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势”“市”“适”“是”形势分析

第一,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争斗与各种敌对势力的围攻,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大势”存在对立面。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的“西化”“分化”“中国威胁论”“宪政民主”,挑战我国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攻击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不遗余力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错误。”^[11]

信息化时代的网络传播,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消费主义以学理、学术的名义,为西方价值观摇旗呐喊,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势”也是一种僭越。后现代主义是以环境污染、食品添加、城市拥堵,人对生活状态不满意的现实考量中进入中国的,扩大“工业化”造成的损伤和担忧,恰逢其时地迎合了国内学术批判的口味。一部分人从自由主义出发,调侃和嘲弄现实,认为要么回到过去,拒斥国家管理,要么,生活在未来,消解政党权威,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和教育。历史虚无主义则是以人文关怀为由,认为对严肃问题的思考是无谓的深沉与作态,历史是人为编造的文本,受到叙述着、著作人的解读、歪曲,不足信任,强调个人至高无上,认为人只有摆脱国家、政党的工具性存在与管理,才是自由和有价值的。新消费主义倡导人们及时行乐,体现消费价值,无底线消耗社会资源,甚至赊欠人格和生命。它们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是政治噱头,“是错误的延续”^[12]。

第二,供需失衡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市”受到影

响。首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方针和形势要进行宣讲、分析、引导和解答,各级教育机构和学校,特别是社会办学架构,对党的理论学习不够,形势研判和解读南辕北辙,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问题的对应解答和引导不充分、不平衡,不全面,不能说服人,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无用”或“有价无市”的世俗评价。其次,新媒体的快速传播和微媒体发展,人人都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碎片化吸引“眼球”,断章取义地发挥,都悖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市”,使思想政治教育时强时弱,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在供给侧不能保持稳定升值,影响了价值判断。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适”,亟待完善和创新。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需要投入更多研究,在多学科的交叉中,主导地位不突出,研究内容和对象要么简化,用“大思政”一言一避之,要么扩张到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学科范围,成为捡拾“思想政治教育学帝国”的篮子,缺乏科学化和专业化,走向泛政治化^[13]。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式上,政策注释多,理论讲授多,灌输多,说教多,还没做到一事一人一解,深入人心,潜移默化,人文关怀,观念的引导和思想的开解少,完成任务多,在教育过程中的虚多实少唱高调,缺少探讨自我的分析和坦诚的交流,最终落入苍白空洞的窠臼,失去了凝聚力。

第四,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违背“是”的现象。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是一个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过程。但是,现实中,为了赶任务、上项目、争荣誉、比成绩,思想政治工作被当成硬条件,写材料、签字等要求短时间快速完成,等不到思想接受、思考逻辑,领悟道理,生硬的接受与思想的转变过程不相符合,教育和自我教育不能相互转化,思想提升、进步、巩固缺乏落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教育规律的结果不一致,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是”与教育过程的“是”两张皮,不是双轨合一,而是各行其道,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和实效不突出。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势”“市”“适”“是”的展望和进阶路径

升“势”靠实力,造“势”要方法。中国已经是国际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科技领域的载人航天、神舟飞船、蛟龙潜海、自造航母,“中国制造”带来的国际声誉和国内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经济发展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底气。目前,要保持“中国制造”在产业结构转型中成功升级,保持科技创新能力,在军工领域、航空航天、医学技术、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尖端机器人等20个关键科学技术领域中,我国要想占据一席之地,必须培养大量的人才,才能产生顶级的工程师、科学家,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教育人才报效祖国、兴业敬业、关爱他人、奉献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既要有好教材,也要有好的教法,我们要掌握“外塑”与“自塑”并行法。在“外塑”上,多年来选拔、支持、组织的对西方文化背景了解的专家学者,研究西方和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品德教育、教育制度的异同,在比较中探寻自我教育特色与体制,已初见成效,需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首先,强化党中央领导的各级党委落实第一责任,狠抓落实,将“中央领导、府院协作”的国家意识、大局意识贯彻下去,真正能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放眼全球。其次,严格各种社会力量办学、民众团体培训、学校教育、研究机构的教育评估与检查,取缔一批、淘汰一批落后教育产能,鼓励教育创新竞争,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复合空间,探索实践成效,完成“内塑”的坚挺和严格。

新时代创新“市”,面对新变化,要有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迎来新时代,要“乘势而上”和“顺势而为”。首先,提高供给侧的含金量,要研究新形势、新情况,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专家学者纷纷“入市”,释放强势信号,领导人带头讲党课、作报告,阐理论,抓实效,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能,系统“兴市”。其次,针对我国“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专家学者做足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道场,将国外思想政治的起始根源、研究内容、理论导向及现实表征,与现实思潮、利益集团的宣传倾向,进行比较和剥离,对其核心和主旨进行批判性评价,克服西方“泛知识化”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形成群团集聚和智库,发出“中国声音”。最后,吸引需求侧的需求,不断完善的思想教育建制体系,博大的学科研究领域,丰富学科内容,独特的学科特色,开设专业教育,增加“中国化”的学术话语,采用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受众入市,扩大思想政治在各级各类学习、考试的权重和分值,增设就业岗位,疏通需求侧的应用途径和提升通道。

没有最好,只有“适”合更好。对于青年学生,

开展特色实践活动,不间断地进行体验教育,根植爱国情怀。对于大多数的职业人员,借助文化消费和道德情感平台进行思想关怀,在舒解心情、畅通思想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拓展网络平台,丰富网络内容,净化网络空间,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学习强国”,不仅仅作为党员学习的党建工作平台,而且还包括了社会历史、经济科学、日常百科、戏曲美工等,内容全面,更新迅速,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充实自己,学以致用,在网络遨游中,引导人们树立网络思维,提升网络政治素养和文化素质,传播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对于极少数所谓“政治冷淡”的人的胃口,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可以滋养心灵,涵育品行,让他们回到关心自己、关心社会、关注国家发展的大环境中来,增强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

思想政治教育的“是”是在“势”“市”“适”中实现的。规律的作用,是经过市场运行的,更是通过实践检验的。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处于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深化与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双轨合一,交互融合。互联网、新媒体等科技平台扁平化的交流方式,开放的对话,拉近思想政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离,实现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瞬时的角色转换,使

所有人进入教育——自我教育——再教育过程,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

参考文献:

- [1]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2.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9.
- [9]欧娜.中国教育2018年年报[N].中国教育报,2019-05-01.
- [10]田心铭.简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兼评“德育非政治化”的观点[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6).
-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2]刘基,闫立超.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反思与重构[J].求实,2011(12).
- [13]王习胜.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9).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Trend”, “Market”, “Suitability”, and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NG Suq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s 19th congress, our country's great attention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kes a new and strong “tren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market” for both the educator and the educated. Its extension and benefit are decided by “suitability”, which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educational “principles”.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leaders of the country should develop the “trend”, and experts and scholars enter the “market” one after another.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he society follows the “principles” and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 “suitability” of new era of Internet +, forming a closed loop of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to keep on consolidating and pus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 “big trend” which has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rend; market; suitability; principles

河南辛夷 SRAP 分子标记的引物筛选

王 岚¹, 张 宏², 李靖靖^{1*}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南阳市南召县辛夷产业办公室, 河南 南阳 474650)

摘要:筛选出河南辛夷 SRAP 分子标记的引物, 为后续遗传多样性分析提供分子学基础。选取 34 个河南辛夷品种, 应用 SRAP 分子标记的 36 对引物组合对其 DNA 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共筛选出 8 对背景干净、条带清晰、扩增条带丰富、重复性好的 SRAP 分子标记的引物, 应用这些引物进行 PCR 扩增, 多态性谱带比例为 77.57% (83/107)。利用 SRAP 分子标记筛选出的引物, 能满足从 DNA 水平上对河南辛夷进行多态性分析。

关键词:辛夷; SRAP; 分子标记; 引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20

中图分类号:Q9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112-04

辛夷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之一, 其性温、味辛, 具有祛风散寒、开穴通窍之功能, 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临床应用历史^[1]。辛夷的采集主要集中在花蕾部位, 对其有性繁殖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国内外对辛夷的需求增加, 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但缺乏利用分子标记进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受到严峻考验, 如何保证辛夷的可持续发展是未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2]。随着 DNA 分子标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检测技术的日益完善, 从 DNA 水平上对品种的遗传特异性进行快速、准确、不受季节或外环境影响的鉴定成为可能, 可为道地品种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本研究旨在筛选出辛夷序列相关扩增多态性 (Sequence-Related Amplified Polymorphism, SRAP) 分子标记的引物, 为河南辛夷的道地性品牌提供分子学基础。

1 文献综述

辛夷始载于《神农本草经》^[3], 是我国民间常用

的中药材, 具有抗炎、抗过敏作用^[4]。辛夷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临床应用历史, 其性温、味辛, 具有祛风散寒、开穴通窍之功能, 临床上主要用于抗炎、抗病毒治疗。辛夷多为栽培, 少有野生, 药用原植物较多, 种类多样。辛夷富含芳香类物质, 其中挥发油含量高达 3%~4%, 主要成分为松油二环烯、桉精油等, 是轻化行业和食品行业重要的添加剂。此外, 辛夷树种根系发达, 耐干耐寒, 生长迅速、树形及树冠美观, 花色鲜艳, 也是重要的速生和绿化树种。辛夷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 近些年, 国内外对辛夷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辛夷价格不断攀升, 市场开发前景十分广阔。作为辛夷的原产国, 其植株主要分布于河南、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河南省南召县位于伏牛山东段南麓, 长江流域汉水上游, 是河南省山区林业重点县之一。南召辛夷具有绿色、无污染、道地性好, 药用价值高, 用途范围广等优点。南召栽培辛夷的历史悠久, 《本草纲目》上对南召辛夷曾有详细记

收稿日期: 2019-08-15

基金项目: 2017 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河南辛夷’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及 SNP 分子标记开发”(172102310140);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青年骨干教师项目“应用 SRAP 标记进行‘河南辛夷’种质资源研究”(2017GGJS06)

作者简介: 王岚(1982—), 女, 河南郑州人, 硕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植物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

通信作者: 李靖靖(1962—), 女, 河南南阳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功能材料和绿色食品添加剂研究。

载,把南召辛夷列为“本经上品”;《河南省志》第五十八卷记载,辛夷花应用始于元末明初,以南召所产之地最佳;1977年南召辛夷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列为正品,在国际市场上素有“南召辛夷不验货”的嘉誉。2001年3月,原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经济林协会将南召县作为首批命名的全国唯一“中国辛夷之乡”;2003年,南召辛夷及其制品获得原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保护注册认证。南召县栽培辛夷的历史悠久,为历史上辛夷的原产地,但目前市场品系混乱,真伪难辨,严重影响辛夷药品质量及道地药材的品牌效应^[2]。目前,国内外有关以辛夷种质资源为研究对象的报道不多,且辛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化学成分分析、临床应用、栽培技术、品种选育、种属分类等方面^[2,5-6],利用分子标记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报道甚少,仅见郭乐等^[7]利用 ISSR 标记对野生望春玉兰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进行过比较分析,这对于人工栽培的辛夷种质资源多样性和种质鉴定而言,提供的分子水平的理论依据不够充分,也无法为“河南辛夷”道地性品牌的保护提供有力的支撑。

利用 DNA 分子标记能科学准确地鉴定植物品种以及种质资源材料的遗传特性,对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遗传资源评价、种子质量鉴定和道地性品牌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8]。目前已经建立的 DNA

分子标记技术有十多种,但每种方法的复杂性、可靠性均不相同。SRAP 分子标记是分析植物材料遗传背景的有力工具,它通过独特的双引物设计对基因的开放式阅读框特定区域进行扩增,因不同个体以及物种的内含子、启动子与间隔区长度不同而产生多态性。赵秀娟等^[9]利用 SRAP 筛选标记研究 43 份苦皮的遗传多样性表明:平均每对引物扩增可得到 14.15 条多态性谱带,多态性位点 42.11%。SRAP 分子标记具有简便、产率高、可显示大量的共显性标记、易从序列中得到分离的条带等优点,在遗传学和育种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于各类农作物、中药材等的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领域^[10]。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

采取河南省南召县辛夷树种盛花期的花蕾,共 34 个个体,由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辛夷产业办公室张宏提供(见表 1),采摘后用自封袋封装, -70℃ 冰箱冻存。

2.2 实验仪器

DP305 植物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NanoDrop 2000C 微量分光光度计:美国 NanoDrop 公司;Tanon1600 凝胶图像处理系统: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

表 1 河南辛夷编号及品种名称

编号	标本数量	品种	采集地	采集日期	采集部位
1-1,1-2,1-3,1-4,1-5	5	大毛桃	小店乡马庄村	2017-10-27	花蕾
2-1,2-2,2-3,2-4,2-5	5	串鱼	小店乡马庄村	2017-10-27	花蕾
3-1,3-2,3-3,3-4,3-5	5	猴巴掌	小店乡马庄村	2017-10-27	花蕾
4-1,4-2,4-3,4-4,4-5	5	串鱼-猴巴掌	小店乡马庄村	2017-10-27	花蕾
5-1,5-2,5-3	3	辛夷王	小店乡马庄村	2017-10-27	花蕾
6-1	1	驴奶头	小店乡马庄村	2017-10-27	花蕾
7-1,7-2,7-3,7-4,7-5	5	紫玉兰	皇后乡天桥村	2017-10-27	花蕾
8-1,8-2,8-3,8-4,8-5	5	红玉兰	皇后乡天桥村	2017-10-27	花蕾

2.3 实验方法

2.3.1 DNA 提取及检测

每个品种称取 70~100mg 移入研钵,加入少量石英砂,研磨成细粉末状。将粉末加入 2.0mL 离心管中,应用植物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北京天根,DP305),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提取 DNA。用微量分光光度计(美国 NanoDrop 2000C)测定 DNA 的 OD 值及 A260/280 值,分光光度计测定 DNA 浓度, -70℃ 冰箱冻存备测。

2.3.2 SRAP-PCR 反应体系及检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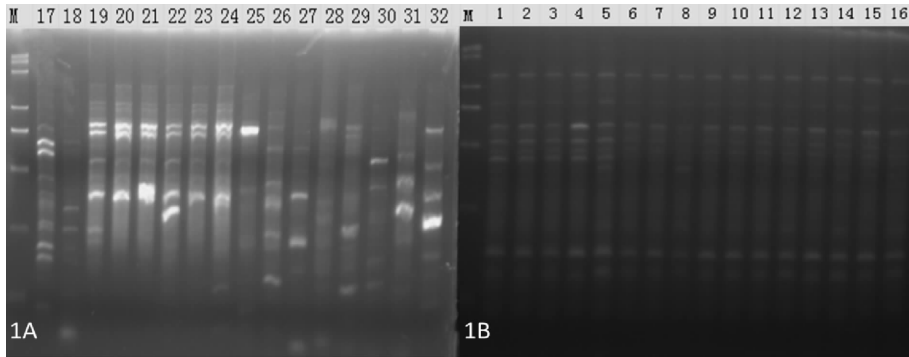
参考 2001 年由 LI 和 QUIROS^[11]创建的 SRAP 方法,并对扩增体系和程序进行优化。正反向引物由上海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见表 2)。通过正反向引物正交实验,组成 36 对 SRAP 引物组合,对 34 个辛夷品种进行初筛。PCR 扩增采用 25μL 反应体系,其中 2.5μL 10×PCR buffer(含 MgCl₂),1μL 2.5 mmol·L⁻¹ dNTPs,正反向引物各 1 μL,模板 DNA 30ng, Taq DNA 聚合酶 0.2 μL,余双蒸水补齐。扩增

程序:94℃ 预变性 3 min;94℃ 变性 1 min,35℃ 退火 1min,72℃ 延伸 1 min,5 个循环;94℃ 变性 1 min,50℃ 退火 1 min,72℃ 延伸 5min,35 个循环;4℃ 保存。在含有核酸染料的1.8% 琼脂糖凝胶,电极缓冲液为 0.5 × TBE,110 V 电压下对 PCR 产物进行电泳分离,电泳后用 Tanon1600(上海天能)凝胶图像处理系统对凝胶进行拍照。

表 2 SRAP 所用引物序列(5' - 3')

编号	正向引物	编号	反向引物
me2	TGAGTCCAAACCGGAGC	em2	GACTGGGTACGAATTTGC
me5	TGAGTCCAAACCGGAAG	em4	GACTGGGTACGAATTTGA
me6	TGAGTCCAAACCGGTAA	em5	GACTGGGTACGAATTAAC
me12	TTCAGGGTGGCCGGATG	em10	GACTGGGTACGAATTCAG
me14	TGAGTCCAAACCGGATC	em12	GACTGGGTACGAATTATG
me16	TGAGTCCAAACCGGACA	em14	GACTGGGTACGAATTACG

2.3.3 优化体系的验证



A. 初筛(编号为引物序号)

B. 复筛(编号为样本序号)

图 1 SARP 部分引物的初筛和复筛

3.3 河南辛夷多态性分析

应用筛选出的 8 对引物对 34 个河南辛夷品种进行 PCR 扩增,共扩增出 107 条谱带,83 条多态性

利用优化好的 SRAP 反应体系,对 34 个河南辛夷品种进行 PCR 扩增,分析多态性。

3 结果

3.1 河南辛夷基因组 DNA 的检测结果

经分光光度计测定,所有样品的 DNA A260/280 值在 1.7 ~ 1.9,材料的基因组 DNA 质量和浓度都较高,满足本试验的要求。

3.2 引物的筛选

3.2.1 初筛

将 34 个河南辛夷品种的 DNA 各取 1ul,作为混合 DNA,对所有的引物组合进行初筛(图 1A),初步筛选出 10 对引物组合。

3.2.2 复筛

在初筛的基础上,对选出来的 10 对引物组合用 34 个辛夷品种进行复筛(图 1B),共筛选出 8 对引物组合(见表 3),满足背景干净、条带清晰、扩增条带丰富的条件,可用于深入的研究。

谱带,其中多态性比例为 77.57%。每个引物组合的扩增条带为 11 ~ 17(表 3),DNA 扩增产物的大小在 100 ~ 2000bp。

表 3 复筛的 SRAP 引物组合序列(5' - 3')及扩增结果

引物组合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位点总数(N1)	多态性位点数(Np1)	多态性位点比例(Pp1,%)
me2/em4	TGAGTCCAAACCGGAGC	GACTGGGTACGAATTTGA	13	10	76.92%
me2/em14	TGAGTCCAAACCGGAGC	GACTGGGTACGAATTACG	11	9	81.82%
me5/em2	TGAGTCCAAACCGGAAG	GACTGGGTACGAATTTGC	11	9	81.82%
me5/em10	TGAGTCCAAACCGGAAG	GACTGGGTACGAATTCAG	14	12	85.71%
me6/em4	TGAGTCCAAACCGGTAA	GACTGGGTACGAATTTGA	16	10	62.50%
me6/em12	TGAGTCCAAACCGGTAA	GACTGGGTACGAATTATG	17	14	82.35%
me12/em2	TTCAGGGTGGCCGGATG	GACTGGGTACGAATTTGC	13	11	84.62%
me14/em4	TGAGTCCAAACCGGATC	GACTGGGTACGAATTTGA	12	8	66.67%
合计			107	83	
			13.4	10.4	77.57%

4 结论

本研究运用 SRAP 分子标记对河南省南召县的 34 个辛夷品种进行了研究,经过初筛和复筛,最终选出 8 对背景干净、条带清晰、扩增条带丰富的引物组合,并进行辛夷多态性分析,共扩增出 107 条谱带,83 条多态性谱带,其中多态性比例为 77.57%,为今后河南辛夷在 SRAP 分子标记方面的研究提供依据,且能满足对辛夷的多态性分析、聚类分析等。为辛夷品种分类鉴别、种群进化潜力、优质种质资源的保护和选育提供可靠的分子学证据,对从源头保障“河南辛夷”药材道地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 [1]朱伟雄,杨晋凯,胡道伟.辛夷成分及其药理应用研究综述[J].海峡药学,2002,14(5):5-7.
- [2]张行,吴迎春,郭夫江,等.道地药材南召辛夷现状调研[J].中药材,2015,38(11):2285-2287.
- [3]丁兆平.神农本草经解读 50 味[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29.
- [4]罗会畏.辛夷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3.

- [5]吴玉洲,张新权,倪锋轩.豫西山区辛夷树种苗及栽培技术[J].中国林副特产,2011(1):54-56.
- [6]刘星,单杨.辛夷的提取、应用及其品质评价研究进展[J].食品工业科技,2011,32(11):506-510.
- [7]郭乐.望春玉兰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ISSR 分析[D].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4.
- [8]周琳,段玉,文博,等.SNP 分子标记及其在木本植物遗传育种的应用[J].亚热带植物科学,2018,47(2):187-193.
- [9]赵秀娟,宋建文,胡开林.苦瓜种质遗传多样性的 SRAP 标记分析[J].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3,14(1):78-84.
- [10]WANG L, XIAO A H, MA L Y,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Magnolia wufengensis* (Magnoliaceae) cultivars using phenotypic traits, SSR and SRAP markers: insights into breeding and conservation[EB/OL]. [2019-08-10]. <http://www.doi.com/p-1875354644.html>.
- [11]LI G, QUIROS C F. Sequence-related amplified polymorphism (SRAP), a new marker system based on a simple PCR reaction: its application to mapping and gene tagging in Brassica[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01, 103(2):455-461.

(责任编辑 姚虹)

Primer Screening of SRAP Molecular Markers of Henan Provincial Magnoliae Flos

WANG Lan¹, ZHANG Hong², LI Jingjing^{1*}

(1.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Food Engineering,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Nanzhao County Xinyi Industrial Office of Nanyang, Nanyang, Henan 474650, China)

Abstract: To screen out the primers of SRAP molecular markers in Henan provincial Magnoliae Flos and provide molecular basis for subsequent genetic diversity analysis, a total of 34 Henan provincial Magnoliae Flos were selected and their DNAs were analyzed for genetic diversity using 36 pairs of primers with SRAP molecular markers. Eight pairs of primers with clear background, clear bands, abundant amplified bands and good reproducibility of SRAP molecular markers were screened. These primers were used for PCR amplification, and the ratio of polymorphic bands was 77.57% (83/107). The primers screened by SRAP molecular markers can satisfy the polymorphism analysis of Henan provincial Magnoliae Flos from the DNA level.

Key words: Magnoliae Flos; SRAP; molecular marker; primer

纳米二氧化硅/淀粉/聚乳酸三元复合 材料力学性能研究

豆鹏飞

(长庆油田公司, 陕西 榆林 718100)

摘要:对淀粉进行增韧改性,研究共混改性后力学性能的变化。制备不同含量的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通过双螺杆挤出机进行挤出、造粒,通过注塑机注塑成样条,测试其力学性能,检测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结果表明,偶联剂最佳添加量为0.8%,纳米二氧化硅最佳添加量为1.5%。在淀粉/聚乳酸共混体系中,随着聚乳酸含量的增加,材料的拉伸强度先降低后升高,聚乳酸的最佳添加量为20%。改性后的淀粉材料力学性能优于改性前,断裂伸长率明显提高。

关键词:力学性能;淀粉改性;添加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21

中图分类号:TQ4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116-04

淀粉是有刚性的高分子材料,纯淀粉不具备热加工性能,在制作塑料制品的过程中无法进行机械加工,因此淀粉的塑化改性尤为重要^[1]。聚乳酸(PLA)属合成直链脂肪族聚酯,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其疏水性、抗冲击性差,细胞的亲和性差,生物相容性降解周期较难控制,所得产物韧性也相对较差,极易弯曲变形^[2]。通过对淀粉和聚乳酸共混体系进行增容改性,改善亲水性淀粉与聚乳酸的相容性,使聚乳酸与淀粉共混物呈现两相连续状态,淀粉力学性能得到提高。受聚乳酸自身脆性高、冲击强度低的性质制约,在共混体系中用甘油作为增塑剂,增强了混合物体系中聚乳酸的结晶度,体系的相分离可使其力学性能有明显的波动^[3]。通过添加偶联剂使淀粉与聚乳酸之间的界面张力降低,两相的结合力得到增强,机械性能得到提升。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材料

木薯淀粉:食品级,广西南宁金光有限公司;甘油:化学纯,广州玉华化工有限公司;纳米二氧化硅:化学纯,鹏翔化工有限公司;聚乳酸:化学纯,浙江海正生物有限公司。

1.2 实验仪器

SHR-10A 高混机:张家港格兰机械有限公司;CET-35 双螺杆挤出机:科倍隆科亚(南京)公司;HTF90WE 塑料注塑成型机:宁波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B-5200DTN 超声波清洗机: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MT4104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深圳新三思公司;CS101-2ABX 电热干燥箱:中国重庆银河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案

(1)空白实验:分别用甘油含量为15%,20%,25%,30%,35%的甘油塑化淀粉进行挤出、造粒和注塑,并测试其力学性能。

(2)甘油含量为30%的塑化淀粉中加入聚乳酸,通过高混机共混,应用双螺杆挤出机挤出、造粒、注塑成样条。

(3)甘油配比定位在30%,纳米二氧化硅用量为1.5 phr,加入甘油中塑化淀粉,挤出、造粒和注塑样条。

(4)甘油配比定位在30%,纳米二氧化硅用量为1.5 phr,偶联剂DB-570用量为1.2 phr,分别加入甘油中塑化淀粉并与PLA共混挤出、造粒和注

收稿日期:2019-09-28

作者简介:豆鹏飞(1992—),男,陕西榆林人,硕士,长庆油田公司工程师,从事金属材料以及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工作。

塑,测试其力学性能。

(5)甘油含量为30%,加入偶联剂DB-570用量为1.2 phr,分别塑化淀粉与PLA共混、造粒、注塑并测试样条的力学性能。

1.4 样条的力学性能测试

使用CMT-4104型微机控制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进行拉伸性能测试。拉伸速度为5mm/min或20mm/min(根据国标0.5min~5min内拉断),测量试样由开始拉伸到断裂所承受的负荷及其伸长量,计算试样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1)拉伸强度:试样的拉伸强度用拉伸实验中试样所承受的最大拉伸应力进行计算,计算式为

$$\sigma_{\text{断}} = F \div (a \times b), \quad (1)$$

式中: $\sigma_{\text{断}}$ —拉伸强度,MPa; F —试样断裂时承受的最大张力,N; a —试验前的试样宽度,mm; b —试验

前的试样厚度,mm。

(2)断裂伸长率:用试样断裂时的相对伸长率表示,计算式为

$$\varepsilon_{\text{断}} = \frac{l - l_0}{l_0} \times 100\%, \quad (2)$$

式中: $\varepsilon_{\text{断}}$ —断裂伸长率,%; l —试样断裂时标线之间的距离,mm; l_0 —试样标线间的原始距离,mm。

2 结果与讨论

2.1 淀粉力学性能测试

以甘油与木薯淀粉的质量比分别为30:100,35:100,40:100和45:100制备样条。样条拉伸强度与断裂伸长率见表1,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与甘油含量关系曲线如图1所示。

表1 以不同甘油与木薯淀粉的质量比制备的样条的拉伸强度与断裂伸长率

编号	30 : 100		35 : 100		40 : 100		45 : 100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第1根	14.83	0	20.49	0	6.88	42.08	16.74	0.84
第2根	15.1	2.28	21.55	0.01	6.61	75.67	16.96	1.35
第3根	18.91	0.47	18.79	1.73	7.36	41.61	18.32	0.05
第4根	19	0	18.71	2.65	7.1	78.96	16.27	0.51
平均值	16.96	0.69	19.89	1.1	6.99	59.58	17.07	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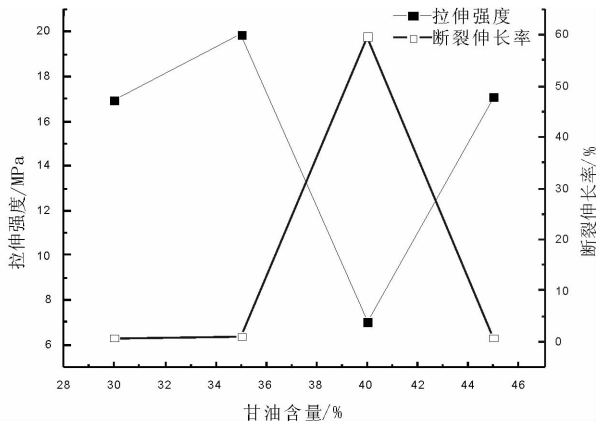


图1 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与甘油含量关系曲线

由图1可以看出,样条的平均拉伸强度随甘油含量的增加出现升高-下降-升高的趋势,甘油含量为30%时拉伸强度很高,此时的断裂伸长率最低,材料表现为很脆,很容易被拉断。相对于甘油含量为30%,甘油含量为40%时材料有一定的韧性。加入甘油为增塑剂改变了淀粉中的氢键,甘油为小分子进入到淀粉中,甘油中的羟基相互作用,削弱了淀粉分子间的氢键,使得淀粉的拉伸强度下降^[4]。

2.2 聚乳酸力学性能测试

将聚乳酸作为一组空白,为后续的淀粉/聚乳酸挤出和注塑实验做参考,实验数据见表2。聚乳酸平均拉伸强度为64.72MPa,平均断裂伸长率为1.27%。

表2 聚乳酸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名称	厚度/mm	宽度/mm	原始标距/mm	拉伸强度/MPa	最大力/N	拉伸屈服力/N	断裂伸长率/%	拉伸断裂应力/N	拉伸屈服应力/MPa
PLA1	4	10	50	64.36	2574.36	2593.94	1.91	64.36	64.85
PLA2	4	10	50	66.18	2647.11	2650.26	1.1	66.18	66.26
PLA3	4	10	50	64.41	2576.25	2576.25	1.07	64.3	64.41
PLA4	4	10	50	63.91	2556.28	2566.06	1	63.91	64.15

通过对聚乳酸挤出和注塑温度的摸索,得到了最好的一组聚乳酸挤出温度和注塑温度。实验中聚乳酸的脆性很大,加热后改变了聚乳酸的性能。查阅文献得到聚乳酸的拉伸强度为40MPa~60MPa,断裂伸长率为4%~10%。实验所得的聚乳酸拉伸强度得到了提升,通过加工后的聚乳酸脆性增大。

断裂伸长率减小证明此时材料在拉伸过程中会立即脆断。

2.3 淀粉、聚乳酸、不同含量偶联剂力学性能测试

不同含量偶联剂改性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实验数据见表3,其关系曲线见图2。

表3 不同偶联剂含量的改性淀粉/聚乳酸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编号	0.4		0.8		1.2		1.4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第1根	17.66	0.13	9.41	17.89	13.15	1.13	12.34	1.93
第2根	16.78	0.89	8.57	7.69	11.56	1.13	14.65	1.02
第3根	16.57	2.23	9.16	10.53	13.25	1.03	18.32	0.05
第4根	19.28	1.29	8.36	7.9	10.72	1.02	13.45	0.88
平均值	17.57	1.14	8.87	11	12.17	1.07	14.69	0.97

由图2可知,共混材料拉伸强度随着偶联剂含量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偶联剂作为一种增容剂降低了聚乳酸同淀粉的界面张力,因此拉伸强度先降低而后缓慢升高。断裂伸长率随着偶联剂含量的增加而降低,最好的偶联剂含量配比在0.4%~0.8%。拉伸强度降低,材料相对地慢慢有韧性,不会很快被拉断。证明偶联剂的添加量不易过大,含量越多越会影响材料的力学性能^[5-7]。

2.4 淀粉、偶联剂、不同含量聚乳酸力学性能测试

不同含量聚乳酸共混材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实验结果见表4和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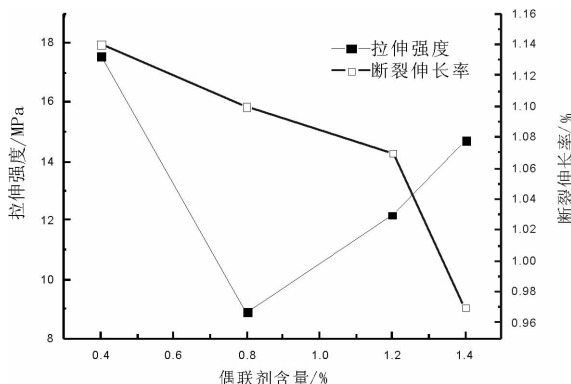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含量偶联剂对共混物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曲线图

表4 不同含量聚乳酸共混物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编号	10		20		30		40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第1根	15.07	0.62	13.15	1.13	18.35	0.75	18.48	0.92
第2根	10.57	5.65	11.56	1.13	16.04	1.08	9.22	1.68
第3根	18.89	0.7	13.25	1.03	17.81	0.92	20.14	1.35
第4根	15.75	1.02	10.72	1.02	18.11	0.67	18.29	1.55
平均值	15.07	1.99	12.17	1.07	17.57	0.85	16.53	1.37

如图3所示淀粉/聚乳酸共混体系中加入不同含量的聚乳酸,偶联剂的含量定位在1.2%,聚乳酸的含量增加后,淀粉/聚乳酸共混体系的拉伸强度先降低后升高,聚乳酸含量为30%时拉伸强度最大,此时的材料表现为硬而脆,但其断裂伸长率最低,说明此时材料没有单性伸长,会立即脆断。聚乳酸含

量在20%时拉伸强度最低,相对于聚乳酸含量30%,此时的材料脆性小,断裂伸长率高。

2.5 淀粉/聚乳酸、偶联剂、纳米二氧化硅力学性能测试

通过前期的工作找到了最好的聚乳酸、偶联剂的配比,在此基础上加入纳米二氧化硅用来增加材料的韧性。添加纳米二氧化硅后试样测试数据如表5,试样平均拉伸强度为13.24MPa,平均断裂伸长率为2.18%。添加纳米二氧化硅可以增韧改性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测试出现了位移后退现象是因为在拉伸过程中材料没有在固定范围内断裂,导致位移发生变化,但是材料已经断裂,图形还在变化,材料在两端处断裂。加入纳米二氧化硅后拉伸强度相对加入纳米二氧化硅前有了明显的下降,纳米二氧化硅增韧了材料,使材料比加入纳米二氧化硅前柔软,断裂伸长率得到了提高,材料不会很快发生脆裂^[8-10],添加纳米二氧化硅材料的韧性得到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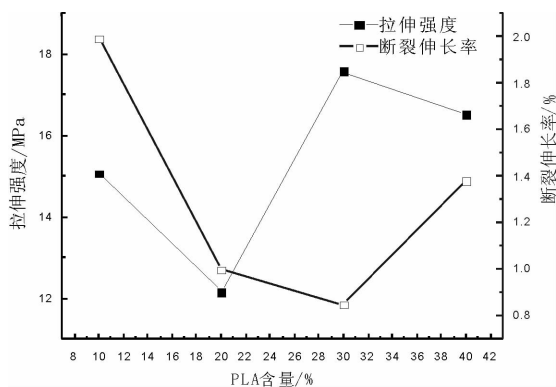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含量聚乳酸对共混物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曲线图

表5 添加纳米二氧化硅的共混材料力学数据

样条名称	试样厚度/mm	试样宽度/mm	试样原始标距/mm	拉伸强度/MPa	最大力/N	拉伸屈服力/N	断裂伸长率/%	拉伸断裂应力/N	拉伸屈服应力/MPa
纳1	4	10	50	11.02	440.96	448.65	0.91	11.02	11.22
纳2	4	10	50	9.81	392.53	392.53	5.59	1.44	9.81
纳3	4	10	50	18.14	725.57	727.34	0.64	18.14	18.18
纳4	4	10	50	13.97	558.68	558.68	1.56	0.4	13.97

3 结论

通过使用甘油增强改性淀粉,制备了热塑性淀粉材料样条,在此条件下添加纳米二氧化硅和偶联剂 DB-570 改性淀粉,将改性后的淀粉同聚乳酸制备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考察研究纳米二氧化硅和偶联剂 DB-570 对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的力学性能的影响。同时也对添加不同含量的聚乳酸制备出淀粉/聚乳酸共混物的力学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通过在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中添加偶联剂,材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都发生了变化,拉伸强度呈现先降后升、断裂伸长率先升后降的情况。偶联剂的最佳添加量为 0.8%,在此添加量下材料的脆性较低。偶联剂的添加提高了淀粉聚乳酸的相容性。

(2) 添加少量的纳米二氧化硅同样可以改善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的韧性,纳米二氧化硅最佳添加量为 1.5%。加入纳米二氧化硅可以提高材料的韧性。

(3) 聚乳酸的含量对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的力学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聚乳酸的含量增加会使共混材料变脆,聚乳酸的最佳的添加量为 20%,在此添加量下材料有一定的断裂伸长效果。

参考文献:

- [1] 王佩璋,王澜. 淀粉的热塑性研究[J]. 中国塑料, 2002, 16(4): 39-43.
- [2] 陈庆,郭木. 全淀粉热塑性塑料的开发应用[J]. 化工新型材料, 2003, 31(2): 39-41.
- [3] 高延敏,赵琴,李磊,等. 小分子增塑剂对热塑性淀粉中氢键的作用[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26(3): 245-248.
- [4] 吴苏琴,李艳霞,龚磊,等. 聚乳酸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J]. 江西化工, 2007, 21(4): 6-8.
- [5] 肖伟娜,黄雪,冯光炷,等. 聚乳酸增韧改性研究进展[J]. 化工进展, 2011, 30(3): 578-582.
- [6] 杨惠,刘文明,黄小强,等. 聚乳酸合成及改性研究进展[J]. 合成纤维, 2008, 37(3): 1-5.
- [7] 吴海艳,周莉,臧树良. 纳米二氧化硅表面改性的研究[J]. 矿冶, 2010, 19(4): 49-52.
- [8] 和平生. 热塑性淀粉/聚乳酸共混材料的制备、表征及性能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 2011.
- [9] 李勇锋,陆冲,程树军,等. 钛酸四丁酯增韧改性聚乳酸/淀粉共混材料[J]. 功能高分子学报, 2007, 19(3): 304-308.
- [10] 周光大,曹堃,姚臻,等. 同向双螺杆挤出机的停留时间分布及填充度[J]. 化工学报, 2006, 57(12): 3025-3028.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Nano - Silica/Starch/ Polyactic Acid Ternary Composites

DOU Pengfei

(Changqing oil field co., Ltd., Yulin, Shaanxi 718100, China)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is mainly to toughen and modify starch and to explore the change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arch after that. The researchers prepare different content of starch/polyactic acid blend material, through the twin screw extruder extrusion and granulation, by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 injection into spline, and test its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t brea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agent content is 0.8%, and the best nano silicon dioxide optimum adding amount is 1.5%. In starch/polyactic acid blend system, with the increase of polyactic acid content,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material increases after first decreases, and the best addition amount of poly (lactic acid) (PLA) is 20%. The modified starch material's mechanics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before modification, and elongation at break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mechanical properties; starch modification; add the amount

基于蚁群优化的特征基因选择算法

侯远韶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机电工程系,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传统的特征选择算法需要依靠大量的数据进行有监督训练,具有高维和小样本的属性,进而造成数据冗余,导致维数灾难。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一种基于蚁群优化的特征基因选择算法。该算法对传统的蚁群算法模型进行优化,改进蚁群算法的参数选择方法,利用特征对不同数据集的敏感度,寻找最优基因,滤除无关基因,将特征选择过程转化为蚁群寻找最优路径的过程。实验表明,该算法可以有效地对特征进行优化选择,在降低数据维数的同时,提高分类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关键词:蚁群算法;特征选择;优化;数据维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22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6-0120-04

特征选择方法是影响机器学习分类速度和分类精度的重要一环。为了提高分类精度,减少数据计算的复杂度,从原始数据集中提取出一组最能表达原始图像信息的子集,即为特征选择方法。特征选择方法是一个 NP 问题,具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封装式(Wrapper)、过滤式(Filter)和嵌入式(Embedded)^[1]。Wrapper 方法首先利用特定的学习模型大致确定特征子集,通过学习模型的准确性带动特征搜索过程,将学习算法的优劣定性为评估特征选择的标准,进而得到最优子集。该方法需要对分类器进行多次训练才能对每一个子集进行评价,虽然精确度有所提高,但数据冗余计算量大,对数据集较大的模型并不适用。Filter 特征选择方法利用数据自身的统计特性作为基因评价准则,通过判断特征子集与目标函数的相似度得到最优子集。该方法分类速度快,但准确率不高。Embedded 特征选择方法为了得到最优特征子集,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学习模型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得到基因的最终表达形式。该方法虽然能够与学习模型互相影响,但时效性并

不高^[2]。蚁群算法作为一种解决组合优化问题的经典算法,可以很好地改善上述算法的不足,快速精确地提取到特征基因,进而实现提升机器学习分类的精度和速度。

1 蚁群算法

1.1 蚁群算法思想

蚁群算法(ACO)又称蚂蚁算法,是意大利人 Marco Dorigo 在 1992 年提出的基于模拟蚁群觅食行为寻找优化路径的一种自然估算算法^[3]。本质上特征选择问题可以转化为求解离散组合的优化,蚁群算法可以通过选择机制、协调机制和更新机制进行优化。通过分析蚁群的遍历,得到起点和终点之间所有路径中最优的一条^[4]。每个特征可以理解为蚁群觅食时经过的结点,通过 0 或 1 来表示蚂蚁选择的路径,0 表示该基因没有被选中,1 则表示该基因被选中。假设路径为{1,1,0,1,0}则表示第 1, 2, 4 个基因被作为特征基因进行下一步分类,而第 3 和第 5 个基因则作为冗余数据没有被选中。每只蚂蚁经过一次完整的起点到食物的过程称为遍历,即

收稿日期:2019-06-26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基于机器视觉的网状织物表面检测系统研制”(0721002210032);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基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移动机器人最优路径规划策略研究”(20A120007)

作者简介:侯远韶(1986—),男,河南平顶山人,硕士,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机器学习与图像处理。

一个子集,则 m 只蚂蚁可以得到 m 个基因子集。蚂蚁之间通过每个特征结点的信息素表达最优的路径,蚂蚁之间在某一路径传达的信息素浓度越高,就意味着此路径的选择概率越大。特征子集(即蚁群觅食路径)的优劣可以通过适应度函数来得到,特征子集越好适应度函数越大^[5]。基于蚁群的特征选择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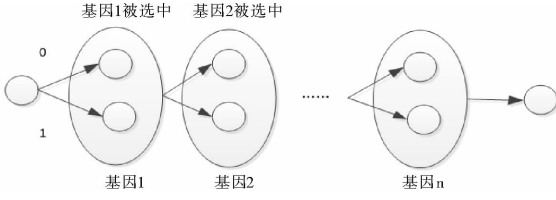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蚁群的特征选择

1.2 蚁群算法数学模型

假设蚁群中蚂蚁的数量为 m ,巢 i 与食物 j 之间的距离用 d_{ij} 表示,某一时间点 t 蚂蚁 k 从巢 i 到食物 j 之间的转移概率用 $p_{ij}^k(t)$ 表示,则

$$p_{ij}^k(t) = \begin{cases} 0, & \text{otherwise} \\ \frac{\tau_{ij}^\alpha(t) \eta_{ij}^\beta(t)}{\sum_{s \in allowed_k} \tau_{is}^\alpha(t) \Delta \eta_{is}^\beta(t)}, & j \in allowed_k \end{cases} \quad (1)$$

式(1)中: η_{ij} 表示巢 i 与食物 j 之间能见度; $\tau_{ij}^\alpha(t)$ 为某一时间点 t 时巢 i 与食物 j 之间留下的信息素和; α, β 为启发因子; $allowed_k$ 为蚂蚁 k 的下个选择路径。

如果 $\tau_{ij}^\alpha(t)$ 表示某一时间点 t 巢 i 与食物 j 之间留下的信息素和,那么 $t + 1$ 时刻的信息素则可以表示为

$$\tau_{ij}(t + 1) = (1 - \rho) \tau_{ij}(t) + \Delta \tau_{ij} \quad (2)$$

式(2)中: $\rho \in [0, 1]$ 为信息素减弱程度; $\Delta \tau_{ij}$ 为信息素增量,即

$$\Delta \tau_{ij} = \sum_{k=1}^m \Delta \tau_{ij}^k \quad (3)$$

2 特征选择

2.1 特征选择理论

为了降低数据维数,避免维数灾难的发生,需要从高维数据集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子集来表示原始的特征集,这一过程即为特征选择^[6]。特征选择的数学描述为:假设一个原始数据集中有 n 个特征分别为 $X_1, X_2, X_3, \dots, X_n$,可以分为 Y 类,通过有监督训练学习算法,得到能表示整个特征集的特征子集 X_{OPT} ,即特征子集 X_{OPT} 根据相应的评价准则确定为整个特征集的最优特征子集。特征选择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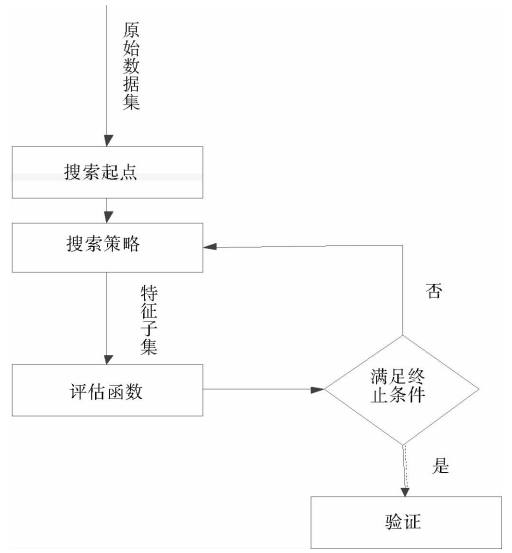


图 2 特征选择流程

2.2 特征选择标准

特征选择主要有 3 个步骤:首先,利用数学方法将图像数据转化为矩阵形式,通过函数来表示图像特征即为特征的形成;其次,通过对原始图像数据集进行映射或者压缩感知等变换,将高维数据低维化,利用低维数据表示图像原始信息,即为特征提取;最后,依据相应的评价准则,从提取到的特征集中选择最优的、全面的、必需的特征子集,去除冗余的子集,即为特征选择。评价特征选择方法的优劣主要从鲁棒性、相异性、单独性(即相关性)和少量性等方面进行评判^[7]。

不同特征子集可以分类是由于其属于特征空间中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的选择标准主要有距离度量、信息度量、相关性度量和一致性度量^[8]。当特征子集中不同样本类别距离尽可能大,同类别样本的距离尽可能小时,特征子集才是最优特征子集^[9]。距离度量的数学表示为:存在样本集 S 中有 n 个特征分别为 $X_1, X_2, X_3, \dots, X_n$,可以分为 C 个聚类, $K_1, K_2, \dots, K_C (i = 1, 2, \dots, C)$,每个样本维数为 T ,距离度量 F_d 的表达式为

$$F_d = \sum_{i=1}^C \sum_{y \in K_i} \|y - w_i\|^2 \quad (4)$$

式(4)中 w_i 为类中心向量。其中

$$y = (y_1, y_2, \dots, y_T) \quad (5)$$

$$w_i = \frac{1}{n} \sum_{y \in K_i} y \quad (6)$$

$$\|y - w_i\|^2 = \sum_{i=1}^T (y_r - w_{ir})^2 \quad (7)$$

只有当取 F_d 最小值时,表明选择的子集为最优特征子集。

3 基于蚁群优化的特征基因选择

蚁群算法将路径结点作为特征,边缘作为下一特征选择,通过每只蚂蚁对整个路径的遍历,得到满足停止条件的最小数量的特征和结点^[10]。但蚁群算法容易在局部循环,同时收敛速度慢,即蚂蚁会对同一路径重复搜索,导致算法停滞、计算数据量加大。同时算法对参数的要求比较高,参数的设置决定了算法的质量^[11]。因此,需要对蚁群算法进行优化和改进。以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算法的优化和改进。

a. 增强概率的自适应性。蚁群算法将路径结点作为特征,边缘作为下一特征选择,因此对选择下一结点概率算法进行优化。

b. 蚁群通过每个特征结点的信息素表达最优的路径,蚂蚁之间在某一路径传达的信息素浓度越高就意味着此路径的选择概率越大。因此,为了使信息素分配更加合理,对信息素更新规则进行优化。

c. 将蚁群算法与其他智能优化算法相结合,如与粗糙集等相结合。

本文采用基于蚁群算法与粗糙集的特征基因选择算法。粗糙集作为研究不确定性方法,利用已知知识刻画不确定知识,可以解释不精确数据间的关系。定义信息系统可以由 $S = \langle U, A, V, f \rangle$ 表示, A 表示非空有限条件属性集合, V 表示属性的值域, U 为非空有限条件对象集合, f 则为 V 的映射即信息函数。其中 $\forall a \in A, x \in U, f(x, a) \in U, f(x, a) \in V_a, A = C \cap D$ 且 $C \cap D = \Phi$ 。具体算法流程如图 3 所示。

输入:信息系统 $S = \langle U, A, V, f \rangle$ 。

输出:特征子集 CS 的最优解 (Characters - Set)。

(1) 将原始数据信息进行重置初始化。

a. 最大重复反馈次数 $\max = n$, 蚂蚁数目 m , 候选特征子集;

b. 选择初始特征子集 S , 设定初始值为零, 属性集的分类个数初始值为 NULL;

c. 将蚂蚁置于初始结点, 设置初始值各特征结点信息素浓度为 $\tau_i(0) = \tau_0$ 。

(2) 生成特征解和评价结点重要性函数。

a. 构造解: 在起始点随机放入 m 只蚂蚁, 进行属性集遍历;

b. 评价解: 所有蚂蚁遍历后, 选择最好的蚂蚁作为迭代的最优结果, 通过评价结点重要性函数来得到特征子集的是否为最优子集。

(3) 验证算法的终止条件。假如得到了特征子集且最大重复反馈次数已经到达了最大值, 则进行

步骤 6, 否则进行步骤 4。

(4) 环境信息素更新。将信息素的挥发和蚂蚁自身信息素的混合对结点信息素浓度的影响考虑进去, 对属性结点的信息素浓度进行更新。

(5) 每次完成遍历性后, 生成新的蚂蚁。把每只蚂蚁的最后一个结点作为下一次迭代的开始, 重复步骤 2。

(6) 输出最优特征子集 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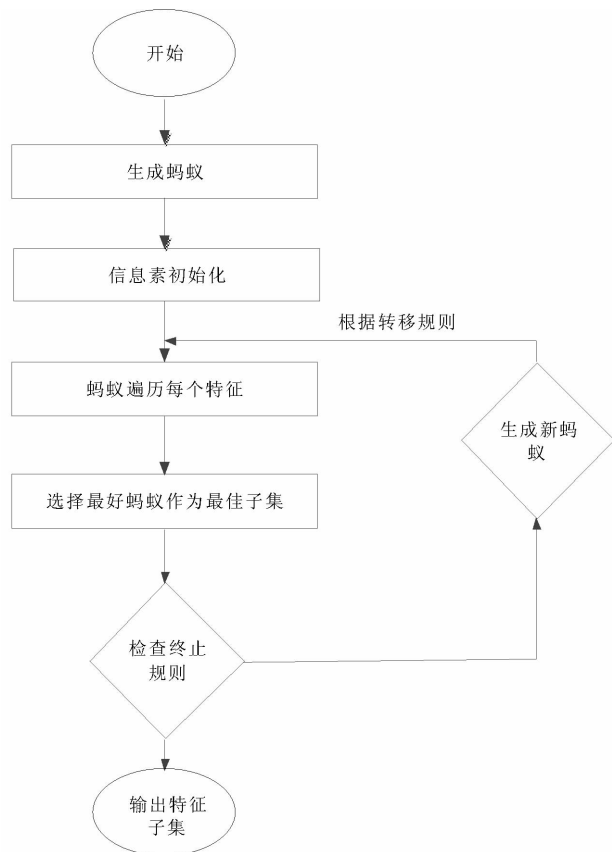


图 3 蚁群优化的特征基因选择算法流程

4 实验仿真

实验采用 Matlab 实验平台, 电脑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配置 CPU 为 Intel I7 处理器, 16G 内存。在进行实验前需要对样本数据集进行归一化处理, 使得每个样本特征属性列的数据都属于 $[0, 1]$ ^[12]。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采用的样本数据为 UCI 数据库的 3 组数据和 Internet 上选定的 2 组数据, 这些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实验数据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数据说明

编号	数据集名称	样本数	特征维数	类别数	数据来源
1	Vote	324	23	2	UCI
2	Zoo	237	25	2	UCI
3	Wpbc	215	21	2	UCI
4	Weather	110	14	2	Internet
5	car	121	20	2	Internet

为了验证算法的优劣,将本文算法与基于贪婪法的特征选择算法在实验数据集上进行测试,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本文算法与基于贪婪法的特征选择实验性能

编号	本文算法		贪婪法	
	准确率/%	时间/s	准确率/%	时间/s
1	0.979	6.541	0.932	9.561
2	0.796	5.567	0.741	8.597
3	0.884	6.412	0.820	8.452
4	0.965	5.789	0.912	7.709
5	0.950	6.698	0.895	8.618

由实验结果可知,基于蚁群优化的特征基因选择算法和传统特征提取算法相比,不管是在准确率上还是在运行速度上都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大大提高分类效果,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5 总结展望

分析了蚁群算法的模型以及现有算法在进行特征选择时存在的不足之处。为了提高蚁群算法的准确性,利用特征对不同数据集的敏感度,寻找最优基因,滤除无关基因,同时引入粗糙集的属性重要度和依赖度,改进蚁群算法的参数选择方法,有效地提高了蚁群搜索的效率。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纪会,高齐圣,徐心和.自适应蚁群算法[J].控制理论与应用,2000,17(1):1-3.

[2] 段海滨,王道波,朱家强,等.蚁群算法理论及应用研究的进展[J].控制与决策,2004,19(12):1321-1326.
 [3] 黄丹凤,祁云嵩,许姗姗.基于粗糙集和蚁群算法的特征基因选择方法[J].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12,22(6):68-70.
 [4] 杨丽.基于Relief和蚁群算法的特征基因选择方法分析[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7,13(32):199-200.
 [5] 景鹏杰.基于多目标蚁群优化算法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5.
 [6] 蔡立军,蒋林波,易叶青.基于蚁群优化算法的基因选择[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8,25(9):2754-2757.
 [7] 张伟娟,张红梅,陈峰.基于蚁群算法的基因路径预测[J].计算机系统应用,2015,24(3):280-283.
 [8] 林振荣.一种基因与蚁群的融合算法研究[J].微计算机信息,2007,23(36):176-177.
 [9] 程智慧.基于蚁群算法的双向聚类问题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2.
 [10] 王聪.改进蚁群遗传算法在设备管理系统中的研究与应用[D].大连:大连交通大学,2010.
 [11] 陈维洋.蚁群算法和编码理论在序列分析中的应用[D].长沙:湖南大学,2009.
 [12] 王德晗,万幼川,王明威,等.改进蚁群算法及其在高光谱影像分类中的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8(1):196-203.

(责任编辑 姚虹)

Feature Gen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HOU Yuanshao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enan Industry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relies on a large amount of data for supervised training, with high-dimensional and small-sample attributes, which in turn leads to dimensional redundancy caused by data redundancy. Aiming at this situation, a feature gene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is proposed. The algorithm optimizes the traditional ant colony algorithm model, improves the parameter selection method of ant colony algorithm, uses the sensitivity of features to different data sets, finds the optimal gene to filter out irrelevant genes, and transforms the feature selection process into the process of ant colony searching the optimal path.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 feature selection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timeliness of the classification while reducing the dimension of the data set.

Key words: Ant Colony Algorithm; feature selection; optimization; data dimension

基于 NES - 双管隔振器耦合系统的动力学分析

李世霖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 天津 300300)

摘要: 阻尼器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土木工程、航空航天等工程领域。研究了非线性能量汇(NES)与双管隔振器相耦合的动力学特性,利用谐波平衡法、牛顿迭代法和弧长延拓法对耦合系统的常微分方程近似解析,并用数值验证解析结果,解析数值一致重合。通过对比系统的幅频响应,证明耦合系统比 NES 系统具有更好的减振性能,研究系统参数对时域和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固有频率附近需要更多的能量输入,进一步分析系统能量的传递关系,结果表明耦合系统具有更高的能量吸收性能。

关键词: 非线性能量汇;弧长延拓法;简谐激励;振动抑制;能量吸收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6.023

中图分类号: O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9)06-0124-05

阻尼器广泛存在于土木工程、航空航天工程和汽车工程等不同领域。NARKHEDE 等^[1]研究了非线性流体黏滞阻尼器在半周期正弦冲击激励下的瞬态响应,并进一步研究了非线性阻尼和附加阻尼对系统的影响。郑璐等^[2]综述了三种非线性黏性阻尼器的研究进展,即非线性能量汇(NES)、粒子冲击阻尼器(PID)和非线性黏滞阻尼器(PTC),并对非线性刚度和非线性阻尼进行了分类。方智伟等^[3]研究了非线性能量汇(NES)与超磁致伸缩材料(GMM)相耦合的新模型,并对系统进行了振动控制和能量采集。徐兆东等^[4]研究了一种阻尼性能更好的小变形、高承载的冲击减振装置,并对物料和空气弹簧进行了考虑和建模。为了实现在航空航天工程中的应用,戴宏华等^[5]建立了精确的生物激励分离模型,分析了在地面和空间环境中的减振性能。PEPE 等^[6]提出了一种变分反馈控制器,并将其应用于半主动激波中,证明了其在突变处理上的优良性能。张玉新等^[7]研究了一种 S 型双腔振幅敏感阻尼器,通过提供连续的阻尼力,系统可以平稳地在低阻尼和高阻尼之间切换,为车辆的乘坐舒适性和

行车安全性能提供了优化设计。此外, NIE 等^[8]研制了一种与速度相关的阻尼器,可以获得半主动阻尼器的动态性能,而且结构更加简单紧凑。

采用谐波平衡 - 弧长延拓法对 NES - 双管隔振器耦合系统进行相关分析。先建立一体化耦合系统的非线性振动方程^[3,9-10],运用谐波平衡 - 弧长延拓法研究系统在基础简谐激励下的稳态响应。通过研究耦合系统和 NES 系统位移幅频响应的最值,结果表明耦合系统具有更好的减振性能。对比分析系统参数对时域和功率的影响,揭示各参数对耦合系统的动态响应,并进一步通过系统的能量传递关系,验证一体化耦合系统在能量吸收方面的优良性能。

1 系统模型

系统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9],双管隔振器产生阻尼力的油液存在于三个不同的油室,即储油室、增压室和回弹室。两个进出油液的阀门分别安装在活塞和静态阀座上,分别称作压缩阀和回弹阀。在压缩行程中,增压室的压力增大,然后打开压缩阀和压缩基阀,增压室体积减小,在油液流经压缩阀和孔口时产生阻尼力。在油液流过压缩阀和节流口时,开启进气

收稿日期:2019-09-30

作者简介:李世霖(1993—),男,山东青岛人,中国民航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叶片优化分析研究。

阀和压缩基阀,增压室体积减小,产生压缩阻尼力。相似地在回弹行程中,回弹室的液压升高,而负压发生在增压室。因此,回弹室和储油室中的油,通过两个回弹阀和回弹孔流入增压室,产生回弹阻尼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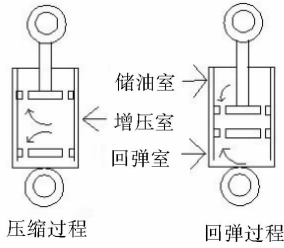


图1 工作原理

如图2给出了NES-双管隔振器耦合系统连接在一个线性主系统上的力学模型。由牛顿第二定律列出如下非线性控制方程^[3]

$$\begin{cases} m_1 \ddot{x}_1 + k_1(x_1 - x_0) + c_1(\dot{x}_1 - \dot{x}_0) + \\ k_2(x_1 - x_2)^3 + c_2(\dot{x}_1 - \dot{x}_2) + F_D = 0, \\ m_2 \ddot{x}_2 + k_2(x_2 - x_1)^3 + c_2(\dot{x}_2 - \dot{x}_1) - F_D = 0, \\ F_D = c_d(\dot{x}_1 - \dot{x}_2). \end{cases} \quad (1)$$

其中: m_1, k_1 和 c_1 分别为单自由度卫星系统的质量、刚度和阻尼; m_2, k_2 和 c_2 分别为 NES 的质量、非线性刚度和阻尼; x_1 为单自由度卫星系统的位移, x_2 为 NES 系统的位移; F_D 为双管隔振器提供的等效阻尼力^[9], c_d 为油液的等效阻尼。在发射阶段卫星所受到的位移激励 x_0 作用在基座上,可以表示为:

$$x_0(t) = A \sin(2\pi f_i t) \quad (2)$$

其中 A 为基础位移幅值, f 是激励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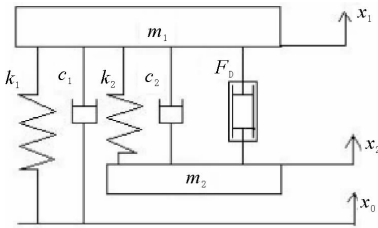


图2 系统模型

2 对比分析

由于整星隔振系统是强非线性激励系统,通过谐波平衡法对方程(1)进行近似求解,假设方程(1)的谐波解满足如下形式:

$$\begin{aligned} x_1(t) &= a_{11} \cos(\omega t) + b_{11} \sin(\omega t) + \\ &\quad a_{31} \cos(3\omega t) + b_{31} \sin(3\omega t) \\ x_2(t) &= a_{12} \cos(\omega t) + b_{12} \sin(\omega t) + \\ &\quad a_{32} \cos(3\omega t) + b_{32} \sin(3\omega t) \end{aligned} \quad (3)$$

其中 a 和 b 表示一阶、三阶傅里叶系数($i = 1, 3; j =$

1, 2)。将方程(2)(3)代入方程(1),借助 mathematica 的符号推导功能,对代数方程组进行推导和简化得到 $\cos(\omega t), \sin(\omega t), \cos(3\omega t)$ 和 $\sin(3\omega t)$ 系数分别相等的 8 个代数方程式。在给定的激励频率下,通过牛顿迭代法和弧长延拓法进一步求解方程,最终可以求得控制方程的解。

根据文献[3][9][10]选取如表1所示的系统参数,并将相关参数代入整星隔振控制方程,研究耦合系统在振动抑制和能量传递方面的性能。

表1 系统参数

参数	数值
m_1	60 kg
m_2	7 kg
c_1	10 Ns/m
c_2	100 Ns/m
c_d	300 Ns/m
k_1	$2.1346 \times 10^6 \text{ N/m}^3$
k_2	$5 \times 10^6 \text{ N/m}^3$
A	0.0002 m

图3为通过谐波平衡-弧长延拓法与四阶龙格库塔法分别求解系统幅频响应得到的结果对比图,研究表明解析解和数值解高度重合,证明了研究方法的正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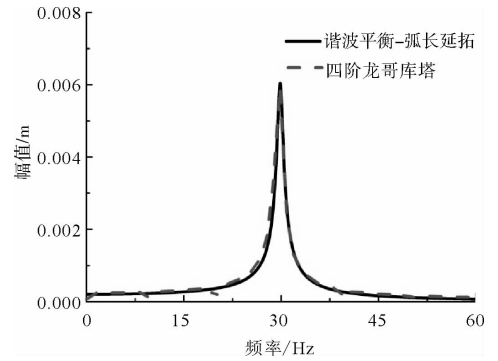


图3 解析解与数值解

图4给出了双管隔振器对耦合系统的位移幅值响应的结果对比图,NES-双管隔振器耦合系统更好地实现了对卫星主系统的振动抑制,并在固有频率附近将整星系统位移降低到原来的 35.2%,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减振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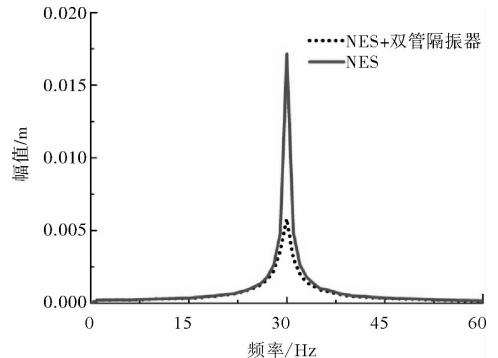


图4 系统减振效果图

3 参数分析

图5为外激励幅值 A 分别是 0.0001, 0.0002, 0.0003m 时与主系统位移幅值的结果对比图。研究表明,系统位移随外激励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可以通过对比外激励的幅值来研究主系统的减振性能。图6给出了双管隔振器等效阻尼 c_d 分别为 100, 300 和 500 Ns/m 时与主系统位移幅值的结果对比图。研究表明,系统位移随着等效阻尼的增大而减小,因此选择合适的等效阻尼参数可以实现更好的系统减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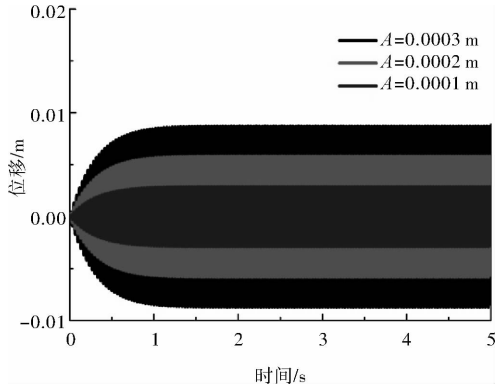


图5 外激励与位移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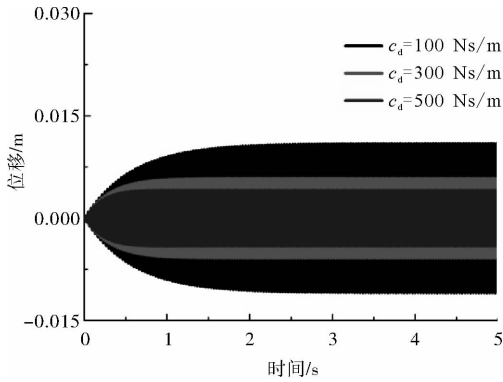


图6 等效阻尼与位移响应

双管隔振器工作时的平均功耗为^[9]

$$P = 2\pi^2 c_d (x_1 - x_2)^2 f = 0.5 c_d (\dot{x}_1 - \dot{x}_2)^2 \quad (4)$$

图7为外激励幅值 A 分别是 0.0001, 0.0002, 0.0003 m 时与所需功率的结果对比图。在相同频率下,随着外激励幅值的增加平均功耗随之增加,并在固有频率处达到最大值。研究表明,随着外激励幅值的增大,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实现系统减振。图8给出了双管隔振器等效阻尼 c_d 分别为 100, 300 和 500 Ns/m 时与所需功率的结果对比图。在相同频率下,平均功耗随着等效阻尼的增加而减小,在固有频率处减小的效果更明显。因此,通过增加隔振器流体的压强,可以提高系统等效阻尼的效果,进而在相同功率下可以实现更好的系统减振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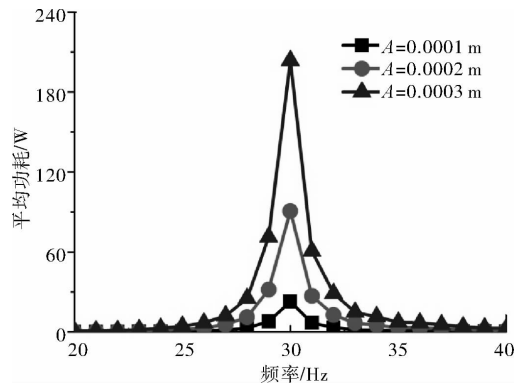


图7 外激励与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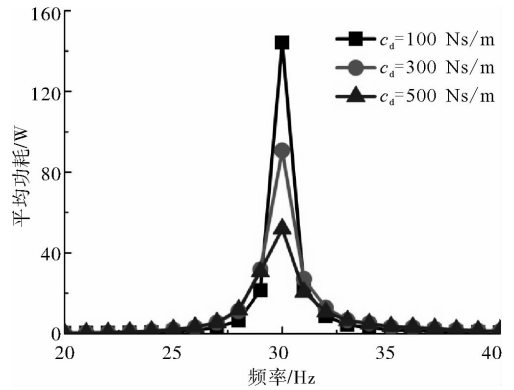


图8 等效阻尼与功率

4 能量关系

根据能量守恒原理,系统的总能量 $E(t)$ 表示为^[3]

$$E(t) = T_{ps}(t) + V_{ps}(t) + W_{ps}(t) + T_{NES}(t) + V_{NES}(t) + W_{NES}(t) + E_D(t) \quad (5)$$

其中: $T_{ps}(t)$ 和 $V_{ps}(t)$ 分别为基础结构响应的动能和势能; $W_{ps}(t)$ 为基础阻尼的耗散能。 $T_{NES}(t)$ 和 $V_{NES}(t)$ 分别为 NES 系统的动能和势能; $W_{NES}(t)$ 为 NES 阻尼的能量耗散; $E_D(t)$ 为双管隔振器等效阻尼耗散能^[9]。

各能量计算如下^[3,11]:

$$T_{ps}(t) = \frac{1}{2} m_1 \dot{x}_1^2(t) \quad (6)$$

$$V_{ps}(t) = \frac{1}{2} k_1 [x_1(t) - x_0(t)]^2 \quad (7)$$

$$W_{ps}(t) = \int_0^t c_1 [\dot{x}_1(t) - \dot{x}_0(t)]^2 dt \quad (8)$$

$$T_{NES}(t) = \frac{1}{2} m_2 \dot{x}_2^2(t) \quad (9)$$

$$V_{NES}(t) = \frac{1}{4} k_2 [x_1(t) - x_2(t)]^4 \quad (10)$$

$$W_{NES}(t) = \int_0^t c_2 [\dot{x}_1(t) - \dot{x}_2(t)]^4 dt \quad (11)$$

为了深入研究 NES 与双管隔振器的内部机理,对系统中输入能量的分布进行了初步的计算。当系统受基础位移激励时,对整星隔振系统进行相关能

量计算,基础系统吸收的能量占输入总能量的百分比表示为

$$\eta_{PS} = \frac{T_{PS}(t) + V_{PS}(t) + W_{PS}(t)}{E(t)} \times 100\% \quad (12)$$

NES - 双管隔振器耦合系统吸收的能量占输入总能量的百分比表示为

$$\eta_{NES-D} = \frac{T_{NES}(t) + V_{NES}(t) + W_{NES}(t) + E_D(t)}{E(t)} \times 100\% \quad (13)$$

图9给出了双管隔振器等效阻尼 c_d 分别为 100,300 和 500Ns/m 时与基础能量吸收的结果对比图,在固有频率下基础能量吸收率随等效阻尼的增加而减小。研究表明,适当增加系统的等效阻尼,基础可以传递更多的外激励能量。图10给出了双管隔振器等效阻尼 c_d 分别为 100,300 和 500Ns/m 时与耦合系统能量吸收的结果对比图。在固有频率下,耦合系统能量吸收率随着等效阻尼的增加而减小。研究表明,适当增加等效阻尼的参数,耦合系统可以耗散更多机械能,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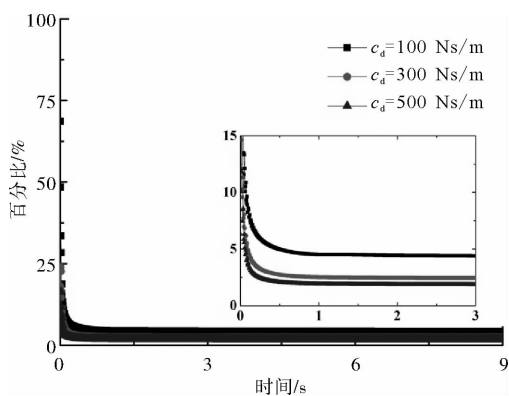


图9 基础能量吸收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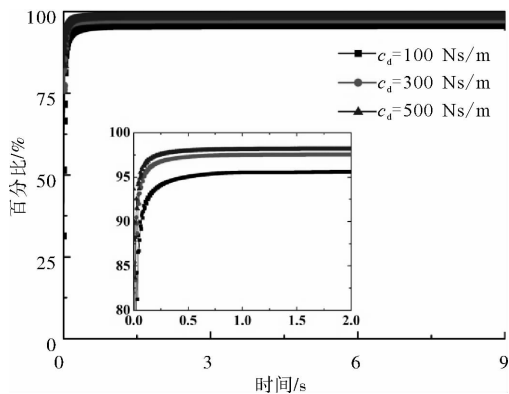


图10 耦合系统能量吸收对比

图11给出了双管隔振器对基础系统能量吸收的结果对比图。在基础系统受到外激励时,NES - 双管隔振器耦合系统比单一 NES 系统更好地实现

了对卫星主系统的能量转移,并在 9s 后提升了 5.74% 的能量传递效率,表明耦合系统具有更优良的能量吸收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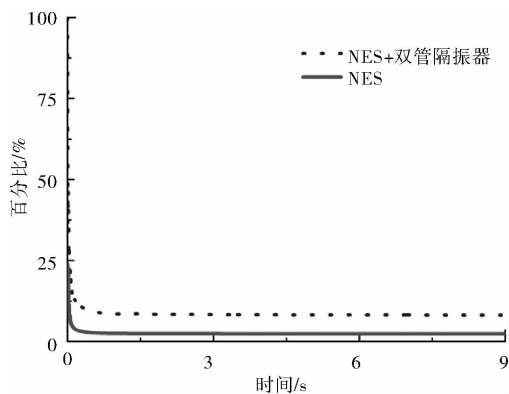


图11 有无隔振器对基础能量吸收的影响

图12相应的给出了双管隔振器对耦合系统能量吸收的结果对比图。在基础系统受到外激励的 9s 时间内耦合系统吸收了主系统能量的 97.60%, NES 系统吸收了主系统能量的 91.86%,结果表明耦合系统的能量耗散率比单一 NES 系统提高约 5.74%,再次证明耦合系统具有更优良的能量吸收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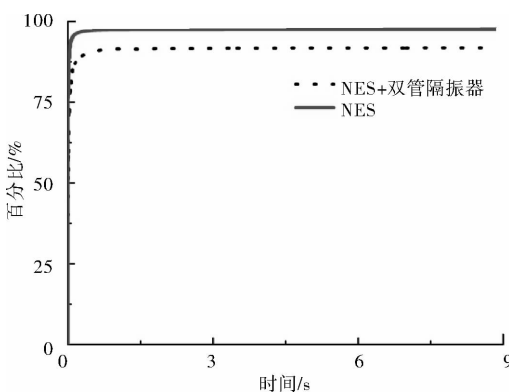


图12 有无隔振器对耦合系统能量吸收的影响

5 结论

研究 NES - 双管隔振器一体化耦合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响应和能量耗散,通过谐波平衡 - 弧长延拓法和四阶龙格库塔法验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讨论双管隔振器对主系统位移幅值的影响,并进一步对比分析系统参数对时域和功率的影响,研究耦合系统能量吸收的变化情况。得到以下结论:

- (1) 谐波平衡 - 弧长延拓法的近似解与四阶龙格库塔法的数值解高度一致,验证了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 (2) 对比分析主系统的幅频响应,结果表明耦合系统比单一 NES 系统,具有更优良的减振性能。
- (3) 研究双管隔振器对系统的能量吸收的影响。

响,结果表明耦合系统的能量吸收率比单一 NES 系统提高约 5.74%。

参考文献:

- [1] NARKHEDE D I, SINHA R. Behavior of nonlinear fluid viscous dampers for control of shock vibrations [J]. Sound Vib, 2014, 333:80 – 98.
- [2] ZHENG L, WANG Z, ZHOU Y, et al. Nonlinear dissipative devices in structural vibration control: a review [J]. Sound Vib, 2018, 423:18 – 49.
- [3] FANG Z W, ZHANG Y W, LI X, et al. Integration of a nonlinear energy sink and a giant magnetostrictive energy harvester [J]. Journal of Sound & Vibration, 2017, 391: 35 – 49.
- [4] XU Z D, XU Y, YANG Q, et al. Tests and modeling of a new vibration isolation and suppression device [J]. Dyn Syst Meas Contr, 2017, 139:121011.
- [5] DAI H H, JING X, SUN C, et al. Accurate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a bio – inspired isolation system: with application to on – orbit capture [J]. Mech Syst Sig Process, 2018, 109:111 – 133.
- [6] PEPE G, CARCATERRA A. Variational feedback controller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emi – active suspensions [J]. Mech

Syst Sig Process, 2016(8): 72 – 92.

- [7] ZHANG Y X, GUO K, LI S E, et al. Prototyping design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of membranous dual – cavity based amplitude selective damper [J]. Mech Syst Sig Process, 2016, 76:810 – 822.
- [8] NIE S, ZHUANG Y, WANG Y, et al. Velocity & displacement – dependent damper: a novel passive shock absorber inspired by the semi – active control [J]. Mech Syst Sig Process, 2018, 99:730 – 746.
- [9] DONG G, XING J J, SHEN H, et al. Test and simulation the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twin tube shock absorber [J].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2019, 122: 707 – 719.
- [10] FANG Z W, ZHANG Y W, LI X, et al. Complexification – averaging analysis on a giant magneto – strictive harvester integrated with a nonlinear energy sink [J].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s, 2017, 140(2):021009 – 021014.
- [11] XIONG L, TANG L, LIU K, et al. Broadband piezoelectric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using a nonlinear energy sink [J]. Journal of Physics D Applied Physics, 2018, 51(18): 185502.

(责任编辑 姚虹)

Dynamic Analysis of Coupling System Based on NES – Twin Tube Shock Absorber

LI Shilin

(College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Damper is widely utilized in different engineering fields, such as automotive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etc. In this paper,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nonlinear energy sink (NES) coupled with double – tube isolators are studied. Harmonic balance method, Newton iteration method and arc length extension method are used to approximate th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of the coupled system, and the analytical results are numerically verified. The analytical values are consistently coincident. By comparing the amplitude – frequency response of the system, it is proved that the coupled system has better damping performance than the NES system.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system parameters on time domain and pow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energy input is needed near the natural frequency. Furthermore, the transmission relationship of system energy is further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ed system has higher energy dissip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nonlinear energy sink; arc length extension method; simple harmonic excitation; vibration suppression; energy dissipation

《中州大学学报》2019 年总目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 关于中西方生态文化思想的对话 鲁枢元,张嘉如(1-1)
- 当代文化地理散文创作的新趋势(笔谈)
- 地缘意象跨体写作的发生
——我看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 王一川(1-7)
- 直指源头和根本的极致文本
——读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 高兴(1-9)
- 险笔徘徊
——刘恪《一滴水的传说》的元体写作 胡继华(1-11)
- 大地之上绝无尺规
——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阅读随感 沈念(1-13)
- 雕刻一滴水
——读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 张新赞(1-15)
- 惯例拒役者:文体作为一种创作实践 李海英(1-16)
- 论塔克视角下的儒道生态智慧 岳芬(1-19)
- 非虚构写作:时代呼唤人性觉醒与群体意像表达 张林贺(1-24)
- 俄国文学的多元生态
——《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观察 耿海英(2-1)
- 物哀之美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 杨光祖,张亭亭(2-8)
- 从此找到作为作家的那个自己
——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和铁凝的《棉花垛》比较研究 刘海燕(2-12)
- 论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观的形成 王萍(2-17)
- 俄国文学的几场论争 耿海英(3-1)
- 宋朝书家那些有意思的事儿
——序《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 何弘(3-10)
- 论《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的叙事艺术 墨白(3-12)
- 论《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的境界
——以小说《莲荷图》为例 刘恪(3-14)
- 《宋真宗的朝野》序言 艾云(3-16)
- 以史学家的态度写小说 张晓林(3-18)
- 荒诞世界中的一线希望
——评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 李欣(3-21)
- 俄国文化的一个意外
——别尔嘉耶夫论维·伊万诺夫 耿海英(4-1)
-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谭旭东(4-7)
-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与文学风貌 施新佳(4-12)
- 社会转型期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惯性
——以墨白《局部麻醉》和汪曾祺《陈小手》中的人物为例 饶丹华(4-17)
- 新世纪河南文学论
——《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导言 李勇(5-1)
- 从女神崇拜到男尊女卑
——中日古代女神的比较研究 林祁,薛晨(5-10)
- “坎普”的两幅面孔:从《霸王别姬》和彩虹合唱团现象看“坎普”的中国表达 柯英(5-17)
- 李渔《闲情偶寄》语言风格简论 惠萍(5-25)
- 时代映像:“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长长背影 刘忠(6-1)
- 摹状那时的民众
——漫谈范若丁和他的创作 艾云(6-8)
- 《搜神记》中的民间叙事研究 郭艳(6-18)

· 经济与管理 ·

乡村振兴背景下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发展问题分析
——以聚峰谷油橄榄田园综合体为例 兰虹,熊雪朋,汪俐君,胡颖洁(1-30)

基于城际铁路沿线的休闲空间资源评价 舒菁英(1-35)

“亚太再平衡”战略及 TPP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郭琰(1-39)

中原城市群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彭鹏,周莹(2-23)

河南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赵明成,周凤杰,鲁小波(2-29)

郑州市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力研究 郭国峰,李玲玲(2-34)

河南省家庭农场发展的优势和阻碍因素及对策建议 张长江(2-38)

基于 DEA 模型的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实证研究 曲涛,王雪梅,陈婷婷(3-25)

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以河南省为例 余兵(3-31)

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杨慕(3-35)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程慧,徐琼(4-21)

基于低碳经济理念的食品安全路径新探 向媛秀(4-28)

我国电竞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堕距”问题探讨 李大伟,鞠增平(4-33)

全域旅游视角下我国省域旅游竞争力研究 王庆生,刘诗涵(5-29)

沙集电商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优化路径探析 刘建军(5-36)

中原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
——基于 2000、2018 年截面分析 周倩(5-41)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研究 杨德玲,刘战伟(6-30)

边境旅游发展水平的地域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赵建平,明庆忠(6-36)

· 文化传承与创意 ·

地域性城市规划中色彩与文化的融合研究 刘爽(1-43)

济源市“一山一水一精神”文化品牌及时代价值 段亚利(1-47)

新时代城市品位提升机制与品牌延伸对策 陈高雅,赵学义(2-51)

毁灭·沉沦·涅槃
——颓废主义语境中的电影《雷神 3:诸神黄昏》 田源(2-56)

河洛文化“可久可大”之道与文化自信 王灿(2-60)

河南打造中原文化高地刍议 胡永启(4-51)

海南疍家人的民俗文化及其旅游开发 黄丽华(4-55)

“诗意栖居”塑造中小城市文化品位
——以宣城为例 王建(4-59)

林语堂想象中的“文化中国” 潘水萍(6-81)

改革开放四十年河南姓氏文化寻根述论 陈建魁(6-87)

· 法学研究 ·

危机与变革: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冲突的时代境遇 吴留戈(1-56)

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的完善 张玮智(1-62)

论基因编辑的风险及法律规制 陈博文,胡尚慧(2-42)

我国轻罪制度构建的困境及对策 苏冠宇(2-47)

从文化自信角度再认识清末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 郭威(3-39)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评价、分析及建议 任丙超(3-44)

论司法大数据在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中的运用 王工厂(3-50)

盗用个人跨境电商额度的刑法规制和治理 陈禹衡,尹航(4-40)

养老保障地方立法与执法思考 祁雪瑞,张书占(4-46)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认定及其规制 鞠真(5-46)

“一带一路”创新下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邓文(5-52)

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缺位及建构路径
——基于空间正义视角 管其平(6-43)

· 社会学与历史 ·

大唐县令元德秀 薛存心(1-66)

年龄分层理论与精准为老服务 纪 红(1-70)

北海骑楼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保护开发对策 庞广仪,陆一萍(2-64)

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中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研究
——以 A 省 B 市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王 蕾(2-69)

爱之以道:习近平家风理论的分层解构及哲学基础 张书霞(2-74)

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的溺婴现象 李俊丰(4-63)

古代民间信仰的和谐语境:基于借鉴《周易》智慧 黄德锋(4-69)

汉代铺首衔环的造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杨 远,朱畅然(6-70)

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及其对新时代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价值研究 王 沛(6-77)

· 传媒与艺术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原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建构研究 刘 杨,李莎莎(1-74)

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研究进展与前瞻
——基于 CNKI 期刊文献的统计分析 周良发,潘 红(1-78)

论夏承焘点读词籍的方法 胡永启(1-83)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语境、现状与路径探析 李 纲,林 璐(3-56)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建构经验与借鉴
——以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为例 刘 杨(3-61)

新媒体视域下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吕 雯(3-65)

年轻父母的晒娃习惯及其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认知调查 祁 涛,景聪会(4-7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设计及实践路径探析 林 璐,刘 杨(4-79)

打通最后一公里
——加强网络新闻舆论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思考 邓帅杰(4-83)

融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韩燕飞(4-88)

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几点看法 陈国剑(5-75)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两会新闻报道特点研究
——以 2018—2019 年两会新闻报道为例 王 莹,秦双飞(5-80)

新媒体语境下国企宣传与舆论环境优化 白昌中(5-85)

人工智能对传媒业影响及发展趋势分析 朱 涛,黄 夏(6-55)

媒介视角下维新报刊的政治中介作用及其实现 许 莹(6-60)

新时代残疾题材影视作品传播影响力及策略分析 唐海龙(6-65)

· 语言文化与翻译 ·

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马 静(1-87)

“一带一路”背景下桂剧《大儒还乡》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 陈春兰(1-91)

汉英政治漫画中动物隐喻异同的认知研究 王亚聪(1-95)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研究 陈双双(3-69)

红莲相依浑如醉
——漫议普通话与方言 孟昭泉(3-75)

韩国手语研究概况 傅吉莲,辛承姬(3-80)

汉藏语系诸语言里调类生成的两大模式 金有景(5-57)

徽州民歌中乡土语言模因解读与传译 谷 峰(5-62)

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对比研究 程张根,曹 琳,汪雅雪(5-66)

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与提升:“一带一路”新闻语篇的积极话语分析 徐 靖(5-70)

· 教育与教学 ·

新工科视阈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汤丽萍(1-100)

以习近平新时代思想推动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	谭笑风(1-105)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张 勇(1-110)
中职学校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崔 蕾(1-115)
微课提升艺术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及实现路径研究	于 雪(1-120)
“健康中国”视野下大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研究	耿子轩(1-125)
高校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几点思考	苏 炜,汪 菁(2-80)
新工科理念下地方本科院校培养人才特征	李宏德(2-84)
基于学科特性的人文学科人才评价机制研究	吕鹏娟(2-90)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马耀锋,李红丽(2-95)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实证研究	周春辉(3-87)
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仲 岩(3-92)
应用技术型院校发展的实践逻辑	周书焕(3-9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钱昌照,张晓丹(3-102)
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调查分析	张菁菁(3-106)
土木工程安全意识纳入学生培养全过程的探索	汪 菁(4-92)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姚 瑶(4-96)
新时代高校廉政档案建设研究	巩善鑫(4-102)
新时代背景下教育信息化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发展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周芬芳(5-89)
智慧教室环境下高校情景教学模式的变革路径探究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胡 钰(5-95)
兰州市教师礼仪素养现状调查及提升路径研究	赵爱婷,张晓玉,高雪琴(5-100)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职业技能培养模式研究	李 敏(5-105)
基于《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开展思政教育的几点认识	苏 炜(6-91)
“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路径研究	和 伟(6-96)
德国语言文学类博士生跨学科结构化培养研究 ——以柏林自由大学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文学研究院为例	张 宇,高 稳(6-101)
思想政治教育的“势”“市”“适”“是”探析	王苏琪(6-107)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硼酸对聚乙烯醇凝胶的性能影响研究	姬春梅(2-99)
7059 铝合金热处理工艺及力学性能研究	康 永(2-105)
稀土掺杂煤系高岭土介孔材料的合成及催化性能	杨高峰,康 浩,潘文平(2-111)
稀土 Ce^{3+} , Sm^{3+} 掺杂 $Ca_3SiO_4Br_2$ 的制备及发光性能研究	王 坤(2-116)
几种不同的化学预处理方法对甜高粱秆酶解糖化效果的影响	孙子庆,周 芳,康 静,冯 冲(2-121)
基于 Python Tkinter 课堂手机监管系统的设计	张喜红,王玉香(2-125)
门式启闭机主梁疲劳寿命预估研究	王继东,孙建廷(3-112)
Ce 和 Nd 对多道次固相合成 AZ31-RE 镁合金腐蚀性能的影响	康 永(3-116)
提高 VC 6.0 中函数执行时间测试可信度的研究	张合花,张全法,马 冰(3-121)
大数据流式计算框架的任务调度优化方法研究	梁秋红,郝雅萍(3-125)
非常规条件下骨架隔墙饰面板裂缝的对策研究与应用实践	焦 涛,袁新华(4-107)
碎石桩加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的应用	于德国,郑敏丽,张 彬,宁亚瑜,徐鑫哲(4-112)
聚二甲基硅氧烷杂化材料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豆高雅(4-116)
降糖因子铬调素的制备	闵玉涛,宋彦显,马庆一,刘 鑫(4-121)
基于 MATLAB 的汽车动力性参数的确定	李 静,李晓锋(4-125)
小麦谷朊蛋白的改性研究及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王建中,姚 虹(5-109)
盐胁迫下不同地锦属植物的生理响应及耐盐性研究	孙浩冉,孙 森(5-114)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测定谷物中铅、铬、镉及不确定度评定	张 强,徐 惠,曹雅莉,王 萍,张小琴(5-119)
共享平台建设背景下云计算在老人智能看护系统开发中的应用前景	孔 健(5-125)
河南辛夷 SRAP 分子标记的引物筛选	王 岚,张 宏,李靖婧(6-112)
纳米二氧化硅/淀粉/聚乳酸三元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研究	豆鹏飞(6-116)
基于蚁群优化的特征基因选择算法	侯远韶(6-120)
基于 NES-双管隔振器耦合系统的动力学分析	李世霖(6-124)